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修订本）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E HANXUE LUNCONG

[美]朱学渊 著

世界汉学论丛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修订本）

〔美〕朱学渊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美)朱学渊著,—北京:中华书局,2004重印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101-03336-9

Ⅰ.中… Ⅱ.朱… Ⅲ.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Ⅳ.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6809号

书　　名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修订本)
编 著 者　〔美〕朱学渊 著
责任编辑　柴剑虹　张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5月北京第1版
　　2004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1　字数252千字
印　　数　300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336-9/K·1440
定　　价　26.00元

朱学渊博士，1942 年生于广西桂林，1965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馀载。1978 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1983 年在美国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 年前曾于美国能源部属下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涉及固体物理诸多理论课题。1987 年起在美国经商。朱学渊博士以其自然科学学力，却有志于人文科学的探索。他从中国史料中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为争论不休的历史、语言、人类科学的难题，洞察出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原　族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修订本序

周 策 纵

朱学渊博士把他2002年5月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寄来，说准备出修订版，并要我写一篇序。我早先就读了他第一篇文章“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他说Magyar（读“马扎尔”，即匈牙利），事实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靺鞨”族。他从“语言、姓氏、历史故事和人类互相征伐的记载中”，勾画出了一个“民族”的始末来，旁征博引，我认为有很大的说服性。后来他又讨论了通古斯、鲜卑、匈奴、柔然、吐火罗等许多种族和语言，一共收辑了九篇论文，还有“附录”和“后记”，就成了本书。

大家都知道，19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一些汉学家由于兼识多种语言，而对中亚、远东诸族的姓氏和源流，多有研考，成绩可观。如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1865—1943）、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ri Maspero, 1883—1945）等尤为显著。中国的冯承钧（1887—1947）翻译了不少他们的著作。其实是应该全部都译成中文的。中国学者懂这些语言的太少，像陈垣、陈寅恪都已经去世

了，季羡林教授又已年老。将来只能靠年青一代。

学渊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不但索源，并且穷流，指出亚、欧种族和语言融合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尤其难得的是，他本来是学物理学的，能不受传统人文学科的拘束，独开生路，真是难能可贵。读了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之后，不免有许多感想，这里只能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第一，中国人"族"的观念起源很早。至少于三千五百年前甲骨文中的"族"字，就是在"旗"字下标一枝或两枝"矢"（"箭"）。丁山解释得很对，族应该是以家族氏族为本位的军事组织。这种现象在北方诸族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旧唐书·突厥传下》说的：

> 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为十箭焉。……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

这里的"箭"，本义为"权状"或"军令"，后来则转义为"部落"了。又像满洲"八旗制度"，将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满语 *niru*，义为大箭）。因此"八旗制度"和"十箭制度"，也都在"旗"下集"矢"，是军事性的氏族组织。"族"与"矢"的这种关系，可以说中原汉族和北方民族是习习相通的。学渊说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这或许是个合理的证据。

箭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对这个字的研究，自然非常重要。它在匈牙利语中是 *nyil*，芬兰语中为 *nuoli*，爱沙尼亚语中为 *nool*，竟都与满语的 *niru* 如此相近；而汉语中的相关词汇"弩"、

“砮”等，是否与之相关？也很值得深思。中国古文字研究，重“形”和“义”之解释，固然有其特殊贡献，但忽略“语音”的构拟，已经被诟病得很久了。总有一天是要兼走这条路的，而舍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恐怕不能成功。

第二，关于唐太宗征辽东（高丽）的战争，正史的很多记载并不真实。在学渊的《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一文中，他详细叙述了这场战争，但引用的却多是中国官史的说法。多年前，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一位美国朋友赠我一文。他根据高丽方面的记载，说贞观十九年（645）六月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之战，因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来救，直抵城东八里，依山布阵，长四十里，抵抗唐军。唐太宗亲自指挥李世勣，长孙无忌、江夏王李道宗（太宗的堂弟）等攻城，然而经过三个月还不能攻下。后来因为太宗中箭，只得在九月班师。

可惜这篇文章一时找不到了，我只能根据中国史料来重构一些真相。而中国官方记录都是一片胜利之声，实在离真实很远。据《资治通鉴》说安市之战时，李道宗命傅伏爱屯兵山顶失职，高丽兵夺据土山。太宗怒斩伏爱以徇，李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太宗说“汝罪当死”，但“特赦汝耳”。据我看，太宗中箭，大约即在此时。而靺鞨兵善射，太宗可能就是中了靺鞨之箭。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说：“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馀，悉坑之。”同书《高丽传》所说的“诛靺鞨三千馀人”，当是同一件事。太宗对高丽军都很宽恕，独对靺鞨人仇恨，必非无故。九月班师，《通鉴》说是“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其实都只是借口。

《通鉴》又说，这年十二月太宗突然患痈疽，“御步辇而行”；“至并州，太子（李治）为上吮痈，扶辇步行者数日。”还有侍中兼民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刘洎，本是太宗的亲信大臣，“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太宗居然用“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政”的罪名，赐他自尽。其实他不过是透露了太宗受箭伤的消息，竟惹来了杀身之祸！

《通鉴》还说，二十年二月，“（太宗）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阳历三月二十九日），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褚遂良谏太宗多给太子一些闲暇，说明太宗已把责任都交给太子了。二十二年五月，太子率更长史王玄策击败天竺（印度），得其方士那逻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太宗令他“采怪药异石”，以求“延年之药”。据我看，太宗是想要治箭疮。二十三年（649），五月己巳（阳历七月十日），太宗服丹药反应崩驾。他死后四天才发丧。当时宣布他年五十二，实际只有五十岁。

中国后世史家，甚至写唐史的人都很少留心敌人方面的记载。我只注意到钱穆先生的老师吕思勉在他的《隋唐五代史》里曾怀疑官方的说辞。他说：

> 新唐书高丽传曰：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馀，马死什七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通鉴曰：战士死者几二千人，马死者什七八。）此乃讳饰之辞，岂有马死什七八，而士财（才、仅）丧百一之理？

当然，他还没有注意到高丽方面的记录，可是有此见解已很不容易

了。

第三,关于李唐家族的血缘,前人也有些研究。陈寅恪曾发表两篇论文,认为唐朝皇室基本出于汉族。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一文反驳。陈寅恪又写了“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来答复。陈说:李唐祖先李熙及妻张氏皆汉族,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亦皆汉族,其子李虎自系汉族,虎妻梁氏固为汉姓,但发现有一例为胡人,乃只好作为可疑了案。陈寅恪是依传统,以男性血缘为主,所以终于认定李唐为汉族。

依照我从男女平等的看法,张姓本多杂胡姓,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种。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其妻独孤氏(即匈奴屠各氏,后改刘氏)当是胡族,他们的儿子李渊(高祖)必是汉胡混种,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渊的妻子窦氏(太宗之母)乃纥豆陵毅之女,更是鲜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高宗的母亲),是拔拔氏(史亦称拓拔氏,也就是拓跋氏),高宗身上汉血的成分已很少很少了。

据陈寅恪考定,高宗做太子时,即烝(上淫曰烝)于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太宗死后便直接娶了她。为了避免显得他是直接娶了父亲的爱妾,便又伪造武则天先在感业寺为尼,然后才把她娶来的假故事。这虽像掩耳盗铃,但于胡血甚浓的李唐家族来说,从“父死,妻其后母”的胡俗,又有什么可惊怪的呢?皇族还可略加追索,至于一般老百姓,当然更是一篇胡涂帐。

中国历来对姓氏和血缘的研究就不用心,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姓氏之学……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姚薇元于抗战前师从陈寅恪,他在1963年出版《北朝胡姓考》,于“绪言”中说自己是“以蚊负山”,也不为无故。

第四，这里还必须指出，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六月己卯（阳历七月二十八日）因病去世，实年仅三十五。她的英年早逝，对唐朝的命运关系重大。身为皇后的她，既好读书，又反对外戚弄权。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她向太宗说：“不愿私亲更据权于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新唐书·后传》）太宗不听，任无忌为尚书仆射，即宰相之职；她却勉强要哥哥辞谢了。她一死，无忌就当了权，扶持了外甥李治做太子。亲征高丽时，有人建议直取平壤，无忌却主张先攻安市，结果有太宗的中箭。

后来高宗因常患“风眩”，一切由武则天控制。她把唐朝宗室几乎杀尽，连太宗的爱女和女婿，和她自己的儿女也遭诛杀。长孙无忌遭贬谪赐自尽，褚遂良则死于贬所。武则天终于篡了天下，做了皇帝。说来，在玄武门事变中，太宗把同母兄太子建成射死；自己后来也因中箭伤而崩驾，可谓报应不爽。而他让人把胞兄建成和胞弟元吉的头割下来示众，还把他们的十个儿子都杀光。时元吉仅二十三岁，想必他的五个儿子不过几岁，小孩又有何罪？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通鉴》则评得更痛快：“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仪刑（模范）也，后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摹拟），以为口实（借口）乎！”那几代皇帝都要靠军队平难，方能继位。太宗虽然是一个历史上的好皇帝，但他也为本朝后人树了坏规矩。上述的这些恶果，多少与长孙皇后和魏征的早死有关。魏征死于征辽的两年前。太宗在战事失败后，曾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服丹药丧命，也是皇室的坏榜样，赵翼的书中就有“唐诸

帝多饵丹药”一条，说贞观二十一年高士廉卒，太宗欲去吊唁，房玄龄谏阻，“以上饵药石，不宜临丧。”长孙无忌更一再拦阻。这还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但可见他早就在服丹药了。多年后，李藩对唐宪宗（806—820 年在位）说，太宗“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说的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至于好色和乱伦，更是唐朝皇帝们的家常便饭了。

最后，我想质疑学渊在《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中的一个说法。他引用马长寿的结论说“阿伏于是柔然姓氏”。并且推论说：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称霸漠北的突厥语族部落，公元 508 年被高车族重创；又据欧洲历史记载，一支叫 Avars 的亚洲部落于 568 年进入东欧，曾经在匈牙利地区立国，并统治巴尔干北部地区二百年之久，865 年为查理曼帝国所灭。欧洲史家认为 Avars 是柔然之一部；学渊以为 Avars 就是匈牙利姓氏 Ovars，或“阿伏于”的别字。很可能是在 9 世纪末，Avars 与 Magyar 人融合，而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

我原来以为学渊的推测很巧妙；可是一查他在注释里所引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一书，其中所说的不是“阿伏于”，而是“阿伏干”。再查马氏所根据的《魏书·长孙肥传》附其子长孙翰传曰：

> 蠕蠕大檀入寇云中，世祖亲征之，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斩首数千级，获马万馀匹。

马氏认为入寇云中是在公元 424 年。我查得柞山是在绥远界内，今属内蒙。

据陈连庆著《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初版,页198)说:

> 《魏书·官氏志》说:"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于"字系"干"字之误。《姓纂》七歌、《氏族略》均不误。《广韵》七歌误作"于"。

陈氏又说:

> 《魏书·高祖纪》云:"延兴二年(472)二月,蠕蠕犯塞,太上皇(献文帝拓跋弘)召诸将讨之,虏遁走。其别帅阿伏干率千馀落来降。"

为什么在四十八年之后,阿伏干又来投降北魏?我再查手头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原来陈氏又将"阿大干"错写作"阿伏干"了,他们不是一个人。

我以为"阿伏干"读音,最接近"阿富汗"(Afghan),而阿富汗人多数说的是一种属于伊朗语言(Iranian language)的普什图语(Pashtu)。当然阿富汗之名的由来还须查实,1970年版《大英百科全书》说Afghan的名称是6世纪印度天文学家Varaha-mihira首先提到,当时用的是Avagana。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似亦有线索,《魏书·西域传》记载过"阎浮谒,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古之"高附",就是今之喀布尔(Kabul);莫非"阎浮谒"就是阿富汗?此事还望学渊作进一步探索。

我在这篇序里要强调的有几点:(一)凡对外、对内关系或战

争，都应该要比较对方的记录，平衡判断。（二）官方的宣传和记载，不可尽信。（三）偶发事故，像长孙皇后和魏征之死等，往往可有长远重大的后果，历史并非有必然定律可循。（四）美国素来以世界诸族熔炉自豪，当然可贵，但还只有三数百年发展；中国却早有三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了。语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融会，更可能是将来的趋势。我看这也是朱学渊博士此书最重要的贡献。

——2002 年 10 月 5 日写成于

美国威斯康星州陌地生市之弃园

自　序

中国北方诸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玉成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对东西方文明社会持续数千年的激烈撞击，使它们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中最精彩和诱人的部分；而中国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史迹的最重要的责任。本书无意重复描绘他们轰轰烈烈的业绩，而是试图解析它们的语言信息，俯视它们的源流，以及它们与东西方民族在血缘和语言上的关联。

涉及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北方诸族的研究，是在西学东渐后才在中国正式展开的。然而，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中国人治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双方虽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但总体状况却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法人伯希和，俄人巴托尔德，日人白鸟库吉等，以及中国的洪钧、屠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人，于19和20世纪中都有专精的见解和著述。

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首先在于目标的差异。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标；结果往往是学贯满盈，而见地不足。然则，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设，虽时有疏于求证的结论，而探新的优势反倒在他们的手中。就北方诸族研究而言，中国史料有必须被征引的机会，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有登堂的荣誉。面对西人的大

胆宏论，国人往往只有小心求证的本份。如果说西方学术有海洋民族勇敢的精神，中国传统学术则表现为农业民族的勤奋和执着。

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弊端，可以从贡献卓著的两位古代学者，颜师古和胡三省的名字上看出一些端倪："师古"有杜绝创新之意；"三省"则有主观唯心之嫌。这种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有前期的灿烂和辉煌，继而必有后期的守拙和停滞。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方法的进取优势面前，我国学者往往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西学结论者多。历史、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则在"传统的"和"别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纠缠于咀嚼式的考据。那些本该由中国历史作出许多判断的重大课题，却都谦让给别人去说了。

比如，由于汉字系统非表音的特殊性征，使"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分野在中国长期未能界定。即便是在西方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入传以后，这一问题至今仍未理顺。尤其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倡导的以"中古音"和"诗经韵"构拟汉语"上古音"的方法，寓合理中又夸大了汉语语音的变化。然而，这些尚待检验和开发的假设和理论竟又成枷锁，使我国学界对汉语语音的基本延续性愈具疑虑，对上古文字—语音记载，或怀疑一切，或避之犹恐不及。竟而至于，通过语言信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领域，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的状态。

关于"汉民族"和"汉语言"的形成机制，自然是中国人文科学最核心的议题。"汉—藏缅语系"理论使人们注意到汉语与藏缅语间的关系；但又使人们忽视了北方诸族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北方汉语的高度统一性，使我们猜测：它是由许多不同部落语言兼容而成的，在黄河流域必定发生过大规模的迁徙和

融合活动。因此，辨明中原古代居民的成分，及其语言的先后、主客和转换关系，是动力学地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地名及其他语言信息，与后世北方诸族的语言有着明显的可比特征。大量的证据表明，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地区出走的。它们在北方的草原地带，因改营游牧而获得了巨大迁徙能力；而所谓“西戎”民族又是由“北狄”部落转化而成的。北狄、西戎与中原民族间的这种同源关系，正是今世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原因。

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藏缅式语言更可能是南方汉语之本，而北方汉语则是在南方汉语的影响下形成的。认为只有藏缅语与汉语同源的假设是片面的；那些无视北方诸族语言的因素，而仅仅依照藏缅系语言去构拟的“上古音”理论，是不尽可靠的。如若无限延拓它的合理内涵，并且用它去限制人们的思想，我敢预言：其自身将走向“谬误”，而且终将成为贻误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又一死结。

就历史科学本身来说，繁琐考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无法抱怨的现实，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力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精确地重现了。历史科学的使命，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真实过程。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而“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育阶段，而它们又往往转化为语言最稳定的深层沉淀：姓氏、人名和地名。因此，通过揭示族名、地名、人名、姓氏的语属信息，来达成某些历史、人类科学的基本结论，是

本书采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基于上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我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是我的研究的出发，它求证了满族的先祖“靺鞨”或“勿吉”，也就是匈牙利民族的最东方的源。而“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成分”是我的思考的返归；北方诸族出自中原，走遍世界是其结论。“东亚民族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则将马背上的民族西迁的时间，至少提前到希罗多德记载的年代。而“大宛”、“大夏”或“吐火罗”即是“达斡尔”，可能是“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一文许多令人惊心的结论之一。本书各篇的水准参差不齐，有些虽然注重敏锐之洞察，不少则偏向愚钝之列举，追求完美的企图无以实现。

为读者检阅的便利，《金史·金国语解》、《金史·百官志》、《魏书·官氏志》、《隋书·铁勒传》、《汉书·地理志》作为语言记载，而《新唐书·室韦、黑水靺鞨、渤海》诸传作为史料，都以附录列于正文之后。《辽史·国语解》因篇幅漫长而内容散乱，且多语焉不详，则从略。

在战乱的 1942 年，我出生于流落在广西桂林的一个清白的铁路工程师的家庭，母亲是个美丽慈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识妇女。1965 年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曾于四川的乡间和南京的工厂任教十馀载。1978 年，方入得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1980 年移学美国，三年后于蒙大拿州立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又曾于某国立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涉及固体物理学的诸多理论课题。1985 年弃学经商谋生。

我虽曾受自然科学精密研究之训练，却偏志于人文科学玄妙

课题的探索。值得庆幸的是，近十余年来得助于夫人张宁华女士的干练操持，身心自由，思维远行。历时五年研究的肇于偶然，始于混沌，朝思暮想，勤于足下；得到过真挚护爱的奖掖，也不乏寓于贬损的激励；终却是广大学人的认同，和回馈自信的喜悦。感谢享有卓越学术信誉的中华书局，给予这一充满颠覆气息的著作出版的机会，我希望这些工作，能激励历史、语言、人类学研究者们的自信和勇气。

目 录

原族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修订本序(周策纵) …… 1
自序 …… 10
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 …… 1
蒙古语民族中的通古斯血缘成分 …… 48
欧亚草原诸族的通古斯成分 …… 68
鲜卑民族及其语言线索 …… 91
Hun 人的鲜卑—通古斯族源…… 125
嚈哒与吐火罗斯坦诸族…… 159
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 193
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成分 …… 226
东亚民族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 256
关于若干问题的注记…… 290

参考文献

附录
一《金史·金国语解》…… 325
二《金史·百官志》(摘要)…… 330

三《魏书·官氏志》(摘要) …… 331
四《隋书·北狄列传·铁勒》(摘要) …… 337
五《新唐书·北狄列传·室韦、黑水靺鞨、渤海》 …… 339
六《汉书·地理志下》(摘要) …… 346

后记…… 353

图 目

（一）唐代东北亚地区形势 …… 7
（二）今日按出虎水鸟瞰 …… 8
（三）足蹬滑雪板的通古斯—鄂温克族青年猎人 …… 59
（四）图瓦族“萨满” …… 60
（五）阿富汗的一名乌兹别克族男子 …… 80
（六）阿富汗一名 Pushtun 族妇女与她的两名
乌兹别克族女仆 …… 81
（七）阿富汗的塔吉克—乌兹别克族混血青年男子 …… 185
（八）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两名男子 …… 186
（九）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附近出土的青铜釜 …… 265
（十）匈牙利 Törtel 地方出土的青铜釜 …… 266
（十一）黑龙江下游的一个通古斯—那乃族家庭 …… 292
（十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两个 Cheremis 族妇女 …… 296
（十三）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一个 Cheremis 族家庭 …… 297
（十四）哈萨克斯坦 Kara-Agach 地方出土的“龙”头
装饰金器 …… 299
（十五）西夏骨勒茂才著《番汉合时掌中珠》之一页 …… 312

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

作为一个现代欧洲民族，Magyar 人（即匈牙利人）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起源，始终是历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个难题。尽管 Magyar 人已经在中欧腹地生活了一千多年，但仍然使用着一种在语辞、语法和韵律上，与中国北方诸族相似的语言；他们的姓名称谓与欧洲的习惯相反，却与亚洲式的“姓氏—名字—身分”为顺序一致，如：Arany Janos ùr（爱新·亚诺什先生）。可以肯定，Magyar 人是从东方来的一个民族集团。然而他们的祖源和种族内涵，他们迁徙的动因和年代，始终是难解的谜。

西方关于 Magyar 人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拜占廷皇帝康斯坦丁（905—959）的一部地理—历史著作中[1]。它提到在 9 世纪末，进据今匈牙利地区的“突厥”部落中，有个名叫 Megeris 的部落。1896 年，布达佩斯曾经举行过 Magyar 人穿越喀尔巴阡山“征服家园”（*honfoglalás*）的千年纪念。此前，政府曾要求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个学术委员会确定这一历史事件的确切年代。学者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肯定它发生在公元 888 到 900 年间，而 895 年又是个较可接受的年分。根据这一建议，这一纪念活动，因技术原因于 1896 年举行[2]。

遗憾的是，早于这一事件的漫长岁月，都成了 Magyar 人的史前期，留下的只是一些飘忽不定的传说，或极具争议的推测。较具

有代表性的西方学术观点是:Magyar 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乌拉尔山脉和伏尔加—卡玛—奥卡河流域的森林地带;他们与西西伯利亚鄂毕河流域的 Vogul 人和 Ostiak 人,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由于某种不见诸记载的原因,使他们迁徙到南方的草原地带。9 世纪时,Magyar 人和一些突厥部落,在黑海北岸结成了一个名为 On-Ogur(突厥语"十箭")的部落联盟,它被邻近的斯拉夫人讹读为 Vengr,其谐音即是今世的 Hungary[3]。

公元 889 年左右,受到后续而来的游牧部落 Pechenges[4] 人的攻击,Magyar 人西迁到喀尔巴阡山脉的边缘。892 年,东法兰克王国阿诺夫(Arnulf)皇帝邀请 Magyar 人参与对莫拉维亚(Moravia)公国的征战。895 年,拜占庭列奥六世(Leo VI)皇帝又利用 Magyar 人反对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尔人。在保加尔人和 Pechenges 人的联合进攻下,Magyar 诸部由 Arpad 率领,穿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地区。据欧洲历史记载,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Magyar 人以其游牧部落的快速袭击能力骚扰周边诸国,曾引起西欧地区的一片恐慌。953 年,他们在巴伐利亚被日耳曼人决定性地击败,从此退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基督教,从而在文化和意识上转化为欧州居民的一部分。

东西方史籍均无 9 世纪前 Magyar 人的记载,游牧部族高速和频繁的流动,又没有为考古学留下充分的遗迹。因此,比较语言学是研究 Magyar 人起源的不多手段之一。关于 Magyar 语的分类学说,以"乌拉尔语系"理论较流行,却又颇多争议。它将匈牙利、芬兰、爱沙尼亚和分布在乌拉尔山两侧,有两千五百万使用者的 20 馀种大小语言纳入这一集团。Magyar 语与鄂毕河流域的 Vogul 和 Ostiak 语,又被划归为"芬—乌戈尔"(Finno-Ugric)语族属下的"乌

戈尔”(Ugric)语支。有一千五百万使用者的 Magyar 语,当然是“乌拉尔语言”的主体。

据说各种“乌拉尔语系”下属语言的共同祖先,是七千至一万年前便存在于乌拉尔山脉北部的“原始乌拉尔语”(Proto-Uralic Language[5])。必须指出,这种缺乏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依据的假说,由于过早地被奉为成熟的理论,已成为不利于科学地追溯所谓的“乌拉尔语系”诸族祖源的实际障碍。

“乌拉尔语系”的两大主要语言,匈牙利语和芬兰语之间的相似程度,有人说接近但略低于英语和俄语间的关联[6],也有人说仅相当于英语和波斯语间的疏远联系[7]。相反,学者们倒注意到 Magyar 语中有很大的蒙古语辞集合,它不仅包括了大量基本物质、动植物、人体器官和家庭关系方面的初等辞汇,而且还包含很多社会组织、军事、体育和娱乐方面的高等辞汇。这不仅揭示了匈牙利人的祖先,即古 Magyar 人必定融含了蒙古语族的成分,而且表明了他们是在脱离蒙昧状态后才离开远东地区的,乌拉尔地区是他们到达欧洲前的暂居营地,而决不是他们祖宗的发祥之地。

有些学者将匈牙利语中蒙古语成分的来源,归结为突厥语族的中介作用。这是假设 13 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扩张,使蒙古语言对突厥语世界产生巨大冲击,并由此而引发了对欧洲地区语言的次级影响。可是,蒙古语言的力量远不如蒙古骑兵来得强大,除去蒙古地区被彻底蒙语化之外,进入中亚和南俄的蒙古人都被占人数优势的突厥语族同化[8]。Magyar 语中的蒙语成分不可能是转手于突厥语族,更可能是古 Magyar 人自己从远东地区带到欧洲去的。

为证明 Magyar 人起源于远东,我们将满族祖先使用的女真

语，与匈牙利语进行语辞比较，发现了一些前所未知的关联现象；而金代女真姓氏与匈牙利人姓氏，又更系统地表现出一致性。由此我们猜测 Magyar 就是女真—满族的祖先族名“靺鞨”（亦作“靺羯”）或“勿吉”（读作“莫吉”[9]）的源音，古 Magyar 人是由靺鞨和诸多蒙古语族部落，及相当突厥语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类集团。在进入欧洲之前，他们使用的可能是以古代女真语和蒙古语为主体的混合语言。

女真—满族，源于唐代（618—907）的“靺鞨”，北魏（386—534）时称“勿吉”，古称“肃慎”。1115 年阿骨打建立金朝，1125 年灭辽，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1234 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17 世纪女真族再度兴起。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5 年其子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Manchu），次年改“后金”为“清”，1644 年入主北京，渐次统一中国，1911 年为辛亥革命推翻。

靺鞨—女真—满族属通古斯语族，与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同属阿尔泰语系。靺鞨诸部主要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在嫩江—扶馀—辽东地区，与当地属蒙古语族的室韦、契丹以及扶馀诸族混居融合，并与中原地区接触。唐帝国兴盛后，对辽东和朝鲜半岛用兵近三十年，北部靺鞨族与高句丽结盟抵抗，并曾重创唐军。公元 666 年高句丽宫廷内争，部分王族降唐内应，668 年唐军攻入靺鞨族后方，然后移兵朝鲜半岛，九月陷平壤，高句丽—靺鞨联盟遂战败瓦解。

关于古 Magyar 人西迁的原因和时代，中国史籍似乎也有线索可循。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

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遗人迸入渤海。

而《金史·世纪》则称：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其五部无闻”，是隋唐两代连年用兵的结果。公元668年高句丽—靺鞨联盟的败灭和平壤的陷落，导致了靺鞨社会分化、重组和迁徙。安车骨、泊咄等部抗唐失败而出走，就此失闻于中国历史；二百多年后出现于欧洲的 Magyar 人，可能就是这些西迁的靺鞨后裔。

高句丽王朝覆灭和靺鞨强部出走以后，满洲地区出现过一段和平时期。大概是公元700年左右，靺鞨族以中原皇朝行政模式建立了渤海国。《新唐书·渤海传》对这个兴盛了二百馀年的北方王朝有如下的记载：“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辖下的十五府，大部又以原靺鞨和高丽各部领地为域界，如：

鄚颉府领鄚、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率宾故地为率宾府……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铁利故地为铁利府……越喜故地为怀远府……

“挹娄”、“率宾”、“拂涅”、“铁利”、“越喜”均为靺鞨部名；而“鄚颉”就是“靺羯”或 Magyar 之音，它应该是西迁的靺鞨或 Magyar 人的馀众居地。

渤海国最盛时（820 年左右）的鄚颉府界于嫩江—松花江和粟末水之间地区[10]，鄚、高二州分别为今黑龙江省阿城（旧名“阿勒楚”，女真语“金”字之异音）和宾县，这一带恰是安车骨部的居地。府界内粟末水入注嫩江—松花江处，即今吉林省扶余市，古名“伯都讷”，有人认为那是当年“泊咄”部落的聚居地[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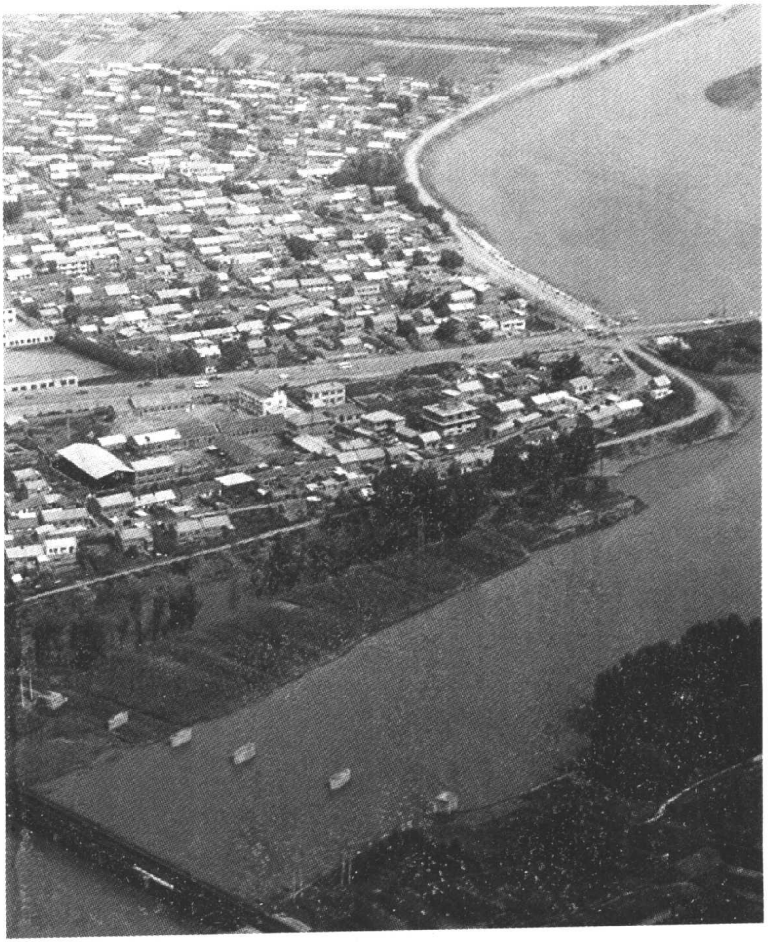
安车骨和泊咄部馀众被指为“鄚颉”，必因它们是靺鞨的核心。隋唐两代，他们又是对抗中原帝国的中坚。在通古斯系民族内，他们大概是继“肃慎”、“挹娄”之后，最具军事进取心的领袖部落，盛名震动中原，其馀各部亦都以“靺鞨”自冠。只是在战败溃散以后，他们才又以“女真”或“女直”重新正名。

经渤海国和辽朝先后各二百年的统治后，于 11、12 世纪之交兴起的完颜女真部，又是源发于这一地区的“按出虎水”，即今哈尔滨—阿城地区之“阿什河”。1115 年阿骨打兴立金朝，建都上京，即是鄚州故地。《金史·地理志》说：

> 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

韩儒林先生，很早便考定“安车骨”与“按出虎”本乃一词[12]。唐代“安车骨部”应出自于“按出虎水”。从地望上来看，金代的完颜部及周边女真诸部，应即是安车骨等靺鞨部落之裔，因而很可能与西迁的 Magyar 人同源。

图一:唐代东北亚地区形势



图二:今日黑龙江省阿城和阿什河鸟瞰。阿城又名“阿勒楚”;阿什河即金代“按出虎水”。

故尔，将现代 Magyar 语，与源出按出虎水流域的金代女真语进行比较，是极具价值的。通过这种比较而得出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是 Magyar 人来自远东地区的可靠证据。

一、语词比较

《金史》是一部重要著作，因得金元相交之际中原儒仕领袖元好问及王鹗等人的累积考撰，其学术价值颇为后世史家重视。《金史》全书 135 卷，后附《金国语解》，即金代统治部落的语辞解译。如前所述，这些“金源”部落似与 7 世纪奔散的安车骨部同脉。倘若“安车骨”是西迁的 Magyar 人的先世之一，那么，匈牙利语和《金国语解》录载的女真语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应在意料中。

《金国语解》收录金代官称、姓氏和语辞，125 条，其中“人事”、“物类”和“物象”等类辞汇 77 条，它是对 12 世纪女真语的一个粗略记载，但也是历史语言学的宝贵遗产。这些女真语辞意义散乱，显然是从汉文资料中罗致来的只字片语。然而，这些无关的各类辞汇却构成了一组随机抽样的语辞集合，对于语言比较而言，反而具有重要的统计学意义。

此 77 条女真语辞，因语义不明，或无适当可比对象，或为外来语辞，而无法或无必要比较者 20 条。以所馀 57 条与蒙古语和匈牙利语进行了比较，发现三者互有关联者达 39 条（附表一），若将女真语和蒙古语联合与匈牙利语比较，相关辞语高达 32 条（附表一，粗黑体标出），占 56%。这无疑显示了这三种语言间的高度亲缘性。下面，列出若干匹配严整的女真语辞和匈牙利语辞的对应组合：

	女真语	匈牙利语
客人	按答海	vendég
穷人	什古乃	szegény
摔角者	拔里速	birkózó
头	兀术	fej
牙	畏可	fog
第二	益都	kettö
和谐	奴申	összhang
宽容	讹出虎	eltür
快	撒八	sebes
买	兀带	vétel
刀刃	斜烈	él
金	按春	arany
口袋	蒲卢浑	börönd
罐	活女	korsó
红色	活腊胡	vörös
铁	斡论	vas

东部女真语辞较少受蒙古语影响，假如用两个明代东部女真语辞“佛热”与“超还”，来取代金代女真语辞“牙吾塔”和“哈丹”，相关的匈牙利语辞则与之对应得更为切合：

疮疡	佛热（牙吾塔）	fájó
山峰	超还（哈丹）	csúcs

这或许显示了7世纪末被西迁的Magyar人所带走的某些靺鞨语辞，较之于12世纪按出虎地区的西部女真语，持更为纯正的通古斯语形态。

满语、蒙语与Magyar语间的转换，亦有若干规律可循。首先，可以发现前者（金代女真语亦然）的声母k多转作h或kh（类“赫”）；g转为h或gh（类“额”）。Magyar人似又不善发h音，而将不少东方语辞中的g、h之音，转发为f、v或w等。其次，相对于满蒙两语，匈牙利语辞常有首辅音增减现象，如：

按答海（客人）	endeg ⇒ vendég
奴　申（和谐）	nosszhang ⇒ összhang

其三，满蒙两语和匈牙利语间，常有首辅音n和t之间的互换现象。附表三中，我们将蒙古语和匈牙利语间的这些变换规律作了一个表列。

令人惋惜的是，不仅是女真语，甚至后来的满语也都已被人类遗弃了，剩下的只是书面的记录而已。只有18世纪去伊犁地区戍边的锡伯族将士的后裔，还有少数人将它作为活的语言（非化石）在使用着。在关于锡伯族的论著[13]中，我们发掘了一些与匈牙利语相关联的锡伯语辞汇，并择要作一比照如下：

	锡伯语	匈牙利语
母亲	额聂	anya
妹妹	嫩	nővér

乞丐	盖克吐	koldus
富人	巴颜	vagyon
指甲	库浑	köröm
手、臂	嘎拉	kar
头	乌杰	fej
牙	畏可	fog
鼻	欧弗	orr
鸡	超库	csirke
牛	依憨	tehén
喜鹊	沙沙哈	szarka
箭	牛录	nyíl
食物	依迪	étel
鞋子	萨布	cipö
仓库	查尔	csür
村庄	嘎善	község
好	萨音	szép
新	伊彻	új
旧	佛	vén

以上比较就象是一个指纹鉴定，确证了匈牙利语言的极东祖源是靺鞨—女真语。那些与 Magyar 人使用同类语言的 Vogul 和 Ostiak 人，应该也是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鄂毕河上游森林地区的，以渔猎为生的通古斯部落“乌古”和“兀者”的后裔；“兀者”又作“乌底改”或“兀的改”，中国历史对它们有很多记载。

大量蒙古语辞存在于 Magyar 语中，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

13 世纪前,“蒙古”是一个不甚著名的“室韦”部落。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室韦”乃“鲜卑”的遗族,“契丹”的旁支。大兴安岭东侧的嫩江流域是室韦诸部的汇居之地。《魏书·失韦传》关于室韦的记载:“……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馀,名捺水,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同。”这就是关于嫩江地区湿地环境的概述,也是今日将鲜卑—室韦遗族归属于蒙古语族的依据。

“契丹”是较“室韦”更为著名的蒙古语民族,今天的热河—辽西地区是他们的发祥地。宋代时,以契丹民族为主体的辽朝(916—1125)已成为统治长城内外、满洲、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的强盛帝国。因此,在蒙古语、俄语、希腊语甚至中古英语中,“契丹”都是“中国”的一个代名词。

高寒多林木的大兴安岭和水量丰富的嫩江,是渔猎的室韦部的生息之地。然而,水文无常,间有沙碛和草原的西辽河上游,是契丹族的良好牧场。分割嫩江—松花江和辽河两大水系的松辽分水岭(今通榆—长岭—长春一线高地),构成了这两大蒙古语民族的一条模糊分界。

大概在很早的时代,善战的靺鞨人就来到粟末水和嫩江—松花江的合流处,并与当地的室韦诸部融合。继续南进的靺鞨部落,则取代了嫩江、辽河之间的扶馀族,并与地处西南的契丹、库莫奚等族混居,开始改变整个嫩江—扶馀地区的人文和语言的生态。由于使用通古斯语和古代蒙古语的民族的长期融合,一种靺鞨—室韦相间的古代混合语言也就形成了。《新唐书·室韦传》对这种语言属性的变化也有记载:“室韦,契丹别种,……其语言靺鞨也。”它标志着该地区室韦诸部的语言已经相当通古斯语化了。

据记载，锡伯族的祖先直至满清初年，都还在使用一种“非清非蒙”的混合语言[14]。

相反相成的另一方是，进抵嫩江—扶馀地区的靺鞨诸部，也开始使用一种以通古斯—靺鞨语为基底，同时又兼容了大量古代蒙古语（室韦、契丹语）成分的混合语言，安车骨和泊咄两部可能就是这种混合语言的载体。《金国语解》记录的西部女真语中的蒙语成分则是明证。现代 Magyar 语中俯拾皆是的女真语、蒙古语混合成分，应该就是传承于隋唐年间这种混合语言的。

作为室韦后裔的锡伯族的语言，已在清代相当彻底地满语化了。而一度强盛的契丹族，却又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辽史·国语解》记载了为数甚少的一些契丹语辞，然而从中我们不但可以确证契丹语属蒙古语族，同时还可以发现匈牙利语与之相关的强烈信息。在附表二中，我们将语义明确的 35 个契丹语辞与现代蒙古语和匈牙利语进行了比较，结果是 24 字（70%）与蒙古语一致，19 字（56%）与匈牙利语关联。下面，我们选择了 7 个契丹语辞和 13 个现代蒙古语的社会辞汇，与匈牙利语辞作一对照：

	契丹语	蒙古语	匈牙利语
父亲	阿主	etseg	atya/apa
兴旺（1）	耶鲁	–	jólét
兴旺（2）	蒲速	–	bőség
繁殖	窝笃	uulter	fajta
辅助	何鲁	–	helyettes
孝顺	得失得	tahim	(t)áhítat

法官	楚古	shuukh	zsüri
营地	捺钵	–	tábor
军队		tsereg	sereg
会议		hural	ülés
富有的		bayan	vagyonos
官员		tushaal	tiszt
英雄		baatar	bátor
时代		tsag	szak
村庄		gatsaa	község
城市		hot	város
娱乐		zugaa	szorakozás
乞讨		guikh	kér
欺诈		zali	csal
阴谋		huivaldah	esküvés
荒凉		tselger	sivár

最后，我们以“兴旺”一字的讨论来结束本节，契丹语中的两个同义辞（“耶鲁”和“蒲速”），竟与现代匈牙利语中的同义表达（*jólét* 和 *böség*）一一对应，加之于其他的对应现象，都明确地告诉我们，Magyar 人和 Magyar 语与契丹民族和契丹语言有着非偶然的亲缘联系，隋唐年间（甚至更早）在嫩江—扶馀地区形成的那种通古斯—室韦（蒙古）混合语言中，契丹语必是其重要成分。

二、姓氏分析

中国的女真—满族，两度对中原实行军事征服，其自身语言却被征服者同化了。它的姓氏系统，亦因文化模仿而被彻底汉化。反之，西迁欧洲的 Magyar 人，在文化宽松和语言多样的环境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祖源语辞和基本语法，而且还完美地保留了以靺鞨诸姓为主体的中国北方诸族姓氏系统。

《金史》亦以相当高的音准记载了女真姓氏，它为解析女真民族的内涵提供了信息，也为追溯 Magyar 人的祖源提供了对照。《金史·百官志》中的 99 个和《金史·金国语解》中的 31 个女真姓氏的主体是靺鞨—女真，或后世的满族姓氏，如："完颜"、"爱申（新）"、"拓特"、"粘割"、"呵不哈"、"女奚烈"、"古里甲（瓜尔佳）"等。同时又包含了一些著名的北方诸族姓氏，如：

契丹大姓：　移剌（"耶律"）、石抹（"萧"）
匈奴贵姓：　苏不鲁（"须卜"）
扶馀大姓：　把（朝鲜姓氏"朴"，或满族姓氏"巴"）
蒙古部名：　光吉剌（"弘吉剌"）

因此，12 世纪入主中原的"女真民族"是一个兼容契丹、室韦以及鲜卑、匈奴和扶馀等族遗民在内的多民族的混合体。

这个融合过程，至迟可追溯到北魏年间（4、5 世纪）。那时，黄河流域敞开大门地涌入了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北方诸族。这次移民运动的后果之一是，在蒙古高原和满洲西部和南部形成相对真空

的现象，这为更东北地区的通古斯语族的进据提供了机遇。《魏书·勿吉传》关于“（靺鞨）常轻豆莫娄”，和同书《高丽传》的“扶馀为勿吉所逐”的记载，皆发生于此一时期。作为中原民族大融合的连锁反应，在满蒙地区，也实现了通古斯语族和当地原住民的融合，而嫩江—扶馀地区，是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的碰撞点，强烈的融合也就在那里发生。

令人惊叹的是，现代匈牙利姓氏竟与金朝女真族姓氏极准确地对应，不仅那些典型的靺鞨姓氏一一在列，连那些契丹、鲜卑、匈奴和扶馀的名家大姓，如 Illés（移剌）、Szima（石抹）、Major（抹颜）、Sípos（须卜）、Papp（把，朴）等，亦无一遗漏。这充分表明：7 世纪末西迁的古 Magyar 人所融含的种族成分，与 12 世纪南下中原的女真族十分近似。因此，现代匈牙利语中兼含女真语，蒙古语（当时的契丹、室韦语）和一些突厥语成分，也是顺乎情理的。

金代以前，载于诸史的靺鞨姓名，仅限于几个贵族而已，如：

乙力支	（《魏书·勿吉传》）
倪属利稽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突地稽	（《新唐书·李谨行传》）
舍利乞乞仲象、乞四比羽	（《新唐书·渤海传》）

这些靺鞨人名中的“支”、“稽”是官称，“乞乞仲象”和“比羽”可能是名字。因此不难析出其中的姓氏，并将它们与后世的女真和匈牙利姓氏进行比较：

靺鞨姓氏	女真姓氏	匈牙利姓氏
乙力	移剌、挹娄	Illés、Illyes
倪属利	女奚烈	Nyíri
突地、度地	拓特	Tóth
舍利	—	Széles
乞四	赤盏	Csiszár

其中“乙力支”是一位使者，从他出使中原的路线[15]来看，应是来自于松花江下游的挹娄地区；与之对应的匈牙利姓氏 Illés 应即是“挹娄人”的意思。“舍利”、“倪属利”、“乞四”都是渤海国或靺鞨贵姓，它们分别对应现代匈牙利姓氏 Széles、Nyíri、Csiszár。而匈牙利头等大姓 Tóth 似应源自靺鞨部名“拓特”。

现代匈牙利众多姓氏中，Nagy（纳吉）是最大的一族，当初必有人数众多的 Nagy 部落参与了 Magyar 人的西迁活动，它可能就是古 Magyar 七部之首 Nyek 部（见注释[1]）。美国史学家 P. 戈登认为，“征服家园”时代的 Nyek 部，与今天俄罗斯南部的巴什基尔族的 Nagman 部同源[16]。而我以为 Nagman 就是中亚族名“乃蛮”。法国史学家伯希和曾猜测，辽代契丹人的腭音很重，他们将“乃蛮”读成了“粘八葛”[17]。中国史学家陈述又曾说过“粘八葛”就是女真姓氏“粘割”[18]。循此推理，Nagy 氏应出自靺鞨“粘割部”。

与 Nagy 或 Nyek 可能相关的姓氏，如：“粘割”、“粘葛”、“纳合”、“纳可”等，在《金史》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元代有人称之为“金源之巨族”[19]。《元史·粘合重山传》说：“粘合重山，金源贵族也”。福建、台湾地区的《粘氏家谱》[20]，亦谓其祖先是“金源贵

胄”。前文述及,“金源”者,“按出虎水”也。故尔 Nagy 氏或 Nyek 部,也应出自“按出虎水”或“安车骨部”;依其今日在匈牙利的人多势众,也可以推知当初这个“金源巨族”在西迁的靺鞨人中的重要地位。

匈牙利姓氏 Arany 的意义是“金”,它与满清皇族姓氏“爱新”(现多改“金”姓)音义均相吻合。靺鞨部名“泊咄”,亦有匈牙利姓 Bodó 与之音合。匈牙利 Buza(蒲察)、Dudas(徒单)、Fehér(夫合)、Gyurkó(瓜尔佳)、Sánta(散答)、Szabó(塞蒲里)、Szakál(撒合烈)、Tomen(陀满)、Turi(都烈)诸姓,皆与女真姓氏相关的现象,更表明靺鞨社会广泛参与了古 Magyar 人的西迁运动。

关于中古时代北方诸族语属之结论已趋一致,“鲜卑”、“室韦”、“契丹”属“蒙古语族”,“匈奴”、“柔然”、“高车”、“回纥”属“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作为阿尔泰语系三大语族之一,居于最东,突厥语族居西,蒙古语族居中。在西迁欧洲的过程中,古 Magyar 人贯穿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的居住地区,因而也必然在中途融入了它们中间的一部分族落。

史籍的记载,有助于识别源于“室韦系”的匈牙利姓氏。如《魏书·勿吉传》记载的勿吉邻国名“覆钟”、“库娄”、“素和”、“郁羽陵”、“库伏真”,以及《新唐书·室韦传》记载的“如者”、“婆莴”、“骆丹”、“那礼”、“落坦”等部落名,多可在金代女真和匈牙利姓氏序列中找到对应者:

室韦部落名	女真姓氏	匈牙利姓氏
覆钟	吾塞	Fejes
库娄	—	Körösi

素和	术虎	Juhos
郁羽陵	斡雷	Oláh
库伏真(库莫奚)	—	Kovács
如者	术甲	Józsa、Rózsa
婆莴(仆骨)	蒲古里	Bokor
那礼	纳剌、那拉	Nyúl
骆丹、落坦	—	Rodas

其中,Kovacs 是匈牙利最重要的姓氏之一,它对应的"库伏真"或"库莫奚",即奚族的全称;Bokor 即是鲜卑大族名"婆莴"或"仆骨",这都揭示了 Magyar 人中的蒙古语族的氏族成分。从上述的对比中,也可以注意到后来的女真—满族中的一些重要氏族,如"那拉","术虎"等,是从蒙古语族转化而来的。

契丹的两大姓氏"耶律"和"萧",即金代的"移剌"和"石抹",都有其匈牙利族裔:Illyes 和 Szima。而匈牙利姓氏 Boros 和 Bartha 则可能是来自奚族。《辽史·太祖纪》载:"天显元年(926),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金史·伯德特离补传》载:"伯德特离补,奚五王族也,辽御院通进。""勃鲁恩"应是魏姓"拨略"或"破六韩"的异译,其辞根为"拨略"即 Boro,该部融入 Magyar 族后称 Boros,意为"来自 Boro 部落的人"。

《魏书·官氏志》有载的那些可能是"突厥语族"姓氏,在匈牙利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亦将它们与相关的匈牙利姓氏,作一对照:

突厥姓氏(可能)	匈牙利姓氏
契苾	Csibi
副吕,贺楼	Fülöp
贺拔	Horváth
乙弗,羽弗	Iffiu
须卜	Sípos
庾氏	Soós
树六于	Szöllös、Szöllös、Szöllös
独孤	Takács、Tokaji

其中,与"贺拔"对应的 Horváth 是匈牙利大姓之一。

中国历史记载的漠北大族"高车",在 Magyar 人中也有后裔 Kocsis 氏。匈牙利语 *Kocsi* 是"车",*Kocsis* 即是"驾车人"。《魏书·高车传》说该族使用的车轮高大,因而得名"高车";其实突厥语的"车"就是 *hoca*,"高车族"只是"车族"或"驾车族"而已。汉语的"车"(*che*)与"高车"之名可能有渊源,有匈牙利学者则认为欧洲语言 *coach* 一字是出自匈牙利语的,总之这一族和这一字都是来自东方的。

中国音乐学家杜亚雄教授发现,许多匈牙利民歌的音阶、旋律乃至歌词,都与甘肃地区的裕固族民歌一致[21],这一研究结果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兴趣。"裕固族"是"回鹘"的后裔,9 世纪中叶迁离蒙古高原的回鹘民族,必然包容了大量"匈奴"和"高车"的遗族。中国历史有许多关于匈奴民族善歌的记载,独处祁连山区的裕固族民歌旋律,就是匈奴—高车—回鹘之遗风。回鹘民族可能在 7、8、9 世纪,于蒙古高原和欧亚草原各处,不仅以其血缘和姓氏

的传承，乃至语言和感情的旋律，与西迁的靺鞨人一起，融合成了古 Magyar 人。

匈牙利语中的 Kun 族，是指 11 世纪出现于东欧的另一支著名而不知其源的突厥语部落“库蛮人”（Cuman）[22]。这提醒了我们：“库蛮人”应当就是中国史籍中的“浑族”。欧洲史载库蛮人两度进入匈牙利地区，第一次被击败而退出，第二次则是在蒙古铁骑的追迫下，破釜沉舟，永远地融合于 Magyar 人中了。

匈牙利 Bakó、Szekeres、Bokor、Torok 四姓，可能就是活跃于蒙古地区的“拔野古”、“思结”、“仆骨”、“同罗”等部落的后裔。《新唐书·高宗本纪》有载，公元 660 年拔野古部曾联合思结、仆骨和同罗部反唐，而遭镇压。Magyar 人于 668 年战败后西迁时，中途可能融纳了这些创伤未愈的部落成员。

匈牙利姓 Orvas，显然是魏姓中的“阿伏于”，马长寿先生求证了阿伏于是柔然姓氏[23]。“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称霸漠北的突厥语族部落，公元 508 年被“高车”重创于蒲类海地区，公元 552 年被新兴的兰突厥部所灭。据欧洲史载，一支叫 Avars 的亚洲部落于 568 年进入东欧，曾在匈牙利地区立国，并统治巴尔干北部地区二百年之久，865 年方为查理帝国所灭。欧洲史家认为 Avars 是柔然之一部[24]。我以为，Avars 就是 Orvas 或“阿伏于”的别字。很可能是在 9 世纪末，他们与后到的 Magyar 人融合，而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

在附表四中，我们将匈牙利姓氏，金朝女真姓氏，和北魏北方诸族姓氏（简称魏姓）的可比部分，作一表列。我们相信，这一比较极具说服力地表明：现代 Magyar 人的东方祖先确实是以靺鞨族为主体的中国北方诸族。

三、历史的遗迹和语言的化石

中国史书关于靺鞨—女真族先祖的最早的记载之一是《国语·鲁语下》中的一则有趣的故事：

>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氏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

"楛"（音 hu）木就是桦木，这是一种生长在寒带的树种，在大小兴安岭地区十分繁盛，在中原地区却很罕见，蒙语称"桦树"为 *hus*，汉语中的"楛"字可能就是来自北方民族的语汇。桦木轻而直且硬，肃慎人早在数千年前便善用桦木制箭杆，还以一种轻质石料磨制箭头，并以此上贡中原，这就是博学广闻的孔子告诉陈惠公的"楛矢石砮"。肃慎之后勿吉亦以此物进贡，《魏书·勿吉传》有载："太和十二年，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直到清代，桦木箭杆仍是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每年献给朝庭的例贡。可见从古肃慎族贡楛矢，到清代东北地区满族贡桦木箭杆，是数千年一脉相承的传统[25]。

由于女真族的祖先肃慎人在冷兵器时代的早期便解决了射击武器的材质问题。因此，和蒙古人的马术一样，靺鞨人的箭术也就成了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当然也是他们恃勇好斗的本钱。唐朝辽东战争期间，多名唐军主将被其毒箭中伤，甚有致死者，以致唐

军恼羞成怒，残杀俘虏，你来我往，愈演愈烈，辽东战局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制箭术也就成了肃慎—靺鞨—女真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现代的满语和锡伯语中，称箭为 *niru*（“牛录”），匈牙利语则为 *nyíl*，两音相同，桦树在匈牙利被称为 *nyírfa*，意为“箭树”，这也证明了现代匈牙利人的部分东方祖先，就是那个用桦树制箭的民族。

作为蒙古军队的一种布阵或组织形式，“古列延”（*küriyan*）在波斯史学名著《史集》中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解释[26]：

> 所谓古列延（*küriyan*）是圈子的意思，当某部落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了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象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叫做古列延。在现代，当敌军临近时，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和异己无法冲进来。

尽管现代蒙古语已经没有了这个辞，但是匈牙利语中的 *gyürü*（圆圈）和 *kör*（圆环），都还是与古代蒙古辞“古列延”同根。

匈牙利语辞中的汉语成分也是 Magyar 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有力佐证。例如，匈牙利语中的 *gyöngy*（珍珠）、*szál*（丝）、*csengö*（钟）、*szürö*（筛箩）和 *malomkö*（磨石）等字，都是以汉音来记载这些当初来自中原的水产、纺织、铸造和工具类产品的。《魏书·失韦传》在描写 5、6 世纪时室韦地区的民俗时记：“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珍珠这种盛产生于江南地区的装饰物，为各国人民珍惜历千年不衰，当初也曾为中国北方诸族妇女所偏爱，故尔汉语“珍珠”也就铭刻在

Magyar 人祖先的语言中了。

流行于阿尔泰语系诸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也在匈牙利语言中流下了蛛丝马迹，“萨满”出自通古斯—满语中的“巫师”一词。至今在匈牙利语中，*sámán* 仍作为“巫师”保留着它的席位。满族及其先祖崇拜植物神——柳树，其实与原始宗教的生殖崇拜有关。柳叶是女阴的象征，柳枝则成了生育女神的图腾。现代满族还保持着柳枝家祭的习俗[27]，亦即所谓“佛多妈妈祭”，“佛多”意即柳枝。落户欧洲的 Magyar 人早于公元 10 世纪末已皈依基督教。在此后整整一千年中，原始宗教的世俗荒诞，早已被高级宗教的伦理涤荡一净。然而匈牙利语中的柳树和柳枝（*füzfa* 和 *vesszö*）两字，仍与满语中的同义辞（“佛多活”和“佛多”）在声韵上相对应。当然，它们早已失去了既秽俗又神圣的图腾意义了。

在未穿越喀尔巴阡山前，Magyar 人的七个部落选出了 Levedi 为他们的第一个联盟酋长，他的称号是 dux [28]。在匈牙利王朝早期历史中，*dux* 又是“王子”或“公爵”的头衔[29]。斯蒂文一世（Stephen I）在位时（997—1038），将匈牙利全国划分成四十五个相当于县的行政地区（Megyék），并任命了负责管理和税收的地方官员，其称号是 *fö ispán*，其中 *fö* 的意思是“头头”（head）[30]。

然而，中西史料竟能精确地互相印证，“咄”和“弗”作为北魏隋唐时期满蒙地区的酋长称号，也曾被详细地记载在各代历史中[31]。“弗”与“咄”含意相似，某些部族“弗”是“咄”的副手，有些部族有“弗”而无“咄”。Magyar 人循远东先祖之惯例，仍以 *dux*（咄）为酋长之称号；初抵中欧，立国建政，又以 *fö*（弗）为地方行政长官之称谓。

作为古 Magyar 人来自远东地区的语言遗产的一部分，现代匈

牙利语中的许多动植物名辞和有关辞汇，仍与满语、蒙语、锡伯语或古代的契丹语一致。有些匈牙利语辞，也为我们考证满语和蒙语的古代语辞提供了对照。下面我们表列了一部分这类相关辞汇：

	满语（锡伯语）	蒙语（契丹语）	匈牙利语
树、木	moo	mo	fa
花	ilga	tsetseg	virág
动物		mal	állat
家畜		mal	marha
马	morin	morin	ló
骑马	moringga/yaluga		lovagol
牛	ihan		tehén
羊		khon	juh
骆驼		teme	teve
兔		tuulai	nyúl
鸡	coko（超库）		csirke
鱼		zagas	hal
鱼骨			szálka
狗	kuri	nohoi	kutya
狗叫		khutsah	
猴	monio（monj）	samz	majom
田鼠		（拍）	pacok
跳蚤		bers	bolha
喜鹊	（沙沙哈）	shaazgai	szarka

苹果		alim	alma
豌豆	bori	buurtsag	borsó

上表中似乎只有“鱼”、“狗”和“马”三字有一些对应上的麻烦。但稍加甄别便一切释清。原来,蒙语中的“鱼”(*zagas*)就是匈牙利语中的“鱼骨”(*szálka*),匈牙利语中的“狗”(*kutya*),就是蒙语中的“狗叫”(*khutsah*)。两种隔离了一千多年的同源语言间,会有这些微妙的变化是不足为怪的。

“马”字在所谓“阿尔泰诸语”中,满语为 *morin*,突厥语为 *at*,蒙古语两者兼用。匈牙利语的“马”字为 *ló*,它不能与满、蒙古、突厥语对应。而这些语言的语序又有“宾语 + 谓语”的共同特征,它们的“骑马”一词都应为“马骑”,该词在满语有两种说法 *moring-ga* 和 *yalu-ga*;匈牙利语则为 *lovagol*。因此可以判定动词“骑”在满语中是 ga,在匈牙利语中是 gol;而名词“马”在满语中除 morin 外,还可能是 yalu;匈牙利语的 lova(t)则应是“马”的宾格。从语音来看,ló 可能是 yalu 的关联或省略形式,它可能与湮灭了的某些东北亚古代部落语言有关。如果注意到西夏语中的“马”为“罗”,汉语中的“驴”和“骡”又是马的同属动物,那么不难得出这些语言现象都支持 *ló* 是东方语汇的结论。

历时二百五十馀年的满清统治,也以许多满语词汇充实和丰富了现代中国语言,特别是北京方言。“沙其马”原本是满语中“面糕”的意思,现在已经是中国无人不知的一种甜点心。从现代匈牙利语中的“甜糕”一辞 *sutemény*(音“苏基马尼”),我们竟也不难品尝到其中“沙其马”的味道。

四、唐帝国的辽东战争和 Magyar 人的西迁

西方的史学家往往把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西迁活动，归结为中华帝国的强盛和罗马帝国的虚弱。其实，古代的中国也只是时而强大，时而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追求良好的生存环境，一次次成功地入侵中原，统治中国，而且最后融入了中华民族，万里长城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然而，倒的确是因为强盛的唐帝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将一个后世极有作为，但当时还处于较落后状态的靺鞨族的一部分部落，逼上了西迁不归之路。本文在语言和姓氏诸方面论证了 Magyar 人和中国北方诸族的血缘关系以后，还将以史实证明，对唐战争的失败是 Magyar 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

隋朝(581—618)和唐朝(618—907)是两个姻亲家族先后统治中国的皇朝，隋朝的亡国之君杨广(569—618)，就是唐代的开国帝王李渊(566—635)的姨表兄弟。杨李这两个北方军人世家长期与异族的相处和通婚，使他们的后代身上都有相当多的胡人血统。或许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种族和血缘的认同感，隋唐两朝政权对异族文化和人材都表现出很高的宽容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职业军人的家族背景，又使得他们在追求军事成就上表现出特殊的进取心。

然而，隋唐两朝的诸多扩张领土的军事活动中，唯有“辽东战争”进行得极不顺利。就是因为隋炀帝杨广的一意孤行屡征高丽不果的人祸，触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断送了原本是兴旺发达的隋皇朝的命脉。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当政十八年后，恃国力强盛，置前朝之先鉴于不顾，开始了另一场缠斗不休的征东战

争。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以二十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命牺牲，去换取极为有限和极不稳定的空间，是得不偿失的。

这场漫长的战争，实际上是唐帝国对高句丽—靺鞨军事联盟之间的战争。在这个联盟中，已具备国家和政府组织形态的高句丽王朝，显然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处于被利用的次等地位的靺鞨部落，在政治上被别人包办，然而却不知进退地从事着军事上的蛮干。在长达一代人的抗唐战争中，既耗尽了唐帝国的精力，也给自己引来了灭顶之灾。

在唐初连续的征东战事中，以第一次（贞观十九年，645）的期待最高，声势最隆。那时候，统一中国的唐太宗，又因解决突厥和收服西域，而踌躇满志，威望如日中天。开国元勋们，如李勣（594—669）等正年富力强，阅历丰富。后起之秀，若农家之子薛仁贵（614—683）虽初出茅庐，却已显露头角，正在军中任下级军官。归附的各族酋帅，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契苾何力，靺鞨族的突地稽等也都为唐太宗的恢宏气度所感召，心悦诚服，忠勇无比。在这种挟开国之盛势，集各族之英豪，内政外交诸事顺遂的大好形势下，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地区的领土问题。

唐军战前的准备相当充分，战略的算计亦极尽致密，它的安排大概可沿史载的战事进程揣度出来，即陆路大军以营州（今朝阳）为后方基地，春季开始行动，于夏水泛滥之前抢渡辽河，迅速攻取今抚顺、辽阳等要地。海路部队出山东半岛，袭取辽东半岛南端之金州地区。然后南北夹击，拔除辽东湾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敌军据点（今鞍山、海城一带），以打通通往朝鲜半岛之最短线，力争夏季进入朝鲜半岛，隆冬前结束战争。然而，北部靺鞨部落出乎意料地

介入，挫败了唐军这一战略企图的实施，使得唐太宗败兴而归，一场本拟速决的战争就此一拖便是几十年。

《新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梗概：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

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

十一月甲午，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勣、马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总兵官，以伐高丽。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

二月庚戌，（太宗）如洛阳宫，以伐高丽。

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

癸亥，李（世）勣克盖牟城（今抚顺）。

五月己巳，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克沙卑城（今金县）。

丁丑，军马首山（今辽阳市郊）。

甲申，克辽东城（今鞍山）。

六月丁酉，克白崖城（今鞍山本溪间）。

己未，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今海城南）东南山，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死之。

九月癸未，班师。

对于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史籍上也做了许多生动的记载。唐军将领负伤乃至牺牲者比比皆是，士卒填于沟壑者则更不可数

计。唐太宗也亲临前线，救死扶伤，激励士气。如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于贞观十七年(643)率部内附后，“授右武卫将军，从征辽东，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之吮血……，未几，卒于京师。”[32] 又如“帝征高丽，诏(契苾)何力为前军总管。次白崖城，中贼槊，创甚，帝自为傅药。”[33] 决战是在安市城外进行，正当唐军兵临城下时，情况发生突变，“高丽北部辱萨高延寿，南部辱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34] 而在双方的激战中“常以靺鞨锐兵居前”[35]。显然是靺鞨军的高昂士气和优良箭术，使唐军饱受重创。最后“(高)延寿等度势穷，即举众降”时，太宗对高丽部众宽大有馀，“酋长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馀众三万纵还之。”而惟独对逞勇好斗的靺鞨部众恨之入骨，竟“诛靺鞨三千馀人”[36]。接着唐军又围城休整达三月之久，仍无力再战，遂于九月撤军，征东战事半途而废。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们饥寒交迫，衣衫褴褛，唐太宗与将士同甘共苦，但情绪极为沮丧[37]。以后的东征也都不顺心，四年后太宗在抑郁中死去。

唐军首战不胜的根本原因在于靺鞨部队的介入，而在战前唐朝对靺鞨毫无防范。甚至于唐太宗向新罗使者阐明他解决朝鲜半岛三国之争的策略时，还曾说过[38]：“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辽东，而国可纾一岁，一策也……”然而，内附和可资利用的靺鞨、契丹部多居辽西营州和燕州地区，偏远的嫩江、扶馀、粟末、长白等地的契丹、靺鞨诸部则并不在唐朝的掌控之列。在战争中，外交又未能与军事并进，“远交近攻”的古训被置诸脑后，乃至于发生了北部靺鞨与高丽结盟抗唐的严重后果。《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对此前后始末说得一清二楚：

武德五年(622),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628)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三千馀,悉坑之。

就此,北方的靺鞨族就成了唐军不共戴天的死敌,从以后唐朝的各次征东战事中,不断地用兵于"扶馀道"的史实,我们推测当时与唐军为敌最力者,乃是聚居于扶馀、嫩江地区的靺鞨泊咄和安车骨两强部。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唐朝和高丽之间的战事无休无止,胜负却始终未能决出。除掉唐军将帅的指挥失误以外,游击战也困住了唐军。庸懦的高宗比起他的父亲来,实在乏善可陈,年号一个一个地换着,却也唤不出一个好运气来。若要逐次地叙述高宗时代的征东战事,简直是浪费篇幅,就连《高宗本纪》也将历次战事的将帅任命和事态发展记载得极为疏略,以致我们还得从史卷的字里行间去搜证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顺序。

连续二十年的抗唐战争,对于高丽和靺鞨人民来说也是一条不尽的隧道,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灭殆尽。为权臣所挟持的傀儡国王,还不得不与唐帝国私相授授[39]。老迈而顽固的独裁者泉盖苏文却一味地好战,而他的儿子们早已等着争夺他死后将遗下的权位。高句丽王朝气数将尽了。

乾封元年(666),高句丽国大难临头,盖苏文一死,内哄即起。继任"莫离支"(相当于兵部尚书或总理大臣)的长子泉男生被两个弟弟男建和男产陷害,出走国内城(今集安),并遣子泉献诚入唐求助。同年六月壬寅,唐高宗任命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

率庞同善、高侃(契丹族聚居的营州都督)、薛仁贵和李谨行(燕州靺鞨部酋长突地稽之子)等出辽东接应。九月薛仁贵小胜高丽军于新城(今抚顺北)。泉男生率其靺鞨、契丹部众前来会合。唐军进次金山(今开原西北东西辽河交汇处)[40],威胁扶馀地区。十二月己酉,高龄八十的李勣被任命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统率征东战局,战事进入高潮。

乾封二年(667),九月辛未,李勣率唐军击败敌军,占领高丽西陲重镇新城,由契苾何力留守,主持北线战事。迹象表明,此次唐军已不以速胜为战略,而以攻取扶馀嫩江地区,痛击靺鞨强部为首期目标。

总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贵(时年五十四,极精明)率两千精兵攻克扶馀城(今四平),扶馀地区三、四十城纳款输诚[41]。唐军进入北部靺鞨、契丹混居地区。在西线失利的危急态势下,泉男建率大军倾巢而出,史载:"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兵数万据南苏城(今开原东西丰境内)。"[42]并袭击新城,薛仁贵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地区受阻。薛仁贵避其锋芒,出其不意东取南苏、木底(今新宾)、苍岩(今通化)等三城,歼敌五万[43],消灭大批有生力量,进据东部靺鞨粟末、白山部之腹地。高丽败象已露,靺鞨社会大受震动,史载:"……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今敦化北山区)。"[44]又载:"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45]失尽了辽东、扶馀,朝鲜半岛已无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靺鞨外援更无指望,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契苾何力率军于今安东新义州一带渡江,"悉师围平壤"[46],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丽国亡。

而我们所关心的唐军的死敌,Magyar 人的祖先,靺鞨安车骨、

泊咄两部人民的命运，则更是凄惨，《新唐书·高丽传》的记载是："泉男建以兵五万袭扶馀，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对我们来说，究竟是谁指挥了这次战役，已是无从考据了。李勣和泉男建分别是双方的主帅，凡事都可以和他们扯在一起。然而那条"萨贺水"在何处，则十分重要。按其音，应该就是后来的宋瓦江[47]，现代的松花江，也就是安车骨、泊咄两靺鞨强部的聚居地区。

当时的真相大概是，唐军在占领扶馀地区以后，又以穷追猛打之势进抵嫩江—松花江流域，以图一举肃清靺鞨强敌之后方基地。在薛仁贵率主力唐军东进后，朝鲜半岛告急，高丽部队已无心恋战，急于回救平壤，扶馀、嫩江地区的靺鞨部队已成孤军，最后被唐军聚歼于萨贺水地区。本着唐朝一贯的"以夷制夷"的治边政策，唐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如高侃所率的营州契丹—奚族，和李谨行所率的燕州靺鞨族，似乎也参与了这场"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战胜后则纵兵虏掠，所谓"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似已不是来自农业地区的中原部队之所为。此时，与高丽方面结盟的靺鞨、契丹—奚族部落的内部已相当空虚，无力抵抗，于是一场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开始了，这也就史书所说的："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

作为后来欧洲的 Magyar 人，他们在告别了东方社会以后，先是逃亡，转而漫游，在无垠的欧亚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个寒暑，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许多不同血缘的族落，也终于忘却了自己祖先的业绩。他们本可以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于9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动乱，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将他们推入了欧洲民族的熔炉。就此开始了他们作为西

方民族的新篇章。

五、结束语

亚洲北方诸族对世界人类、语言和历史的伟大影响是无法低估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为他们的文化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但也玉成了他们坚毅刻苦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而中国史学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历史和人文的最重要的责任。然而史载留给我们的毕竟只是一些片断，语言也随着时代的迁延和种族的融合而游移变换。但是，正如于群星万点中可以看到一条银河，本文即是从语言、姓氏、历史故事和人类互相征伐的记载中，企图窥判一个极有作为的民族的全息性的始末。在注意到蒙古语族、突厥语族与 Magyar 人的毋庸置疑的血缘关系的同时，本文所力图证明的是：具有辉煌历史成就的女真—满族的祖先靺鞨人，对于在科学、文化、艺术、体育诸方面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匈牙利人来说，则是他们更为重要的远东祖源。

注释

[1] Consta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rio*,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1967, p. 175.

按：此英译本所列八个 Turk 部落为：Kabaoi、Nekis、Megeris, Kourtougermatos、Tarianos、Genach、Kari、Kasi。一般认为 Kabaoi 部滞留于摩尔达维亚而未入匈牙利地区。馀称 Magyar 七部，匈牙利文则译作：Nyek、Megyer、Kurtgymat、Tarjan、Jeno、Keri、Keszi。

[2] E. Lengyel, *1,000 Years of Hungary*, New York, John Day Co., 1958, p. 15.

[3]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in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29—255;

D. Sinor, *History of Hunga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6, pp. 15—22;

C. Macartney, *Hungary, a Short Histor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2, pp. 1—17;

D. Kosary, *A History of Hungary*, Cleveland, Benjamin Franklin, 1941, pp. 1—18.

[4] E. Lengyel, *1,000 Years of Hungary*, New York, John Day Co., 1958, p. 13.

D.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4, p. 98.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 80。

按:在匈牙利语中称 Pechenegs 部为 Besenyo,音似"伯岳吾",它可能就是《元史》所载的"钦察伯岳吾部";阿拉伯文献则记之为 Bajanak,音似"巴颜"。韩儒林先生认为"伯岳吾"是源自于"巴颜"一字的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5] T. Vuorela, *The Finno-Ugric Peopl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15;

R. Harms, "Uralic Languages",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22, p. 701.

[6] P. Ignotus, *Hungar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p. 21.

[7] E. Lengyel, *1,000 Years of Hungary*, p. 9.

[8] 格列科夫等《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页

53。

[9] 《北史》卷九十四,《契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127。

曰:"其莫贺弗勿干,率其部落……"

按:"勿干"意为"智者"或"善射者",应读作 mergan,故"勿"应读作"莫"。

[10]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地图出版社,1987,页78—79 。

[11]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页409。

[12] 韩儒林《穹庐集》,页471。

[13] 李树兰等《锡伯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白友寒《锡伯族源流史纲》,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

《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

贺灵等《锡伯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4] 《侍卫琐言补》,转引自《锡伯族史论考》,页12。

[15] 《魏书》卷一百,《勿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220。

曰:"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

[16]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in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45.

[17] P. Pelliot, *La Haute Asie*, *Paris*, 1931, pp. 25—28.

[18]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页133。

[19]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页394。

[20] 陈智超《粘氏族谱考》,待发表。

[21] 杜亚雄《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中国音乐》第四期,1982,页22。

Du Yaxiong, "Ancient Hungarian Folk Songs and Shamanic Songs of Minorities of North China", in T. Kim and M. Hoppal, ed., *Shaman-*

ism in Performing Arts, Budapest, 1995, p. 123.

[22] C. Macartney, *Hungary*, *A Short Histor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2, pp. 8, 21.

[23]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页251。

按:其依据是《魏书·长孙肥传》中关于长孙肥之子长孙翰的事迹:"蠕蠕大檀入寇云中,世祖亲征,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于于柞山,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

[24]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58,页204—208。

[25] 孙秀仁、干志耿《楛矢石砮探源》,载《史料汇编》第二辑,黑龙江博物馆出版,1979。转引自陈芳芝:《东北史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81。

[26]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页112。

[27] 宋和平《满族萨满神歌译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页15。

[28] D. Sinor, *History of Hungary*, p. 18.

[29] C. Macartney, *Hungary*, *A Short History*, p. 18.

[30] C. Macartney and G. Barany, "Hungary",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20, p. 700.

[31] 《北史》卷九十四,《勿吉、奚、契丹、室韦、乌洛侯》等传,页3123—3132。

曰勿吉诸部:"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瞒咄。"曰奚族:"其后种类渐多,分为五部……二曰莫贺弗……四曰木昆……。"曰契丹:"献文时,使莫弗纥何辰来献。""太和三年……其莫贺弗勿干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馀口,驱徙杂畜求内附,止于白狼水东。""隋开皇四年,率莫贺弗来谒。"又曰:"南室韦……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馀莫弗瞒咄,犹

酋长也。……北室韦,分为九部……,其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

再曰乌洛侯部:"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

[32]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上》,中华书局,点校本,页5165。

[33]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契苾何力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4119。

[34]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页6191。

[35]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页6192。

[36]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页6192。

[37]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页6194。

[38]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页6188。

[39]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页6194。

[40] 贾敬颜"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载《文史》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1,页149。

[41]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薛仁贵传》,页4141。

[42]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契苾何力传》,页4120。

[43]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页6196。

[44]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页6179。

[45]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黑水靺鞨传》,页6178。

[46]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页6197。

[47] 同[40],页135 。

附表一：金女真语、蒙古语、匈牙利语关联语辞

	女真语	蒙古语	匈牙利语
二、第二	益都	kheyordokh	kettö
客人	按答海	zochin	vendég
穷人	什古乃	yaduu	szegény
围猎	阿里喜(胡喜)	khashaa	karám
摔角者	拔里速	bukh	birkózó
户长	胡鲁刺	khargalzagch	felügyelö
奴隶	阿合	zarts	szolga
头	兀术	tolgoi	fej
心	粘罕	zurkh	szív
牙	畏可	shud	fog
疮	牙吾塔(佛热)	yar	fájó
尿	石哥里	shees	vizel
笨	漫都哥	manguu/bodol	buta
分享	忽都	khuvi	közös
帮助	阿息保	ajil	segitö
和谐	奴申	nairsag	összhang
宽容	讹出虎	khultseh	eltür
幸运	赛里	zol/jarga	szerencse
快	撒八	khurd	sebes
堆积	吾里补	ovooloh	halom
购买	兀带	hudaldah	vétel
星	兀典	od	csillag
山	阿邻	uul	hegy

	女真语	蒙古语	匈牙利语
峰	哈丹(超还)	oroy	csúcs
坡	阿懒	dov	domb
海	忒邻	dalai	tenger
船	沙忽带	zavi	hajó
铁	斡论	tumur	vas
锅	睹毋	togoo	fazék
刀刃	斜烈	ir	él
金	按春	alta	arany
口袋	蒲卢浑	sav/tartsag	börönd
罐	活女	laaz	korsó
红色	活腊胡	ulaan	vörös
灶	胡刺	zuukh	kályha
松树	桓端	khush	fenyo
羊羔	活里罕	khurga	bárány
幼犬	合喜	zulzagha	fiazik
狗	古乃(库立)	nokhoi	kutya

附表二:辽契丹语、蒙古语、匈牙利语语辞比较

	契丹语	蒙古语	匈牙利语
父亲	阿主	etseg	atya/apa
夫人	夷离的	gergii/ehener	feleség
控制	辖	hianah	fékez
凶恶	暴里	bulai	alávaló
著名	阿庐朵里	aldar	híres

	契丹语	蒙古语	匈牙利语
雨	瑟	khur	esö
婚礼	奥礼	khurim	esküvö
邀请	射	zalah	(meg)hívás
力量	虎思	khuch	erö
宫帐	斡尔朵	ord	palota
主要的	葛儿	gol	fö
宰杀	恹	alahk	ölni
田鼠	拍		pocok
太阳	乃捏	nar	nap
兔	陶里	tuulai	nyúl
美好	赛伊	sain	szép
天、日	儿奢	urder	nap
狗	捏褐	nokhoi	kutya
站立	卓	zogs	állni
心脏	算	zurkh	szív
讨伐	夺里	darah	hódítás
兴旺(一)	耶鲁	zhurzhih	jólét
兴旺(二)	蒲速	degzhih	bőség
金	女古	altan	arany
玉	孤稳	has	gebe
繁殖	窝笃	uulder	fajta
宽大	阿斯	aguu	nagy
辅助	何鲁	tuslah	helyettes
孝顺	得失得	tahim	áhítat
法官	楚古	shuugu	zsüri

	契丹语	蒙古语	匈牙利语
一百	爪	zuu	száz
土壤	耨斡	shavar	föld
角	犀	ever	szarv

附表三：蒙古语（契丹语）、匈牙利语语辞变换规律

	契丹语	蒙古语	匈牙利语
燃烧		gal	fütés
主要的	葛儿	gol	fö
河流		gol	folyó
跑		guikh	fut
松树		gutakh	fenyö
青草		nogoo	fü
控制	辖	hyanakh	fékez
一半		hagas	fél
乌鸦		heree	varjú
旧		huuchin	vén
割		huvaah	felvág
儿子		huu	fiú
热		hal	forró
水		us	víz
柳树		ud	füz
繁殖	窝笃	uulder	fajta
云		uul	felhö
兔子	陶里	tuulai	nyúl

	契丹语	蒙古语	匈牙利语
湖泊		nuur	tó
孝顺	得失得	tahim	áhítat
角	犀	ever	szarv
一		neg	egy
五		tav	öt
动物		mal	állat
家庭		ail	család
丈夫		er	férj
大		aguu	nagy
空气		agaar	lég
挖掘		*maltah*	ás
疯狂		galzuu	örült
头脑		tarkhi	agy

附表四：匈牙利、女真、北魏姓氏比较

匈牙利姓氏	女真姓氏	北魏姓氏	备注
Aba, Abai	呵不哈、阿不罕		
Ács	阿斯准、阿速		
Almás	谙蛮		
Arany	爱申、阿鲜		
Bakós	把古		族名“拔野古”
Balla		拔列	
Barta, Bartha			奚姓“伯德”

匈牙利姓氏	女真姓氏	北魏姓氏	备注
Bodó	泊咄		靺鞨部名
Bokor	蒲古里		族名“仆骨”
Boros		拨略/破六韩	
Buza	蒲察		
Csaki, Csiki	夹谷		
Csarszar	赤盏、石盏		
Csibi		契苾	
Dobi		达勃	
Dudas	徒单		
Fehér	夫合		
Fejes, Füzese	吾塞		
Földes		扈地于	
Fordo	贺都		
Fülöp	吾鲁	副吕、贺楼	
Gáal, Gál		盖楼	
Gyöngyösi		辗迟	中原古族“长勺”，人名“穷奇”等。
Gyurkó	古里甲、瓜尔佳		
Herczegh	和速嘉	贺若	
Horváth		贺拔	
Illés	挹娄、乙力		契丹姓氏“耶律”
Illyes	挹娄、移剌		同上
Józsa, Rózsa	术甲		

匈牙利姓氏	女真姓氏	北魏姓氏	备注
Juhos	术虎	素和	
Kocsis			族名“高车”
Kopasz		柯拔	
Kun			族名“浑”
Major	抹颜	莫舆、慕容	
Molnár		莫那娄	
Nádasi	纳坦		
Nagy	粘割、粘葛		
Németh	聂木栾、纳木鲁		
Nyíri	女奚烈、倪属利		
Nyul	纳剌,那拉	那礼	
Ökrös	乌古论		
Oláh	斡雷		
Orsi	纥奚烈	纥奚	
Országh	斡准		
Orvos		阿伏于	
Pálfy			蒙古部名“巴尔虎”
Papp	把		朝鲜姓氏“朴”
Rajk	耨		
Sánta	散答		
Sípos	苏勃鲁	须卜	
Soós		庾氏	
Sütö		尸突	
Szabó	塞蒲里		

匈牙利姓氏	女真姓氏	北魏姓氏	备注
Szakál	撒合烈		
Szántó	神土		
Szekeres			族名“思结”
Széles	舍利		
Szima	石抹		契丹姓氏“萧”
Szollos		树洛于、如罗	
Tánczos	田众		
Takács, Tokaji	独吉	独孤	
Tomen, Tumen	陀满		
Torok		太洛稽、沓卢	族名“同罗”
Tóth	拓特，突地		
Turi	都烈		
Vassi			锡伯族姓氏“华西”
Vörös	斡论	乌洛兰	

蒙古语民族中的通古斯血缘成分

“蒙古民族”成名较晚，是成吉思汗将它推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旧唐书·室韦传》首先记载了“蒙兀室韦”，而《新唐书·室韦传》又将它记为“蒙瓦”。学界普遍认为它的祖先是一个“东胡—鲜卑—室韦”系的小部落，而现代蒙古语也的确与古代的“东胡—鲜卑语”最相接近。事实上，早在蒙古民族兴起前一千年，鲜卑民族就建立了统治中原的“北魏”政权；后来北方草原地带还育成过另一个使用蒙古语的强大民族“契丹”，这个过早湮灭了的民族的绚丽作为，也是世界历史上光彩照人的一页。

13世纪前，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纥等民族先后是漠北高原的主人。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在这片“匈奴故地”上不断地融合，因此没有人会以为“蒙古民族”、“契丹民族”，乃至它们的祖先“东胡—鲜卑—室韦系民族”都是纯之又纯的人类集团。然而在追溯这些“蒙古语民族”的源流时，西方学者却又往往一味突出以“匈奴”为背景的“突厥语民族”强势作用；而蒙古语与通古斯语有大量共有成分的事实，却未能唤起人们对通古斯民族在蒙古语民族形成中的重要影响的认识。

远徙欧洲的Magyar人的语言中的女真语和蒙古语兼重现象，无疑启发了我们：来自更东方的“东夷—通古斯系”民族，在“蒙古民族”和“契丹民族”中有形地注入了他们血缘。事实上，欧亚草

原诸民族的血缘和语言是在历史地渐变着的，从较单纯的“东胡—鲜卑”到“契丹”和“蒙古”民族的发展，是与通古斯民族的渗透不可分割的。本文将以“契丹民族”和与“蒙古民族”戚戚相关的“鞑靼”、“蔑里乞”、“克烈”部落的内涵，以及成吉思汗家世渊源来揭示这一事实。

一、关于契丹民族的成分

“契丹”的名气很大，由于它的发源地靠近中原，因此地处北方的蒙古民族也就把中国叫“契丹”，西方世界也把“契丹”当做了中国的一个代名词。契丹民族的政治军事活动开始得很早，可是直到10世纪初，它的杰出领袖“耶律·阿保机”[1]才在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建立了“辽”。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官制完备的朝代，还创造了文字；后世为它存活二百多年还留下一部正史。对契丹民族的研究结果表明，它的语言与“蒙古语”是相当接近的。它灭于女真民族建立的金朝，金朝又很快转灭于蒙古民族之手，契丹民族在历史上就消失了，它的族人分别融入了蒙古、女真和汉民族之中。

“契丹”是一个真实的部落名，《南村辍耕录》记载的“蒙古七十二种”之一的“乞要歹”[2]，南西伯利亚地名“赤塔”，新疆地名“奇台”等，都是“契丹”部落的遗迹，玄奘说“于阗”（今“和田”）也叫“屈丹”[3]。因此，我们不必以为只有一个“契丹”，这个古老的民族可能很早就星散在欧亚草原上了；更不必认为10世纪立国的“契丹”是个血缘很纯的部落，它在历史上一露头就已经是一个部落联盟。《魏书·契丹传》记载[4]：

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絫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入献天府，遂求为常。

于是后来的《辽史》就称上述部落为“古八部”了[5]。而其中“悉万丹”又是欧亚大陆上一个渊源流长部落，中国历史也将它记作“深末怛”[6]等；而西方历史则记载了很早就入侵欧洲的亚洲游牧民族 Sarmatae 或 Sarmatian[7]。说来，中原姓氏“司马”和“西门”，匈牙利姓氏 Szima 等，可能都是与这个族名相关的。这个氏族是辽朝的“后族”，即外戚之族。辽朝时它改汉姓“萧”，金朝时又将它还原为“石抹”了。因此许多人以为姓“萧”和“石抹”的都是契丹人。

《隋书·北狄传》也记载了“契丹”，它说：

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并为慕容氏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其后稍大，居黄龙之北数百里。其俗与靺鞨同。

显然，那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契丹民族与通古斯系的靺鞨人有相近的习俗。《新唐书·北狄·契丹传》则说：

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

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

其中所说的“大贺氏”，当然就是历史上屡见的东胡—鲜卑系的“屠何氏”，而现代学者则认为它就是族名“达斡尔”的缩音。然而，契丹民族最后又是由“耶律氏”来统治的，《辽史》如此地记述这个权力更替的过程[8]：

> 至唐，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析三耶律氏为七，二审密氏为五，凡二十部。刻木为契，政令大行。逊不有国，乃立遥辇氏代大贺氏，兵力益振，即太祖六世祖也。

我们又不难看出，取代“大贺氏”的“遥辇氏”，就是“耶律氏”，亦即是通古斯系的“挹娄氏”；而“审密氏”就是“石抹氏”或“悉万丹氏”；契丹王室是在“挹娄氏族”和“悉万丹氏族”间进行婚配的。当然，也不必将“挹娄氏族”和“悉万丹氏族”视为“纯通古斯系”或“纯东胡—鲜卑系”的群体，它们都是血缘融合历史中的两条互相渗透的脉络。除了王族如此，《辽史》记载的契丹民族包容的部类中，就有大量的通古斯系部落，如：

奥衍女直	即“兀颜·女直”（《金国语解》曰：“兀颜曰朱”）；
乙典女直	即“阿典·女直”（《金国语解》曰：“阿典曰雷”）；
讹仆括	即“阿巴嘎”（《金国语解》曰：“呵不哈曰田”）；

匿讫唐古	即“纳吉·唐古”；
窈爪	即“兀者”；
梅只、慢押、梅里急	即“靺鞨”；
梅古悉、蛮葛	即“靺鞨斯”；
大蔑孤	即“大靺鞨”；
小蔑孤	即“小靺鞨”；
楮特	即“拓特”。

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契丹民族，无论其语言和血缘都融有通古斯成分，看来是无疑的了。

二、关于“鞑靼”的起源

就一般常识而言，“鞑靼”被认为与蒙古民族有关。然而至今东西方的学者对于“鞑靼”民族的起源仍存疑惑。它似同“蒙古”，又不同于“蒙古”。大概是在7、8世纪之间，这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初现于蒙古东部地区。根据西方的记载，8世纪时，它已经扩散到了欧亚大陆上的很多地方。但中国和西方世界皆因不明真相，而将北亚诸族都统称“鞑靼”。继之又引申出“蒙鞑”、“满鞑”、“鞑子”、“鞑虏”等带有歧视性的政治名词。

尽管如此，《蒙古秘史》和《史集》等关于蒙古民族的重要著作，却将“蒙古”与“鞑靼”在种属上区分得很清楚。西方传教士鲁布鲁克，于公元1253年8月到达伏尔加河，他记述在去见拔都之前[9]：

> 一些官廷里的书记官对我们说:“你们不许说我们的主人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而是一个蒙古人。”……他们也不愿被称作鞑靼人,鞑靼人是另一个种族……

事实上,“鞑靼”是蒙古人对通古斯民族的特称。元朝政府就以“水达达”,来称呼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通古斯部落。我们还发现,往往只有那些与通古斯族相关的部落才被称为“鞑靼”。中国历史则早有“鞑靼”源于“靺鞨”的记载,欧阳修所撰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就说过:

> 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靼。

在明代御边将士所使用的蒙古语会话读本《蓟门防御考》中,也是将“达子”一字的记为“抹暗”的[10]。然而,昧于对这一族名的世界性的长期误解,中国学者历来又对语言信息不屑一顾;因此关于“鞑靼”之初出自通古斯族的说法,竟未能被任何中外学界所注意和采信。

《金史·金国语解》记载的通古斯—女真姓氏“拓特”,可能就是“鞑靼”一名之源。较早提到这个姓氏的是《隋书·靺鞨传》,它说:

> 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

从，每战有功，赏赐优厚。

《新唐书·契丹传》又再次提到了这同一个人：

武德中，其[契丹]大酋孙敖曹与靺鞨长突地稽俱遣人来朝。

“突地”和“度地”，都是“拓特”的异译；而“稽”则是通古斯语“酋长”或“王”的意思[11]。这位“拓特部的酋长”率其部众定居于“柳城”（今辽西朝阳地区）。他们与一些属于蒙古语族部落融合成了“契丹”民族。8 世纪所立的后突厥“阙特勤碑”[12]中，提到的 Otuz-Tatar（“三十姓鞑靼”）和 Tatasi（“地豆于”）；《辽史》中记载的“惕德”，应该都是东蒙古地区的“拓特”部。

匈牙利姓氏 Toth 也与“拓特”有关，我猜测 Toth 一字在蒙古语中是读 to-ta-ha 的，也就是《秘史》和《元史》中频繁记载的人名“脱黑脱阿”、“秃黑秃黑”、“秃秃黑”、“土土哈”、“脱脱”等。通古斯民族在欧亚草原上扩散，使这个通古斯姓名具有冲击性的世界意义。由于东方民族对近东和巴尔干半岛的入侵，那里也被西方人称为“达达里亚”（Tartaria），沟通黑海和爱琴海的南部海道也被叫做“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它们都是出自“鞑靼”之名的。

13 世纪蒙古部兴起，《秘史》和《史集》对于它的强敌“塔塔尔”部，有相当丰富的记载，波斯著作《史集》说[13]：

声誉昭著，各有军队和君长的塔塔尔部落，有下列六个：

秃秃黑里兀惕—塔塔尔、阿勒赤—塔塔尔、察罕—塔塔尔、奎因—塔塔尔、帖烈惕—塔塔尔、不鲁恢—塔塔尔。秃秃黑里兀惕部是[所有]塔塔尔部落中最受尊敬者。

这揭示了“塔塔尔”是以“秃秃黑里兀惕”为核心的部落联盟。而“秃秃黑”(tutuq)则是“塔塔尔”之源音。其馀五部,也不难予以识别。“阿勒赤”(alji)即是“阿勒楚”(女真语之“金”字“按出”之变音),应该是《金史》记载的靺鞨“安车骨”的同源部落;“察罕—塔塔尔”即是“白鞑靼”;“帖烈”(trat)则与历史上的族名“铁勒”相关;“不鲁恢”(brqui)又与鲜卑氏名“破六韩”或“步六孤”有关;“奎因”(kuin),则是匈奴氏族名“呼衍”。

《秘史》第五十三节对于“塔塔尔”部也有备载:

在捕鱼儿海子、阔连子海中间相连的兀儿失温河附近住着阿亦里兀惕氏和备鲁兀惕氏塔塔尔部。

所谓“捕鱼儿海子”和“阔连子海”即贝尔湖和呼仑湖。“呼仑贝尔”是欧亚草原东端的一个水草丰盛的牧场,它原本是“蒙兀室韦”的领地。7 世纪中(也可能更早),靺鞨强部就称霸于这一首富地区。那里也就成了“通古斯”和“室韦”两族的熔炉,“鞑靼民族”大概就是在那里酿成的。进入蒙古高原的“蒙兀部”,也不断地融入了后续而来的,呈强势的通古斯—靺鞨人。因此,现代蒙古语也都包容了大量的通古斯语成分。

三、关于“蔑里乞”和“靺鞨”的渊源

根据《秘史》记载，早先“蔑里乞”和“塔塔尔”都是蒙古部落的世仇，等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以后，它们又都成了蒙古民族的重要成分。《南村辍耕录》记载的“蒙古七十二种”中，名似“蔑里乞”的部落就有：“灭里吉歹”、“木里乞”、“末里乞歹”、“灭里吉”四种。其实，通古斯族名“靺鞨”，亦记作“靺羯”，“蔑里乞”应该是“靺鞨”或“靺羯”的变音。

事实上，《魏书·官氏志》中记载的北方民族部落名“勿忸”、“茂眷”、“秘邗”，都是参与拓拔鲜卑入侵中原的“靺鞨”氏族；《隋书·铁勒传》记载的“蔑促”，也是一个“靺羯”部落；《辽史》的《营卫志》和《兵卫志》记载的契丹属部名：“慢押”、“梅只”、“梅里急”等，也都是“蔑里乞”的转音。

西史中也有“蔑里乞”民族的信息，它是由突厥人传递到西方去的，忒俄费拉克图斯的记载[14]，在公元598年初，有西突厥使者指责拜占庭庇护一支西逃的Avars人（通常认为就是“柔然”）。在他递交的国书中，还述及到Avars人逃入中国和一个名叫Murki的东方部落的事情：

> 著名东方突厥之可汗……与室点密可汗共同征服“阿瓦尔”（Avars）。……其余众奔亡入“桃花石”（Taugas，突厥语之“中国”）之中，别有一部分阿瓦尔馀众逃入Murki，此民族居地与“桃花石”极近，人颇好战。

法国人伯希和早就猜测 Murki 民族就是“蔑里乞”，还有西方学者进一步指出它就是通古斯族名“靺鞨”[15]。

“蔑里乞”最初是些通古斯系部落，但后来演变成了一个血缘复杂的民族；而相邻的蒙古部落，也融入了“蔑里乞”人成分。成吉思汗家族谱系就是这种种族融合的证据。《秘史》记载了成吉思汗家族一个十分重要的先人[16]，那是他的十一世祖“朵奔蔑儿干”用一条鹿腿换来的“马阿里黑巴牙兀惕”穷汉的儿子，这个小孩就作了朵奔蔑儿干和他的妻子“阿阑豁阿”的仆人。《秘史》说：

> 朵奔蔑儿干去世以后，他的妻子阿阑豁阿寡居，又生了三个儿子。

她的两个大儿子在背后议论说：

> 我们的母亲没有亲近的男子，也没有丈夫，生了这三个儿子，家里只有马阿里黑巴牙兀惕族的仆人，这三个儿子就是他的儿子吧？

这三个非婚生子中的最幼者“孛端察儿”，是红发碧眼的“孛儿只斤”（“兰眼睛”[17]）氏的第一人，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据说成吉思汗本人的眼瞳也是兰色的。推算起来，孛端察儿应该出生在公元 900 年前后。

“马阿里黑”是用汉字拼音的 m-a-r-kh，也就是族名“靺鞨”；其谐音 mi-ri-khi 就是“蔑里乞”。而“巴牙兀”就是“伯岳吾”。因此，成吉思汗真正的十一世祖，必是一个的长着红头发兰眼睛的

“蔑里乞—伯岳吾”部人。这个部落的成员表现有印欧人种的体征，使我猜测其祖先曾进入“黠戛斯”地区（叶尼塞河上游之谦河流域），并从那里的土著居民血缘中，获得了部分印欧人种的血缘和容貌。后来在东蒙古地区出现的“黄头室韦”或“黄头女真”部，可能就是自黠戛斯地区回流蒙古高原的这些部落。

《新唐书·黠戛斯传》还有它们盘踞在黠戛斯地区的记载：

> 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俄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籍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坚昆之人得以役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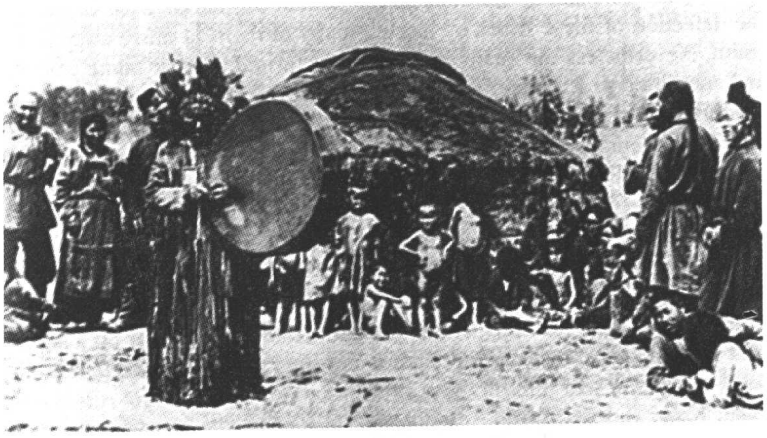
其中，“弥列哥”就是“蔑里乞”，“俄支”就是“兀者”，都是些通古斯系部落名；而“木马”就是雪橇，那是通古斯民族发明和率先使用的雪上运载工具。所谓“坚昆”就是“黠戛斯”，据《新唐书》记载，那里的原住民有“赤发，皙面，绿瞳”的特征，他们统统臣服了善战的通古斯民族。公元804年，蒙古高原上的回纥汗国出人祸，有人引“黠戛斯人”南下参与内战。其实，他们都是一些“蔑里乞”和“兀者”部落，其中可能还有成吉思汗的“马阿里黑·巴牙兀惕”之真祖。

四、关于“克烈”部的起源

所谓“克烈部”，必是《蒙古秘史》中的“客列亦惕”，也就是《南村辍耕录》记载的“怯列歹”，波斯《史集》则将其记为

图三:20 世纪三十年代西泊利亚地区的一个鄂温克族青年猎人,身穿鹿皮衣裤,足蹬滑雪板。滑雪板即唐书所谓的“木马”。

取自:J. Forsyth,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13.



图四:1900 年左右,我国萨彦岭南图瓦族地区(今属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一个“萨满”在击鼓跳神。“图瓦族”应即唐代的“都播”。

取自:J. Forsyth,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26.

k(a)rait。这个族名不见于中国前朝的历史,我以为它与古鲜卑族名“敕勒”可能是有关系的。也有人推算它就是辽、金两代历史记载的“阻卜”;中外学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阻卜”即是“鞑靼”,是源自大兴安岭西侧的“室韦系蒙古语族部落”的后裔。其中又以王国维、冯承钧等人的研究最为卓著。余大钧先生在其所著《阻卜考》[18]中,有专精独到的总结性论述。

既然“克烈”就是“阻卜”,“阻卜”又等同“鞑靼”;那末“克烈”和“鞑靼”一样,至少应该是室韦—靺鞨混合部落。事实上,隋唐以来(甚至于更早的时代)鲜卑—室韦族和通古斯—靺鞨族,已经在血缘和语言上互相融合了。若不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部”异军突起,一鸣惊人;蒙古地区或许早已成了这些“来自室韦地区的靺鞨人”的一家天下。

“阻卜”之名,可以追溯到匈奴单于家族“须卜氏”[19];12 世纪时,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中还有一部 Sobekul 人[20];匈牙利还有一个不小的姓氏 Sipos。元蒙早期军事领袖“速不台”之名,就是“须卜台”。“须卜氏”也可能就是“鲜卑氏”。在“克烈”部落联盟形成的过程中,“须卜”氏族曾在其中占有领导地位。

驻牧于蒙古高原中部,人口众多的克烈部曾是漠北的强部。酋长“王罕”曾与年轻的铁木真,有过“父子”之谊。友谊破裂后,克烈部败灭于蒙古部,它的诸多千金们又成了成吉思汗家族最重要的女眷。克烈部也因此成为蒙古民族内的最有影响的成分之一。众所周知,王罕的弟弟“扎阿绀孛”的女儿“唆鲁禾帖尼”,是托雷的长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四汗之母。

1939 年,冯承钧就先生就考证了王罕的祖父“马儿忽思”(Marguz)[21],就是《辽史》中的那个屡叛不止,后因塔塔尔人的出

卖，而被辽朝擒杀的“阻卜磨古斯”[22]。西方学者猜测“磨古斯”和另一位克烈部酋长“余古赧”[23]，分别是基督教教名 Marcus 和 Johanan[24]，不少中国学者也很赞同这样的想法。我以为“磨古斯”就是“靺鞨斯”；“余古赧”则是“余古赧”的误抄，它是鲜卑和女真常见人名“什古乃”，《金国语解》解释说：“什古乃，瘠人”。

《史集》记载，马儿忽思妻子的名字是“忽秃黑台”，这也是一个蒙古高原各族男女通用常见的名字，它是女真语的“柳树”，即“佛多佛”[25]一字。《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有一个克烈族重臣名“镇海”（有人也作“镇国”），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女真语“鹰鹘”一字“申科岸”[26]。王罕有一个女儿“忽扎兀儿·兀真”（嫁与蔑里乞部“脱黑脱阿”）。“忽扎兀儿”即“忽朝”，是女真语中的“尊贵”意思[27]；“兀真”则是通古斯语对“夫人”的称呼，即“福晋”。该书还说：

> 扎阿绀孛（jakambu）原名客列亦台（karaidai）。当唐兀惕人捉住他时，见他十分机灵，便称他为扎阿绀孛，即“国家的大异密”；“扎阿”意为“国家”，“绀孛”（kambu）意为“大”。

作者告诉我们“绀孛”（kambu）一字，其实是通古斯语的“按巴”（amba）。根据这些分析，不难看出克烈部的语言与女真语有着渊缘。

“克烈”也是一支西去的民族。Keri 部是匈牙利民族（Magyar）的七个祖先部落之一；现代哈萨克族中有一个很大的“克烈”部落；13 世纪时，成吉思汗的部队曾两次在南俄地区遭遇“克烈”部落的抵抗。《秘史》记载[28]：

> 斡歌歹(即窝阔台)……派遣速别额台(即速不台)把阿秃儿去征服康里、钦察、巴只吉惕、斡鲁速惕、阿速惕、撒速惕、马扎剌惕、客失米儿、薛儿客速惕、孛剌儿、客列剌等部国,渡亦扎勒河、扎牙黑河,直取蔑客惕绵、客儿绵、客亦别诸城。

其中"客列剌"显然就是"克烈"部落。

至今,伏尔加河下游还住着一支"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俄国人称他们为"卡尔梅克"(Kalmuk)人。18 世纪时,在酋长"渥巴锡"的率领下大部族众回归中国。"土尔扈特"或许就是"克烈"之下属部名"董合亦惕",而 Kal-muk 就是"克烈—谋克","谋克"则是女真语"氏族"之意。

有人认为"克烈"是个"突厥语"部落,事实上它是一个"通古斯"化了的"室韦"部落。然而,克烈部落联盟中还包容了"匈奴"遗族;它使用的是一种突厥、室韦、通古斯的混合语言,应该是更合理的结论。当时蒙古高原各部所使用的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只是这三种主要语言融合的配方不同而已;纯之又纯或非此即彼的语言已经是很难设想的事情了。

五、结束语

人们很早就知道"满蒙不分家"的事实,然而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又往往被认为始于清代皇室与蒙古贵族长期通婚。事实上,蒙古民族的先祖就有很浓重的通古斯民族的血缘,这就是蒙古语中含有大量通古斯语言成分的直接原因。

很多西方历史—语言学家认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种语言有共同的祖源,因此他们构造了一个著名的“阿尔泰语系理论”。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又有些人开始认识到这些语言间的关联,并不是因为它们“同源”造成的,而是由于长期接触而形成的语词借用现象[29];然而,他们又总是将蒙古语、通古斯语之间[30],和突厥语、通古斯语之间[31]的语辞交集,一律地解释为以通古斯语为受体的借辞现象[4]。即是说在北方诸族的融合过程中,位处更东方的通古斯民族是处于一种弱势和被动的地位。事实上,这些假设与北方诸族由东向西的实际迁徙呈反向态势,因此也就很难为人接受了。

本文则以“契丹”、“鞑靼”、“蔑里乞”、“克烈”等民族与通古斯民族的关联,来揭示“蒙古语民族”融有大量的通古斯民族血缘;而且通古斯民族是欧亚草原上的一个强势的血缘群体。也只有认识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历史地、动力学地理解中国北方诸族及其语言形成的机制。

注释

[1]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

曰:“太祖大圣大明神烈皇帝,姓耶律氏,讳亿,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

[2] 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97,页12—14。

[3]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二十二国》,台北,三民书局,1998,页627。

曰:“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涣那

国，凶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溪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

[4] 《魏书》卷一百一，《契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223。

[5] 《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中》，页377—378。

[6] 《北史》卷九十四，《室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129。

曰：“室韦国……，其后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并无君长。”

[7]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79。

Tacitus, *Germani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sect. 46.

[8] 《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页395。

[9]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页234。

[10] 贾敬颜、朱风《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页154。

[11]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182。

曰：“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

[12] 岑仲勉《突厥史集》下册卷十六，《突厥文碑注释》，中华书局，1958，页880。

[13]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页167。

[14]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页220—221。

[15]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 192.

该书第五章，注10（p. 578）曰：“人们怀疑这个蔑儿乞部就是第六世纪时的拜占庭作家提到的 Mukri（见 P. Pelliot, "Apropos des Comans", Journal Asiatique, 1920, p. 145），另

外有人将 Mukri 当作中国史学家所称的靺鞨(Mo-ho),即第七与第八世纪时在黑龙江流域的通古斯人。"

[16] 《蒙古秘史》15—18 节,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中华书局,1957,页 31。

[17]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页 61。

[18] 余大钧《阻卜考》,内蒙古大学学报丛刊《蒙古史论文选集·卷1》,1984,页 168。

[19]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2890—2891。

曰:"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

[20]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41.

其中有关文字之译文为:"1183—1184 年,博戈留伯斯基(按:已故罗斯大公 Bogoliubskii)之弟,Suzdal 城的符西窝洛德(Vsevolod),向伏尔加-保加尔人发动了一次重要的进攻。Sobekul、Chalmat(a)和 Tetuz 等城的保加尔人都严阵以待"。

[21]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辽金北边部族考》,中华书局,1957;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页 213。

[22] 《辽史》卷二十五,《道宗本纪五》,页 298,300,302,304。

《辽史》卷二十六,《道宗本纪六》,页 312。

[23] 《辽史》卷二十四,《道宗本纪四》,页 286。

曰:"七年(1081),六月丙寅,阻卜余古赧来贡"。

[24]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 191.

该书第五章,注8(页. 578) 说:"关于克烈部诸王的基督教名字,见 P. Pelliot, *Chretiens d' Asie Centrale*, p. 627"。

[25] 宋和平《满族萨满神歌译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页15,375。

[26] 和希格《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女真译语研究》,1983,页285;
贾敬颜、朱风《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页277;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页371,注八。

[27] 和希格《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女真译语研究》,1983,页300。

[28] 《蒙古秘史》270节,页268。

[29] G. Clauson, "The Case Against the Altaic Theor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II (1956), pp. 181—87.

[30] W. Bang, "Turrkisches Lehngut im Mandschrischen", *Ungarische Jahrbucher*, 4 (1924), pp. 15—19.

[31] W. Rozycki,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欧亚草原诸族的通古斯成分

突厥和蒙古两大语族的西迁活动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通古斯语民族的西向运动,以及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巨大影响,却始终未被人们注意。事实上,除公元9世纪到达欧洲中部的匈牙利(Magyar)民族外,更早就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芬兰民族和爱沙尼亚民族的语言中的通古斯语成分表明:通古斯民族向欧洲的迁徙活动可能在上古时代就开始了。

《隋书·铁勒传》首次把中国历史的笔触伸向欧洲,它列举的远至"拂懔"(罗马帝国)的欧亚草原的诸多部落名,为北方诸族西向迁徙的态势,构造了一幅清晰的图象。该传说[1]:

>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独洛河(按,蒙古"土拉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按,"天山")则有契弊、薄洛职、已咥、苏婆、那曷、乌罐、纥骨、也咥、于尼罐等,胜兵可二万。金山(按,"阿尔泰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契等,一万馀兵。康国北,傍阿得水(按,"伏尔加河"),则有诃咥、曷蠚、拨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末、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拂懔东则有恩屈、阿兰、

北褥、九离伏、嗢昏等，近二万人。北海（按，“贝加尔湖”）南则有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

上述族名大多不难辨认，其中一些通古斯部落名也是一目了然，如：

已咥、也咥、诃咥、曷蠚	皆“兀者”；
蔑促、蒙陈	皆“靺羯”；
恩屈	即“按出虎”；
曷比	即“阿巴嘎”；
羯三	即“女真”或“诸申”；
那曷	即“粘割”。

根据“拂懔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的说法，一些源自通古斯系的部落，如“恩屈”（“按出虎”）等，早就生活在罗马帝国边界附近了。

西方历史也提供了亚洲游牧民族在欧洲地区活动的记录。公元458年，西罗马皇帝 Majorian（451—461）征募了一支完全由“蛮族”构成的军队，去对抗从北非入侵的汪达人，这些来自多瑙河下游的达契亚和梅西亚地方的匈人（Huns）部落是[2]：

Bastern、Suebus、Pannonius、Neurus、Chunus、Geta、Dacus、Halanus、Bellonotus、Rugus、Burgundio、Vesus、Alites、Bisalta、Ostrogoths、Procrustes、Sarmata、Moschus…

其中,除一些欧洲种蛮族之名,如"孛艮第"(Burgundio)、"西哥特"(Ostrogoths)等外,还有已经为我们熟知的亚洲族名,如:"须卜"或"鲜卑"(Suebus)、"女奚烈"(Neurus)、"叱奴"(Chunus)、"达妬"(Dacus)、"葛逻禄"或"哈喇鲁"(Halanus)、"如甲"(Rugus)、"阿勒楚"(Alites)、"深末怛"(Sarmata)、"靺鞨"或"密须"(Moschus)等。而"女奚烈"、"如甲"、"阿勒楚"、"靺鞨"明显都是通古斯系部落。

因此,中西方历史都表明,来自东北亚的通古斯部落,中古时代就生息在从中亚远至中欧草原上的广大地域上。隋唐两代以后,中国历史对漠北民族的了解大大深化了;辽金元蒙三代,北方民族建立了统治中原乃至欧亚大陆的强大政权,他们自己的历史也为认识他们的血缘和语源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线索。本文从探讨"回纥"、"乃蛮"等民族的血缘出发,试图进而了解中亚和南俄地区若干重要的古代民族的远东血缘,从而延拓我们对中国北方诸族迁徙活动的认识。

一、"回纥"的成分及"汪古"之源

"回纥"就是"护骨"、"袁纥",它是匈奴、鲜卑、高车、柔然、突厥之后,两度主掌漠北的强大部落。尽管最初回纥是个鲜卑系部落;但9世纪时的"回纥语"是"突厥语"的继承,也是后世维吾尔、土耳其、哈萨克语的祖先。唐书说[3]:

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或

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

这是漠北部落的总汇和历史的概述，其中“仆骨”、“契苾”、“同罗”、“曷萨”、“浑”等，在历史上早有记载。馀者如：

思结、奚结	即“厖狄”；
多览葛	即“同罗”或“吐如纥”；
拔野古	即“伯岳吾”；
斛薛	即“纥奚”；
白霫	即“白狄”、“白题”或“拔悉”；
阿跌	即“兀者”；
骨利干	可能是“乌洛浑”的变音。

公元668年，唐帝国战胜高句丽—靺鞨联盟，战败的靺鞨诸部向四方渗透，大举进入蒙古高原；则天年间（690—694），后突厥兴起，回纥等部曾一度南迁甘凉地区；天宝初（741—744），返回漠北的回纥等部，配合唐军消灭后突厥，建立“回纥汗国”，重主漠北。唐书对当时回纥内部及盟属也有详尽的记载[4]：

天宝初，……［回纥］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啜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邪勿。药罗葛，回纥姓也，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六种相等夷，不列于数，后破有拔悉密，葛

罗禄总十一姓……

其中回纥之“九姓”均可予以辨认：

药罗(葛)	即“挹娄”(“药”拟读 a 或 ya,“药罗”即 a-lu)；
胡咄(葛)	即“纥突”；
嚈罗(勿)	即“敕勒”；
貊歌息(讫)	即“靺鞨斯”；
阿勿嘀	即“阿巴嘎”之转音“阿伏于”或“阿保机”；
葛萨	即“曷萨”或“可萨”；
斛嗢(素)	即“滑”、“狐胡”、“回纥”；
药勿葛	又即“阿巴嘎”(a-ba-ga)；
奚邪勿	即“悉万”。

这九个氏族至少有四个(“药罗葛”、“貊歌息讫”、“阿勿嘀”、“药勿葛”)是通古斯部落。波斯著作《史集》有一段重要而颇费解的相关记载[5]：

> 在古代,畏兀儿诸部的驻地这些河流(按:指色楞格河及其诸多支流)沿岸、山里和平原上。沿着十条河流居住的,称为 auun 畏兀儿,而住在九河[地区]的,称为 tughuz 畏兀儿。

经过波斯人添枝加叶的想象和复述,这蒙古高原的事情就变得复

杂化了。突厥语中 *tughuz* 是“九”，*auun* 是“十”（*on*）；作者以“九河”和“十河”配合描述，那“tughuz 畏兀儿”和“auun 畏兀儿”，似乎就是“九河回纥”和“十河回纥”了。其实它们与河流没有关系，就是“九姓回纥”和“十姓回纥”而已，余大均先生则将它们直译成“温—畏兀儿”和“脱忽思—畏兀儿”了。鉴于回纥民族的内涵，我以为“九姓回纥”就是“通古斯回纥”。

在回纥立国的近百年（744—840）中，西来诸教纷纷传入漠北社会，景教经文所用的叙利亚文字被改造为回纥文字。至 13 世纪，克烈、乃蛮、汪古三部民众仍信奉景教；而且它们的知识分子，如克烈人“镇海”精通回纥文字。相反，直到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人崇拜的还是原始的萨满教，对于回纥文字也一无所知，还是靠在乃蛮国中任事的回纥人“塔塔统阿”（“拓特·唐兀”）的帮助，才藉回纥文字创立了蒙古文。这表明克烈、乃蛮、汪古等部，都曾是回纥汗国的成员部落；蒙古部与之则稍为疏远。

公元 840 年，高原上有天灾，回纥部出人祸。有人引“黠戛斯人”南下参与内战，回纥本部才退出了这块荒瘠的多事之地。逃亡的回纥诸部，人分两路。西迁者入河西、高昌和中亚，与原住民融合成今世中亚突厥语诸族。回纥牙帐十三部，则推举“乌希（纥奚）特勤”为“乌介（兀术）可汗”，由他率众南下。人群中还有“那颉特勤”、“蜜羯可敦”这样一些具有通古斯式名字的达官贵人。回纥部拥“十万”之众抵今大同地区，王子嗢没斯，公主蜜羯可敦等降唐；惟乌介可汗蛮横索地，而与唐朝决裂，失败后逃往“和解（黑车子）室韦”，而未得善终[6]。看来，在回纥汗国的末期，靺鞨人在统治集团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说有三万回纥之众安置在内地。事实上，头面人物得善待，

基本群众仍羁留于阴山地区，辽代称之为“阴山室韦谟葛失”[7]，耶律大石又称之为“白达达”[8]。“谟葛失”当是“貊歌息”；中有定语“室韦”二字，大概是他们的语言接近于相当通古斯化了的“室韦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述过北宋亡国前，金国使臣兀室杨璞的一番活动：

> 宣和五年(1123)二月兀室杨璞到馆，谓赵良嗣曰：“西京路疆土，非原约当割，若我家不取，待分与河西、毛褐室家，必得厚赏”。河西为夏国，毛褐室为鞑靼也。

文中“西京路”即今阴山—河套地区，“毛褐室”即是“谟葛失”，谓之“鞑靼”，必“靺鞨”之裔。今“毛乌素沙漠”之名可能出自“毛褐室”。元代族名“汪古”乃是“回纥”，该族人多“马”、“赵”二姓。马姓可能源自族名“谟葛失”；赵姓则是因为阴山古属赵国，元朝封“汪古”部主为“赵王”的缘故。

元代还出过两个杰出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教士，“扫马”(Sauma)和“马忽思”(Marcus)。前者生于大都；后者则是东胜州汪古部人。两人相约去耶鲁撒冷朝圣，然因战乱而未能归国。聂斯脱里派教长 Denha 去世后，马忽思继任；而扫马则受波斯蒙古汗庭的器重，伊利汗阿鲁浑多次派他出使西方，周旋于英法君王，出入于罗马教庭[9]。我猜测，Sauma 和 Marcus 分别就是“石抹”和“谟葛失”。

二、关于“乃蛮”与“粘割”

11、12世纪间,阿尔泰山两侧的“乃蛮”是蒙古高原上最开化的部落,据说他们信仰景教,却又来路不明。亦邻真等猜测它是从黠戛斯南下操突厥语的部落[10];阿拉伯史学家 Ibn al-Athir (1160—1233)称它为“第一鞑靼”[11];伯希和认为“乃蛮”就是《辽史》所载的“粘八葛”和“粘没葛”[12];陈述则认为“粘八葛”就是女真姓氏“粘割”[13]。若把这些说法串在一起,或许就达到了正确的结论:族名“乃蛮”就是突厥语中的“粘割蛮”,即“粘割部落”;谓之“第一鞑靼”是因为它是“靺鞨之遗种”中最强的一族。

关于乃蛮人和他们所建立的国家的记录少之又少;然而,史载中的乃蛮人的名字,也许能为追溯它的祖源提供线索。《史集》记载乃蛮国君的名字“纳儿黑失—太阳汗”(narqis-tayank,余大钧译作“纳儿乞失”[14]),与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元史》中有关于乃蛮人氏“囊加歹”及其父祖的记载[15]:

> 囊加歹,乃蛮人。曾祖不兰伯,仕其国,位群臣之右。祖合扎儿,管帐前军,兼统国政,仕至太师。太祖平乃蛮,父麻察来归。

其中“不兰伯”可能是“不兰—伯克”的缩音。周良霄认为《元史》中的“孛兰奚”或“不兰”不是蒙古语词,有与“逃亡人口”或“遗失牲口”有关的意思[16]。我以为“不兰”就是女真语中的“遗失”一字“卜鲁斡黑”[17],“不兰—伯克”象是草原上负责“失物招领”的

官员。其馀的人名“合扎儿”、“麻察”、“囊加歹”，则分别与通古斯族名“兀者”、“靺羯”、“粘割”相通。

《史集》中还有一段内容丰富的乃蛮王族记载[18]：

> 古失鲁克（即：屈出律），有个姊妹名叫额昔思，她有几个儿子：一个名叫月失木惕，另一个叫完泽—额不干，第三个叫阿八赤。阿八赤［麾下］有两千人；他有个兄弟，名叫不术—额不干，已故。不术的儿子名叫爪忽。……阿林—沙勒、塔鲁—沙勒、伯颜—沙勒与统格—沙勒兄弟四人都是古失鲁克汗的族人。“沙勒”是“王子”的意思。

这些乃蛮姓名，不少与女真、契丹的族名、人名可比，如：

月失	即“纥奚”；
完泽	即“兀者”；
额不干	即“阿巴嘎”；
阿八赤	即“阿保机”；
不术	即“孛术鲁”；
爪忽	即“术虎”；
统格	即“唐括”。

其中，“阿巴嘎”就是女真语的“天”字 abka，“阿八赤”或“阿保机”又是它的变音。伯希和认为“阿巴嘎”是蒙古语的“叔父”一字[19]；但作为人名或部落名，“天”字一意可能更妥切。

称谓“沙勒”似乎是女真语中的 sha-la-an 一字[20]，意为“贵

人”或“官人”,但也有人将其附会为汉语的“侍郎”,《史集》的作者则误将它作“王子”了。《辽史·国语解》对该字的诠释是“沙里,郎君也。管众人之官”。这都说明乃蛮部与东北亚地区的民族是相关的。

“粘割”是重要的通古斯—女真族姓氏,有元人称之为“金源巨族”[21]。元代姓氏“纳智”,现代姓氏“粘”或“纳合”,匈牙利的第一大姓 Nagy(纳吉)等,都是它的变译。他们有些就是女真族,或是元蒙年间被整合为蒙古族的通古斯人的后裔。辽代《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有“妣夫人聂赫氏”的记载,“聂赫”当即契丹族之“粘割”氏。

“名亦作姓,姓作名”是世界上多数民族的习惯。“粘割”与“拓特”、“靺羯”这些氏族名,也都是通古斯及相关民族常用的人名。如:金朝将领“粘合满柱”之名,即为“粘割·靺羯”之复合;元初名臣女真人粘合重山之子“粘合南合”之名,乃是“粘割·粘割”之重叠。契丹人名“涅鲁古”、“捏儿古”;蒙古人名“囊加歹”、“聂古台”等,也统统是由“粘割”派生出来的。至于女真—满语为何称汉人为“南家”或“粘割”,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事情。

“粘割”作为最重要的通古斯—靺鞨氏族之一,大概很早便从其祖居的满洲地区西向扩散,并转化为其他语族的部落。传说中的蒙古族的祖源氏族 Nakuz(“捏古思”[22]);后世蒙古部落“捏古歹”;9 世纪末,进入匈牙利平原的 Nyek 部;15 世纪,钦察汗国衰裂成的 Nogai(“诺该”)汗国;乌拉尔地区的巴什基尔族的 Nagman 部落[23](即“粘割蛮”);以及哈萨克族中的“乃蛮”部落,和今世蒙古族的“奈曼”旗,应该都是“粘割”部落的遗族。

《辽史》也不止一次地记载了地名“纳葛泺”,它是辽朝帝王于

早春季节凿冰钓鱼、游幸射猎后的“捺钵”驻跸之地[24]。在洮儿河入注嫩江处附近的多湖渚地区，此处相去“金源”——“按出虎水”不远，这段沿江地带大概就是遍布欧亚大陆的“粘割部落”的一个出发地。

由于过去未曾认识通古斯—靺鞨民族西迁的事实，前人也无法推定乃蛮部落的先世由来；于是采信了一些便捷的解释，即他们是9世纪中来自“黠戛斯”地区的突厥部落[25]之一。当然，他们可能转辗来自其他地区，也可能使用以突厥语为主体的语言；但是，这支号称“鞑靼”的中亚部落，却是与通古斯民族有渊源的。

三、中亚诸族

从阿尔泰山到伏尔加河之间的广大地区，是诸多游牧部落迁徙的通道。古代的乌孙、康里、钦察等著名部落，都已经包容在现代“哈萨克族”中了。哈萨克族虽然主要呈亚洲人种体征，但是也可以察觉其中印欧血缘的丝迹；然而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中亚诸族是否也有来自远东的通古斯成分？

清代哈萨克汗国分大、中、小三个“玉兹”。“大玉兹”含“乌孙”、“康里”、“札剌亦儿”、“阿勒班”、“苏万”、“千希克勒”、“契莫尔”等部。“中玉兹”含“克烈”、“乃蛮”、“弘吉剌惕”、“克普恰克”、“瓦克”、“阿尔根”等部；其中“克烈”又分“阿巴克”、“阿夏马”两支；前者含“木里合”、“密里克特”、“喀拉喀斯”等十二个氏族。里海附近的“小玉兹”由“艾力木”、“哲得”、“巴衣”等部组成，属下有：“木克依”、“吐尔提哈拉”、“阿勒钦”、“恰尔克西”等氏族[26]。

以上哈萨克民族的组成部落和氏族中，不仅那些蒙古高原古老部落，如："克烈"、"乃蛮"、"钦察"、"札剌亦儿"、"弘吉剌惕"、"柯尔克孜"等，都一一在列；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似曾相识的通古斯部落名：

哈萨克部落—氏族名	通古斯部名
木里合、木克依、密里克特 、瓦克	靺鞨、蔑里乞
阿勒钦、阿尔根	阿勒楚
阿巴克	阿巴噶
吐尔提	拓特

关于中亚大族"乌兹别克"（Uzbek）的族名，俄国学者的一种说法[27]是它来源于"金帐汗国"的"月即别汗"（1312—1342 年在位）之名，他使金帐汗国一度中兴。汗国的居民曾被称为"月即别人"，军队则被称为"月即别军"。15 世纪时，金帐汗国瓦解，一部分部落迁徙至楚河流域，成为哈萨克民族的一部分；那些留在咸海东北地区的游牧民，15 至 16 世纪进入河中地区，与当地操突厥语的居民相融合成"乌兹别克人"。

上述说法未必中肯，"乌兹别克"是由 Uz 和 bek 两字复合而成，它有时亦简做"乌兹"[28]。bek 是突厥语"伯克"固属无疑；但何为 Uz 却仍须解释。事实上，这片地方就是中国历史记载的"月氏国"，唐代那里曾有一个"野叉城"，元代则名"讹迹刊"（今 Uzgand），许多现象表明 Uz 就是"月氏"、"野叉"、"讹迹"，它们都是通古斯部落名"兀者"的化音。因此，东方民族注入这个地区，可以上推到纪元前的时代。关于这个重要问题将另文讨论。

图五： 阿富汗巴里黑(Balkh)南七十五公里处 Aq Kupruk 地方的一名乌兹别克族男子。

取自:G. Debets,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fghanistan: I -II*,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Published by Peabody Museu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0, p. 129.

图六:阿富汗西部赫拉特(Herat)的一名蒙有面罩的阿富汗 Pushtun 族女子,和她的两名乌兹别克族的女仆。
取自:G. Debets,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fghanistan: I - II*,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Published by Peabody Museu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0, p. 166.

“柯尔克孜”族，亦即“吉尔吉斯”。它有着久远的历史记载。《史记》、《汉书》和《唐书》上称它的祖先为“鬲昆”、“坚昆”或“黠戛斯”，还说他们身材高大，有着“赤发，皙面，绿瞳”的特征。然而，现代柯尔克孜人只象亚洲人种，这或许是因为北方诸族的迁徙活动，不断地骚扰黠戛斯地区，使得那里的人种和语言都被换了血。

公元840年，黠戛斯人南下消灭了回纥汗国。然而，事后在蒙古高原混战了几百年的“克烈”、“乃蛮”、“蔑里乞”诸部，非但无一自称“黠戛斯”，却又多有与通古斯民族相关的特征。因此我猜测：中西伯利亚很早就为通古斯部落盘踞，前文提到的“木马突厥”之“都播”、“弥列哥”、“饿支”，统统都是一些通古斯部落名。9世纪中，或许就是在这些名为“黠戛斯人”，实为“蔑里乞人”的策划下，逐走了一度强盛于蒙古高原上的“回纥汗国”。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匈奴—突厥语占优势的世界，而今柯尔克孜人使用的，也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突厥语。但柯尔克孜语中却保留了一些特异的通古斯、契丹语辞[29]。这种与众不同的现象，是对上述猜测的一个支持。例如：

	柯尔克孜语	赫哲语	满语	契丹语	蒙古语
母亲	enie	anie	额聂		eke
哥哥	aga	age	阿格		aqa
山峰	choku		超还		oroy
雾	tuman	talman	塔马		maniyan
雨	shaan		阿哈	瑟	boroo/qura

柯尔克孜族长期在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三大突厥语民族环抱中生存。很难设想,它与远东地区诸族之间,会发生有形的相互作用。然而,上述的这些语言现象又表明,曾有使用通古斯语的部落,将他们的语汇直接传递给柯尔克孜人。唐代靺鞨人的大规模西迁活动,可能是导致上述现象的历史事件之一。

突厥民族语言和姓名中的"通古斯现象",还可以在各突厥汗国的历史中发掘出来。公元716年,后突厥汗国国君"默啜"死后,"阙特勤"立其兄继位,他的名字是"默棘连"("靺羯连")[30]。庞大的"塞尔柱帝国",是由一支10世纪才离开中亚的"乌古斯"部落所建立的,许多塞尔柱家族成员的名字[31],也显现出与通古斯民族的联系,如塞尔柱一子名Mika'il(靺鞨),还有一个野心勃勃后裔名叫Tutush(脱脱夕)。1223年,哲别和速不台率领蒙古部队穿越伊朗,进抵高加索地区,当时阿萨拜疆王的王号也是"月即别"(Ozbek)[32]。北方诸族的持续的西迁活动,无疑也将"通古斯"的血缘和语言的尘埃播撒到了东和西亚地区。如果我们会从由"塞尔柱"帝国的衍生物,埃及的"马木鲁克"("蜜昔儿")王朝的历史中,发现出一些"靺鞨现象",也不必以为是怪事。

四、南俄草原的可萨汗国

15世纪前的欧亚草原的欧洲部分,一直为来自东方的游牧诸族所盘据。他们很久以来都被称为是"匈人"(Huns)或"突厥人";唯一的例外是,13世纪"蒙古人"通过这个地区入侵欧洲。事实上,中古时代南俄地区的民族和语言,要比西方学界已有的认识要复杂得多。如果无视鲜卑和通古斯民族的影响,就无法解决许

多困扰。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关于“可萨人”和“可萨语言”的问题。

可萨汗国出现于西突厥汗国覆灭以后,它可能就是西突厥汗国的替身。可萨人曾与阿拉伯人争战一百年之久,阻挡了锋芒正锐的伊斯兰教向东欧的传播。公元737年,双方以高加索山脉划界息争,可萨汗国退据伏尔加一顿河之间地区,建都Atil城,又维持了两百多年的繁荣。8世纪时,拜占庭有两任皇帝娶过可萨妻子。9、10世纪间,它受到游牧的Pechenegs人和斯拉夫人的夹迫而衰落。10世纪中叶,败灭于基辅罗斯人之手。据拜占庭史料记载,可萨汗国对Magyar人、保加尔人以及斯拉夫人,都有过接受朝贡或类似统属的关系[33]。

地处欧亚大陆枢纽,幅员辽阔的“可萨汗国”,当然不可能是由使用单一语言的单一民族组成的;在长达数百年历史中,其统治集团的族属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关于“可萨语言”,阿拉伯地理学者Istakhri曾记载[34]:

> 可萨语言不是突厥语和波斯语,它与任何人类集团的语言都不一致。

令人吃惊的是,被认为是突厥种的可萨人,竟可能不属于突厥语族。可是拜占庭和阿拉伯一波斯史料又都没有为后人留下确切的“可萨语言”的记载。这也就为追溯可萨人的族源,和寻找他们的后裔,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可萨人是在公元740年以后皈依犹太教的,这是犹太教为非犹太民族所接受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可萨汗国覆灭于965年,直

至922年还有人在Atil城毁坏清真寺[35]，看来一些可萨人至终没有放弃他们的犹太教信仰。巴托尔德发现这些“可萨”犹太教徒可能与“鞑靼人”有关，他注意到[36]：

> Tat是有趣的。关于Tat这一名称的起源仍有疑问。作为民族学上的意义，Tat主要用于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人们用来称呼说伊朗和突厥混合语的犹太教徒的。

这些“说伊朗和突厥混合语的犹太教徒”，显然是指高加索地区的“可萨人”，他们也被称为Tat，亦即是“鞑靼”。蒙古民族尚未兴起之时，“鞑靼”民族应该是通古斯—靺鞨部落。8世纪时，Magyar人正在南俄草原游牧，他们可能就是可萨人中的Tat；他们使用的通古斯—室韦混合语，可能正是那种既“不是突厥语和波斯语”，又“与任何人类集团的语言都不一致”的“可萨语言”。

在一封由可萨“约瑟可汗”用希伯来文写的信件中，曾提到过一位名叫Obadiah的先人，说是他在汗国内“确立了信仰”[37]。原苏联学者阿尔塔莫诺夫认为，在可萨汗国体制和信仰转变时，曾经发生过朝代的更替，而Obadiah正是这次事变的领袖[38]。我们虽然没有足够的依据来支持这一历史的重构；但远东族名Tat（“鞑靼”）和人名Obadiah（“渥巴锡”或“阿保机”）的出现，说明来自远东地区的靺鞨—鞑靼人是可萨汗国的重要成分。

西方历史学家们认为[39]，俄国的“哥萨克”人就是南俄草原上的Tatar人；他们是那里的“猎人”、“盗贼”、“骑士”、“牧民”或“自由人”。为了应付草原上的艰难险阻，这些视农耕为下贱，劫掠为荣耀的“哥萨克”们，聚合在“鞑靼”式的部落组织中，实行原始的

民主议决方式,热衷于冒险的军事活动。显然,他们就是融入了斯拉夫民族中的"可萨"后裔,后来又为16世纪开始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扩张做出了巨大奉献。

五、结束语

在俄罗斯—哥萨克人东来前的漫长历史中,欧亚大陆上的人类基本流向是自东向西的。印欧人种的居住空间呈现萎缩倾向,亚洲人种的语言和血缘则呈扩张态势。苦瘠的蒙古高原无法容纳人口的增长,水草盈盛的南俄草原,更是马背上的人们的向往,亚洲游牧民族是这一迁徙运动的无尽源泉。然而,东西方学者尚未意识到,通古斯—靺鞨人也是参与这一运动的重要集团。本文的结论表明:通古斯民族很早就遍布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了。

通古斯民族持续的西向进取,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它往往是与一些鲜卑—室韦系民族作伴进行的。即便是被称为"靺鞨之遗种"的"鞑靼民族",也是由通古斯民族和室韦民族融合而成的。12世纪金代女真语中浓重的鲜卑—室韦语成分,就反映了这两大民族语言的互相渗透。通常被被认为是"突厥民族"的"乃蛮"、"回纥"、"汪古"中的通古斯成分,又即是成分极其复杂的突厥语民族和通古斯与鲜卑—室韦民族融合体的再融合。

本文从中亚和南俄的许多被认为是"突厥语"的古代民族和它们的语言中,找到了不少与通古斯民族和语言的相关成分。将它们珠联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从满洲到中欧,从大兴安岭到喀尔巴阡山,从松花江到多瑙河的一条支脉错综而主干清晰的人类运动轨迹。

注释

[1] 《隋书》卷八十四,《铁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880。

[2]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1973, p. 160.

[3]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回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111。

[4]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回纥传》,页6114。

[5]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页240。

[6]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5214—5215。

[7] 《辽史》卷二十九,《天祚皇帝三》,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49等。

[8] 《辽史》卷三十,《天祚皇帝四·耶律大石传》,页355。

[9]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页108—146。

[10]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丛刊《蒙古史论文选集》卷1,1984,页43。

[11] 岑仲勉《突厥史集》下册卷十六,《突厥文碑注释》,中华书局,1958,页893。

[12] P. Pelliot and L. Hambis, *Historie des Compagnes de Gengis-khan*, Leiden, 1951.

[13]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页133。

[14]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页222。

[15]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囊加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184。

[16] 周良霄《阑遗与孛兰奚考》,《文史》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1,页179—184。

[17] 和希格《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女真译语研究》,1983,页346。

[18]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页253。

[19] 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耿升译,中华书局,1994,页67。注32。

曰:"阿巴嘎斯一名的词意仅仅是'叔伯',通用于东蒙古人中,那里有一个部族阿巴嘎(Abagha),另一个部族叫作阿巴嘎纳尔(Abaghanar,其复数形式为abagha,与abaghas完全一样)。"

[20] 和希格《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页296。

[21]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页394。

《丞相耶律铸妻粘合氏封懿宁王夫人制》曰:"朕[绍]绳祖武,追思社稷之元勋;加禋王章,爰及闺门之懿德。故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妻粘合氏谦柔有则,专静自持。簪绂袭芳,相尔金源之巨族;珩璜中度,佐予黄阁之名臣。"

[22]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页128。

[23]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in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45.

[24] 《辽史》卷二十二,《道宗本纪二》,页261。

曰:"八年春正月癸丑,如鸭子河。二月驻跸纳葛泺。"

[25]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六·吉利吉思等》,页1574。

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南去大都万有馀里。相传乃满部始居此。"

[26] 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民族出版社,1989;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哈萨克社会历史调查》,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巴里坤哈萨克族风俗习惯》,新

疆人民出版社,1986。

[27] 格列科夫等《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页251—258。

[28]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页299等。

按:该书俄文译者在关于地名注释中,将"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作 Uz S. S. R.。

[29] 胡振华《柯尔克孜语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30]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页6049、6051。

按:《金史·百官志一》记载了许多女真姓氏,内有"黑号之姓,唐括、蒲察、术甲、蒙古、蒲速、粘割、奥屯、斜卯、准葛、谙蛮、独虎、术鲁、磨辇、益辇、帖暖、苏孛辇皆封彭城郡"。其中"磨辇"、"益辇"、"苏孛辇",与"默棘连"一样,都以 lian 音结尾。

[31]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pp. 148—159;

J. Boyle edi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5: *The Seljuq and Mongol Peri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302;

C. Cahen, *Pre-Ottoman Turkey: Ageneral Survey of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 and History c.* 1071—1330, New York, Tap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pp. 19—51.

[32]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页265—267。

[33] Consta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rio*,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1967, pp. 165—179.

[34] D.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93—95.

[35]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67。

曰:“根据伊斯兰的资料,犹太教是可萨政府的宗教,而不是可萨人民的宗教。可萨政府是维护犹太教的利益的,获悉伊斯兰国家的一个犹太教堂遭破坏的消息后,在922年也破坏了阿得城(Atil,位于伏尔加河口)的一个清真寺尖塔作为报复。”

[36]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页94。

[37] D.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p. 144—155.

[38] P. Golden, *Khazar Studies*,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80, p. 101;

M. Artamonov, *Ocherk Drevneishei Istorii Xazar*, Leningrad, 1936, pp. 261—266.

[39] G.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 —191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12.

鲜卑民族及其语言线索

“鲜卑”民族的系统记载始于东汉，更早的史料则多半是些片断线索。“鲜卑”又名“师比”或“犀毗”，其音值可能是 sa-bi、si-bi 或 xi-bi。它的今世后裔“锡伯”族自称“锡韦”，那是因为锡伯语中的 b，与 w 或 v 相通，sibi 也可读成 siwi。隋唐后魏年间的“室韦”，当然也就是汉代的“鲜卑”。西方历史—地名学家很早就认准，Siberia 的字根 Siber 就是族名 Sabir[1]，因此很多人认为“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地方”。

史籍将“鲜卑”与“乌桓”，都说成是“东胡”的后代[2]。其实，它们三者只是同源，而未必有裔属的关系。我以为现代族名“达斡尔”，就是古代族名“东胡”、“屠何”或“土方”[3]之音源，今世“达斡尔”族虽然人丁不旺，然而在上古时它却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部落。而族名“乌桓”则是“乌洛浑”的缩音；蒙古语的“山”字是“乌洛”，因此“乌桓”就是春秋时的“山戎”。“东胡”、“乌桓”、“鲜卑”都使用类同的语言，因此被归属为一个族类，现代学者已经确认契丹语、蒙古语都是由它们的语言发展而来的。先秦时“东胡”是这些蒙古语民族的祖先部落的统称；秦汉两代“匈奴”则占尽北方诸族的风头；东汉时期“鲜卑”又取代“匈奴”的强权。

由于北方诸族在长期的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地析离和融合，因此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这些“东胡—鲜卑语”的后裔语言的内

涵，也不会都是完全一样的，在现代蒙古语中就融含了大量的突厥语和通古斯语成分。因此，将早期的东胡—鲜卑语称为“蒙古原语”（proto-Mongolian）或许较为贴切。东胡—鲜卑民族的后裔——拓跋鲜卑、契丹、蒙古人曾数度入据中原或统一中国，因此蒙古语族人的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不可与缺的部分，他们的血缘是汉语民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方也有鲜卑民族的相关记载。在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的六、七百年前，一支 Sabir 人就长期生活在里海西岸的北高加索地区，他们被人们称作“高加索 Hun 人”。由希腊文转写成的 Sabir，也作 Savir 或 Sawir，因为希腊字母 β 既可作 b，也可作 v 或 w。这个民族在阿拉伯文献中就被记为 Suwar，在亚美尼亚文献中被记为 Savirk[4]。这些语音转换，与汉文记载中的“鲜卑—室韦”或“锡伯—锡韦”的转换，都是一致的。

公元 558 年，阿瓦尔人（Avars）和西突厥人相继追杀来到南俄草原，Sabir 人不堪其扰，从草原地带退避到僻静的北方森林地区去了。据 10 世纪时的阿拉伯地理著作记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 Bulgar（通译“保加尔”）汗国里，Suwar 和 Bulgar 是两个主要的部落。而现代“楚瓦什”（Chuwash）人被公认是 Bulgar 汗国古代居民的后裔。该族学者认为 Chuwa 是从 Suvar、Suwar 等变来的[5]。

“东胡—鲜卑”系语言不仅是“蒙古语”的先祖，也是遍布欧亚大陆的“突厥语”的重要成分。长期以来，由于史料与方法上的局限，以及对“高车”、“回纥”、“仆骨”等部落的早期语属的误判，因此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的研究，一直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故而，如能发掘东西方史料中关于“鲜卑语言”的深层信息，重新辨析东胡—鲜卑民族的裔流，无疑将会提升对人类语言和历史的认识。

一、鲜卑族的早期历史

关于鲜卑人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国语·晋语篇》有说：

>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亦作"牟"）守燎，故不为盟。

这段楚人"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的记载，古代学者往往以后世封建社会的"礼"或"仪"来予以解释[6]；其实，这可能是双方以放烽火来通信息，抗拒周人统一中原的武力活动。根据这一记载，认为鲜卑人是出自中原的想法，也未必是很离谱的猜测。因为，他们的祖先既不可能源自北极或者美洲，也不象是出自欧洲，南方的中原地区应该是他们唯一的来路。现代人类学告诉我们，东部非洲人类的基因最为复杂，现代人类的祖先可能都是出自那里的；而中国北方人的血缘又远较南方人单纯，北方人则应是出自南方的[7]。

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王朝（386—534），是北方少数民族统一中原地区的第一个政权，《魏书·序纪》说北魏王族"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是：

> 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纯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北俗谓土为拓，谓后

为跋，故以为氏。

《魏书·礼志》有关于北魏真君四年(443)，中书郎李敞去一“石庙”刻文祭祖事迹，该文说：

>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念焉。其岁，遣中书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石室南距代京四千馀里。

1980年，中国学者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的石壁上，发现了这篇石刻祝文。从此，“大兴安岭”被确认为是“大鲜卑山”无疑了。

据《序纪》记载，拓跋鲜卑的重要先世酋长有：“毛”、“推寅”、“诘汾”和“力微”等人。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推寅领导部众“南迁大泽，方千馀里，厥土昏冥沮洳”。诘汾的父亲“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地”。这些口口相授的传说是这个鲜卑部落的一段重要的历史。

“推寅”，是不多的古鲜卑语词记载中的一例，《序纪》说：“推寅，盖俗云钻研之意。”现代蒙古语中已无此字。但是“达延”或tayang，却是不少后世蒙古酋汗的尊号。学界多将它们释作“太阳”，以为它是一个汉字。其实不然，它是鲜卑语里“聪明人”的雅称。“大泽”乃是湿地环绕的“呼伦湖”；“神兽”则是健硕而耐寒的鹿。这段传说的诠释应该是：拓拔鲜卑人在一些聪明人的带领

下，西出大兴安岭以后，使“鹿”做运载工具，南下水草丰盛的呼伦贝尔草原，然后进据当时的匈奴之地。

我们不必认为这是鲜卑民族第一次进入蒙古高原，但它倒是中国历史关于东北亚民族迁徙的首次记载。很难设想，那个令中原王朝终日惶惶的北匈奴汗庭，竟不堪这帮刚刚出山的鲜卑人的一击，而逃迁中亚。算起来这应该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中后期[8]。此后，不可一世的“匈奴”之名便逐步消失了。

在成吉思汗出世以前，“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纥”、“鞑靼”等强势部落，在蒙古高原上轮流坐庄。而北方诸族民众的血缘和语言，也在这片苦旱的“匈奴之地”上不断地融合。严格实行“外族婚”的一些匈奴部落的男性成员，总是在外来部落中择妻；而鲜卑族则一定在本地民族中选择女性配偶。所谓“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9]，和马长寿教授所论断的“鲜卑父胡母”的“拓跋鲜卑”[10]，可能都是这样形成的混血氏族。

滞留在蒙古高原上的鲜卑人，长期浸溶在匈奴民族之中。一种以匈奴语为基本，掺杂了鲜卑语成分的混合语言，即后世的“突厥语”，就在那里逐渐地形成了。南迁的拓跋鲜卑部落，较早就脱离了蒙古地区，他们的语言可能反倒保留了较多的“蒙古原语”的特征。至于“匈奴民族”是否早已融有使用“蒙古原语”或“通古斯语”的部落？或者，新到的“鲜卑民族”本身是否也带有“通古斯民族”的成分？无疑都是有价值的课题。然而，无论是作为“突厥原语”的匈奴语，还是作为“蒙古原语”的鲜卑语，或是参与这种融合的无处不在的“通古斯语”，也都是基于更早的语言融合的一个历史断层。追溯一种纯之又纯的语言，和追溯一种纯之又纯的民族，一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鲜卑民族的族名特征

历代北方诸族族名，许多是以 gu 音结尾的，如："蒙古"、"裕固"、"仆骨"、"拔野古"、"汪古"、"纥骨"、"乌古"、"护骨"、"达姤"、"多滥葛"等。腭化了的 gu 音又作 ghu 或 ghur，即"纥"、"兀"、"侯"、"吾尔"、"斡尔"等，相应的族名则有："蒙兀"、"回纥"、"乌洛侯"、"蒙兀儿"、"维吾尔"、"达斡尔"等。这些以"古"和"纥"或其谐音作其部名尾音的部落，可能多与东胡—鲜卑系民族有某种渊缘，这也可能是中国人以"胡"来称呼北方诸族之原因。

西方历史关于南俄地区游牧民族的记载[11]，除 Sabir 外，还有 Bulgar、Kurtrighur、Oghur、Saraghur、Utrighur、Urog 等。这些部名也多以 g、gar、ghar、ghur 等结尾，它们分别就是中国历史记载的"仆骨"、"高车骨"、"纥骨"、"撒拉纥"、"兀的哥"、"乌洛侯"等的对音，其中不少一定是鲜卑系部落。

"回纥"，即是"纥骨"、"护骨"、"乌古"、"维吾尔"的异字。《魏书·官氏志》记载，"纥骨"是"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的"内族"第一姓。因此"纥骨"必是与"拓跋"近缘的鲜卑氏族。而"回纥"会从一个鲜卑部落，演变成为最重要的突厥民族，是它与"匈奴馀种"长期融合的结果。

"达斡尔"族的语言和族名，更可以证明这一"鲜卑现象"。现代达斡尔语仍被归纳为一种蒙古语，历史上的"屠何"、"徒河"、"大贺"、"达姤"等诸多族名，都是"达斡尔"的转音，其中"何"、"河"、"贺"、"姤"等都是 gur 或 ghur。先秦时，兼顾其所处之地

域，将它们记为“东胡”。“达斡尔”这个现代蒙古语系民族，其祖先源自于东胡—鲜卑系是不言而喻的。

“仆骨”，应该就是隋唐年的室韦“婆莫部”[12]。《北史》将其简记为“钵·室韦”[13]，兴许是明白了“骨”和“莫”同皆“部落”的意思，而将其略去了。《左传》也有“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这个三千年前的“亳”部落，可能就是后世的“仆骨”。

“仆骨”，也就是西文族名 Bulgar，它可拆解为 Bul 和 gar 两部分，“仆”即 Bul，“骨”即 gar。它通常被译作“保加尔”，后来蒙古人将 Bul 读成了 Buli 或 Bula，又将 gar 软化成了 ar。因此《秘史》将 Bulgar 记作“不里阿耳”或“孛剌儿”，即是 Buli-ar 或 Bula-ar。

“布里雅惕”(Buryat)是贝加尔湖以东的一个蒙古部落，其名可被拆成 Bury 和 at 两部分，Bury 即是 Buli 或“布里”，at 或“雅惕”则是蒙古部落名尾缀。因此从族名上来看，“布里雅惕”的先祖就是“仆骨”。许多学者认为“仆骨”是个突厥语部落，但基于“布里雅惕语”是典型的蒙古语的事实，我们不难判定它们祖先“仆骨”部落所使用的语言，是蒙古语的先祖——鲜卑语。

当然，族名以“古”、“骨”、“纥”、ghur 结尾的部落，也未必都一定是属于东胡—鲜卑系的。例如，《金史·世纪》所记载的“靺鞨”七部之一的“安车骨”部；与族名“兀者”相关的“兀的改”、“兀的哥”；西史记载的 Utrighur 等，应该都是一些通古斯部落名。它们有着非鲜卑祖源，却又有着鲜卑式族名特征，这是它们与鲜卑部落长期融合的结果。

现代裕固语中“氏族”一字，亦作“骨”(*gu*)[14]，它显然是出自古鲜卑语的。在唐山、昌黎、蓟县、宝坻等地，及京、津郊区，多有地

名如“张各庄”、“李各庄”者，其意“张家庄”、“李家庄”也。著名的有唐山“胥各庄”，蓟县“尤古庄”[15]，宝坻“耶律各庄”[16]等。历史上，这一地区是“徒河”、“慕容”、“宇文”鲜卑，和契丹民族的聚居地。显然，“尤古”即是“乌古”，它和“耶律”一样都是鲜卑、契丹姓氏之遗存，而作为“家族”一意的“各”、“古”等字，也必是传自东胡—鲜卑—契丹语言的。

三、鲜卑族的语言

入主中原的“拓跋鲜卑”所使用语言的究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语言学课题。尽管关于它的语言记载很少，但它与后世的蒙古语较为相近，却已被中西学者注意到了。《南齐书·魏虏传》中记录了一些北魏官吏和公务人员的职称：

> 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杖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

其中“比德真”、“乞万真”和“羊真”，都可以在现代蒙古语中找到切近的对应：*bichgiin*（秘书）、*khelmerch*（译员）和 *jiazguurtan*（贵族）。这些都是“拓跋鲜卑”使用“蒙古原语”的证明。

然而，“拓跋鲜卑”语含有突厥原语的成分也不容否认。《序

纪》在解释氏名“拓跋”之由来时说:“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我们注意到蒙古语中“泥土”一字是 *shavar*,在土族语中为 *chavar*[17]（“土族”是鲜卑“土谷浑”部的后裔),在契丹语中为“耨斡”[18];在通古斯语中为 *na*;惟突厥语才是 *toprak*。根据这些比较,不难确认《魏书》是用匈奴语中来解释“拓跋”这个姓氏的。可以推见,拓跋鲜卑的语言是掺杂了匈奴语成分的鲜卑语。

在语言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姓名的比较研究,也能提供鲜卑人裔流的信息。从鲜卑强人“檀石槐”和“轲比能”的名字,就可以看出鲜卑人与蒙古族间的血缘联系。“檀石槐”是 2 世纪中叶,鲜卑族的一个杰出领袖。幼时他便勇健而有智略。及长,他有“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的领袖才干,而被拥为大人,并在弹汗山附近(今山西省阳高县北)建立了牙帐,东部和西部鲜卑的大人都逐渐地归附了他。东汉桓帝时(147—167 年在位),他建立了一个草原部落军事大联盟。据《后汉书》记载[19],它“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扶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馀里,南北七千馀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从满洲到中亚,“檀石槐”统辖下的鲜卑族,已经取代了匈奴人的统治地位。

从语音上来看,“檀石槐”很可能就是“成吉思汗”一字的异译。

在亚洲人类的语言中,辅音 t, d 与 ch 间的转换是颇常见的。如“天”字,汉语作 *tian*,匈奴语作“撑犁”,蒙古语作“腾格里”,朝鲜语作 *ch'on*,它们都反映了这一现象。在汉语中,“单”字亦读作 chan,闽粤地区“陈”又读 tan。同样“檀”字也有两音 tan 或 chan。

北方诸族语言 ai、an、al 亦经常互换。如“爱新”(*aisin*),也作“按春”(*anchun*),又作“阿尔泰”(*altan*)。因此,“槐”(huai)也可

转读成“桓”(huan),其音近“汗”(khan)。“檀石槐”(Chan-s-huan)可能就是“成吉思汗”(Chin-gi-z Khan)的一个转音。事实上,“檀石槐”是汉代记载的鲜卑名号,“可汗”或“可寒”这样一些较为准确的译音,是后来在北魏年间才被启用的。

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3),檀石槐逝去。他的草原部落军事联盟迅速瓦解,西部鲜卑相率叛去。漠南的鲜卑族分裂成三个部分[20]。檀石槐的后裔“步度根”系,据有云中、雁门、及代郡部分地区;“轲比能”系据有高柳以东的代郡、上谷一带;而“弥加”、“素利”、“阙机”诸部占据辽西、渔阳、右北平之地,它们可能就是通古斯系部落一氏族“靺鞨”、“舍利”[21]、“女直”[22]。

上述诸集团的领袖中,以“轲比能”者最为干练。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自己被曹魏当局设计谋杀(235年)之前,统一了中部和东部鲜卑各部。《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列传》记载:“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轲比能是继檀石槐之后,又一个鲜卑族的杰出领袖。

确认“轲比能”即“忽必来”,则不是一件难事。循k—h,l—n,ai—an之间的经常的互换现象,“忽必来”(hu-bi-lai)这个名字,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化成“轲比能”(ku-bi-nan)。看来,蒙古民族的领袖“成吉思汗”和“忽必来”的名号,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两个鲜卑强人使用过了。

在轲比能时代的鲜卑、乌桓及周边部落的酋长名字,有不少被历史记载了下来,如:“和连”、“魁头”、“騫曼”、“扶罗韩”、“步度根”、“泄归泥”、“无臣氏”、“成律归”……等[23]。其中“成律归”和“泄归泥”两个名字的语义,可作一番细致的探讨。

从东汉、魏晋及至隋唐各代，北方诸族与“成律归”相关的人名和称呼，几乎无处不在。如，《后汉书·乌桓传》记载“灵帝初，乌桓大人……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馀落，皆自称王”；《晋书》说“慕容廆字弈洛瑰（亦作：若洛瑰[24]），昌黎棘城鲜卑人也”；《魏书·蠕蠕传》有“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以及“［拓跋］嵇敬、［拓跋］崇等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获之”的文字。4世纪初“段部鲜卑”有酋长“就六眷”者，及其伯祖名“日陆眷”者[25]。《新唐书》又有安禄山曾“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的记载。

不难看出，“丘力居”、“若洛瑰”、“车鹿会”、“就六眷”、“日陆眷”、“曳落河”、“成律归”，及北魏章、穆二帝之名“悉鹿”和“猗卢”，突厥可汗之号“处罗”等，都是蒙古语词 *cheregh* 或其变音 *sheregh*、*rheregh*，其义是“健壮”。在东胡—鲜卑—契丹语中，它还有“壮士”和“英雄”的意思。《元史·木华黎传》说：

> ［木华黎］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事太祖，俱以忠勇称，号掇里班曲律，犹华言四杰也。

其中“掇里班”（*dorban*）是蒙古语的“四”字，“曲律”（音同 *cheregh*）则必当是“英雄”或“豪杰”无疑了。这个字还被用来做族名，“高车”之另名“敕勒”即是也。

史载北齐皇帝高欢因战事不利而抑郁致疾，曾使斛律金[26]唱一曲鲜卑语的“敕勒歌”激励士气。这首永垂不朽的歌词译云：

>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它以北方草原的辽阔景象，来抒发壮士不屈的豪迈情怀。“敕勒歌”是否就是“壮士之歌”或“英雄之歌”呢？

“英雄”应是尚武的游牧民族语言中的一个重要词汇，然而《蒙古秘史》和《元史》中的“英雄”——“把阿秃儿”或“拔都”，在《魏书》和《北史》中却是怎么也找不见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诸族通用的“英雄”——*baator* 一字，可能是后世传入蒙古地区的一个通古斯语词“英雄”——“巴图鲁”。现代蒙古语仅保留了 *cheregh* 的“健壮”意思，而其兼有的“英雄”一义，却被 *baator* 所取代了。

另一个很令人感到兴趣的鲜卑名字是：“泄归泥”。此人是檀石槐的曾孙。《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载：“至青龙元年(233)[轲]比能诱步度根深结和亲，于是步度根将泄归泥及部众悉保比能”。这个字在鲜卑系民族中作男子名字好象很普遍。例如，北魏昭成帝之名“什翼犍”，慕容廆之父名“涉归”[27]，土谷浑人名“拾归”[28]，乞伏部酋长“乾归”[29]等，以及突厥“射匮可汗”之名，可能都是“泄归泥”的变音或缩音。

鲜卑语字“泄归泥”的词义应该是“穷人”。其依据颇多，首先，《金国语解》中就有“什古乃，瘠人”的词条，以其为名的金代女真人很多。其次，匈牙利语中“穷人”一字也正是 *szeguny*。在回纥语的 *n*－方言、*y*－方言和代表方言中，“穷人”分别为 *chighan*（近“什翼犍”）、*chighay*（近“乾归”）和 *chighany*（近“泄归泥”）。而在哈萨克语中则是 *shighay*（近“涉归”或“拾归”）。因此，我们也就面临了一个问题：究竟谁是此字之源？

答案不难通过分析而求得。首先,金代女真语中有此字,而后世的满语中的"穷人"却并非此字,它不会是一个通古斯语族的泛用语词。其次:回纥方言中虽有此字,土耳其语中却又无此字,它也不象是个突厥语通用词汇。其三,匈牙利语中出现大量的,有如 *szeguny* 这样的东方词汇,只是其祖先来自远东的一个证据。比较合理的答案应是:"什古乃"或"泄归泥"是一个鲜卑语词,在金代女真语、回纥语、匈牙利语中的该字,可能都是从"鲜卑语"承继来的。

前已述及,金代女真人和他们的先世——嫩江流域的靺鞨人所使用的语言,可能就是一种通古斯—室韦(鲜卑)混合语言[30]。当这些通古斯部落在融入鲜卑—室韦人的血缘时,也吸纳了大量的鲜卑—室韦语的成分。这个以女真语被记载下来的鲜卑字"什古乃",未能在蒙古语中保有一席之地,却奇迹般地被 Magyar 人带去欧洲,成了匈牙利语言中的一个词汇。

在古代回纥语和现代哈萨克语中,有"泄归泥"之类的鲜卑语词汇,绝非怪事。其实在各种突厥语言中,均含有不同数量和内容的鲜卑语词汇。例如大部分突厥语中的"花"字都作 *gul*;而土耳其语中却偏偏是 *chichig*(即蒙古语之"其其格")。土耳其人的祖先乌古斯人在 10 世纪时就离开了中亚,他们与 13 世纪时成名的蒙古民族,没有发生过直接的相互作用。事实上,回纥出自鲜卑,后融于匈奴,其语言中有鲜卑基因自属必然。象"泄归泥"和"其其格"等鲜卑或蒙古语词,出现在回纥(即"乌古")后裔民族的语言中,是完全合理的历史现象。

四、“柔然”及其语言

当拓跋鲜卑族南下中原，建立统一政权的时候，蒙古高原上的种族、语言以及政治的生态，也在发生变化。《后汉书·匈奴传》记载：

> 匈奴馀种留者尚有十馀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历史地看，这个过程不只是一次“以强部之名为名”的现象，而且是“较野蛮”的鲜卑人对“较文明”的匈奴人的一次征服。汉代历史记载中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匈奴语词，如“单于”和“阏氏”等，此后都逐步让位于鲜卑语的“可汗”和“合敦”了，显然鲜卑人已经取代了匈奴族的统治地位。

在以后的年代里，那里的匈奴原住民与外来的鲜卑人，自然也实现了血缘和语言的融合，“匈奴”这个名称从此也就消失了。但是，相当于五十万到八十万人口的，那些“十馀万落”的“匈奴馀种”（其成分必定也是很复杂的），理当是蒙古地区的基本群众（数十年前，外蒙古地区的人口亦仅一百馀万而已）。毋庸置疑，在武力上居优势的鲜卑人，是可以征服匈奴部落的；然而他们自身，却注定是要被在数量上、文化上占优势的匈奴大众所同化的。在蒙古高原上割据的“柔然”和“高车”，就是两个匈奴—鲜卑杂居或混血的部落联盟。

继匈奴之后，最初在蒙古高原上称霸的是“柔然”（亦作“蠕

蠕”或“茹茹”)。《魏书·蠕蠕传》对它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它说:

> 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馀人,依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

看来,“柔然”始于一个秃首的草原流民,以其领袖魅力,纠合百馀人,白手起家。初依附于一个名为“纥突邻”的部落,后篡其权。至“车鹿会”时,渐成气候,他一度臣服北魏政权,后来势力膨胀,号令漠北诸部,遂成盟首。

汉代西域地名“楼兰”和“鄯善”应该是“柔然”、“蠕蠕”和“茹茹”的谐音,那里是蒙古人种的“柔然”部落曾经游牧过的地方。“柔然”为“东胡之苗裔”的说法,自然是指其统治集团或部落,而绝不会是指它的全体民众。从一些柔然头面人物的鲜卑名字,如“车鹿会”和“丑奴”(蒙古语“狼”)等,就不难看出他们的东胡—鲜卑血统;然而根据一些柔然语词的分析,亦不难判定在柔然统治下的漠北语言是突厥语的先世。

如柔然汗族“郁久闾氏”,在《魏书·官氏志》中却是找不到的。它是后世突厥语言中的“大胆”或“勇敢”一字,此字在土耳其语中作 *yurekli*,在阿萨拜疆语中作 *urekli*。我猜测它是鲜卑氏族名“敕勒”,亦即鲜卑语的“雄健”一字的匈奴语意译;即如满清皇族“爱新”氏取汉姓为“金”一样。此一变姓的目的,自然是因为当时

蒙古地区基本住民是“匈奴馀种”的缘故。

又如车鹿会的四世孙“社崙”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称“可汗”之第一人。“可汗”是一个鲜卑语的，而不是一个匈奴语的称号。《魏书·蠕蠕传》说他“自号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北魏末年有柔然名人“阿那瓌”，《蠕蠕传》在叙述他中兴柔然时说，他“部落既和，士马稍盛，乃号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揽也”。

“兵豆伐”显然是“丘豆伐”的误写。“丘豆伐”应是“驾驭”或“控制”的意思。查土耳其语，“驾驭”一字恰为 *gutmek*。突厥语动词多以 mak 或 mek 结尾，蒙古语则无此特征；蒙古语中“驾驭”是 *tuukh*，与“丘豆伐”似不相干。将“丘豆伐”或 *gutmek* 判为一个匈奴字，或许是不必置疑的。《魏书》以收声之“伐”（wak 或 wek）字来替代 mek，并将 *gutmek* 译作“丘豆伐”了。

再如：“永兴……二年，太宗讨之，社崙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众，部落立社崙弟斛律，号蔼苦盖可汗，魏言姿质美好也。”其中“斛律”是鲜卑人名已不必怀疑，而所谓男子的“姿质美好”，以“英俊”或英语的 *handsome* 最为匹配。此意土耳其语为 *yakishkh*，阿萨拜疆语为 *ghashangh*，蒙古语则为 *elbeg*。相比之下土耳其语之 *yakishkh* 与“蔼苦盖”最切近。

在语言变化的过程中，姓氏、名字和称号是相对稳定的部分。从柔然汗国领袖人物的名字和称号来看，许多是鲜卑式的，而其语言中的一些动词和形容词却又多象是出自匈奴语的。因此，从血缘上来说，柔然汗国早期的统治集团可能是东胡—鲜卑族的后裔；但从语言上来说，柔然汗国内使用的却好似是一种以匈奴语为主体，含有部分鲜卑语成分的混合语言，它可能就是后世的所谓“突

厥语”。当然,柔然各部也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匈奴语可能是其中的强势成分,鲜卑语则逐渐化解消逸于其中了。

历史地看,当“拓跋鲜卑”部在中原地区立国建政,走上了彻底“汉化”的道路时;蒙古高原上的东胡—鲜卑部落,却沿着“匈奴化”的方向发展着。

五、“高车”和“回纥”源自鲜卑

“匈奴”之名消失于蒙古高原以后,另一个与“柔然”并立的强势部落联盟,便是“高车”。《魏书·高车传》最早记载了它:

> 高车,盖古赤狄之馀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

其实,西方也有关于“高车”部落的记载。Hun 人部落名 Kurtrighur,大概就是“高车骨”。据拜占庭的记载,8—9 世纪时的南俄草原上,有一个所谓“突厥部落”Kurtgy-mat[31],这个突厥式的族名“高车蛮”,应该就是从“高车骨”演变来的。这个部落后来加入了 Magyar 人的行列。匈牙利大姓的 Kocsis 氏,大概就是当初的鲜卑“高车”氏。

据“匈奴馀种……皆自号鲜卑”的说法,这个后匈奴时期的强部之名“高车”,也应该是个鲜卑名号。再根据上述“其先匈奴之甥也”的说法,“匈奴”则应是早期“高车”的“舅族”或“母族”;就

当时蒙古地区的种族状况而言，其“父族”则非“鲜卑”而莫属也。

上述“高车”的六个氏族中，“袁纥”和“护骨”即“回纥”或“纥骨”；“解批”即“契苾羽”；“斛律”即“乌洛侯”。其中“纥”、“骨”、“羽”、“侯”均即 gu 或 ghu，上述四部皆具鲜卑式族名。“狄氏”即“厙狄氏”，也是个鲜卑氏族。北齐高欢是一个“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32]的汉人，他对鲜卑人的根底自然了解得很清楚。他死前关照长子高澄：“厙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犹直，终不负汝”。可见“厙狄”和“斛律”都是鲜卑系姓氏。

“高车”、“敕勒”、“护骨”间可能是一种相当松散的联盟，时而“高车”兴盛、时而“护骨”强大。分裂、兼并和通婚，造成了“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错杂现象。因为血缘的亲疏，又有“内族”和“外族”之分。所谓“高车”是一个以鲜卑血统为内族的部落联盟的霸主，“敕勒”、“护骨”、“厙狄”、“斛律”、“解批”等，则又是它的核心。

丁谦很早就提出过，“高车”是源于“鲜卑”的观点，但很少为人所注意。在《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一文中，他猜测：

> 高车与魏（即拓跋鲜卑）同种，上古□□穷北之大鲜卑山，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即今贝加尔湖，《汉书》所谓北海，本书所谓于已尼大水也，未几，拓跋氏又南迁漠北，旋至漠南，其留居贝加尔湖滨者自号丁零，后又分部西牧至坚昆之西陆昆海西北，鱼豢《魏略》载之，时称为西丁零，云高车者，不过由车制之异，从而呼之，并非部名，部人与元魏、突厥、蒙古皆鲜卑族。

尽管在这些说法中,有个别欠妥的地方。如“大泽”应为今呼伦湖,而非贝加尔湖。又如“高车”与“拓跋”即便同宗,也未必是同时离开大兴安岭的鲜卑部落。然而,不仅他说“高车”、“元魏”、“蒙古”出自鲜卑,显然是正确的结论,他说“突厥”之名也是源自鲜卑,可能也是有道理的。

关于“高车”即“鲜卑”的证据还有很多。例如《魏书》说:“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乞伏保,高车部人也”;“乞伏惠字令和,马邑鲜卑人也”。“乞伏”既为“鲜卑”,又是“高车”,“高车”当然就是“鲜卑”。

再如《魏书·高车传》中曾说:

> ……高车侄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馀落内附,拜敕力犍为扬威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谷二万斛。后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馀落内附,亦拜为威远将军,……

文中“侄利曷”就是“敕勒骨”,即“敕勒部落”;“莫弗”则是室韦系酋长的称号。故第一人为“高车的敕勒部落酋长敕力犍”,第二人为“高车的解批部落酋长幡豆建”。“敕力犍”即“车鹿会”[33],鲜卑语“雄健”和“英雄”之义。“幡豆建”可能是《金国语解》中的“谩都哥,痴呆之谓”一字;它与“什古乃,瘠人”一样,大概也是金代女真语中的一个鲜卑—室韦语借词;鲜卑人和女真人好似都喜欢用“穷人”、“笨蛋”之类的“贱字”为名。“敕力犍”和“幡豆建”均以 gan 结尾,也都象是鲜卑式人名的一个特征。

《魏书·高车传》所载的高车部的民俗也与后世的契丹、蒙古族很相似,如:

> 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桵，回竖之，以乳酪灌焉。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

契丹人就有这种骑马绕柳树祭祀或庆祝的习俗。高车族妇女头上戴的装饰物，也就象是后世蒙古女子的头饰"顾姑冠"。

"回纥"之名既源于"高车护骨"，必出自"鲜卑"，它是与"匈奴"融合而成的"突厥语民族"。《突厥碑文》中的"十姓回纥"(On Uyghur)，或"九姓乌古斯"(Toquz Oghuz)，统统都是"回纥"，他们是"突厥汗国"中的基本民众。各代波斯、阿拉伯、拜占庭历史和罗斯纪年，也都有关于 Uyghur 或 Oghur 的记载，它与 Bulgar、Kurtrighur 等为同等重要的 Hun 人部落。

"回鹘汗国"继"突厥汗国"，在蒙古地区称霸了一百年，公元840年时被"黠戛斯"逐出蒙古地区，散居在中亚—西亚各地。现代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所使用的"突厥语"，实际上是传承于"回鹘语"的。"回鹘汗国"属下的种族和语言也一定相当复杂，不仅匈奴、鲜卑部落盘根错节，通古斯—靺鞨成分也不断地注入。现代裕固族中的突厥—蒙古两语并用的状况，可能就是回鹘汗国中匈奴—鲜卑语并存现象的延续。

作为"回纥"的直系后裔，在甘肃祁连山区独处的"裕固族"，是研究古代回纥民族的一具标本。前苏联学者杰尼舍夫注意到，裕固族的 Isaqana 鄂托克(部落)含有不少蒙古氏族，如 Arlat、Dzunil、Oreg、Paghana、Qalga、Qarghos、Qongrat、Soltus、Temurchin、Tu-

man、Virat 等[34]。我们不难于其中识别出:Oreg(斛律)、Qalga(喀尔喀)、Qongrat(弘吉剌)、Virat(卫拉特)、Temurchin(铁木真)、Tuman(图门)等。回纥人于9世纪离开蒙古地区时,蒙古民族还无影踪。裕固族中的这些"蒙古氏族",可能就是回纥人自己的"鲜卑根"。

裕固族姓氏的多样性,也足以揭示它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例如:

裕固氏族	汉译	注释
Andzhan	奄章	女真语"金"字"按春"
Kong、Qon	浑	突厥部落名
Qirghis	吉尔吉斯	突厥语民族族名
Tokshu	塔克什	满族姓氏
Turgust	突骑施	突厥部落名
Yaglak	药罗葛、夜落纥	族名"挹娄"或"耶律"

这些氏族名字,有的出自匈奴—突厥系,有的甚至来自通古斯—靺鞨系。

近代"裕固族"的"那颜"(头人)多出自"奄章"(Andzhan)家族[35]。又据史载,唐代回纥"内九族"有"药罗葛"[36]氏;宋代"甘州回鹘"王族为"夜落纥"[37]氏,两者必是今日裕固族中的 Yaglak 氏。Andzhan 和 Yaglak 两氏之源名可能就是通古斯之"爱新"和"挹娄"。通古斯系血缘氏族可能很早就执掌了"回鹘汗国"的领袖地位。

六、楚瓦什人的先祖也是鲜卑

楚瓦什(Chuwash)人主要分布在伏尔加河右岸的楚瓦什共和国境内,他们主要是 Bulgar 和 Sabir 等 Hun 人部落的后代。前文已经指出,Bulgar 即是"仆骨",Sabir 即是"鲜卑";Chuwa 一字则是转自 Suwar。由于楚瓦什语中包容了大量突厥语成分,因此它被纳入了突厥语的范畴。但是它又与一般突厥语言相去甚远,互相之间不能沟通,因此它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突厥语。许多事实表明,楚瓦什语与蒙古语和通古斯语间有着"特殊的"的联系。这也都表明它的先祖 Hun 人,可能与鲜卑人和通古斯人有着某种渊缘[38]。

楚瓦什语偏离突厥语的特征,被一些学者说成是它与"乌拉尔语系"属下的"芬—乌戈尔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这未能解释楚瓦什语的由来,却又暗示了"芬—乌戈尔语言"与远东语言的关联。我们已经发现,最重要的"乌拉尔语言"——匈牙利语中,就有着大量的通古斯语和蒙古语的成分。西西伯利亚的 Vogul 和 Ostiak 语列在"芬—乌戈尔语言"的属下;事实上 Vogul 和 Ostiak 就是"护骨"和"兀者","乌戈尔语"就是来自远东的"护骨语"。因此难怪有许多学者要反对"芬—乌戈尔语言"和"乌拉尔语系"理论存在的必要了。

在王远新的《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一书中,介绍了阿尔泰语系理论中的这种很令人质疑的观点[39]:

早在十五世纪,在现代楚瓦什人居住的地区就形成了楚

瓦什部族，在楚瓦什部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其部族和语言与芬—乌戈尔语言的一些部族和语言发生了融合。因此，近现代楚瓦什语是在古保加尔语的一些方言基础上，融合了芬—乌戈尔语言的一些特点而逐渐形成的。

尽管他没有明说古保加尔（Bulgar）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但又暗示楚瓦什人祖先的语言可能更为突厥化，只是后来在“芬—乌戈尔语言”的影响下，才异化成了今世楚瓦什语的怪异状况。

事实并非如此，苏俄突厥学家威廉·巴托尔德指出[40]，楚瓦什人的祖先 Bulgar 人所使用的语言，就是与一般突厥语很不一样的。他引用阿拉伯的记载说：

阿拉伯地理学家着重指出，从南俄的 Pechenegs 人至中国近邻的突厥人的各种方言是相似的，并补充说，有一种语言是特殊的，别人不懂的语言，就是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的不耳阿里人和可萨人所说的。

他接着就推论：

历史事实使人假设，如果楚瓦什语是代表突厥语发展较早阶段的残余，那末这一阶段的匈奴语也就不会是突厥语……突厥语本身的最早的发展阶段，很可能就是与匈奴人东邻的鲜卑语。

这里所说的“匈奴语”当指“Hun 人的语言”。18 世纪以来,“Hun 人即匈奴”的学说在东西方流行,因此两者很容易混淆;兼之于“突厥语”是源自于“匈奴语”,和楚瓦什人又是 Hun 人的后裔的基本事实,因此便产生了楚瓦什语可能是早期突厥语的设想。当我们认识到 Bulgar 和 Sabir 都是源自东方的鲜卑部落后,“Hun 人即匈奴”的假说,自然也就应该被扬弃了。而古代 Hun 人所使用的主体语言是鲜卑语的结论,也就一目了然了。而巴托尔德(可能还有伯希和)很早就在猜测:Hun 人不是使用突厥原语的匈奴民族,而是来自东北亚的鲜卑民族。

而现代“阿尔泰语系”理论的设计师们,竟不惜周章地去定义一种所谓的“*r* 型突厥语”,来解释这种“楚瓦什语现象”。《大英百科全书》的“阿尔泰语系”一章的作者在介绍这种理论时,颇费心机地说[41]:

> 可能在很早的年代,突厥语就分裂成两支:*z* —*š* 型的(通常称为 *z* 型突厥语),和 *r* — *l* 型的(通常称为 *r* 型突厥语);这两类突厥语得名于这几个语音间的有规则的转换。例如“百”字,在 *z* 型突厥语中为 *yuz*,在 *r* 型突厥语中相应为 *ser*;又如“岁”字,在 *š* 型突厥语中为 *yaš*,而在 *l* 型突厥语中则是 *sul*。这种朝 *r* 和 *l* 偏离的最早的倾向,是出现在南俄草原地带。当年的 Hun 人看来就是使用这种 *r* —*l* 型突厥语的,他们的迁徙是这种语言西向传播的原因。现在唯有楚瓦什语属于这种 *r* — *l* 型的语言,楚瓦什语被认为是伏尔加—Bulgar 语的后裔;而其他的突厥语则都是 *z* — *š* 型的。

无疑，*yuz* — *ser*（“百”），和 *yaš*— *sul*（“岁”），是最易于比较的两组词例。然而无论“外行”还是“内行”，都不会看出它们间有任何“表面”或“内在”的关联。这种不顾全字的对音，而仅将个别辅音进行武断比较，其结论一定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其反例当然也是不可胜举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是陷入无法自洽的重叠假说的境地，必定是已经走进了无望的死胡同。

其实，三种所谓“阿尔泰语言”中的“百”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在契丹语中它作“爪”[42]，现代蒙古语中作 *zwu*，匈牙利语中作 *szaz*；通古斯—满语则是 *tang-gu* [43]；而突厥语却为 *yuz*。显然，楚瓦什语中的 *ser* 一定是个古鲜卑字，否则便不会与契丹—蒙古语的“百”字相通了。此外，“岁”字，在楚瓦什语中是 *sul*，它与现代蒙古语的 *nas*，和各种突厥语的 *yaš* 都相去甚远，却又与通古斯—满语的 *ser* [44]极其相近。

真不必去虚构这种“两类突厥语理论”，而只需实事求是地承认：尽管楚瓦什语曾受到过突厥语巨大的影响，但楚瓦什人的祖语是以鲜卑语为主体，渗融了不少通古斯语成分的混合语言。释清了楚瓦什民族和语言的鲜卑祖源后，许多虚构的语音转换规则，也应该予以摈弃。在失去了楚瓦什语这个中间体后，各种所谓“阿尔泰语言”间的同源假说，亦将形同泡影。

要将古鲜卑语的成分从现代楚瓦什语中辨析出来，无疑是一件极具学术价值的工作。然而，因为在现代突厥语中已经融合了大量的“蒙古原语”成分；而在现代蒙古语中又不仅包容了大量的“突厥原语”，还渗透了大量的“通古斯语”的成分。如果认为以现代突厥语和现代蒙古语作对照，就能轻而易举地识别楚瓦什语中的鲜卑语成分，则是大大低估了此事的难度了。

其次，作为古鲜卑语的主要载体——现代蒙古语，也丧失了许多古鲜卑语的词汇或它们的部分词义。而有些被蒙古语言遗失了的鲜卑语成分，却分别在楚瓦什语、匈牙利语、裕固语、锡伯语、维吾尔语、土耳其语中，被保留下来了。前述的《金国语解》中的"什古乃"（"穷人"）一字，就完好地保留在匈牙利语中（*szegeny*）；再如蒙古语中的"马"字 *at* 和 *morin*，分别是借自突厥语和通古斯语的，而古鲜卑语中的"马"字则很可能与匈牙利语的 *ló* 或楚瓦什语中的 *lasa* 有关。

20 世纪 30 年代，在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的推动下，土耳其开展了一场"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的群众运动，旨在清除土耳其语言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分，并以拉丁文字取代阿拉伯文作为书写文字。在这场运动中，政府有组织地收集各历史时期的突厥语词汇，以及各地区的突厥语方言，经鉴定后逐步替代外来语词。事实上，这些被收集来的"纯突厥语词"中，有不少是"回纥"人撤出蒙古高原以前，已经融入突厥—回纥语中的"鲜卑语"或"通古斯语"词汇，它们很多也被列入现代土耳其语词典[45]。这场在土耳其进行的"净化语言"的努力，竟也无意地为中国北方诸族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采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以"白色"一字为例。突厥语中它都作"阿克"或"阿赫"（*ak* 或 *akh*），在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中则是"察罕"（*chagaan*）；而楚瓦什语却不寻常例作 *shur*（*a*）。我们又发现现代土耳其语词典中，"白色"一字除有 *ak* 外，还有 *soluk* 和 *solgun* 等字。*ak* 即是"阿克"，*solgun* 则是"察罕"的变音；而 *soluk* 却是楚瓦什语"白色"一字 *shur*（*a*）的变写。该字之源很令人深省。《元和姓纂·卷八》在谈到鲜卑氏族名"素和"时曾说："后魏书云，以本白部，故号素和"，它揭

示了楚瓦什语的 *shur*(*a*),和土耳其语的 *soluk*,都是来自鲜卑语的。当然,汉语的"素"也有"白色"的意思。

为了揭示楚瓦什语中的鲜卑语的成分,同时比较楚瓦什语和蒙古语、契丹语、突厥语、通古斯—满语、匈牙利语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下面表列不多的几个基本词汇,以期读者能发见其中的一些内在联系。

汉语	楚瓦什语	蒙古语(契丹语)	突厥语	通古斯语
门	alak	haalaga	eshik	duka
乳房	kakar	kherkh	emegh	meme
花	chicheg	chichig	gul	ilgha
种子	vara	ura	tohum	uso/udze
马	lasa	at, morin	at	morin
公牛	vakar	buqa	boga	ihan
冬天	hel;	evel	kish	tuweri
时间	chuh	tsagh	kez/chak	erin
石头	chul	chuluu	tash	wohe
精神	chun	suuns	ruh	
语言	cheilhe	heile	dil	gisun
一百	ser	zuu	yuz	tang-gu
夜间	ser	sherner	gedje	dobori
土壤	ser/tapra	shavar	toprak	na/bohon
雨	sumar	boroo, hur (瑟[46])	yaghmur	agha

白色	shura	tsagaan	ak/soluk/solgan	cha-gan
小的	vak	baka	kechigh	ejighe

七、结束语

以中国北方诸族语言为对象的研究，早在18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突厥、蒙古、通古斯三大语言是否同源的探索，不仅具有语言学上的意义，而且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是涉及这三大民族是否同源的重大课题。西方各国的学界都对它表现了巨大的兴趣，而且做出过许多积极的贡献。直到如今芬兰和匈牙利的学者仍然对它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当然这也是因为它和匈牙利、芬兰两民族的祖源探索有着重要的关系。

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都是相当复杂的混合语言。西方的语言学者，发现了它们之间的某些关联现象，却又未能洞察它们互相融合的历史和机制，而将流变着的近世语言断层作为依据，构造了一个静态"阿尔泰语系"理论；以致将先世不同，后世方才融合的这三种语言，说成是同宗同源的姊妹语言了。

所谓"阿尔泰语系"理论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在突厥、蒙古、通古斯这三大语言之间，"数词"和"基本词"完全不同，而许多"文化词"（我称之为"高级词汇"）却相当地类似。这也就与成功的比较语言学理论——"印欧语系"学说的普适性假设相抵触。显然，这三大民族和语言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较后期才发生的。本世纪以来，"阿尔泰语系"理论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其支持者们固执地坚持该语系的所谓"特殊性"，在方法

论上则采用无效的“繁琐哲学”。然而,“反方”尽管在论战中呈进攻态势,但却很少能关注或兼通东西方史料,从而历史地或动力学地,解释这三种语言融合的过程和机理,以致始终未能将“正方”置于“死地”。

要科学地解释现代形态的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言的形成机制,不可回避地要使用中国史料关于北方诸族运动的记载。在史前期,“东胡—鲜卑”人和“通古斯”人可能就在潜默地西迁着了,因此“匈奴语”大概也很早就杂有“东胡—鲜卑语”和“通古斯语”的成分。公元1世纪时,鲜卑族大规模地入侵蒙古高原后,“匈奴语”中的“鲜卑语”成分加强了。6世纪时,来自阿尔泰地区的“兰突厥”部消灭了“柔然汗国”,建立了强大的“突厥汗国”,蒙古高原上这种“匈奴—鲜卑”混合语言,才开始被称为“突厥语”。

后世蒙古高原上的语言又几经变迁。7—8世纪间,大规模西迁的靺鞨—鞑靼人,带来大量的“通古斯—室韦”混合语成分。公元840年前,蒙古地区的“回鹘汗国”可能是一个多语的(multi-lingual)部落联盟。其强势语言是“突厥—回纥”语,然其本身又一定是“匈奴—鲜卑—靺鞨”语言的融合体。12、13世纪时,使用含有大量通古斯语成分的“蒙古部”,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整合了草原上的部落社会,蒙古地区的“突厥语”,又再一次被冲击和搅拌,其重心进一步朝“东胡—鲜卑语”和“通古斯—靺鞨语”倾斜。“现代蒙古语”的基本面貌大概是那时形成的。当然,与古鲜卑人使用的“蒙古原语”相比较,它又有了很大的偏离,“突厥语”和“通古斯语”在“现代蒙古语”中都占了重要的成分。

注释

[1] Gy. Nemeth, *A honfoglalo magyarsag kialakulasa*, Budapest, 1930, pp. 183—186.

[2]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978、2985。

一曰:"乌桓者,本东胡也。"

又曰:"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

[3] 孙进已《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页30—31。

[4] P. Golden, *Khazar Studies*,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80, p. 35.

[5] V. Shnirelman, *Who Gets the Past?*, Washinton D. C. ,Woodrow Wilson, 1996, p. 32.

[6] 《国语》卷十四,《晋语八》,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下册页46,注释九。

曰:"置,立也。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望表,谓望祭山川,立木以为表,表其位也。"

[7] Bing Su(宿兵), Junhua Xiao, Peter Underhill, Ranjan Deka, Weiling Zhang, Joshua Akey, Wei Huang, Di Shen, Daru Lu, Jingchun Luo, Jiayou Chu, Jiazhen Tan, Peidong Shen, Ron Davis, Luca Cavalli-Sforza, Ranajit Chakraborty, Momiao Xiong, Ruofu Du, Peter Oefner, Zhu Chen, and Li Jin(金力)(1999) *Y- 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 Northward Migration of Modern Humans into Eastern Asia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Am. J. Hum. Genet. 65: 1718—1724.

[8]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页2986。

曰:"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徙据其地。匈奴馀种留者尚有十万馀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9] 《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054。
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

[10]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页3。

[11]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1973, p. 54, 128, 166, 274, 298.

[12]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室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176。

[13] 《北史》卷九十四,《室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129。

[14] 佐口透《撒里维吾尔族源考》,吴永明译,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页791—801。

[15] 张文生主编《中国地图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页14。

[16] 冯继钦、孟广耀,黄凤岐《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页274。

[17] 照那斯图《土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页103。

[18] 《辽史》卷一百十六,《国语解》,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548。
曰:"耨斡麽　麽,亦作改。耨斡,后土称。麽,母称。"

[19]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页2989。

[20] 《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835—840。

[21]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页6179。
曰:"万岁通天中……,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馀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

[22]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页227。

[23] 《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页831—840;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页179—192。

[24]《魏书》卷一百一,《土谷浑传》,页2233。

曰:"土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土谷浑,少曰若洛廆"。

[25]《魏书》卷一百三,《徒河段就六眷传》,页2305。

[26]《北齐书》卷十七,《斛律金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19。

曰:"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

按:"阿六"(音 o-lu)应即为"斛律",室韦部落"乌洛侯"和匈牙利姓氏 Olah,也都应该就是"斛律"氏。

[27]《晋书》卷九十七,《四夷·西戎·土谷浑》,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537。

[28]《魏书》卷五十一,《封敕文传》,页1135。

[29]《晋书》卷一百二十五,《乞伏乾归载记》,页3116。

[30]本书《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

[31] Consta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rio*,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1967, p. 175.

按:此英译本所列八个 Turk 部落为:Kabaoi、Nekis、Megeris、Kourtougermatos、Tarianos、Genach、Kari、Kasi。一般认为 Kabaoi 部滞留于摩尔达维亚而未入匈牙利地区。馀称 Magyar 七部,匈牙利文则译作:Nyek、Megyer、Kurtgymat、Tarjan、Jeno、Keri、Keszi。

[32]《北齐书》卷一、二,《帝纪·神武》,页1。

曰:"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欢,字贺六浑……。"

按:现代蒙古语"顶峰"一字为 *oroi*,高欢可能是取鲜卑语的"顶峰",来替代他的汉姓"高"的。

[33] 鲜卑—高车语中的"敕力犍"(*chereghan*)和"车鹿会"(*chereghay*)语音之间的区别,可能就是后世回纥语之 *n* 一方言,*y* 一方言之间的区别。回纥 *n* 一方言、*y* 一方言、代表方言,

即回纥北部，南部、中部方言。举例如下：

	羊	穷人	雄健
n 一方言	qon	chighan	chereghan
y 一方言	qoy	chighay	chereghay
代表方言	qony	chighany	

[34] 同[14]。

[35] 雷选春《西部裕固语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序页11；同[14]。

[36]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5198。

曰："有十一都督，本九姓部落：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

[37] 《宋史》卷四百九十，《回鹘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4114。

曰："太平兴国……五年，甘、沙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密礼遏遣使裴溢的等四人，以橐驼、名马、珊瑚、琥珀来献。"

按："夜落纥"又作"夜落割"，应即"挹娄纥"或"挹娄骨"；"密礼遏"即"蔑里乞"，皆为通古斯部落名或由其转化而成的人名。

[38] 李增祥《突厥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页36。

曰："楚瓦什语与突厥语的其他语言相距甚远，并有大量的斯拉夫语和芬—乌戈尔语借词，是突厥语中独特的一支。……楚瓦什语有许多特点表明它与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有联系，是研究阿尔泰语的重要媒介语。"

[39] 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页351。

[40]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25—27。

[41] G. Hazai, "Altaic Languages",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Vol. 22, pp. 711—715.

[42] 《辽史》卷一百十六,《国语解》,页1547。

曰:"六爪/爪,百数也。"

[43] 和希格《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女真译语研究》,1983,页329。

[44] 同上,页275。

[45] Resuhi Akdikmen, *Standard Turkish Dictionary*, New York, Langenscheidt, 1986.

[46] 《辽史》卷一百十六,《国语解》,页1537。

曰:"瑟瑟礼,祈雨射柳之仪,遥辇苏可汗制度。"

Hun 人的鲜卑—通古斯族源

公元 374 年左右，即中国北方正在进行着第一次“五胡乱华”的时代，一支被西方史载称为 Hun 人的东方民族，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他们首先征服了阿兰人（Alans），又在第聂伯河以西地区，降服了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接着又不费力地逐走了西哥特人（Visigoths），进而来到西方文明的面前，捶击它的大门。

在罗马史家 Ammianus 的《后期的罗马帝国》一书中曾记载[1]，Hun 人从顿河以东发动进攻，阿兰人坚决的抵抗，然而以战车为主力的阿兰人，敌不过勇猛突驰的 Hun 人的骑兵，结果国王被杀，民众奔散，大部分阿兰人都被 Hun 人接受为“同盟者”，阿兰人的战士成为 Hun 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之后，Hun 人又驱使被征服的阿兰人，和他们自己一起去攻打黑海北岸的东哥特人的王国，年迈的哥特王 Ermanarich 抵抗失败，自杀成仁。他的侄孙 Vithimiris 领导族人又继续抵抗了将近一年，也战败身亡。接着，Hun 人向西哥特人发起进攻，西哥特人一败涂地，全面崩溃。公元 376 年，大量的哥特人渡过多瑙河，逃入邻近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pole）的色雷斯（Thrace）地区，给多瑙河沿岸的东罗马边防军，带来了关于 Hun 人的令人战栗的消息：

从来未曾见过的人种，不知是从那个角落冒出来的……

他们一路扫荡破坏所遇到的一切[2]。

尽管 Hun 人是以这样一种恐怖的面目出现在欧洲。但是后来阿兰人、哥特人、汪达人(Vandals),都成为他们征战西欧时的盟友。据 Priscus 记载[3],在阿梯拉的帐帏之中充斥着日耳曼的谋臣,在其宫廷的宴席上小丑们以各种语言取悦人众,一片欢愉的景象。Priscus 还记载了一些东罗马民众,因为不满苛捐杂税,而加入了 Hun 人的行列。看来 Hun 人也是一个友好而善交的民族。

从 378 年开始,今天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地方,就被 Hun 人和他们的盟友阿兰人所盘据。据西罗马人的极其简略的记载,383—384 年冬春,Hun 人就开始插手罗马和高卢(今法国)之间的事务。作为第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 Hun 人领袖,Uldin,在公元 400 年时,就是这个地区的 Hun 人之王。408 年他曾率领部众渡过多瑙河,入侵梅西亚行省(Moesia,今保加利亚)的大片地区,接着他又扫荡了色雷斯地区。当地的军事长官提出的和谈条件,被他拒绝,然而却被他的一些下属接受了。失去了大批部众的 Uldin,回渡多瑙河后,就此无闻于史载。

东西方的情况非常相似。每当漠北灾荒发作,北方游牧部落便入侵中原。395—396 年间,东南欧地区饥馑流行,Hun 人移兵高加索,开始大规模入侵中近东地区。他们用了十五天的时间穿越高加索山脉,进入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这些东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深蒙其害,血流成河,连地中海海滨名城安提俄克(Antioch),可能也曾遭其袭击。Hun 人沿幼法拉底—底格里斯河谷,深入波斯帝国的腹地,逼近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但被优势的波斯军所击溃。他们丢弃了大量的战利品和俘虏后,在两位

酋长 Basich 和 Kursich 的带领下，从打耳班（Derband）通道返回南俄草原[4]。

441 年，在兼具魅力和魄力的酋长阿梯拉（Attila）的率领下，Hun 人再度向东罗马帝国挑战，他们将巴尔干半岛搅得大乱。东罗马人不得不与阿梯拉签订和约，正式出让了潘诺尼亚（Pannonia，今匈牙利、奥地利东部和克洛地亚），承诺向 Hun 人纳贡。447 年，阿梯拉又趁水灾和地震并发之后，再次掳掠巴尔干半岛，把东罗马帝国搞得民穷财尽。于是阿梯拉把眼光转向了西方。

451 年，他率大军从潘诺尼亚出发，渡莱茵河，会合了他的日耳曼同盟部落，大举入侵高卢，在四月七日焚毁梅兹（Metz）后，乘胜包围奥尔良（Orleans）城。六月底，阿梯拉和他的东哥特联军，与西罗马和西哥德联军，会战于一个叫卡塔劳尼安平原（Catalaunian Plains）的地方，在一场争夺制高点的搏战中，西哥特王西奥多里克（Theodoric），被一个有着女真式人名 Andga（“按答海”[5]）的东哥特头人用长矛刺死。阿梯拉自己也差一点送命，他和他的随从避入了用车辆围成的营垒（即《史集》中说的“古列延”[6]）中。夜间，死伤惨重的双方在惶恐中息争[7]。阿梯拉在会战失利后，退回多瑙河地区过冬。

452 年，阿梯拉率军转进意大利。在焚掠了阿奎利亚（Aquileia）和占领了米兰（Milan）和巴维亚（Pavia）后，他扬言要进军罗马城，还指名要与皇帝的姊妹荷诺丽娅（Honoria）公主[8]和亲，吓得懦弱的罗马皇帝瓦棱丁三世（Valentinian III）逃之夭夭，罗马教皇利奥一世（Leo I）不得不亲自出面，在他的巧言劝诱下，阿梯拉接受罗马进贡与联姻的诺言，平息了战火，重回潘诺尼亚[9]。

453 年，阿梯拉在他的又一次“新婚之夜”突然病死。逝去了

它的光辉领袖，后继者魅力不再，加盟于其中的日耳曼族的 Gepidae 部酋长领头造反，Hun 人的帝国旋即云消烟散。454 年，阿梯拉的长子 Ellac，在潘诺尼亚的一场大战中战死。其他的几个儿子从罗马人手里得到了一些封地（都在今罗马尼亚境内）。惟有一个儿子 Dengizich（亦作 Dinzigikh）带了一些部众，回归南俄草原，返璞归真，重过游牧生活。然而在一次与东罗马的战事中，他本人被杀。468 年他的头颅曾被展览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竞技场中[10]。

之后，黑海北岸的 Hun 人分裂成两个部落：Kurtrighur 和 Utrighur。前者居亚速海西北，后者居顿河河口，彼此互相敌视。大概是在 545 至 548 年间，在拜占庭使者的挑唆下，Utrighur 部酋长 Sandikh 率众攻灭了 Kurtrighur 部；但是不久后，它又在 Zabergan 的领导下复兴。为了报仇，Zabergan 率众于 548—549 年之冬，穿越冰冻了的多瑙河，突然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幸亏大将 Belisarius 临危不惧，拯救了首都。Zabergan 无功而还，拜占庭人也受了一场惊吓[11]。

6 世纪中叶，败于突厥人而西逃的 Avars 人（有西方学者认为它是“柔然”的核心部落），一度曾在南俄—高加索地区受到过拜占庭的庇护。这惹得西突厥汗国达头（Tardu）可汗大为光火。576 年，Utrighur 部落的最后一位酋长 Anagai，曾配合西突厥部队，进攻位于亚速海出口的拜占庭城市 Bosporus[12]。

据 Ammianus 的记载，Hun 人男子有着“敦实的身材，粗壮的手臂，不成比例的大脑袋”。一些和阿梯拉等打过交道的哥特人，也以欧洲人的眼光，很生动地描绘过阿梯拉的这种短小、粗壮、大头、小眼、塌鼻、少须的亚洲人种的形象[13]。遗憾的是，关于 Hun

人的语言却没有任何记载。正因如此,关于 Hun 人的族属也就成为一种历久不衰的学术题材。

一、Hun 人来源的学术探索

欧洲人最初对于 Hun 人的来源茫然无知。18 世纪初,法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illac, 1669—1748)[14],熟习中国古籍,精通满汉两种文字。他受康熙之命,用了六年的时间,将朱熹的《通鉴纲目》译成法文,1737 年寄达里昂图书馆,1777—1783 年间才于巴黎陆续出版,易名为《中国史》,共十三巨册。启蒙时代的法国学者德揆尼(M. Deguignes),又根据其中关于北方诸族的内容,写成《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各族通史》一书,并提出了 Hun 人即是西迁的匈奴人[15]。长期居住在法国的,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在他的巨著《罗马帝国兴衰史》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16]。从此"Hun 人即匈奴"的观点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

此说"西学东渐"则相对较晚,19 世纪末清庭驻俄使节洪钧,在他所著的《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中,率先介绍了西方关于 Hun 人源于匈奴的观点。后来王先谦在他的《后汉书集解》一书某节的注解里,引述过洪钧的这些关于 Hun 人的文字。Hun 人即西迁的匈奴的观点,也开始在中国学界流传。以后,章太炎和梁启超也都注意到西迁的匈奴与 Hun 人间的关系。中西学界有呼应共鸣之势。[17]

然而,赞同和否定这种见解的学者,均不乏人在。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20 世纪英国剑桥学者伯利(J. B. Bury),他本人既是权

威著作《希腊史》(*The History of Greece*)的作者,又是《罗马帝国兴衰史》的注释、编订者,他最初反对吉朋的说法,但很快又转而肯定 Hun 人的祖先就是中国古代的匈奴[18]。

现代英国学者汤普生(E. A. Thompson)则鼓吹 Hun 人来源的不可知论,他在为《大英百科全书》所撰写的"Hun 人"条目[19]中说:

> 我们和4世纪的罗马人一样,对于 Hun 人的来源的了解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是无从知晓的。至少从18世纪以来,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过无休止的辩论,但是毫无结论。

当然,即便 Hun 人来自东方,也未必就一定是"匈奴"。然而,汤普生从根本上怀疑的却是:Hun 人究竟是不是东方人种?我们不想贬低他的学术水准,但是我们也的确可以发现,汤普生对于中国史料和东方语言的了解是不多的;却又不幸多了一点武断和偏见。难怪在新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撤去了他所撰写的这一条文字。可见反对他的观点的声音,在西方学术界也是很强烈的。

中国学者齐思和,在他的《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20]一文中,利用中国史料,分析了从公元91年到374年,即从北匈奴汗庭离开蒙古地区起,到 Hun 人出现在顿河流域止的近三百年间的情况。他认为在中西史载间断的这个时代,匈奴西迁的过程可能分成四个的阶段:悦般时期(91—160)、康居时期(160—260)、粟特时期(260—350)和阿兰时期(350—374)。他认为西迁的北匈奴就是沿着这条轨迹,步向欧洲的。然而,中国史料对北方诸族的活动只有少量片断记载,如果不利用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的成

果,来推定 Hun 人的东方族源,显然是不可能的。齐思和仅仅基于中国史料,就作出这些延伸性的判断,当然会予人以无力且武断之感。

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结论比较清晰[21]。在匈牙利地区的古墓中,曾出土千数以上的 Hun 人和 Avar 人的头骨,特别是在 Masonszentjanos 地方发现的头骨,都属于纯蒙古人种类型,没有欧洲人种的混杂。巴图契(L. Bartucz)把这些头骨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称为 A 型,由长头型至中长头型构成,平均头盖指数,男子为 75.5,女子为 77。另一类称为 B 型,呈圆头型,男女平均指数均为 83。A 型在今世通古斯族中常见;B 型在布里雅惕(Buryat)蒙古族中表现得突出。A 型出土于 Hun 人墓地较多,B 型头骨发现于 Avar 人的墓地较多。看来 Hun 人和 Avar 人,很可能与鲜卑和通古斯等东北亚民族有关。

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则要困难很多。在西方史料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 Hun 人的语言记录,但是却留下了不少 Hun 人的名字。欧洲学者对它们作了全面的收集,并力图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来达成对 Hun 人的语言和族源的了解。匈牙利学者 Moravcsik 在他的《拜占庭·突厥》一书[22]中,对这些人物的身世作了尽可能详尽的研究。美国学者 Maenchen-Helfen 在《Hun 人的世界》一书中指出[23]:"我们所知道的 Hun 人的语言,只是他们的姓名而已,它们已经被整整地研究了一个半世纪"。同时,他也批评了研究中出现的随心所欲的倾向:"突厥语学家只望字字都是突厥语词,日耳曼语学家则盼个个皆是日耳曼字。"然而,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欧洲学者,大部分人对"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缺乏了解,而对于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大量"胡名"、"胡姓",也根本未作任何比照,却又醉

心于在“突厥语”、“哥特语”、“波斯语”方面去寻求答案，因此在探索的路线上瞄错了方向。

基于 Hun 人的后裔——现代“楚瓦什人”的语言的“怪异”特征，苏俄中亚学家巴托尔德院士，则指出[24]：

> 历史事实使人假设，如果楚瓦什语是代表突厥语发展较早阶段的残余，那末这一阶段的匈奴语也就不会是突厥语……突厥语本身的最早的发展阶段，很可能就是与匈奴人东邻的鲜卑语。

首先须要澄清的是，引文中的“匈奴语”应该是“Hun 人的语言”，这可能是中文译者将它们混淆了。由于 18 世纪以来，“Hun 人即匈奴”的说法主导了学术界的思想，为了附会这种学说，有人不得不引入“Hun 人的语言”是“突厥语发展较早阶段”这样的概念。然而巴托尔德（可能还有伯希和在内）这些学术大师，则早就已经在揣摩：Hun 人可能不是出自突厥语民族，而是源于鲜卑系民族的。

去到欧洲的 Hun 人，兼融了通古斯和匈奴等东北亚族群也是必然的。因此，如果能够厘清“鲜卑”的源头，辨析他们的裔流，发掘中国史料中的深层语言内藏，承接西方学界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Hun 人源于东北亚的证据亦将一目了然。

二、Hun 人的部落探源

东胡—鲜卑系民族的部落名多以“古”或“纥”及近音字结尾。

具有此类族名的民族中,“回纥”是最重要的之一,中西文族名“纥骨”、“护骨”、“乌古”、“滑国”、“维吾尔”、Oghur、Uighur 等,皆其谐音。它很早就使用“突厥语”了,然而《魏书·官氏志》却说“纥骨氏”是“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的“内族”第一姓。因此,“回纥”之初是个“鲜卑”部落大概是无疑的。

西方历史记载,从阿梯拉的帝国覆灭,到突厥人到来之前的一百多年间,南俄地区是被一些名为:Bulgar、Kurtrighur、Oghur、Saraghur、Urog、Utrighur 的部落所盘据[25]。这个地区是 Hun 人入侵欧洲的出发地,它们之中又有一部分是回归草原的阿梯拉 Hun 人的子裔,因此它们必然都是 Hun 人的背景民族。这些多以 g、gar、gur 或 ghur 结尾的部落名,与中国历史上的东北亚族名有着可比线索:

Bulgar	“仆骨”、“婆萬”
Kurtrighur	“高车骨”
Oghur	“护骨”、“乌古”或“回纥”
Sabir	“鲜卑”、“师比”
Saraghur	“撒拉纥”(意“黄部”),今青海有“撒拉族”。
Urog	“斛律”、“乌洛侯”
Utrighur	“兀的哥”,即通古斯族名“兀者”、“斡拙”。

如此谨严的对音,使我们无法拒绝认知:“鲜卑”、“仆骨”、“高车”、“乌古”、“斛律”,和通古斯“兀者”部落等,都是 Hun 人的重

要族源。下面我们将对几个最重要的 Hun 人部落作进一步的讨论。

Bulgar(Bulghar)和“仆骨”

著名的 Hun 人部落 Bulgar,与另一个 Hun 人部落 Kurtrighur 之间,好象有着某种亲缘、从属或联盟的关系。7 世纪时,两部都滞留在亚速海—库班河之间地区。一个名叫 Kubrat(死于 642 年)的“可汗”统一了各部,创立了 Bulgar 汗国的雏形。他有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名叫 Bayan 的,继承了他的汗位和领地,这部分人后来迁往北方,和 Sabir 人汇合成为古代的“保加尔汗国”的居民。另一个儿子率众西去,定居在巴尔干半岛的“梅西亚”(Moesia)地方,与斯拉夫人融合成了“保加利亚人”,他们现在被认为是一个斯拉夫民族。还有一个儿子是 Kurtrighur 部的酋长,这个部落一直定居在顿河西岸[26]。

Kubrat 和 Bayan 可能就是蒙古人名“忽必来”和“伯颜”。据保加利亚的历史说,他们的祖先称酋长为 *Khan*,苍穹之神为 *Tengra*[27];这些语言信息即便并不十分充分,也暴露了 Bulgar 人的语言可能与“蒙古原语”相关的某些迹象。

Bulgar 与“仆骨”,Bulghar 与“婆莴”[28] 分别对音,“仆”和“婆”两字就是 Bul;“骨”和“莴”则是 gar 或 ghur。《北史》中将“骨”或“莴”略去了,而把它记为“钵·室韦”。到了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语的发音有了变化,他们将 Bul 读成了 Buli 或 Bula,又将 gar 软化成了 ar。这样一来,《秘史》便把 Bulgar 或 Buli-ar,用汉字拼写成了“不里阿耳”或“孛剌儿”。

现代聚居于贝加尔湖东侧的“布里雅惕”(Buryat)蒙古部,其

名“布里”(Bury)即是“不里”(Buli),“雅惕”(at)则是蒙语中部落名尾音。由此看来,这个“布里雅惕”部也是“仆骨”的后裔。

学界一般认为“仆骨”是“突厥语族”部落。但基于它的后裔使用的“布里雅惕语”是一种典型的蒙古语,使我们可以判定古代“仆骨”是使用“蒙古原语”的鲜卑系部落。前文所述,匈牙利地区出土的 B 型 Hun 人头骨,与“布里雅惕人”的头骨极为近似,这又表明 Hun 人中有“仆骨”及其近缘部落的重要成分。“仆骨”就是走向西方的 Bulgar 民族之源;而名为“布里雅惕”的现代蒙古部,则是他们遗留在远东的宗亲。

Sabir 和“鲜卑”

西方历史经常提到 Sabir 人。5 世纪中叶时,有一支叫 Sabir 的部落,被 Avar 人逐出中亚。公元 463 年时,这些 Sabir 人又把 Oghur 人,及其名下的 Saraghur、Urog、Onoghur 等部落,从西西伯利亚推向南俄地区。6 世纪初,一支 Sabir 人定居在高加索—顿河—伏尔加河三角地带。他们在拜占庭和波斯的战争期间,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据说 Sabir 人大多站在拜占庭方面。关于这方面的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 515 年。Procopius 说他们能制造“攻城机”,Malalas 说他们有十万之众[29]。

我们大可不必认为这是鲜卑民族最早的一次西迁活动。在希罗多德(Herodotus, 484—430/20 B. C.)和塔西佗(Connelius Tacitus, 56—117 A. D.)记载中,就有很多亚洲游牧民族进据中欧地区了,其中还有一个叫 Suebi 的大部落。这一次可能是因为天灾,也可能是漠北的战乱,导致蒙古高原上的一些部落西迁中亚,它牵动了一个 Sabir 部落,进而触发了一些名为“撒拉纥”、“乌洛侯”、

Onoghur 的部落的连锁互动。从族名上看，这些部落似多为鲜卑系民族。

由希腊文转写成的 Sabir，也作 Savir，阿拉伯文献中记作 Suwar，亚美尼亚文献中则为 Savirk[30]。这些语音转换，与“鲜卑—室韦”或“锡伯—锡韦”的转换是一致的。6 世纪后期，Sabir 和 Bulgar 人一起迁徙到伏尔加河中上游，成为保加尔汗国的基本居民，现代“楚瓦什人”就是这些保加尔人的后裔。楚瓦什民族的学者们认为，他们的族名 Chuwa-sh，是从 Savir、Suvar、Suwar 等字演变来的[31]。

西方很早就有人认为 Sabir 是 Siberia（“西伯利亚”）的字根[32]。前文《鲜卑民族及其语言线索》认为“楚瓦什语”受到过“突厥语”的巨大影响，但它的祖先 Sabir 和 Bulgar 人的语言，则是以“蒙古原语”为主体[33]，又渗融了相当含量的“通古斯语”的混合语言。这显然也是 Sabir 即“鲜卑”的重要的证据。

Kurtrighur 和“高车”

Kurtrighur 是另一个重要的 Hun 人部落，Kurtri 显然与“高车”对音。“高车”部落可能本唤作“高车骨”，汉文记载免去了“骨”字，而直呼它为“高车”；西方记载则保留了鲜卑式叫法 Kurtrighur。9 世纪时，黑海北岸有个名叫 Kurtgy-mat 的部落，它加入了 Magyar 部落联盟。这个“突厥式”的族名“高车蛮”，可能是从“鲜卑式”的族名“高车骨”转化来的。

有人说“高车”是“高大的车辆”的意思，是因为史书有高车部落的车辆“车轮高大，辐数至多”[34]的记载。若果“高车”是一个汉语词汇，那也就无法解释，为何西方人也用 Kurtri 或 Kurtgy 来记

载这个部族。而且匈牙利民族有一个很大的姓氏 Kocsis(音“库车希”),匈牙利语中 *kocsi* 和 *kocsis* 两字,恰是“车”和“驾车人”的意思。这都证明了“高车”是一个“胡字”、“胡姓”、“胡部名”。

一般认为,高车是使用突厥语的部落,即匈奴的裔族。其实,匈奴是个血缘和语言极为复杂的部落联盟,“高车”是被它同化了的一个鲜卑部落。按《魏书·高车传》的“……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说法,“高车”的核心氏族“[厙]狄”、“袁纥”、“斛律”、“解批”、“护骨”等,大多源自于鲜卑系。

Utrighur 和“兀者”

Utrighur 是与 Kurtrighur 争斗不休的另一个重要的 Hun 人部落。Utrighur 显然是“Utri 部落”的意思。而通古斯部落名“兀者”、“兀惹”、“斡拙”可能就是这个西文族名字根 Utri 的源音。

“兀者”部落分布在从太平洋至乌拉尔山的广大地带,它们亦被称为“乌底改”、“兀的改”、“兀的哥”等。元代的“兀者野人”;明代的“野人女真”;清代的“窝集”;现代的“鄂伦春”、“鄂温克”,乃至“赫哲”族的祖先,都可纳入“兀者”的范畴。从旧俄时代的资料照片来看,鄂毕河流域的 Ostiak 和北极圈内外的 Ewenki 族居民的体态容貌和服饰起居,与我国鄂伦春或鄂温克族均极相似。

古代汉语中的“异”、“也”、“额”、“兀”等字互通。Utrighur 显然就是通古斯族名“兀的改”(Uti-gay),或“高车”族名“异奇斤”(Utri-gan)的变音。Hun 人部落 Kurtrighur 和 Utrighur 间的那种共生、互斗的无常关系,在蒙古高原上的影子部落“高车”和“兀者”间,可能也是屡屡发生的。

在匈牙利地区的 Hun 人和 Avar 人的墓地，出土了大量具有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体质特征的人类头骨，而通古斯特征的头骨又多见于 Hun 人的墓地，这是 Hun 人融有通古斯族血缘的重要线索。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还将发现通古斯的基本语词和常见人名，在 Hun 人名中，特别是阿梯拉家族中，有显著的反映。这是通古斯部落参与 Hun 人迁徙活动，且居领袖地位的证明。

三、Hun 人名与中国北方诸族人名之比较

姓名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辨析人类族源的重要依据；在语言资料有所缺失的情况下，它们也是语言研究的替代内容。《Hun 人的世界》是涉猎历史、考古、语言和人类学的重要著作。而该书“语言”一章的内容，几乎都是关于 Hun 人人名的讨论。其罗列的人名极其详尽，它们大多是 Moravcsik[35] 等学者，从 Ammianus、Jerome[36]、Jordanes、Priscus、Procopius[37] 等人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记载，及其他文种文献中汇集来的。

陈寅恪先生曾强调：“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也急待研讨”[38]。然而，中西“胡名、胡姓”的比较研究却很难实施，希腊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中文的史料，分别对于中西学者来说，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英文著作《Hun 人的世界》，集西方一百五十年研究之大成，无疑为中国学者的“胡名”比较研究提供了便捷之径。

东北亚民族的人名往往是些部落名；而部落或氏族的名字，则可能出自某个时代的某个强人之名[39]。这也就是氏族名与人名互通的原因。Hun 人似乎也循这种习惯。因此将 Hun 人的人名

与东北亚民族的人名和部落名进行比较，也是追溯他们东方族源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国史籍中的“胡名”，多是用历代北方汉语语音记载的。比较中西“胡名”，不仅是求证Hun人出自亚洲北方诸族的横向依据；而北方汉语的语音承继性，也可以从中得到纵向确认。

尽管西方学者在收集工作方面是细致的，然而他们对汉文史料，特别是对其中的“胡名”、“胡姓”、“胡部名”多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因此他们的探索方向也不都是正确的。对于西方史学的这一古老课题的浩繁内容和诸多歧见，既不可能也不必予以一一说明或辩驳，本作者只能怀着对前人的感激之情，利用他们的考撰和积累，着力阐发自己的见解了。

Ada-mis[40]

《元史》中以“阿答”、“阿塔”、“阿台”，即Ada为名者不可胜计。而“迷失”(mis)则是蒙古族男女名字常见的后缀。女子如《元史》有载“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宁宗后答里也忒迷失”、“显宗后普颜怯里迷失”等；男子如金帐汗国“脱脱迷失”者，及《元史》之“阿的迷失·帖木儿”等。

Ada-mis为一Hun人后宫侍者之名，它与“阿的迷失”的音值完全一致。

Aigan[41]

拜占庭统帅Belisarius麾下的一名Hun人骑兵指挥官。

史载，慕容廆庶兄土谷浑率部西迁后，慕容廆“追思土谷浑，作阿干歌，徒何以兄为阿干”[42]。可见“阿干”是鲜卑语的“兄”字

（通古斯—满语中“兄”为“阿浑”）。今甘肃兰州附近还有“阿干镇”和“阿干煤矿”，这些地名都是传承自土谷浑时代的。

Amba-zuka[43]

公元500年左右高加索地区的一名Hun人首领。

“按巴”（*amba*）是通古斯—满语中的“大”字。Zuka就是族名“如者”或“术甲”，Amba-zuka可能就是《新唐书·室韦传》记载的室韦部落名“大如者”。

蒙古语和突厥语中都没有*amba*一字，但却有人以其为名号。如蒙古部有“俺巴孩”者；克烈部有“扎阿—绀孛”（王汗之弟）者。波斯著作《史集》的作者说“绀孛”是西夏语中的“大”字，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蒙古人对*amba*一字之由来已不甚明白了，而西夏语与通古斯语倒是有关系的了。

Anagai[44]

Anagai是Hun人在亚速海东北的Utrighur部落酋长，575年时曾参与西突厥人进攻拜占庭人在克里米亚的城邦。中国历史上有个颇有名气“阿那瓌”（A-na-gui），他是复兴柔然汗国的一位可汗，552年柔然被突厥攻灭后自杀。很巧合，Hun人的Anagai，和柔然“阿那瓌”，竟都是欧亚草原两端同时代的两位历史人物。

Apsiq，Apsikal，Oebarsius[45]

Apsiq是580年时的一名拜占庭Hun人军官；Apsikal是出身于哥特人的拜占庭将领，其名却是一个Hun人的名字；Oebarsius则是阿梯拉的叔祖父。

它们与契丹人名“阿保机”,17 世纪蒙古土尔扈特部酋长名“渥巴锡”,可萨汗国可汗名 Obadiah 等都有关联。而清太宗皇太极(“阿巴嘎”)第四子之名“叶布舒”(Epsigh),与 Apsiq、Apsikal 或 Oebarsius 的音值则更为接近。

Atti-la(“阿梯拉”)

后缀-la 也在下文 Rugi-la 和 Tuldi-la 两个人名中出现,Rugi 和 Tuldi 分别是“如者”和“拓特”。Atti 本身则是个族名,唐代漠北有“阿跌”部落,蒙古人名“阿的”、“阿台”等都是这个族名。现代维吾尔族人名“阿的力”即是 Atti-la 或 Atti-li,“力”是男子之昵称。

西方历史曾将伏尔加河记为 Etil,《隋书》记为“阿得水”,《元史》则作“也得里”,它们也都是 Atti 或“阿得”的别用。

Basich 或 Bashiq[46]

公元 395 年时的一位 Hun 人首领。

它们与唐代漠北族名“拔悉密”之字根“拔悉”有关。

Bleda,Balas,Balaq[47]

Bleda 是阿梯拉之兄,本与阿梯拉共掌 Hun 人部落,后为阿梯拉谋杀。

《魏书·官氏志》有“拔列氏”的记载;同书《尒朱荣传》则有“敕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阳,荣并灭之”的记载。“北列”应是“拔列”的异译,它既出自敕勒,必是鲜卑姓氏。现代锡伯族的“巴雅拉”(ba-a-la)氏和维吾尔族的 Barat 氏,可能都与“拔列”同源。Bleda、Balas、Balaq 可能都是“拔列”的转音。

Buqa[48]

拜占庭统帅 Belisarius 的一名 Hun 人下属。

“不花”是蒙古语之“公牛”一字。蒙古男子以“不花”为名者太多。如忽必来孙辈中有“也速不花”、“口温不花”、“帖木儿不花”等人;汪古部有“爱不花”、“君不花”等。《Hun 人的世界》作者亦指出“不花”即是蒙古语之“牛”。

Dengizich, Denzic[49]

Priscus 记载阿梯拉有一子名 Dengizich;而 Ammianus 记载过另一个 Hun 人的名字是 Denzic。前者与蒙语字“腾格思”或“成吉思”非常相似;后者则与汉代鲜卑族领袖“檀石槐”之名完全一致。可惜西方学者中鲜有知“檀石槐”者,否则他们必然会对 Hun 人之祖源作更深层的考虑。

Edika[50]

阿梯拉的一个幕僚,地地道道的 Hun 人。

“阿济格”是通古斯语中的“小”,蒙古语和突厥语中均无此字。但满、蒙两族常用此字作男子名,意为“幼子”。15 世纪,金帐汗国有一位“阿济格汗”(Khan Edighe)。17 世纪时,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第十二子也叫“阿济格”。

“阿济格”和“按巴”(“小”和“大”)两字,都是通古斯语基本语辞。它们以 Hun 人的人名出现,证明通古斯民族是 Hun 人的重要的成分。

Hreka, Ereka[51]

Priscus 曾提及阿梯拉的长妻，东罗马使团曾向她赠礼。Priscus 一处将她的名字记为 Hreka，另一处则为 Ereka。两者应该同是通古斯语的“花”字 *ilga*（“依尔加”），现代锡伯族女子还常用此字为名。

在蒙古语、楚瓦什语、土耳其语中，“花”字是 *chichig*（“其其格”）；在维吾尔、西部裕固、哈萨克、吉尔吉斯等语言中则是 *gul*（“菇”）。因此我们可以确认 *ilga* 是一个通古斯语辞。阿梯拉的这位妻子，显然是出自通古斯语族。

Koursiq, Kursich[52]

公元 395 年时的一位 Hun 人首领。

“客失”，12、13 世纪时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部落名。9 世纪时的古 Magyar 部落名 Keszi，可能也与之有关。

Koutil-zis[53]

公元 555 年时的一名 Sabir 人。

Koutil 与“高车”同音，Koutil-zis 则与匈牙利姓氏 Kocsis 近似。

Mundzuc, Mundius, Mundus[54]

Mundzuc 是阿梯拉生父之名，Priscus、Jordanes、Theophanes 分别用希腊文、拉丁文，以相近的音符记载了这个名字。Mundius 则是 Attila 的一个后人；此人之孙名 Theudi-Mundus。

某些西方学者认为 Mundzuc 是一个哥特族人名。但《Hun 人的世界》的作者推算，阿梯拉的父亲当应出生于公元 374 年之前，

其时 Hun 人尚未与哥特人发生接触，故它不可能是个日耳曼人名。

Mundzuc、Mundius、Mundus 应同是通古斯族男子名“满柱”，明代“建州女真”著名首领即名“李满柱”，辽代则有契丹人名“买住”者。有人认为族名“满洲”是从“满柱”一字演变而来的[55]，事实上，“满洲”和“满柱”应该都是“靺羯”的异声。而 Theudi-Mundus 实为“拓特·满柱”，这种复合人名常见于金代女真人中。

Mouageris[56]

此人是 527 年时，在亚速海附近一个 Hun 人部落王子的名字。

此名应与“靺羯”或“勿吉”对应。北魏年间的“万俟氏”和“莫折氏”，元代的蒙古人名“马扎儿台”和“麻察”，满族姓氏“马佳氏”，匈牙利姓氏 Magyars 等，都是它们的异写。Hun 人有人以此为名，也是它融含通古斯成分的证据。匈牙利学者认为该字即是 Magyar（马扎儿），无疑是正确的。

Odolgan[57]

这是罗马边防军中的一名 Hun 人指挥官的名字。

此名应即魏姓“郁都甄”，契丹人名“胡突堇”，女真人名“温迪罕”，或“突厥”碑铭中的山名 Otukan（“于都斤山”或“乌都鞬山”）等。

西方学者对 Otukan 或“于都斤”一字有各种解释。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它是蒙古语的“地神”一字，伯希和认为它是突厥语中的“女神”一义；释通鄂尔浑碑文的汤姆逊却注意到：“Otukan 或

Utukan……常与 jys(山林)一字连用。"[58]

其实,《金史·金国语解》中"阿徒罕,采薪之子"的词条,便能使一切豁然开朗:Odolgan 或 Otukan 之本意乃"林木"或"木柴"也,为动词是"采薪"或"伐木",指人即是"樵夫"或"伐木者",作地名就是"多林木之地"了。此解还可有旁证:现代匈牙利语中"木材"一字正是 *ocska*.。

Ruga[59]

阿梯拉的伯父,东西罗马文献均有记载,亦作 Rugi-la。

"大如者"和"小如者"是唐代"室韦"部落名[60]。"术甲"则又是金代女真族"黑号之姓"[61]之一。"如者"或"术甲",可能是游移于"室韦"和"女真"之间的一个通古斯部落,故"其语言靺鞨也"[62]。"大如者"的通古斯语的说法,应是"按巴—如者",即 Amba-ruga,或前文的 Amba-zuka。

匈牙利姓氏 Rozsa 或 Jozsa 也可能与之有关。

Sigi-zan[63]

服役于拜占庭军队中的一个 Hun 人军官,出现在公元 491 年安提俄克城的"约翰"的记载中。

它的变音可能就是 Sigi-gan,即"厖狄干"。《北齐书》说:"厖狄干,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即:Odolgan),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污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64]高欢尊称其为"鲜卑老公"。这个"厖狄氏"应该是入主中原的一个鲜卑部落。唐代漠北的"思结"部,以及后来入主西亚的"塞尔柱"部,可能都是"厖狄氏"。

Simmas[65]

一名拜占庭军队中的 Hun 人军官。

Simmas 应即魏姓“乞伏氏”，或后期契丹大姓“萧”的原音“石抹”。北魏契丹有“悉万丹”氏，室韦有“深末怛”部，唐朝回纥中有“奚邪勿”氏，现代匈牙利也有 Szima 氏。“乞伏”、“悉万”、“深末”、“奚邪勿”和 Szima，统是“石抹”之转音。究其源，东胡之裔也。

元代有聂斯脱里派教士“扫马”（Sauma）者，他和“马忽思”两人去耶鲁撒冷朝圣，因战乱滞留中东。伊利汗阿鲁浑曾数次派他出使西方，成功地进行了一些外交活动，深受波斯蒙古汗庭的器重[66]。我猜 Sauma 即是“石抹”。

Souni-kas[67]

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 Hun 人之名。

Souni-kas 可能是鲜卑式的部落名“苏尼骨”或“苏尼纥”之转，即后来《蒙古秘史》和《史集》记载的蒙古部落名“雪你惕”[68]。今天在内蒙二连浩特地区还有左、右两个“苏尼特旗”。

《晋书》有“武帝践阼（司马炎篡政）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馀落归化”[69]的记载。文中“塞外匈奴大水”是说“塞外匈奴地方发大水”。塞外可能发大水的，惟河套地区。那时“塞泥”、“黑难”部落已经居住在那里，“塞泥”可能就是后来的“雪你惕”。

Tourgoun[70]

6 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中的一支以 Vitalian 为首的起义军的成员。

Tourgoun 应该是“屠各”和“独孤”的对音。当年“屠各”氏曾是匈奴的单于家族[71]。《魏书·官氏志》则有“独孤氏后改刘氏”的记载,至隋唐两朝,“独孤氏”仍很显贵。著名将领“独孤信”,既是北周明帝宇文毓和隋文帝杨坚的岳父,也是唐高祖李渊的外公。唐代还有著名文士“独孤及”等。

匈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民族大熔炉,它融含了后世所谓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的诸多部落,有人认为“屠各”和“独孤”是“东胡”的源音。

Tuldi-la[72]

公元 458 年,西罗马皇帝马约里昂(Majorian),曾企图依靠一支种属庞杂的异族雇佣军,去抵抗入侵的汪达人,Tuldila 即是这支部队的一名 Hun 人统帅。

略去添缀-la,得其字根 Tuldi。隋唐年间靺鞨酋长名“突地稽”;金代女真姓氏“拓特”;元朝“脱脱”之人;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匈牙利姓氏 Toth 等,都是 Tuldi 的转音。

Uldin, Uzin-dur[73]

将 Uldin 或 Uzin 译成“乌金”或“乌真”最合适,鲜卑—蒙古人名或职称以“真”音结尾者甚多。《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记载的鲜卑族人名“无臣氏”,和《魏书·蠕蠕传》记载的柔然人名“予成”等,都是 Uldin 或 Uzin。

Uldin 和 Uzin 的字源很象是族名“兀者”,或是通古斯语的

“头”字“兀术”(读作 uzu 或 uju)。后缀-dur 则是“咄”,即是室韦语的“酋长”。

Zaber-gan[74]

公元550—560年间,Hun 人 Kurtrighur 部的一名酋长。

Zaber-gan 应同“哲别干”。蒙元早期有重要将领名“哲别”者。

Zerkon[75]

阿梯拉帐幕中的一位弄臣。

“察罕”(*zagaan* 或 *chagaan*),是蒙古语以及通古斯语中的“白色”一字。蒙古人以“察罕”为名者甚多,著名者有如“察罕·帖木儿”等。

上述的人名研究表明:4、5、6 世纪时,Hun 人及其生活在南俄草原上的同类,都是中国北方民族的同类。这些比较研究对西方学者来说,或许是太过艰深了;然而,西方传教士对 13 世纪蒙古人的生活方式的描述,亦多未引起研究 Hun 人的学者的注意和征引。如东罗马使臣 Priscus 记载[76]:

> 在 Hun 人的村落中,招待我们的食物是被当地人称为 *medos* 的小米饭(millet),而不是玉米[77](corn),喝的是一种被野蛮人称为 *kamon* 的,大麦制成的饮料。

大概是因为 *kamon* 中含酒精的缘故,因此喝醉了的 Priscus 把它当

作是一种啤酒类饮料了。马可波罗也有关于这种饮料的记载[78]：

> 他们饮马奶，其经制作后，质味均类白葡萄酒，其名曰 *kemurs*。

鲁布鲁克则用了一段不小的篇幅，来介绍蒙古人制作饮料 *kosmos*（忽迷思）的方法[79]。连当事的 Priscus（一个头脑极清楚的政客兼学者），都已经说明白该字是一个“野蛮人”的用语。然而西方学者，却偏偏要求证它是个日耳曼语或伊里利亚语之类的印欧语言的词汇。

我想，如果大家都能对中西史料兼加用心，摈除这些本不该发生的错误，关于 Hun 人语言和族源的研究，则不难步入正确的方向。

四、结束语

在过去的三千年中，亚洲北方诸族对东西方文明施加了巨大的冲击。这因此也激发了人类、语言、历史科学，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兴趣。遗憾的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他们的记载都是极端不足的，这又使得我们强烈的历史认知的使命感，面临着无可比拟的困难和挑战。

在浩瀚的中国历史记载中，关于曾几度统治中国的北方民族的人文—语言的内容，显得相对不足。西方人于此也啧有烦言，《剑桥中国史》的一位专论作者说[80]：

> 传统的中国史家对外族的记载，不注重其人种和详述其族类，而是注重外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外族人受到关注，或是因为它们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声望，或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威胁到中国的统一。

这些对于东方世界的自我中心的批评，无疑是中肯的。然而，西方人对异族的记载，可能做得比中国传统史学更差。无论是罗马还是波斯、阿拉伯，对不断入侵的亚洲游牧部落，都没有象样的人文、语言的记载。对曾经破坏过罗马帝国的“声望”，和威胁到西方社会“统一”的 Hun 人，以及先后来到欧洲的 Cimmerian、Scythian、Sarmata、Avars、Khazar、Magyar 人的族源和语属，至今仍是一片迷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若不求助中国史料，几乎是无望的。

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的事实，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这个无法抱怨的现实，也为我们预留了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力的广阔空间。其实，“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精确地重现了。历史科学的使命，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真实过程。

一些主观上的原因，也导致了人们在关于 Hun 人族源的研判上失准。首先，基于“Hun 人即匈奴”说法的影响，学界预先就设定了它是一个“突厥语民族”的出发点。而象“高车”、“回纥”这样一些重要民族的“鲜卑”祖源，却又被完全忽略。这都致使突厥语民族及其语言的作用有被无限夸大，而鲜卑族和通古斯族的影响有被完全埋没的倾向。其次，由于“白人至上”的心理阴影，又

使某些学者有掩盖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亚洲的偏向。

遗憾的是,由于百年贫弱,我国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西学结论者多。历史、语言、民族学的研究,则在"传统的"和"别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作咀嚼式的考据。而今西方学界急功近利,"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者也不乏人在。特别是一些并非成熟的"语言学理论",竟成了大棒。以致我国相关学界陷于一种"不敢想、不敢说"的沉闷局面,那些本该由中国历史作出某些判断的重大课题,却都谦让给洋人们去胡说了。

本文尝试以姓名、族名为主体的语言线索来证明:"鲜卑系"部落和"通古斯系"部落,可能是 Hun 人集团的主要族源。但由于 Hun 人与"阿兰人"和"哥特人"之间,有着很多很长的交往历史,所以有一些西方学者,比较偏向于探索 Hun 人语言与波斯语,或日耳曼语之间的关联。而本文则强调 Hun 人语言中的"鲜卑语"和"通古斯语"的基本内涵。当然,在从兴安岭到莱茵河的遥遥征途中,印欧人种的血缘和语言的不断融入,无疑是不可避免的。

就如不能说一条大河的水是从哪一条支流来的一样,我们关于 Hun 人祖源的结论也只是:他们最东方的源头,是满蒙地区的"鲜卑"和"通古斯"部落。关于 Hun 人就是西迁的"北匈奴"人的说法,则是不够准确的,但又是伟大的"启蒙性"的猜测。

注释

[1]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enguin, 1986, pp. 410—443.

按:Ammianus Marcellinus (330—395)是一位希腊军官,

生于今叙利亚滨海城市安提俄克(Antioch),他也是一位用拉丁文写作的业余史家,立志要继承塔西佗(Tacitus)的工作,完成记载自公元96年以后的历史。他的《后期罗马帝国》一书共三十一章,前十三章失佚。存馀的十八章只记述了公元354—378年的二十五年间的历史事件。

[2] E. A. Thompson, *The Hun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ishers, 1996, pp. 28—29.

[3] Priscus, "Negotiating and Dining with Attila", in D. W. McCullough ed., *Chronicles of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p. 163—164.

摘自 Priscus,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translated by J. B. Bury, London, Macmillan, 1923.

按:Priscus,东罗马政客兼史家,公元449年以幕僚身份参加外交使团,受 Theodosius 二世的派遣去见 Hun 人酋长阿梯拉,参与了许多交涉和宴请活动,对阿梯拉本人极其家属均有亲眼目睹。他的希腊文著作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4]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1973, pp. 40—72.

E. A. Thompson, *The Hun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ishers, 1996, pp. 34—35.

按:入侵中近东的事件 Thompson 认为是发生在415—420年间。

[5] 《金史·金国语解》,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892。

曰:"按答海,客之通称"。许多女真人以此字为名。现代满语和锡伯语"客人"均同此字。匈牙利语"客人"vendeg,系 endeg 前缀 v 构成。东哥特一头人名 Andag,自是得自通古斯

语的影响,亦显示哥特人与 Hun 人血缘的融合。

[6]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页 112 。

[7] Jordanes, "A Goth's Biography of Attila", in D. W. McCullough ed., *Chronicles of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p. 166—171.

摘自 Jordanes, *The Origins and Deeds of the Goths*, translated by Charles C. Mierrow,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15, New York reprint 1960.

按:Jordanes,公元后 6 世纪中叶欧洲史家,可能是多瑙河下游地区的一个哥特人,他的主要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哥特人的祖源和历史》。"A Goth's Biography of Attila"摘自于该书,内容是哥特人对阿梯拉的往事追忆。

[8] E. A. Thompson, *The Hun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ishers, 1996, p. 145.

按:荷诺丽娅(Honoria),罗马皇帝瓦棱丁三世(Valentinian III)的姐妹,她情绪不稳且婚姻不幸。传言她为管家欧根纽斯(Eugenius)所诱而怀身孕,奸情泄露后,欧根纽斯被处死;她被迫与富有而无野心的参议员赫库拉乌斯(Herlacunus)定婚。她无法忍受而决心挣脱这种悲惨命运。公元 450 年,她派亲信传信并带了一个戒指给阿梯拉,请求他将她从这场不幸的婚姻中解救出来,并愿意以重金报赏。当然,阿梯拉可以认为这是她向他求婚的表示。

[9] E. A. Thompson, *The Hun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ishers, 1996, pp. 160—161.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 76.

[10] E. A. Thompson, *The Hun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ishers, 1996, pp. 167—175.

[11]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 79.

[12] 同上,p. 85.

[13] Jordanes, "A Goth's Biography of Attila", in D. W. McCullough ed., *Chronicles of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p. 165—166.

[14]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页 607—615。

[15] M. Deguignes, *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 des Turcs, et de Mongols*, *1*, Paris, 1756, pp. 325—326.

[16] E.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ited by J. B. Bu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5, pp 801—806.

[17] 齐思和《匈奴西迁极其在欧洲的活动》,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页 145。原载《历史研究》1977 年第 3 期。

[18] J. B. Bury, *Invasions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London, 1928, p. 48.

[19] E. A. Thompson, "Huns",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62, 9, p. 876.

[20] 齐思和《匈奴西迁极其在欧洲的活动》,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21] 周连宽《丁零的人种和语言极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页 55—85。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57 年第二期。

[22] Gy. Moravcsik, *Byzantinoturcica* 2, Berlin, 1958.

[23]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1973, pp.

376—443.

[24]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25—27。

[25]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South Russian Steppes",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61—263.

[26]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p. 176—177.

[27] S. Evans, *A Short History of Bulgaria*,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60, pp. 28—30;
《保加利亚简史》,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页38—42。

[28]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室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176。

[29] P. Golden, *Khazar Studies*, Budapest, 1980, pp. 30, 34—36.

[30] P. Golden, *Khazar Studies*, p. 35;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South Russian Steppes",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59—260.

[31] V. Shnirelman, *Who Gets the Past?*, Washinton D. C., Woodrow Wilson, 1996, p. 32.

[32] Gy. Nemeth, *A honfoglalo magyarsag kialakulasa*, Budapest, 1930, pp. 183—186;
S. Patkanoff, "Uber das Volk der Sabiren", *Keleti Szemle*, 1900, No. 1, pp. 258—277.

[33] 现代楚瓦什语中的鲜卑—蒙古语成分是很广泛的,例如:

汉语	楚瓦什语	蒙古语	突厥语
花	checheg	tsetseg	gul

门	alak	haalaga	eshik
石头	chul	tsuluu	tash
公牛	vakar	buqa(不花)	okuz
冬天	hel	evel	kish
乳房	kakar	kherkh	gogus

[34] 《魏书》卷一百〇三,《高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308。

[35] Gy. Moravcsik, *Byzantinoturcica* 2, Berlin, 1958.

[36] Jerome, Saint(348—420),生于达尔马西亚(Dalmatia,今罗马尼亚南部)的Stridon城。他的主要著作是记载古代事件的*Cronicle*(《编年记》),和为圣徒列传的*De Viris Illustribus*,均为拉丁文。

[37] Procopius,大约是500年至562年的人,生于今以色列的Caesarea Maritima地方,他的主要著作有*The History of the Wars of Justinian*八卷,和以追求细节著称的*The Secret History*一书,均以希腊文写成。

[3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242。

[39]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979。曰:"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

[40]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1973, pp. 380, 412.

[41] 同上, p.412.

[42] 《魏书》卷一百一,《吐谷浑传》,页2233。

[43] 同[40],p.390。

[44] 同[40],p.413。

[45] 同[40],pp.418—419,422。

[46] 同[40],p.406。

[47] 同[40],pp.387,390,414。

[48] 同[40],p.414。

[49] 同[40],p.407。

[50] 同[40],p.388。

[51] 同[40],pp.408,409。

[52] 同[40],p.422。

[53] 同[40],p.409。

[54] 同[40],p.409。

[55] 莫东寅《满族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79 重印,页 77—78。

[56] 同[40],p.418。

[57] 同[40],p.418。

[58] 波塔波夫《古突厥于都斤山新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附录》,中华书局,1998,页 231—247。

[59] 同[40],p.389。

[60]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室韦传》,页 6176。

[61] 《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页 1230。

[62] 同[60]。

[63] 同[40],p.420。

[64] 《北齐书》卷十五,《厙狄干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197。

[65] 同[40],p.420。

[66]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页 108—146。

[67] 同[40],p.42。

[68]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页 159—164。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 54—59。

[69] 《晋书》卷九十七,《四夷·北狄·匈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2549。

[70] 同[40],p.421。

[71] 同[69],页2549。

曰:"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

[72] 同[40], pp. 405,422—423。

[73] 同[40], p. 422。

[74] 同[40], p. 392。

[75] 同[40], p. 424。

[76] Priscus, "Negotiating and Dining with Attila", in D. W. McCullough ed., *Chronicles of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 155.

[77] 按:玉米是美洲发现后,传入欧亚大陆的粮食作物。4、5世纪时,似不应有玉米的可能性,Priscus所说的corn,可能另有所指。

[78]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 Marsden,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48, p. 84;
《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页82;
王迅、苏赫巴鲁《蒙古族风俗志》上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页22。

[79]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等译,中华书局,1985,页214—215。

[80] 傅海波等编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52。

嚈哒与吐火罗斯坦诸族

在4、5世纪时达到高潮的,“匈人”(Huns)集团对罗马、波斯和印度等文明世界的入侵,是人类历史上较早有记载的陆际征服活动。其实,公元1世纪开始的以“拓跋鲜卑”为首的北方诸族对中原的入侵,也是这次征服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几乎把中华、罗马、波斯和印度帝国尽数颠覆。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运动,端始于大兴安岭两侧的“鲜卑”民族,和一些“通古斯”部落。他们在征服了“匈奴”后,便开始朝中国内地、欧洲以及中亚、南亚地区进发。

4世纪70年代,入侵中亚的那支“匈人”进入河中地区(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420—438年间,他们西犯波斯“萨珊王朝”,但被击退。接着他们南下入侵“吐火罗斯坦”,逐灭了“大月氏”人所建立的“贵霜王朝”。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他们和波斯帝国进行了互有胜负的长期战争;同时又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征服了喀布尔河流域的“乾陀罗”诸国,开始了与印度“笈多王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就连中原皇朝的传统领地,天山南北两侧也都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6世纪中,他们被异军突起的“突厥汗国”和宿敌“萨珊王朝”联合击灭。[1]

对于这个叱吒了两百年的中亚民族,东西各方历史多有记载。西方史家 Procopius 称之为 Ephthalitai Huns[2],Agathias 称之为 Nephthalitai[3],而 Theophylact Simocatta 记其为 Abdelai[4],印度古

文献则直呼他们为“匈奴”(Huna)或“白匈奴”(Sita Huna)。无论从时间、空间和史实来看,他们一定就是中国历史所记载的那个叫做“嚈哒”的民族。《魏书·西域传·嚈哒》说:

> 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通典·边防九》补曰:至文成帝时已八九十年矣]在于阗之西,都乌许水南二百馀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风俗与突厥略同。……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众可十万。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自太安(455—459)以后,每遣使朝贡。……永熙(532—534)以后朝献遂绝。

如果《魏书·高宗纪》关于“嚈哒”首次遣使是在太安二年(456年),和它脱离阿尔泰山地区的时间“至文成帝时已八九十年矣”的记载都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推算出“嚈哒”西迁中亚的时代,大概是在公元366—376年间。再对照西方关于Hun人在374—376年渡伏尔加河、顿河的记载,“嚈哒”和Hun人迁离蒙古高原,似乎都应该与4世纪中叶“柔然汗国”的崛起有关。如果上述假设正确的话,这两路“匈人”就应该有着相同的出源,和类似的部落成分。

“嚈哒”民族所聚居的今阿姆河两岸阿富汗、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等国的部分地区,亦被称为“吐火罗斯坦”,汉代西域族国名“大夏”或“大宛”,都与“吐火罗”有关[5]。公元前130年“大

月氏”在“吐火罗斯坦”建立的“贵霜王朝”，公元1世纪时曾扩张为南亚强国之一，在波斯“萨珊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兴起后，它才逐渐萎靡。在“嚈哒”到来之前，“贵霜王朝”仍据有今白沙瓦、喀布尔、昆都士、巴里黑以及阿姆河两岸的地区。被征服了的“大夏”好象也一直与“大月氏”相安无事。直至北魏和大唐年间，还有“吐火罗”朝贡的记录[6]。

由于这块古代属于印欧人种的土地上，曾经有过容纳来自北方草原地带的“吐火罗”和“大月氏”人的历史，可能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种属相似，中国历史常常将“嚈哒”、“大月氏”和“吐火罗”搅和在一起。《魏书》就有“嚈哒”既是“高车之别种”，又是“大月氏之种类”的抵触之说。《新唐书·西域传》说：

> 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水之南，古大夏地。与挹怛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颇黎山，其阳穴中有神马，国人游牧牝于侧，生驹辄汗血。其王号叶护。武德、贞观时再入献。
>
> 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兰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嚈哒，王姓也，后裔以姓为国，讹为挹怛，亦曰挹阖。俗类突厥。

尽管上述记载不乏含糊其词，但“嚈哒”、“吐火罗”和“大月氏”显然都是“俗类突厥”的蒙古人种民族；只是到了唐代，它们已经很难加以区分了。

20世纪初，由于流行于古代新疆地区“吐火罗语”[7]文献的发现，和它的印欧语言属性的确证，有些西方学者提出“月氏”就是

使用和传播这种语言的民族，而且连“乌孙”、“塞种”也都被推定为印欧人种了；这也就使西域地区的人类、语言研究面对极为复杂的局面。20 世纪下半叶，在同一地区出土了大量的上古欧洲人种干尸后，中亚地区的早期人种归属已趋明朗，蒙古人种迟于印欧人种到达亚洲中部的事实，已不容怀疑。从东方去寻找“吐火罗语”载体民族的理论需求也就不复存在，当然这也为研究“月氏”等民族的族源创造了客观的学术气氛。本文目的是解析 4 至 6 世纪“嚈哒”民族的成分，但某些结论或许有幸能为举世瞩目的“大夏”和“月氏”，即“吐火罗斯坦诸族”的族源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用的依据。

一、“高车”民族之解析

既然有谓“嚈哒”是“高车之别种”，认识高车民族自然是我们这个研究课题的出发点。事实上，族名“高车”不仅出现在中国历史中，西方世界也早就有关于不同时期高加索—黑海地区的 Colchi[8]、Kurtri-ghur[9]、Kurtgy-mat[10]等游牧部落名的记载。现代中外学者几乎都一致地认为，高车是个“突厥语族”的部落[11]，即匈奴的裔族。其实，有许多证据可以说明，高车是一个以鲜卑部落为主体，融含广泛的漠北部落联盟。《魏书·高车传》最早记载了它的别号和内涵：

> 高车，盖古赤狄之馀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

奇斤氏。

……

高车之族，又分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赤狄”、“狄历”、“敕勒”、“丁零”等都被指为“高车”的别名，可能是因为它们也曾是漠北的霸主。而高车的这个“六氏、十二姓”，则为解析它的族源提供了重要判据。我们曾经多次认证过：“狄”即“厙狄”（有人说它是“赤狄”的异声[12]）；“护骨”和“袁纥”则同是“回纥”；“斛律”即“乌洛侯”，或先秦之“山戎”；“解批”音“懈批”，就是“鲜卑”。它们都是一些东胡—鲜卑系民族的部落。而“异奇斤”则是通古斯族名“兀者”或“兀的哥”的变音。而那“十二姓”，大多也可识得它们的族名之源：

“泣伏利”　即“乞伏”或“悉万”，鲜卑部落名；
“莫允”　即“慕容”，鲜卑部落名；
“乞袁”　即“室韦”，鲜卑部落名；
“乙旃”　即“爱新”的转音，通古斯部落名；
“阿崙”　亦“爱新”之转音，通古斯部落名；
“右叔沛”　疑为“右沛叔”之误，“阿巴嘎”之转音，通古斯部落名；
“副伏罗”　即“覆罗”；
“吐卢”　即“同罗”或“吐如纥”。

中国北方游牧诸族通常被认为是匈奴—突厥系，或东胡—鲜卑系民族；而它们中的通古斯民族血缘，却从来没有被历史学、人类学及语言学学者注意过。因此，剖析高车民族的通古斯成分，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源自通古斯民族的“阿巴嘎”部落，与“嚈哒”民族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阿巴嘎”，是通古斯—满语的“天”字[13]，它是女真民族的一个重要姓氏[14]。漠北和中亚的游牧族名“乙弗”、“悦般”、“阿伏干”（亦作“阿伏于”）、“阿布思”、“阿勿嘀”，或远徙中欧的 Avars 部落之名等，都是它的变音。北方诸族的人名“阿伏至罗”、“阿保机”、“渥巴锡”、“叶布舒”等，则都可能是由它衍生出来的。

西方学界认为 Avars 是西逃的“柔然”部落[15]，马长寿先生说“阿伏干”是个“柔然”姓氏[16]；E. H. Parker 有联系族名“悦般”和 Avars 的卓识[17]。在今天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也都可以发现“阿巴嘎”氏族的踪迹：内蒙有“阿巴嘎旗”；哈萨克族有“阿巴克部”；格鲁吉亚国西北有五十万人口的 Abkhaz 族。中西伯利亚则有一个“阿巴坎”（Abakan）地方，居民使用一种所谓突厥语的“阿巴坎方言[18]。唐书记载当地土著因善用滑雪板，而被称为“木马突厥”，属下有“都播”、“弥列哥”、“俄支”氏族[19]，即是“图门”、“靺鞨”、“兀者”部落，这些族名都揭示了这个地名的通古斯属性。

“高车”姓氏“乙旃”（a-zan）和“阿崙”（a-run），正是“爱新”的实际读音；通古斯族名“爱新”和匈牙利姓氏 Arany（“阿伦泥”）一样都是“金”的意思。在中国历史上，女真人建立过“金朝”；“爱新氏”又是满清皇族，因此在中原民众心目中，“金”也就成了通古斯民族的代名词。

其实,中国古籍中很早就有"金"和"天"部落的记载,《左传·昭公元年》说"昔金天氏有裔子日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允格"和"台骀"正是满语的"兄"(*agu*)和"弟"(*deote*)。这个"金天氏"可能就是"爱新"和"阿巴嘎"部落的祖先,看来它们是从中原出走的。

通古斯民族的西迁活动从未被学界关注过,人们根本没有设想过古代族名"月氏"、"乌孙"、"悦般"就是"兀者"、"爱新"、"阿巴嘎";而"月氏"和"乌孙"是印欧人种的假设,倒被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接受了。北方诸族的血缘是在不断地融合,它们的语言也随着这种融合而互相渗透转化。通过对"高车"民族的部落内涵的识别,将为澄清许多历史现象和鉴别北方游牧诸族的族源,一如"嚈哒"之为"高车之别种"的验证,提供对照。

二、"嚈哒"确为"高车之别种"

《魏书》首先记载了"嚈哒"(拟音 an-da)之名。在与"高车"相关的中国历史记载中,都没有相近的部落名。惟明清之际的满蒙部名"安达尔奇"(Andargi)[20],和希罗多德记载的 Scythian 部落名 Androphagi[21],似与之有关。

据《宋云行纪》[22]记载,他于公元 519 年八月初入葱岭,沿瓦罕河谷西行。九月中旬抵"钵和国",十月初至"嚈哒国"。前者"高山深谷,险道如常",大概是在"巴达哈伤"东部山区;后者"土田庶衍,山泽弥望",则应在"阿姆河"以南的平坦地带。宋云本可迳去"乌场国",但绕道先去觐见了"嚈哒王"。7 世纪中,唐僧玄奘在归国途中,自喀布尔北翻越"大雪山"进入"睹货逻国故地",

他所见到的第一个部落，便是“安咀罗缚国”，从地望上来看，很象就是宋云到过的“嚈哒国”。而“安达尔奇”和 Androphagi，可能就是“安咀罗缚”的源音。

南朝历史《梁书》把“嚈哒”记为“滑国”，该书《滑国传》说[23]：

>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至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其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

该传的其他内容与《魏书·嚈哒传》基本一致。而“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的记载，却点明了“嚈哒”的语属。所谓“河南人”，即鲜卑系的“吐谷浑”部落[24]，它的今世后裔甘青“土族”自称“白蒙古”，操一种典型的蒙古语[25]。据此可以推定“嚈哒”的语言也是某种“鲜卑语”。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则记有一个“活国”，该国于“安咀罗缚国”西北，间隔一个“阔悉多国”，该书云：

> 活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馀里。国大都城周二十馀里。别无君长，役属突厥。土地平垣，谷稼时播，草木荣茂，花果异繁。……其王突厥也，管铁门以南诸小国，迁徙鸟居，不常其邑。

历史上，“护骨”或“回纥”也被称为“滑骨”[26]，这个“活国”必定就是“滑骨”或“滑国”，它在灭国后仍挟有“管铁门以南诸小国”

的馀威。从所描绘的地形植被来看,它应该在阿姆河南的平原地带;现在"昆都士"附近有地名 Warwaliz[27],可能就是这个"回纥"或"活国"之名的遗存。

西方历史则将"嚈哒"记为 Ephthalitai 或 Abdelai,它们最可能是通古斯部落名"阿巴嘎"的变音。可相比较的类似的部落名是《魏书·西域传》记载的:

> 悦般国,在乌孙西北,……风俗言语与高车同。
> 阿弗太汗国,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
> 阎浮谒国,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

《梁书·诸夷传》记载了一个名为"呵跋檀"的"滑旁小国","阿弗太汗"和"呵跋檀"之名酷似 Ephthalitai。《梁书》该传还说"凡滑旁之国,衣服容貌皆与滑同"。这无疑也告诉我们,它们都是与"回纥"同类的民族。

《宋云行纪》则有一个部落名"业波罗"的记载:

> 乾陀罗国,土地亦与乌场国相似,本名业波罗国,为嚈哒所灭,遂立特勤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种,崇奉佛教,好读经典,忽得此王,深非情愿,自恃勇力,与罽宾争境,连兵战斗,已历三年。

文中"为嚈哒所灭"的是南亚古国"乾陀罗",而那个嚈哒入侵部落之"本名"才应是"业波罗"。它可能是从"高附"出发,进据了咫尺之遥的"乾陀罗"。

“阿弗太汗”、“呵跋檀”、“业波罗”之音，都在 ae-ph-th、a-b-t 或 e-b-l 间。Ephthali-tai 就象蒙古式部名“阿弗太汗·惕”，而 Abdelai 则象“业波罗”。以这些与“阿巴嘎”相关的部落名来记载“嚈哒”，可能是因为它们一度曾为这个部落联盟之盟主。它们也可能是最善战部落，在波斯战场上的冲锋陷阵，使它们名扬西亚；后又坐镇乾陀罗，主导印度方面的攻略。所谓“与罽宾争境，连兵战斗，已历三年”，也只是宋云所得知的一段近期的小战事而已。

13 世纪时，还有“阿巴嘎”的后裔部落存活于中亚地区。《元史》就有“可弗叉国唯算端罕破乃满国，引兵据捋思干，闻帝（成吉思汗）将至，弃城南走，入铁门，屯大雪山，……遂奔印度”的记载[28]。中亚大族之名“钦察”也就是“可弗叉”；波斯著作《史集》说它就是“合不黑”（当即“阿巴嘎”）的转音[29]。

东西方历史关于“嚈哒”的多个名字的记载，反映了它是一个内含相当复杂的民族集团，其中祖源鲜卑的“护骨”（“回纥”），和通古斯系的“阿巴嘎”部，是它的核心或主力。在“匈奴”已灭而“突厥”尚未兴起之时，“高车”几乎是漠北诸族的一个通称。因此，用“高车之别种”来描述来自蒙古高原的“嚈哒”诸部，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族源概括。它征服了“吐火罗斯坦”的诸族，侵犯周边的文明社会，但最后又被更凶悍的同类征服了。它在中亚、南亚和近东地区风光了近二百年的时间，也必然留下了它的裔族和遗迹。因此，我们不妨展伸它的时代和空间，以更宽广的视角，来进一步解析“嚈哒”的种族内涵。

三、“嚈哒”人名或称号之剖析

尽管“嚈哒”的语言资料非常缺乏，但历史毕竟还是留下了若干“嚈哒”的人名和族名，从中还是可以嗅出它的语源信息。

《梁书·诸夷传》关于“其王厌带夷栗陀”的记载，或许能为追溯“嚈哒”之名的由来提供一些线索。这个人名其实可以析作三个部分：“厌带·夷栗·陀”。我们猜测它们就是“嚈哒·伊利·咄”。其中，“咄”应即鲜卑一室韦语酋长之号。“伊利”则可能是鲜卑语之“自由”一字，现代蒙语和楚瓦什语该字皆为 *irek*(*h*)；但若干突厥语的“大”字亦作 *iri*。因此，“厌带夷栗陀”可能是“嚈哒自由之酋长”，或“嚈哒大酋长”的意思。

从印度历史和出土的“嚈哒”印章可知，5、6 世纪之交“乾陀罗”地区“匈人”的首领名“头罗曼”(Toramana)和“摩醯逻矩罗”(Mihirakula)。Toramana 应即“万”字 *torman*。。匈奴有“头曼单于”；突厥“伊利可汗”亦名“土门”；远东有“图门江”，那里出过一个“图门”部落。Mihirakula 则可拆作 Mihira 和 kula 两部分，前者可能是族名“靺鞨”或“密须”，后者则是靺鞨语中之“王”字“基”，或匈牙利语中的 *kiraly*。“摩醯逻矩罗”可能就是“靺鞨王”或“密须王”。

在出土的“嚈哒”钱币上，镌有王名 Akun、Hephtal、Katulphe 等。其中，Akun 显然是鲜卑语的“兄长”——“阿干”一字；Hephtal 即族名 Ephthali。与 Katulphe 之名相似，西史还记有一嚈哒人 Katoulphos 者，他因嚈哒王夺妻而投奔突厥；后来又亡命波斯，反对突厥，唆使波斯国王焚烧粟特商人的丝绸，最后竟导致突厥使臣被谋

杀而致使两国交恶。Katulphe、Katoulphos 当是女真、蒙古人常用的名字“忽都忽”或“胡土虎”。

这些入侵印度的异族人中有通古斯部落，也有若干旁证。如建于457—458年的印度朱纳格尔（Junagarh）石刻铭文，曾提到过被笈多王朝击败的一支 Mlechcha 人[30]；《续高僧传·玄奘传》中又曾提到“自斯地（迦毕试）北，民杂胡戎；制服威仪，不参大夏，名为边国蜜里车类”。“胡”者，印欧人种的土著居民；“戎”者，蒙古人种的北方诸族。而这个“蜜里车”或 Mlechcha，显然即是通古斯部落名“蔑里乞”。

波斯文献中也有“嚈哒”人名的记载。在以内容丰富、故事传神著称的《太伯里史》[31]中，有关萨珊王朝“卑路斯”、“居和多”、“库萨和”祖孙三代帝王事迹的文字，曾涉及到四个“嚈哒”人名和称号：

> 当卑路斯的帝国兴盛，帝位稳固，镇压了各种敌人，并筑成了三座城堡以后，他率领军队前往呼罗珊同嚈哒王伊赫申瓦尔（Ikhshanwar）作战。伊赫申瓦尔听到他前来攻打的消息，十分恐慌。
>
> 居和多逃跑了。后来，他侨居在嚈哒国，以争取嚈哒国王派军队支持他。此后，他同反对和废黜他的人打了仗。初抵嚈哒国时，他寄居在嚈哒首领艾白尔舍赫尔（Abarshahr）家中，此人有一个女儿，名叫穆耳绥尔（Mu‘sir）。他同库萨和·阿奴细尔旺的母亲［穆耳绥尔］结婚了。阿奴细尔旺在他的这次流亡期间［出生］。居和多带着儿子阿奴细尔旺及

其母亲结束流亡生活归国了，在他的兄弟贾马斯卜篡夺帝位六年之后，他推翻了贾马斯卜。

Sinjibu 可汗是突厥最坚强、最勇敢的人，他拥有突厥人中最强大、最众多的军队。他毫不惧怕兵多师盛的嚈哒人，与他们的国王斡兹尔(Wazr)作战，终于将嚈哒王及其全部兵众杀死。虏获了他们的钱财，占领了库萨和所占以外全部嚈哒国土。

上述的历史说的是：波斯王“卑路斯”曾与嚈哒王“伊赫申瓦尔”相战，卑路斯战败身亡。其子“居和多”因内争而曾避居嚈哒国，并与酋长“艾白尔舍赫尔”之女“穆耳绥尔”结婚，生子“库萨和”。及库萨和成年继位后，颇具谋略和大志，为复兴波斯而远交新兴的“突厥汗国”，攻灭了近敌“嚈哒”。在战争中，突厥可汗 Sinjibu(沙畹说他就是西突厥“室点密可汗”)勇杀嚈哒王“斡兹尔”。

人名“伊赫申瓦尔”(Ikhshanwar)可析作“伊赫·申瓦尔”，即 ikh Shanwar。*ikh* 或“伊赫”，也作“也客”，蒙古语之“大”字；“申瓦尔”或 Shanwar 即是“室韦”之音，东北亚民族常以部名为人名，“伊赫·申瓦尔”即是《北史》记载的族名“大室韦”。“艾白尔舍赫尔”(Abarshahr)应该是北方诸族常见人名“阿保机”、“渥巴锡”、“叶布舒”之转写。“穆耳绥尔”(Mu‘sir)应是“密昔儿”或“靺羯”之转音，春秋西戎族名“密须”或许也与之有关。“斡兹尔”(Wazr)则是通古斯语“头”字“兀术”。

从上述人名和称号的语属分析，可以确证“萨珊王朝”所接触

的“嚈哒”民族有着鲜卑系背景或通古斯族源。历史还记载，战后库萨和在“拔汗那”迎娶“突厥公主”，萨珊王朝嗣主“荷尔穆兹四世”(Hormizd IV)即为两人所生。因此，数代萨珊波斯皇族均有来自蒙古人种的母系血缘。

四、“吐火罗斯坦”的民族成分

7世纪上半叶，僧人兼学者玄奘去印度游学，除宗教外，他对地理、历史、人文、语言都表现出了极高的学术兴趣。他自629年出发，历时十六年返国。后在唐太宗的鼓励下，著有《大唐西域记》。书中他自奉“推表山川，考采境壤”。他对沿途所见所闻的人文种属、部落名称，特别是与“嚈哒”之种属研究相关的“睹货逻国故地”诸部，亦即“吐火罗斯坦”诸族国，也有详尽有致的记载。

玄奘去印度时，是经焉耆、库车、阿克苏、温宿，北逾天山西脉，继而沿伊萨克湖南缘或北缘、塔拉斯(Talas)、江布尔(Dzhambul)、奇姆肯特(Chimkent)一线西行，然后南下塔什干(Tashkent)、撒马儿罕(Samarkand)，然后：

> 出铁门，至睹货逻国故地。南北千馀里(旧曰吐火罗国，讹也)，东西三千馀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划野区分，总役属突厥……

《大唐西域记》第一卷，记载了“睹货逻国故地”共十六国

(部)。其中阿姆河北的八国为:“呾密国”、“赤鄂衍那国”、“忽露摩国”、“愉漫国”、“鞠和衍那国”、“镬沙国”、“珂咄罗国”、“拘谜陀国”。阿姆河南另八国为:“缚伽浪国”、“纥露悉泯健国”、“忽懔国”、“缚喝国”、“锐秣陀国”、“胡实健国”、“呾剌健国”、“揭职国”。

《大唐西域记》第十二卷,记载了玄奘在回国途中,从“漕矩吒国”都城“鹤萨罗”(今 Ghazna)到“于阗国”的一路旅程。他先到“弗栗恃萨傥那国”的“护苾那”(今 Bamian),然后沿兴都库什山南麓东行,抵达“伽毕试国”(今喀布尔北 Kapisa 盆地)。玄奘说:

> 从此国(弗栗恃萨傥那国)东北,逾山涉川,越伽毕试国边城小邑凡数十所,至大雪山婆罗犀那大岭,岭极崇峻,……行经三日,方至岭上。……又三日行,方得下岭,至安呾罗缚国。

“大雪山”当指兴都库什山,“婆罗犀那”则应是喀布尔以北的 Jabal os Saraj 山口(“婆罗犀那”前,似脱漏一个“雅”字)。玄奘是从这里出发翻越大雪山,进入“睹货逻国故地”的。他在游历“活国”及其以东数国后,从巴达克伤东南再越兴都库什山,抵达 Chitral 附近地方,再沿 Matsuj-Yarkhun 河谷一路东北行,经“商弥国”,最后可能是从 Baroghil 山口,折返山北瓦罕河谷,然后穿越“波谜罗川”(帕米尔山谷),入和田地区,再经西域南道返归长安的。

该卷记有“睹货逻国故地”另十三国:“安呾罗缚国”、“阔悉多国”、“活国”、“瞢健国”、“阿利尼国”、“曷逻胡国”、“讫栗瑟摩

国”、“钵利曷国”、“呬摩呾罗国”、“钵铎创那国”、“淫薄健国”、“屈浪那国”、“达摩悉铁帝国”。此十三国加第一卷所述的十六国，共二十九国，这与玄奘“分为二十七国”的说法似相抵触。事实上游牧部落分分合合，也很难细较它们的准确数目。

7世纪中叶，玄奘所见到的“睹货逻国故地”诸国的总貌，应该说是注入该地的“大夏”、“月支”、“嚈哒”、“突厥”等民族的一个历史的“积分”，要细究各部到达的年代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基于对历代北方诸族族名的了解，使得我们追溯“睹货逻国故地”诸部的族源却成为可能。其如：

安呾罗缚

即《魏书·西域传》所记之“嚈哒”。应同满蒙部落名“安达尔奇”，或西史所载之 Scythian 部落名 Androphagi。

淫薄健

“阿巴噶”之转音。

阿利尼

高车十二姓中的“阿崙”(a-ran)的转音；亦同匈牙利姓氏 Arany。它们分别是通古斯语和匈牙利语中的“金”字或其变音。《后汉书·西域传》说“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阿兰聊”亦即“阿利尼”。

钵利曷

似与魏姓“拔略”、“步六孤”、“步六汗”等有关。可能都是由

“仆骨”的变音“仆利骨”演变而来的。

钵铎创那

复合部落名“钵铎·创那”。《魏书·西域传》记有“拔豆国，……西至旃那国”。拼合“拔豆·旃那”，即是“钵铎·创那”；改作“泊咄·丑奴”，其源则明。“泊咄”，唐代黑水靺鞨之一部；“丑奴”，鲜卑部名，本蒙古语之“狼”字 *chino*。

讫栗瑟摩

复合族名“敕勒·悉万”。“敕勒”和“悉万”，皆鲜卑系基本部落。

屈浪拿

同魏姓“其连”、“丘林”。蒙古语之“石头”（*Chuluun*）一字。

赤鄂衍那，鞠和衍那

“赤鄂”和“鞠和”即“昭武”。“衍那”即后缀音-n 或-na。

咀刺健

同魏姓“太洛稽”、“沓卢”等。高车“吐卢氏”，唐漠北部名“同罗”、“吐如纥”，匈牙利姓氏 Torok 等，都应与之相关。

咀密，达摩悉铁帝

“咀密”和“达摩”，即族名“豆莫娄”之字根；贵霜翕侯国名“都密”亦是“咀密”。“铁帝”应即“拓特”或“突地”。

玄奘说“达摩悉铁帝国，亦名镬侃，又谓护密”。“镬侃”和“护密”分别是其成员部落“护骨”和“库莫[奚]”。

活国

即“滑国”、“滑骨”、“护骨”或“回纥”之别写。

曷逻胡

“乌洛侯”之异译，古之“山戎”，东胡一鲜卑系民族基本部落之一。

高车“斛律氏”，魏姓“阿鹿桓”、“冤赖”、“越勒”，匈牙利姓氏 Olah 等，均为相关姓氏。

忽露摩，忽慄

同魏姓“贺赖”、“贺楼”、“副吕”、“费连”，或高车族名“副伏罗”，铁勒部名“覆罗”，匈牙利姓氏 Fulop 等。

镬沙，胡实健，阔悉多

即“曷萨”或“可萨”。魏姓“库褥官”，铁勒“斛薛”，回鹘“斛萨”等部名均与之相关。唐代人名“哥舒翰”就是“胡实健”。

珂咄罗

魏姓“纥豆陵”、“阿单”，柔然族名“纥突邻”，晋代北狄族名“乌谭种”，唐代回纥部名“胡咄葛”等，皆同此名。《往五天竺国传》载“跋贺那国东有一国名骨咄国”[32]。“骨咄”亦即“珂咄”。

拘谜陀

同“且弥”或“且末”。魏姓“丘穆陵”、“俟力伐”、“俟伏”，突厥部名“处密”，蒙古部名“扎马儿歹”，东北亚族名“吉里谜”（拟读“吉尔谜”）现代内蒙古地名“哲里木”等，都与之相关。“拘谜陀”应即“且弥·惕”。

揭职

即魏姓之“俟几氏”，或《辍耕录》之蒙古部名“扎剌只剌”和“察里吉歹”等。

瞢健

魏姓“茂眷”和“秘邗”之音，似应源自通古斯族名“靺羯”或“勿吉”。

今阿富汗东北 Munjan 河谷，仍有族名为 Munji 的居民，他们可能就是“瞢健”之裔族。《后汉书·西域传》说：“和帝永元九年……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蒙奇”当是 Munji。

愉漫，锐秣陀，呬摩呾罗

即族名“乞伏”、“深末怛”、“悉万丹”等。《后汉书》曰：“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兮顿、都密，凡五部翕侯。”“休密”、“双靡”均与“愉漫”、“锐秣”、“呬摩”等同音。

纥露悉泯健

“纥露”与“悉万斤”之复合，“纥露”即“忽懔”。今 Kholm 东

南数十公里处有 Samangan 城，Kholm-Samangan 可能即是“纥露·悉泯健”。

缚喝，缚伽浪

“缚喝”究为何部？在于“缚”字之音。“阿姆河”古名 Oxus，《大唐西域记》称之“缚刍河”，《魏书》叫它“乌许水”。“缚刍”和“乌许”都是的 Oxus 音译；玄奘又说“纳缚，唐言新”。此字为印欧语基本词汇，波斯语作 naeu、塔吉克语作 nau，梵语作 nava。因此，“缚”应与“乌”等音。

“缚喝”应是“乌护”或“回纥”。又因为“伽浪”急读作“干”，“缚伽浪”即是魏姓“纥干氏”，亦“纥骨”或“护骨”之变音。

玄奘游历“睹货逻国故地”的最后一站是达摩悉铁帝国，它应在巴达克伤东部某地，玄奘谓此国民众：“眼多碧绿，异于诸国”。他目睹那里的百姓多属印欧人种（似即今之“塔吉克族”），但又说这种情况“异于诸国”。这无疑说明“睹货逻国故地”其他族国民众多为蒙古人种。

上述的分析表明，“睹货逻国故地”二十九族国，都是见诸于各代历史的北方部落：“护骨”、“悉万”、“乌洛侯”、“敕勒”、“仆骨”、“赤狄”、“丑奴”、“曷萨”、“同罗”、“覆罗”、“靺鞨”、“拓特”、“阿巴嘎”、“豆莫娄”、“泊咄”等。其中不少应是“大夏”和“月氏”的裔族，它们和“嚈哒”一样，都是些蒙古人种的游牧部落。

五、唐代“吐火罗道”地名佐证

在突厥兴起的一百年后，西突厥汗国占尽中亚，甚至远达南亚和东欧地区，它于公元659年（高宗显庆四年）为唐军所破。“吐火罗斯坦”诸部自然趋附兴盛而宽容的唐帝国。唐朝政府也在这片地区进行了设州置府的活动。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

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龙朔元年（661），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二十六。

月氏都督府，以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置。领州二十五。兰氏州以钵勃城置。大夏州以缚叱城置。……弗敌州以乌逻毡城置。沙律州以咄城置。妫水州以羯城置。盘越州以忽婆城置。忸密州以乌罗浑城置。伽倍州以摩彦城置。……钵罗州以兰城置。双泉州以悉计蜜悉帝城置。祀惟州以昏磨城置。迟散州以悉蜜言城置。富楼州以乞施蠕城置。丁零州以泥射城置。薄知州以析面城置。桃槐州以阿腊城置。……身毒州以乞涩职城置。……箋颉州以骑失帝城置。……

大汗都督府，以嚈哒部落活路城置。领州十五。……奄蔡州以胡路城置。依耐州以婆多楞萨达健城置。犁州以少俱城置。榆令州以乌模言城置。安屋州以遮瑟多城置。……迷蜜州以顺问城置。兮顿州以乍城置。……

犁薪州以据瑟部落置。崦嵫州以遏忽部落置。巨雀州以乌离难城置。遗州以遗兰部落置。西海州以郝萨大城置。镇西州以活恨部落置。乾陀州以缚狼部落置。

天马都督府，以解苏国数瞒城置。领州二。洛那州以忽论城置。……

高附都督府，以骨咄施沃沙城置。领州二。……休蜜州以乌斯城置。……

写凤都督府，……领州四。……悉万州以缚时伏城置。……

悦般州都督府，以石汗那国艳城置。领双靡州。以俱兰城置。

奇沙州都督府，以护时健国遏蜜城置。领州二。……大秦州以叡蜜城置。

姑墨州都督府，以怛没国怛没城置。领栗弋州。以弩羯城置。

旅獒州都督府以乌拉喝国摩竭城置。

昆墟州都督府以多勒建国低宝那城置。

至拔州都督府以俱蜜国褚瑟城置。

鸟飞州都督府，以护蜜多国摸逵城置。领钵和州。……

王庭州都督府，以久越得犍国步师城置。……

唐朝政府以一县令去“吐火罗道”，或“嚈哒”故地施放政令，可能也不过是一次考察亲善活动，沿途对大小族落作了一番登录，想必还发放了赏赐和委任，中央政府亦未必真有在那里实施行政管理的意愿。而所谓的“城”，也只是游牧民族“迁徙鸟居，不常其邑”的聚居点，大部无法精确定位。但基于前文的族名分析，不难释读这些“州”、“府”、“城”名，多是熟悉的北方诸族的部族名，如：

回纥：　　阿缓、遏忽、活恨、安屋；

按出：	奄蔡、崦嵫；
白狄：	弗敌、薄知；
泊咄：	婆多；
仆骨：	钵和、盘越；
步六[孤]：	钵罗；
赤狄：	迟散、乞施𡸁、乞涩职、骑失、奇沙、据瑟、褚瑟、遮瑟；
同罗：	多勒建；
豆莫[娄]：	怛没；
覆罗：	活路、胡路、富楼、缚狼、忽论；
库莫[奚]：	护蜜、遏蜜、姑墨、乌模言；
曷萨：	郝萨、护时健；
且末：	叡蜜、俱蜜、忸密；
沮渠：	巨雀；
郁督甄：	久越得犍；
兰氏(匈奴贵姓[33])：	兰氏；
靺羯或密须：	篾颉、摩竭、蜜悉；
莫允或慕容：	摩彦；
弭秣：	迷蜜；
纳吉：	弩羯；
女奚烈：	泥射；
如者：	犁蕲；
悉万：	悉万、悉蜜言、析面、数瞒、双靡、休蜜；
厙狄：	悉计、少俱；

室韦：　　祀惟、顺问；
兀者：　　缚叱；
乌洛浑：　　乌罗浑、乌拉喝、乌逻毡、乌离难、阿腊。

在上述地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语言信息。如："咄"或"啜"（音近"羯"和"乍"）分别是室韦语或突厥语的"酋长"一字；"咄城"、"羯城"、"乍城"都应是"酋长驻地"的意思。又如"兰氏州以钵勃城置"。突厥语"大"为 *buyuk*，"酋长"作"*beg*"。史有"赫连勃勃"者"僭称大夏天王"[34]，"赫连"意为"苍天"，"勃勃"当是"大王"；此"钵勃城"就是"大王城"。再如"遗州以遗兰部落置"，"遗兰"（*ilan*）即通古斯—满语的"三"，黑龙江省的"依兰县"，即"三部城"。

由于"嚈哒"，以及更早的"大夏"和"大月氏"的入侵，在阿姆河两岸和兴都库什山南北的大片地区，沉积了一个相当厚重的非印欧语言的地名层。如：

Andkh-voy

阿富汗西北地名。明代陈诚《西域行程记》记为"俺都淮"[35]；波斯《史集》也有记载，余大均译作"安忒忽忒"[36]，该地名至少可以追溯到蒙古人入侵以前。它应是由女真语"按答海"（"客之通称"[37]）一字转变成的地名。

Jar Quduq

音"牙·忽都忽"，于 Sheberghan 城西南五十公里处。可能曾

是某个名“忽都忽”酋长的“牙帐”驻地。

Jan Bulaq

音“延·钵利曷”，于巴里黑东南四十公里处。

Moqor

音“靺鞨”，于伽兹尼和坎大哈间。去巴基斯坦 Wazirstan 仅一百公里。

Qala

“哈拉”，通古斯语之“部落”或“氏族”一字。大量阿富汗地名之前缀或后缀，如 Qala Hazar、Qala Khan、Qala Nau、Qala Panja、Pashmi Qala、Sowzmeh Qala 等。作为阿富汗地名，可能已经转化为“村落”或“聚落”的意思了。

Samangan

Kholm 东南七十公里处的市镇。名同“撒马儿罕”（Samarkand，亦作“悉万斤”），应是“悉万”部落盘据的遗迹。

Sheberghan

“巴里黑”西一百馀公里处之市镇。应即“鲜卑部落”的意思。

Utohal

音“阿徒哈”，Moqor 西三十公里处地名，即《金国语解》之“阿徒罕，采薪之子”[38]一字。相关者，漠北有地名“于都斤山”，姓氏

有“郁督甄”等。该字本为“木材”之意，蒙古语其为 *hautgai*，匈牙利语作 *ocs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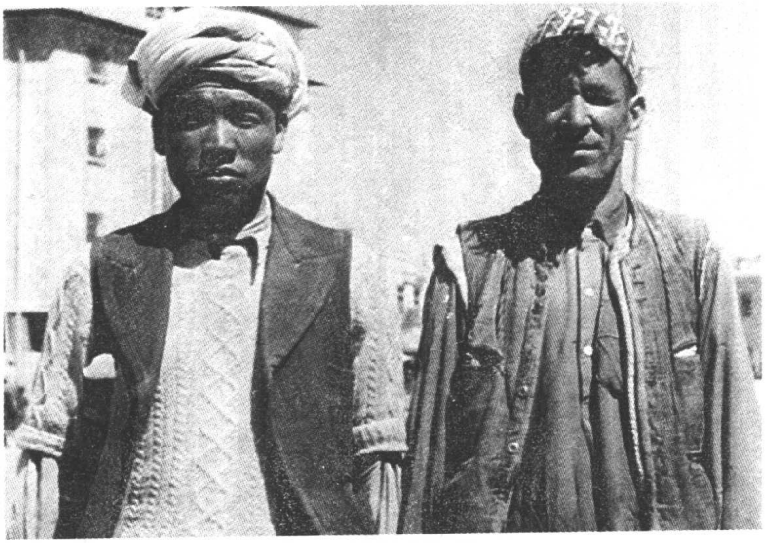
上述现代阿富汗地名形成的精确年代，多已不可考，但它们与东北亚民族语言的关联却是明显的。这一现象在“河中”或“粟特”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于这些地名的发掘和解析，也将为中亚民族融合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判据。

六、结论

究竟是哪些蒙古人种民族，在哪些时期次第进入中亚、南亚、近东、东欧地区？这是历史科学的重要课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地区欧亚混血人种的形成内涵，或其语言的更替时代，都将成为永远无解的“谜”。由于认知手段的急速膨胀，现代人类的视野和洞察力已经大为开阔和深化，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露出了曙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它们研究对象的初显可能是复杂的，而内质却往往是简单的。事实上，人类只有不多的几个“族源”，但却在不停地“流动”和“融合”着，从而形成了语言和人种的五光十色的衍射现象。

本文基于对“嚈哒”和“高车”部落内涵的解析和比较，并求助于东西方对有关“吐火罗斯坦”人文地理的记载，达成了“嚈哒”为“高车之别种”是个确切无误的记载的再认识。以人类—语言学的分类来看，“嚈哒”和“高车”一样，都是以鲜卑系和通古斯系部落为主的民族融合体，它们与被认为是“突厥语族”的祖先匈奴，既是互相渗透，但又是有所区别的。

图七：Aq Kupruk 的一名塔吉克—乌兹别克族混血青年男子。取自：G. Debets,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fghanistan: I —II*,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Published by Peabody Museu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0, p. 132.



图八: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的两名男子。

取自:G. Debets,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fghanistan: I —II*,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Published by Peabody Museu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0, p. 166.

作者无法回避关于“大夏”和“月氏”族源的讨论。根据“吐火罗斯坦”部落名多出自东北亚诸族的事实，它们无疑也都是蒙古人种的民族。东北亚民族多次重复地注入“吐火罗斯坦”的事实，并非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奇迹；那些屡屡成功地入侵中国本土的北方民族，也无非就是鲜卑—契丹—蒙古，和通古斯—女真—满两大民族而已。

《草原帝国》(*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一书的作者格鲁塞(R. Grousset)，在评论“月氏”民族西迁事件时曾说[39]：

> 匈奴在把月氏逐出甘肃的过程中，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被感受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的特征，亚历山大远征在这些地区所留下的最后的遗迹被消除了；帕提亚的伊朗暂时承受了震动；从甘肃被赶走的部落已经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起一个意想不到的帝国。在草原一端发生的一个轻微的搏动，不可避免地在这条巨大的迁徙地带的每一个角落都产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尽管，这位优秀的西方史学家的不少论点是值得质疑的，但他关于东亚和北亚发生的每一次“轻微的搏动”，都会产生“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的说法，无疑是辽阔的历史思维的宏观总结。事实上，4至6世纪间以“鲜卑”和“通古斯”民族为主体的Hun人，以及它的同类——“嚈哒”民族的马蹄声，震颤了从长安到罗马的整个欧亚大陆。

注释

[1]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页1—7;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p. 67—72.

[2]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Secret History, and Build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 Cameron,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7, pp. 6—7, 9, 15, 20, 114.

[3] Agathias, *Historia*, edited By R. Keydell, CFHB, Berlin, De Gruyter, 1969.

按:拜占庭诗人 Agathias (536—582)生于小亚细亚的 Myrina 地方,在亚历山大城接受法律教育,曾在康斯坦丁堡的法庭实习,后任检察官。他有近一百首诗歌遗存在希腊诗选中。Justinian I 去世(公元565年)后,Agathias 开始写作一部他生活时代的历史,这部五卷未完成的著作,被公认为是552—558年间发生事件的权威记载。

[4]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translated 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按:拜占庭历史学家 Theophylact Simocatta(亦作 Theophylactus Simocattes)公元640年后生于埃及或康斯坦丁堡,其父为罗马帝国行政高官和帝国枢密官。他的东罗马帝国纪年史,记载了6、7世纪间希腊与斯拉夫人及波斯的关系。他的主要著作是莫里斯(Maurice, 582—602)皇帝在位期间的八卷历史,东罗马与波斯战争是其重要部分,因此也涉及"嚈哒"。

[5]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页72;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39.

[6]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吐呼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277;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吐火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252。

[7] 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页253—371;

D. Adams, *Tocharian Historical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88, pp. 2—3.

[8]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54;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1, Sect. 104.

曰:"从亚速海到 Phasis 河和 Colchi 人住的地方,轻装要走三十天。从 Colchi 人那里再走不远,便可进入美地亚,因为中间只隔着 Saspire 人的地方,过了那里就是美地亚了。"

[9]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South Russian Steppes",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1—263;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p. 176—177.

[10] Consta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rio*,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1967, p. 175.

按:此英译本列有八个 Turk 部落:Kabaoi、Nekis、Megeris, Kourtougermatos、Tarianos、Genach、Kari、Kasi。匈牙利文译本将 Kourtougermatos 译作 Kurtgymat。

[11]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页317;

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页339。

曰:"总之,丁零、狄历、高车、敕勒、铁勒等名,皆是古代各族

人民对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之民族的通称或泛称。”

[12] 同上白翠琴书，页346。

[13] 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页24。

[14] 《金史》，《金国语解》，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897。

曰：“呵不哈曰田。”

[15] 余太山《柔然、阿瓦尔同族论质疑——兼论阿瓦尔即悦般》，《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页97—113。

[16]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页251。

[17] E. H. Parker,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London, 1985, p. 121;

余太山《柔然、阿瓦尔同族论质疑——兼论阿瓦尔即悦般》，《文史》第二十四辑，页97—113。

[18] 李增祥《突厥语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页135—138。

[19]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鹘传下》，页6148。

曰：“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籍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坚昆之人得以役属之。”

按：雪橇或冰橇为通古斯民族所率先使用的雪上或冰上的运载工具，使他们在寒冷地带得以渔猎生存和远途迁徙。

[20] 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页15。

[21] 希罗多德《历史》，页273、305、307、313。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s. 18, 100, 102, 106, 125.

[22] 《宋云行纪》，摘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页41—61。

[23]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812。

[24]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页810。

曰:"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初,慕容弈洛干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吐谷浑避之西徙,……,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

[25] 照那斯图《土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页1。

[26] 《魏书》卷三十八,《王惠龙传》,页877。

曰:"卢遐妻,时官赐度河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

按:王惠龙子宝兴为尚书卢遐之婿,此"卢遐妻"系续弦夫人,即是宝兴妻子的后母。此段文字是表彰某人的道德和人品,本文仅取用族名"高车滑骨"四字而已。

[27]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页10;

J. Markwart,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p.45.

[28]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宝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522。

[29]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页137。

曰:"……乌古思称他为钦察(q(i)bjaq)。这个词由'合不黑'(q(a)buq)一词派生来。'合不黑'为突厥语'空心树'之意。所有的钦察人都出自这个幼儿。"

按:"合不黑"不是"空心树",而是通古斯语的"天"字:"阿巴嘎",但它转化成了q(i)bjaq,其音与"阿巴赤","呵不察"等音接近。

[30] C. A. Macartney, "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11, 1944, pp. 266—275;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页85—86。

[31] 宋岘译、余太山释《<太伯里史>所载嚈哒史料笺证》,《中亚学

刊》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51—64。

[32]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摘自杨建新编《古西行记》，页115。

[33] 《晋书》卷九十七，《北狄匈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550。

[34] 《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传》，页3202；
《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页2056。

[35] 陈诚《西域行程记》，摘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页275。

[36]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页193。

[37] 《金史》，《金国语解》，页2892。

[38] 同上，页2893。

[39]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 32.

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

《史记·大宛列传》是关于古代中亚人文、地理和政治的重要文献。作者司马迁(生于前135年)所采用的资料,显然是得自于同时代人张骞(生于前114年)的口述或报告。张骞两次西使寻访目标先后是"月氏"和"乌孙",目的都是为了对抗匈奴,他了解到的是葱岭以西的情况。自张骞凿开西域之门,吏卒商贾趋之若鹜,汉朝政府对西域民风、政情从此了如指掌。《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数十族国的情况,作者班固(32—92)之弟班超,曾奉使西域三十一年,其人大智大勇、有作有为,他的亲历当然也为班固的著述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尽管,《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有着当之无愧的科学价值;然而,它们所记载的西域族国名,如:月氏、大宛、大夏、乌孙、康居、奄蔡、安息、且末、于阗、疏勒、龟兹、焉耆、车师、蒲类等,却至今是令人费解的历史—语言—人类学问题,莫说西方学界不得其解,就连中国学界也不知其然。由于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居民可能是印欧人种,为寻找这些族国名的印欧语源,人们枉费了许多功夫。又由于这个地区的语言,是在公元9世纪后才彻底突厥化了的,它们自然也都没有表现出于与"突厥"语言的本质联系。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从较早的人类迁徙活动中,去寻找它们的始源。

西方也对来自东方的游牧部落，和古代中亚地区的情况作了重要的记载。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人），在《历史》（*The Histories*）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至少于公元前8、7世纪，便自中亚进入黑海北岸地区的Scythian人的史迹。成书于公元前后的《地理志》（*The Geography*）的作者斯屈波（Strabo，64/63 B. C.—25 A. D.），根据随亚历山大远征的将士们的回忆，综汇了中亚—南亚地区人文、地理、历史的相关信息。然而，无论是司马迁和班固，还是希罗多德和斯屈波，都不可能按照现代人类—语言学的分类，来告知古代中亚民族的族属。

通过分析中国北方诸族的族名、人名等语言信息，研究它们的迁徙融合态势，作者洞察到，西域诸族国名均与通古斯—鲜卑系族名相关联；而古代西域地区的人名姓氏、生产方式和文化内涵，亦多表现出与东北亚民族类同的特征。本文以大量的事实和充分的理据来论证：在公元前一千年间注入中亚地区的蒙古人种，都是有着东北亚背景的古代“西戎”民族。

一、“月氏”就是“兀者”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去寻找于公元前177—176年间，被匈奴逐出河西走廊的“大月氏”部落。张骞一行出发于前139年，途中被“匈奴”羁留达十一年之久。脱逃后，翻越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时，这个河西部落已在中亚称霸五十年，而乐不思蜀了。《草原帝国》一书的作者格鲁塞在评论“月氏”民族西迁事件时曾说[1]：

> 匈奴在把月氏逐出甘肃的过程中，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被感受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的特征，亚历山大远征在这些地区所留下的最后的遗迹被消除了；帕提亚的伊朗暂时承受了震动；从甘肃被赶走的部落已经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起一个意想不到的帝国。在草原一端发生的一个轻微的搏动，不可避免地在这条巨大的迁徙地带的每一个角落都产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然而，对有如此重大影响的“月氏”民族，我们的了解却是非常有限的。

判定一个民族的族源，首先要确认它的族名的读音。有古人说“月氏”应读“肉支”，现在大概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古训”了。其实“月”是读“乌”的，吴语方言它又音近“讹”。因此“月氏”可能读“乌氏”或“讹氏”，元代中亚地名“讹迹邗”[2]可能就是“月氏邗”，而东北亚族名“兀者”则应是“月氏”的源音。

现代新疆“乌什”地方，汉代名“温宿”[3]，唐代称“温肃”或“于祝”，元代叫“倭赤”[4]。“温”、“于”、“倭”与“乌”、“兀”等音，地名“温宿”、“温肃”、“于祝”、“倭赤”都是通古斯族名“兀者”之别译。而《新唐书·西域传》说：“康[国]者，……君姓温，本月氏人”，说明“月氏”就是“兀者”。

“兀者”是最重要的通古斯系部落名之一，汉代“东夷”的“沃沮”[5]，晋代“北狄”的“雍屈”[6]，北魏“高车”的“异奇斤”[7]，唐代“木马突厥”中的“俄支”[8]等部名，都是“兀者”的变译。元代以后才有“兀者”、“吾者”、“斡者”、“斡拙”、“窝集”、“乌稽”的记

载，他们是散居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野人”部落。现代“赫哲”族也是它们的一方传人。

先秦文献就有“月氏”或“兀者”的隐性记载，《穆天子传》在说到公元前989年周穆王北征“犬戎”的经过时，就提到过“焉居”和“禺知”[9]。岑仲勉认为[10]：“焉居”即“焉耆”，秦时作“义渠”，“禺知”即“月氏”，张掖为其故居。他的这些论断都是很高明的。我则以为：“禺知”、“禺氏”、“焉居”、“义渠”和“月氏”，都是族名“兀者”的异译。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戎”聚居地，今甘肃庆阳、宁夏固原、陕北延安一带的大量地名，如：“安定郡”属下的“复累”，“安俾”、“朝那”、“乌氏”、“月氏道”；“北地郡”的“直路”、“回获”、“郁郅”、“义渠道”；“上郡”的“肤施”、“独乐”、“木禾”、“龟兹”等。这些西北地名与东北亚民族族名竟有不可割裂的可比关系：

乌氏、郁郅、月氏	兀者
木禾	靺鞨
安俾	阿巴嘎
龟兹	厥机、沮渠
复累	覆罗
直路	敕勒、叱勒
回获	回纥
朝那	叱奴
独乐	吐如纥、同罗

这些地名与族名之间的集体对应，揭示了西戎民族与东北亚民族

群体上的“同构”[11]现象，以及它们间必然的源流关系。

这些作为地名出现的东北亚族名，并不局域于今陕甘宁边区一地；在河西走廊，它们不绝于途；在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一线，也随处可见。这种分布态势绘出了一条沿河套，经河西，入西域的，委婉曲折的人类迁徙的流。大概在上古时代，东北亚民族就沿河套迁徙到陕甘宁青地区，从而演变成为西戎民族。在不断侵扰它们的同类“周”[12]和“秦”[13]等部落的同时，它们还西向蔓延，并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或许更早）进入中亚、东欧地区。希罗多德记载的 Argi[ppaei][14]，可能就是“兀者”。

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从河西走廊出走“塞地”，后又为同类乌孙所逐，南下吐火罗斯坦，远涉北天竺国[15]，不过是一段有记载的历史。事实上，唐代于阗王族“尉迟氏”，宋代西夏大姓“讹氏”[16]，现代甘青藏族“洼扎”和“吾合扎”等氏族[17]，都是“月氏”或“兀者”之裔，月氏民族遍布河西、中亚、南亚的格局，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通过多次迁徙活动形成的。

今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境处有个地名 Wazirstan[18]。将 Wazir 比为“月氏”，或许颇难置信；将其比作“兀者”，则无懈可击。Wazirstan 当“兀者斯坦”或“大月氏国”[19]之一方疆土。东北亚民族在南亚的活动也可为西方古文献印证。斯屈波的记载，“高附河”（“喀布尔河”）流域，是为 Astaceni、Masiani、Nysaei、Hypasii 等部落所盘据的[20]。其中 Masiani 当即是“靺羯”或“麻秦”；Hypasii 就是“阿巴嘎”的转音“阿布思”、“渥巴锡”等。

很可惜，“月氏”民族的语言没有留下充分的记载；以致由某些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月氏”为印欧人种的猜测，竟也得到我国学界的普遍认同。其实，我们还可以从不多的“月氏”人名记载中，

去获取一些语言信息。《后汉书·西域传》就有关于南亚地区“大月氏”之裔“贵霜翎侯”的记载：

> 贵霜翎侯丘就却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按：似即“巴达克伤”）、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八十餘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庶，诸国称之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丘就却”，即同书记载的匈奴单于之名“丘除车”[21]。“丘就”和“丘除”就是燕北部名“厥机”，河西部名“沮渠”，和蒙古部名“主儿扯”等的异写，亦即是“女直”或“朱里真”的变音。

“阎膏珍”，有蒙古人名以“真”音结尾的特征。“阎膏”就是“阿骨”，它是通古斯语中的“哥哥”或“王子”的意思。历史上著名的有“阿骨打”者。

“翎侯”是“匈奴”的官称，《史记》就有“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降，为翎侯”的记载[22]。而在印欧语言中，没有任何关于“翎侯”的线索。

荣新江氏说[23]：“月氏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游牧民族，他们便习弓马，兼并诸戎。就连匈奴的冒顿都曾为质于月氏，可以说他们是当时西北各族的主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象，由于月氏的声威和对西北各族的统治，许多民族都这样或那样地打上了月氏的烙印，并且和月氏纠缠不清了”。说来，匈奴、月氏都何尝不是理还乱的民族大熔炉；我的结论则是：“月氏”是源自于“兀者”的西戎部落，它与东北亚民族有关，而与印欧人种无缘。

二、“大宛”、“大夏”和“吐火罗”就是“达斡尔”

《史记》是以“大宛”为中心来记载葱岭之西诸国的。“大宛”和“大夏”分别是在“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Farghana)盆地，和依傍“阿姆河”的“巴里黑”(Balkh)绿洲。《大宛列传》说：

>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居室。其属邑大小七十餘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弥、于阗。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
>
> ……
>
>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万。其都曰蓝氏城，有市贾贩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北魏、隋唐年间佛教北传，东亚诸国佛事兴盛，故“大夏国”是各国僧侣们往返中原和印度的陆路必经之地。唐僧玄奘对这片“睹货逻国故地”的人文地理，尤其有精湛确切的了解。宋代成书的《新唐书·西域传》点明说：

> 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

岭西，乌浒水之南，古大夏地。……大夏即吐火罗也。

西方历史也有关于“吐火罗”民族的信息，斯屈波就记载过Saka人中的一个Tochari部落[24]。Saka是比“月氏”来得更早的东北亚人种游牧民族，即是希罗多德所说的Scythian人，亦是“塞古”或“塞骨”之音，于是《汉书·西域传》就称其为“塞种”了。公元前140年后，“月氏”和“乌孙”的接踵到来，一些部落转徙阿姆河南，取代了希腊人在那里建立的Bactria王国。从此在费尔干纳盆地和阿姆河流域，分别形成大宛和大夏两大族国。西文族名Tochari显然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宛、大夏、吐火罗或睹货逻。

其实，“吐火罗”在中亚是随处可见的大小地名，因此它必是一个星散了的大族之名。大者除“大夏”所在地被称为“吐火罗斯坦”外；新疆吐鲁番—焉耆—库车地区，也被9世纪回鹘文献称为“吐火罗”地方。20世纪初，在后一地方出土了不少于7、8世纪用一种怪异语文写成的佛教文献。西方学者确证，这种语言与欧洲语言有着亲缘关系[25]，并因地命名为“吐火罗语”[26]。为了解释“吐火罗语”的出源，有人提出是“大月氏”人将它带到那里去的。因此，“月氏”等民族的迁徙活动，又都被说成是印欧人种的“倒流”[27]现象，“吐火罗”民族的种属问题，也因此而大大地复杂化了。

然而，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者在邻近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某些甚至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欧洲人种的干尸和遗存后，新疆地区的早期居民的人种归属已趋明朗；从东方去为吐火罗语谋寻载体民族的理论需求，也不复存在。这也就为客观地探讨“吐火罗”、“月氏”等民族的族源，营造了有利的气氛。

从《大宛列传》的记载中，可以找到一些大宛民族的语言信息。例如，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征服“大宛国”的事迹里，一共提到过五个大宛王族人名：“郁成”、“煎靡”、“毋寡”、“昧蔡”、“蝉封”；它们显然就是北狄或西戎族名“兀者”、“且末”、“乌古”、“靺羯”、“吐浑”的异写。

8 世纪初，新罗僧人慧超在其所作的《往五天竺国传》中说[28]：

> 跋贺那（即“费尔干纳”）国东有一国，名骨咄国。此王原是突厥种族，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

慧超的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大宛故地为“胡”和“突厥”两类人种杂居，其“言音”则为“吐火罗”、“突厥”、“土”三语并存。“胡”当指印欧种原住民；“突厥”必是蒙古种。“土”语可能是原住民语言；而“吐火罗”必为有别于“突厥”语的另类蒙古人种的语言。《梁书》记载，“滑国”（即“嚈哒”）的语言须“待河南人（即吐谷浑人）译然后通”[29]。可见那时中亚还流行着“东胡—鲜卑语”，这种“吐火罗”语就绝不会是今世所谓的“吐火罗语”了。

因此，我们势必应该在北方诸族的族名中，去为族名“吐火罗”寻找出源。而鲜卑系族名“东胡”，及其支脉或别称“唐虞”、“屠何”、“屠各”、“独孤”、“独活”、“徒河”、“大贺”、“达姤”等，都是显然的可比线索。然而，元代蒙古部名“朵豁剌”[30]，又与“吐火罗”或“睹货逻”更切近；明清至今，名似“东胡”的部落所剩无几，惟“达斡尔”象是它的一支直裔，它亦作“达呼尔”[31]，至今其

语言仍表现为一种典型的“蒙古语”。在发掘了如此丰富的族名记载的基础上，我们再比较三组类似的北方诸族族名的音转现象：

蒙古	护古	屠各、达姤
蒙兀	回纥	屠何、徒河
蒙兀儿	畏兀儿	达斡尔、达呼尔、打虎儿
忙豁勒		朵豁剌、睹货逻、吐火罗

根据这些一目了然的音变机制，“大宛”是“达斡”，“大夏”是“达呼”，“吐火罗”是“达斡尔”，应该是非常合理的结论。

“吐火罗”也是“蒙古”及其相关民族的常用人名。著名者有如：“王汗”之名“脱斡邻勒”[32]，或即《史集》所记的tughuril[33]；也先不花之子“秃忽鲁·帖木儿”[34]；元顺帝之名“妥欢·贴睦尔”；康里人“秃忽鲁”；“塞尔柱帝国”奠基人“乌古斯”酋长塞尔柱之孙Tughril等。

历史—文字学者刘凤翥、沈汇等[35]，基于契丹小字与达斡尔语的比较，得出达斡尔族源自契丹和东胡的结论。考古—民族学者干志耿、孙秀仁指出[36]：

> 古代民族……很难说哪一个民族绝对纯粹，在其流变过程中必渗入他族成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相对来说，达斡尔族还是保持了较纯的成分。……达斡尔族及其语言，比蒙古和蒙语保存了更多的鲜卑—室韦—契丹系统的成分，保持了这一系统民族语言的原型，从这个意义上说，达斡尔族在民族史上犹如东胡民族的“活化石”。

因此,“达斡尔”即是“东胡”,是个有坚实依据的结论。当然,上述学者关于契丹是“源”,达斡尔是“流”的说法,未必是很必要的,它们也可能是源自“东胡”的两支平行的“流”。

吐火罗民族迁徙的轨迹,也可以循历史—地理记载去梳理澄清。西汉政府就曾于“陇西郡”设县置“大夏”(今甘肃临夏、广河地区)。出河西走廊,还有大量由“吐火罗”或“达斡尔”转化而来的地名:“敦煌”即是其一,月氏和乌孙都是从那里出走的。二如,巴里坤以东的“吐尔库里”[37]亦当是 Tochari。三如,吐鲁番—焉耆—库车地区,亦是“吐火罗”地方。四如,玄奘所说的自于阗“[东]行四百馀里,至睹货逻故国。”[38]就是《汉书》记载的“小宛国”[39]。“大宛”之名既已用于葱西,班固便以“小宛”来命名另一个“吐火罗”部落了。

从诸多方面来看,大宛、大夏、吐火罗、睹货逻等,都是东胡之异名“达斡尔”的别写。它与月氏或兀者一样,既是北狄,亦为西戎;陕甘宁青曾是它们的据点,河西走廊则是它们的通道。它们种类和语言可能一直存留到宋代,自命“大夏”,亦名“唐兀”的“西夏”民族及其语言[40],都融有它们的后裔成分。

三、“乌孙”即是“爱新”

《史记》和《汉书》以对“乌孙”的描述最为详尽。它是一个有十多万人口的强大部落,《汉书》说:“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两者既为近缘部落,因此有人猜测它们都是印欧人种了;反之,我们既已证明“月氏”为“兀者”,那末“乌孙”是否也应该是一

个蒙古人种的部落呢?

汉朝政府为对抗匈奴,而笼络乌孙,长期采取联姻政策,因而对它有深入的了解。《汉书·西域传》记载了不下数十个乌孙权贵人名,而这些人名大多具有东北亚民族族名特征。如:

大禄强	即"大·如者";
猎骄靡	即"如者·靡";
翁归靡、元贵靡	即"乌古·靡";
雌栗靡	即"敕勒·靡";
伊秩靡	即"乙旃·靡";
乌就屠	即"兀术·咄";
姑莫匿	即"库莫奚";
难栖	即"芮奚";
乌日	即"兀者";
末振	即"靺羯";
细沈	即"息慎";
若呼	即"术虎"。

20 世纪后半期,新疆地区有大量古代墓葬发现。根据 C^{14}(碳十四)年代测定,吐鲁番阿拉沟的"卵石墓葬群"和"竖穴木椁墓葬群",分别是于公元前 8 至 2 世纪,和公元前 4 至 2 世纪间筑成。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上部有"封石堆";后者墓穴中央的木椁,是用松木砍削后,纵横交错排列筑成,内中有数量可观的金银殉葬器物发现,墓群南北排列成链状,墓葬中的遗骨也并不表现印欧人种的特征。具有类似特征的墓葬,在张掖—敦煌、巴里坤南湾和伊犁河

河谷亦多有发现，考古学界认为它们是属于“乌孙文化”形态的[41]。

事实上，这些墓葬表现出的是东北亚的文化特征。据《括地志》的记载，“靺鞨国”中有“葬则交木作椁”的习俗；《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高句丽传》则说：“厚葬，金银财币，尽送于死。积石为封，列植松柏。”而具有这些特征的墓葬在河西走廊、天山山麓和伊犁河谷的系列发现，是公元前一千年中源自东北亚的民族在这一带生息驻足的证明；而“乌孙”是他们中间的骨干部落。

从语音上看，族名“乌孙”（Osin）可能是“爱新”（Asin）之转音；而后世突厥民族的核心氏族——“阿史那”（Osina），正是发迹于天山东麓的“高昌”地区，他们可能就是曾活动于此地的乌孙之遗族。

四、“康居”是“弘吉剌”

张骞在去“大月氏”的路上，途经在今“塔什干”附近从事游牧的部落“康居国”。他说：“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大月氏同俗。”

“康居”既与“大月氏同俗”，就应是“兀者”的同类。《汉书·地理志》就有“郁郅，……莽曰功著”的说法，《晋书·四夷传》则有“北狄……捍蛭种”的记载。“功著”和“捍蛭”可能就是“康居”，也就是后世著名蒙古部名“弘吉剌”之缩音。元蒙中亚大族“康里”，西僧柏朗嘉宾记为 Kangit[42]，其音正是“康居”。若将两者合为“康居里”，恰似“弘吉剌”。

《史集》将“弘吉剌惕”列为“迭儿列勤蒙古”诸部之一，而且说这些部落都是“从阿勒坛·忽都合，即金器生出”[43]的。“阿勒坛”即“金”，“忽都合”则是蒙古俗语中的“阴户”一字[44]。“弘吉剌惕”虽是蒙古民族的重要部落，而其母系社会之先祖，可能与自命“金族”的通古斯系民族有关。

五、“安息”和“奄蔡”

“安息”是一个西域农耕大国。张骞回忆：

>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

《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后汉书·西域传》则云：“[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西南行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

“妫水”即“阿姆河”。沿该河，除“巴里黑”一带适田作外，另一处则是灌渠纵横、市镇密集的“花剌子模”绿洲，那里历来是中亚最富庶的地方，无疑也是“安息国”的中心。“于罗国”似即 Urganchi，元译“玉龙杰赤”，实即“乌洛浑赤”；而“番兜”即是“泊咄”。于此看来，鲜卑系的“乌洛浑”和靺鞨系的“泊咄”等部落很早就到了那里。安息王“满屈”之名，又恰是通古斯民族男子名“满住”[45]。因此，“安息”可能就是“爱新”；而《地理志》所记之

中亚部名 Aorsi[46]或 Asii[47]，显然都是“安息”的对音。

“奄蔡”是“咸海”周边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大宛列传》说：

>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馀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族名“奄蔡”，极似高车氏族名“乙旃”[48]，或靺鞨部名“安车骨”[49]。《后汉书·西域传》还有一段发人深省记载：“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阿兰聊”又极似另一高车氏族名“乙嵛”。

通古斯语中的“金”字有两种基本读法：“爱新”或“按出”。实际上，“爱新”亦读如“阿仍”或“阿伦”，高车族名“乙旃”和“阿嵛”，皆为其转音；而族名“奄蔡”和“安车[骨]”则都是“按出”的变写。与通古斯语近缘的匈牙利语的“金”字，即是 *arany*，其音似“阿兰尼”或“阿兰聊”。这是“奄蔡”改名“阿兰聊”的原因

“乙旃”是一个通古斯系部落，也是有根据的。《魏书·官氏志》曾说：“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其实，春秋中原古姓“叔孙”即是“肃慎”；“乙旃”必是通古斯之裔，才会被称为“叔孙氏”的。

六、“休循”、“捐毒”、“尉头”与“塞种”

所谓“塞种”，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渐渐淡出的西戎部落，而于西方来说正是那些来势汹汹的亚洲游牧民族，《汉书·西域传》提到塞种和它的两个部落：

>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

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显然，中国古代史家已经注意到塞种部落南下印度次大陆的史实。而《地理志》在谈到遍布欧亚草原的 Scythian 人时说[50]：

航入甲斯便海（里海），在右方的是那些 Scythian 人和 Sarmatian 人，他们住在 Tanais 河（顿河）和这个海之间的那些靠近欧洲的国土上，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游牧民。在左方的则是东部 Scythian 人，他们也是游牧的，散居在远至东海和印度的地面上。

因此，斯屈波同样也注意到 Scythian 人已经渗透到了南亚次大陆。这些不约而同的记载，都说明西方记载的 Scythian、Sarmatian 或 Saka 民族，就是中国历史曾有笔触的“塞种”。希罗多德更早就记载了 Scythian 人的民情。例如，他们以敌人颅骨为饮器[51]，用柳枝作占卜的[52]的习俗，以及不少与东方民族一致的人名。根据这些记载，不难推断 Scythian 人或塞种，是出自远东的蒙古人种民族。

《汉书·西域传》说：

休循国，……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

捐毒国，……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

尉头国，……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行二日，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

“休循”显然就是通古斯族名“肃慎”的别音。而该传虽然未明说“尉头”也是塞种，但它与“捐毒”相邻，而且与“捐毒”同音。历史上也可以发现与它们类似的族名，如《魏书·百官志》列之“纥豆陵氏”；辽代松花江下游“五国部”之“越里笃国”[53]，又名“伊呼图”或“玩突”[54]，音皆如“捐毒”和“尉头”。

七、“于阗”

“于阗”是西域最重要的族国之一，《史记·大宛列传》将其作为葱岭以东诸国的统称；此名在各代历史经常出现；《蒙古秘史》记其为“兀丹”[55]，《元史》作“斡端”或“忽炭”[56]；20世纪前期这个新疆地名仍作“和阗”，后简作“和田”；西文记为 Khotan。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列举了它的若干异名：

> 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涣那国，凶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溪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

“于阗”或 Khotan，与“于遁”、“兀丹”、“斡端”、“忽炭”等，音同北狄种名“乌谭”[57]。而中原地名“邯郸”、“洪洞”、“滹沱”[58]，先秦人名“黑臀”[59]等，亦与“乌谭”或“于阗”如出一辙。这都是西戎源自北狄，北狄源自中原的证据。“瞿萨旦那”、“屈丹”、“溪旦”可能只是“契丹”的转写；而“涣那”（Huna）则是“匈奴”之别音。《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另一个国名“乌贪訾离”，则应是“乌

谭”与“敕勒”之复合。

《魏书·西域传》说：

> 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

这无疑表明，于阗地方的蒙古人种血缘含量是很高的。而《新唐书·西域传》则记载“于阗国”的王位是在“尉迟”和“伏阇”两个氏族间轮换，它说：

> 王姓尉迟，名屋密，本臣突厥，贞观六年，遣使者入献。后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社尔之平龟兹也，其王伏阇信大惧，使子献橐它三百。……上元初，身率子弟酋领七十人来朝。击吐蕃有功，帝以其地为毗沙都督府，授伏阇雄都督。死，武后立其子璥。开元时献马、驼、豽。璥死，复立尉迟伏师战为王。死，伏阇达嗣，并册其妻执失为妃。死，尉迟珪嗣。妻马氏为妃。

西方学者蒲立本很早就指出“尉迟即月氏”[60]，“月氏”又即是“兀者”；而“伏阇”显然即是族名“靺羯”。因此“于阗”王族必是转辗出自于北方诸族的。

于是看来，河陇—敦煌地区的诸多西戎游牧部落，很早就沿楼兰、若羌、且末、策勒、于阗、墨玉一线，迁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从而形成至今犹存的一系列与东北亚族名相关之南疆地名，而“于阗”与“屈丹”、“涣那”之混用，“尉迟”与“伏阇”两个氏族的联

合统治，都是“乌谭”、“契丹”、“匈奴”、“兀者”、“靺羯”等诸多蒙古人种部落—氏族杂居该地的明证。

八、其他

龟兹

西域地名“龟兹”，应即燕北“厥机”，河西“沮渠”等族名之异译。《新唐书》中“龟兹”亦作“屈兹”，《秘史》和《辍耕录》则有蒙古部名“主儿扯”或“竹赤歹”。波斯《史集》明说“主儿扯”就是“女直”[61]。

《汉书·地理志》记载，“上郡”也有县置“龟兹”，有人说它在陕西榆林城北，《新斠注地理志·卷十三》则谓之在米脂县地方。且不论这个东“龟兹”究竟在“榆林”，还是在“米脂”；西域和陕北的两个“龟兹”必定是有关系的。颜师古说：“龟兹国人来降服者，处之于此县，故以名曰。”附会也。

唐代僧人慧琳在他的《一切经音义·卷八二·屈支国》中又说：

> 古名月支，或名月氏，或曰屈茨，或名乌孙，或名乌垒……即今龟兹国。

这兴许不是什么荒诞不经之说，而是道明了“月氏”、“乌孙”、“沮渠”、“乌垒”（应即“乌洛浑”）等，都是在“龟兹国”中杂居的部落。若把它们的种属、部落区分得太清晰了，或许反而是不科学的。

且末、且弥、扞弥

汉代西域之“且末”、“西且弥”、“东且弥”、“拘弥”等,有大量的相关族名线索。《魏书》记有北族姓氏“丘穆陵”;唐代突厥有“处蜜”,五代奚族有“啜米”,元蒙时有“扎马儿歹”等部名。它亦作名号,突厥“启民可汗”即是也。作为地名,今南疆“且末”犹存,北疆“且弥”易作“吉木萨尔”(古作“金满”),内蒙古有行政区名“哲里木盟”,哈萨克斯坦有 Chimkent(“奇姆肯特”)。这些族名、人名和地名都是同源的。

“且末”或“且弥”部落应出自东方。元蒙时代,被称为“水达达”的通古斯部落即有“吾者野人”、“吉里迷”、“女真”等部,“吉里迷”(应读“吉儿迷”)当是“且末”或“且弥”之源音。如作深究,中原春秋地名“即墨”、“羁马”也应与之有关,“且末”可能是在史前期便自中原出走的诸多部落之一。

蒲犁、蒲类、卑陆

它们当是北方族名“拨略”、“钵利曷”、“步六韩”之变音。古之“蒲类海”,今名“巴里坤湖”,就是这一音变的证明。

西名 Bulghar(“保加尔”),元蒙时称“孛剌儿”的音转,告诉我们“钵利曷”可能是“仆骨”、“钵和”、“婆莴”之转。“仆骨”是鲜卑系民族最重要成分;春秋时的“亳”部落,《魏书》中的“钵·室韦”,和现代蒙古“布里雅惕”部,都是不同时代的“仆骨”部落。

无雷、乌垒、尉犁、郁立师

皆蒙古语“山”字“乌洛”的异写。即春秋时谓之“山戎”,或汉、晋、北魏之“乌桓”或“乌洛浑”。它是使用“蒙古原语”的基本

部落之一。

《魏书·官氏志》记载的“冤赖氏”、“越勒氏”,同书《高车传》的“斛律氏”,3世纪中出现在多瑙河下游的Urugundi部[62],阿提拉Hun人中的Urog部[63],匈牙利人的Olah氏,达斡尔族中的“敖拉氏”[64]等,都是这个“山戎”氏族。前述“花剌子模”地名Urganchi,也必曾是某个“乌洛浑”部落的聚居地。

莎车

族名“厙狄”(音“失吉”)的异写。“厙狄”的缩音“狄”之能为北方诸族之统称,它在上古时必曾十分强大。汉族“狄氏”,羌—藏部落“析支羌”,突厥“塞尔柱”氏族等,皆其裔也。后魏名人“厙狄干”被尊为“鲜卑老公”,“厙狄”为东胡—鲜卑系氏族,当无疑。

车师

《晋书》记载有“北狄……赤沙种”。《魏书》的“者舌”、“折薛”,《大唐西域记》的“赭时”等西域国名,皆应为播迁中亚的“车师”部落。《金史》有女真氏族“赤盏”,《辍耕录》有蒙古部名“赤乞”的记载。匈牙利姓氏Csiszar更如“车师”或“赤沙”。“车师”也可能是族名“赤狄”之异音。

狐胡

“狐胡”即“回纥”。《汉书》云:“狐胡国,王治车师柳谷,去长安八千二百里。户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胜兵四十五人。”它应是今“吐鲁番”附近的一个小部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孤胡”,乃“狐胡”之误。

阿富汗国昆都士地区，有现代地名 Warwaliz，它可能就是唐代“阿缓城”[65]，或《梁书》之“滑国”，或《大唐西域记》之“活国”。Warwaliz、“滑国”、“活国”皆“回纥”之异写。

九、“昭武九姓”

汉代关于西域的记载，是于纪元前形成的中亚人文的终结描述。隋唐以后，西域的居民又经历了进一步的蒙古人种化，语言的突厥化，和宗教的伊斯兰化的漫长过程。北魏以来，中国历史常以“昭武九姓”来记载以“康国”为中心的葱西诸国。《魏书·西域传》说：

>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

《新唐书·西域传》亦有雷同的说法；

> 康者，……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

这两则记载指出“昭武九姓”是来自河西的民族。因此，它们与其

说是“月氏”之裔，还不如说是“西戎”之后。它们出走的年代远远在匈奴兴起之前。总之，蒙古高原或河西走廊上的天灾人祸或强权更替，都会引起民族迁徙的连锁反应。

而“祁连北昭武城”又必指汉置“张掖郡”之“昭武，莽曰渠武”地方。以“昭武”为名的地方其实很多，如：“酒泉郡”的“载武”，“安定郡”的“鹑阴”，“上郡”的“雕阴”，“西河郡”的“驺虞”，“雁门郡”的“疆阴”，“上谷郡”的“沮阴”，“右北平郡”的“徐无”等皆是[66]。而春秋中原地名“曲阜”、“曲沃”、“丘舆”、“钟吾”、“龟阴”、“壮武”等，也是它的别字。10 世纪时，敦煌—高昌—且末地区盘踞着“仲云”[67]民族，人说它是“小月氏”的遗族。今世伏尔加河流域还生活着 Hun 人的后裔“楚瓦什”(Chuwash)民族。族名“仲云”和“楚瓦”与“昭武”就更相似了。这些都表明“昭武”是出自于中原，弥漫于塞北、河陇、西域，乃至远徙东欧的一个东方族名。

我们也不难猜测“昭武”诸国名的出源：

安国	即“安车骨”或“安息国”；
曹国	即“昭武”；
何国	即“回纥”或“护骨”；
那色波国	即“芮奚”；
乌那曷国	即“乌洛侯”；
火寻	即“乌孙”或“纥升骨”；
戊地	即“兀者”或“兀的改”；
穆国	即“靺鞨”。

《新唐书·西域传》还曾经提到“康国”王族的情况：

> 高宗永徽时，……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万岁通天中，以大首领笃娑钵提为王。死，子泥涅师师立。死，国人立突昏为王。开元初，……其王乌勒伽与大食亟战不胜，来乞师，天子不许。久之，请封其子咄曷为曹王，默啜为米王，诏许。乌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钦化王，以其母可敦为郡夫人。

其中的人名和称号也都表现出东北亚民族的属性：

拂呼	即“钵和”；
娑钵	即“须卜”；
泥涅师师	即“女奚烈”；
突昏	即“吐浑”；
乌勒伽	即“乌洛浑”；
咄曷	即“屠何”；
默啜	即“满柱”；
可敦	即鲜卑语之“夫人”。

那时中亚地名[68]，也同样有东北亚族名特征。如：

悉万斤	即“悉万丹”（今“撒马尔汗”）；
布豁、捕喝	即“钵和”（今“布哈拉”）；
贰师	即“女奚烈”；
俱战提	即“沮渠”；

野叉、越于底	即“兀者”；
柘折、瑟底痕	即“厖狄”；
乞史	即“赤沙”；
瞰羯	即“弘吉剌”；
奥犍	即“阿干”。

十、结束语

对于东西方人类交汇的中亚地区，历代先贤留下了丰富的知识遗产；但由于当时的条件，他们未能超越耳闻目睹的认知局限。尽管，现代中亚人文、种属与古代西域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那些无处不在的古代族名、人名、地名记载，却是重构古代中亚人类活动的语言信息。本文由此得出了西域诸族国名是与东北亚民族族名相关的结论。始于远早于春秋的时代，游牧的“北狄”部落便陆续进入了陕甘宁青地区，并演变成了“西戎”民族。由于特定机遇，它的“周”、“秦”部落成为了中原农业民族的主人；亦由于种种动因，许多集团被推入了中亚沙漠的绿洲中，成为了那里的统治者。

张骞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其实，西域原住民固然是“经商务农”的印欧种百姓；而“称王称霸”的却是蒙古种游牧部落。在中亚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持续地进行着强迫或自愿相结合的血缘融合；那种于东方人（如张骞者）看来象西方人，于西方人看来象东方人的中亚人种，也就是在数千年中逐渐地形成的。

注释

[1]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 32。

[2]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568。

[3] 牛汝辰《新疆地名概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页64。

[4] 同[2],页1568。

[5]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东沃沮》,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816。

曰:"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馀,南与秽貊接。其地东西狭,南北长,可折方千里。其葬,作大木椁,长十馀丈,开一头为户,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

[6] 《晋书》卷九十七,《四夷列传·北狄·匈奴》,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549。

曰:"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裨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歧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

[7] 《魏书》卷一百三,《高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307。

[8]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鹘传下》,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148。

曰:"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籍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坚昆之人得以役属之。"

按:雪橇或冰橇为通古斯民族所率先使用的雪上或冰上的运载工具,使他们在寒冷地带得以渔猎生存和远途迁徙。

[9] 《穆天子传》卷一,摘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页6。

曰:"乙酉(周穆王十三年,即公元前989年,闰二月十七日),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己亥(三月初二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

[10] 同上,页10,注15。

[11] "同构"为一数学"集合论"之概念,指两个不同的集合之元素间一一对应,且经某种"运算"或"变换"后的"积"之间,亦相对应。

[12] 《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12。

曰:"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

按:人名"后稷"、"不窋"、"公刘",即族名"兀者"、"仆固"、"斛律"。"不窋……奔戎狄间"和"公刘虽在戎狄之间"也都表明周部落与戎狄的密切关系。

[13] 《史记》卷五,《秦本纪》,页174等。

一曰:"大费生子二人……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又曰:"秦用馀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按:"或在夷狄"和"遂霸西戎",表明"秦"部落是西戎之强部。该纪所记的秦族人名,如:"蜚廉"、"恶来革"、"太几"、"大骆"、"百里奚"、"奄息"、"搏里疾"、"到满"、"乌获"、"孟说"、"白起"等,皆胡名也。

[14]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275。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23.

[15]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大月氏国》,页2275。

曰："大月氏国……，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

[16] 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886，页185。

[17] 陈庆英主编《中国藏族部落》，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页337、392等。

[18] *Indian Subcontinent*, London, Bartholomew, 1997. N33° × E70°.（北纬33° × 东经70°。）

[19] 同注[15]。

[20]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XV - I - 27, translated by H.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88, VII, p. 47.

[21]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948。

[22]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7。

[23] 荣新江《小月氏考》，《中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49。

[24]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XI - 8 - 2, translated by H.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88, V, p. 261.

[25] 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页253—270。

[26] 同上，页271；
D. Adams, *Tocharian Historical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88, pp. 2—3.

[27]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 29.

[28]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摘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页115。

[29]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滑国》,中华书局,点校本,页812。

[30]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页316;

《蒙古秘史》第120、213节,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中华书局,1957,页79、217。

按:《史集》原文作:duq(u)lat,《秘史》作:"脱忽剌温"或"脱忽剌兀惕"。

[31]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页439。

[32] 《蒙古秘史》第133节,页91。

[33]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页144。

曰:"王汗是客列亦惕、董合亦惕及客列亦惕其他诸部落的君主。他们以人数众多的部落、军队和古代的君主驰名,他们与蒙古诸部相似:在风俗、习惯、方言、词汇上彼此相近。王汗原名脱斡邻勒(tuguril),用突厥语及客列亦惕部落语来说则是屯黑鲁勒(tungrul)。"

按:"脱斡邻勒"(tuguril)和"屯黑鲁勒"(tungrul)之声异,乃同"屠何"和"东胡"之音别。

[34] 杨继东《秃忽鲁帖木儿》,摘自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83。

[35]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四期;

刘凤翥《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8年,第二期。

[36] 同[31],页444。

[37] 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8。

[38]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二十二国》,台北,三民书局,1998,页648。

[39]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879。

[40] 西夏民族又称"党项",突厥碑文作"唐古特",元代西僧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记之为Tangut,译作"唐兀"。学界普遍认为它源于羌—藏民族。作者以为"党项"、"唐兀"、"唐古特"、Tangut等皆"东胡"、"大夏"之转音。该族人有皮肤黝黑之特征,是融有藏系血缘之故;但其主流血缘应为有东北亚背景的"西戎"之后。其早期姓氏"野辞"、"米擒"、"拓跋",和后期姓氏"野利"、"没藏"、"西壁"、"西五",即鲜卑或通古斯系部落名"兀者"、"靺羯"、"拓跋"、"挹娄"、"鲜卑"、"室韦" 等。西夏语谓"天子"为"兀卒"(《宋史·外国列传·夏国》),"大"为"绀孛"(《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页214),皆同通古斯—满语。今银川—青铜峡之间为西夏故地,明代有地名"瞿靖"、"王铨"、"王澄"、"魏信"、"唐铎"、"许旺"(皆未见于《汉书·地理志》)等,其实它们就是北狄—西戎族名"沮渠"(即"女直")、"兀者"、"乌孙"、"拓特"、"室韦"等(见徐庄、吴忠礼、鲁人勇著《宁夏历史地理考》,页223)。19世纪流亡俄属中亚的陕甘宁青"东干族"也是其后裔,"东干"似即"党项"、"唐古特"之谐音。现代学者对于西夏文字的研究颇有成绩,然而对西夏文字的语音构拟却未曾着力,故西夏语的归属还待判定。

[41] 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三辑,页4—8。

[42]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73、93、151。

[43] 同[33],第一分册,页269。

[44] 贾敬颜、朱风《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页155、164。

[45] 莫东殷《满族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8初版，1979重版，页78。

曰："那么这个名称（按：指国名'满洲'）应如何解释呢？孟森、郑天挺、冯家升诸氏皆谓为部族名，……据《满洲源流考》所说，满洲本作满珠，原系部族名，起源于曼殊师利佛号。按曼殊师利即文殊师利，是女真人所崇信的一位菩萨。后曼殊转为满珠或满柱，也渐成为女真最大酋长的称号，明初有李满住，……奴儿哈赤部下，全称奴儿哈赤为满住汗。"

[46]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XI－5－8, translated by H.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88, V, p. 243.

[47] 同注[24]。

[48] 《魏书》卷一百三，《高车传》，页2310。

[49] 《金史》卷一，《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

曰："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50]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XI－6－2, translated by H.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88, V, p. 245.

[51] 希罗多德《历史》，页290。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65.

[52] 同上，页290—291。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67.

[53] 《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下·五国部》，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392。

曰:"五国部。剖阿里国、盆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笃国、越里吉国。"

[54] 《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七,《女真》;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页339。

曰:"剖阿里亦作怕忽……;盆奴里亦作蒲奴里……;奥里米亦作咬里没……;越里笃又作玩突、伊呼图;越里吉又称越棘……"。

[55] 《蒙古秘史》第263节,页260。

[56] 同注[2]。

[57] 同注[6]。

[58]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7,页22—23。

[59]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页1782。

[60] 荣新江《小月氏考》,《中亚学刊》第三辑,页48;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RAS(《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会刊》),1966,pp. 9—39.

荣新江曰:"蒲立本……从语言(按:应为'语音')对证出发,将月氏比定为尉迟、越质。他认为,尉迟最早并不是指于阗王姓,而初见于《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公元265年,国仁先祖之一利那'立击鲜卑吐赖于乌树山,讨尉迟渴权于大非川,受众三万余落。'大非川恰好和小月氏住地湟中相近。另外,他还根据《魏书》卷二《武帝纪》:'(天兴)六年(403)春正月辛未,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的记载,认为从此以后,尉迟部也即月氏的后裔成为北魏八姓之一,直到唐代,仍处于显贵地位。"

[61]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页227。

曰："'主儿扯'为蒙古人所用的名称，在汉语中称为'女真'。"

[62]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1973, p. 452.

该书说，西方记载公元250年代，多瑙河下游就有一个名Urugandi的部落，它与哥特人相处在一起，西方学者为它的族源讨论了一百多年，有人认为它是日耳曼人，有人认为它就是Strabo的《地理志》所记载的民族Urgoi。其实它就是"乌洛浑"，它应该是Scythian人中的一个部落。

[63] P. Golden, *Khazar Studies*,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80, pp. 27—48.

[64] 大间知笃三《达斡尔族巫考——以海拉尔群体为主要对象》，载《北方民族与萨满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页50。

[65]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页10；
J. Markwart,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p. 45.

[66] 按：地名"鹑阴"、"雕阴"、"疆阴"、"沮阴"之"阴"，拟读wu或hu。有人说"月氏"（"兀者"）即"阴戎"，一证也。汉代西北地名含"阴"字者很多，凡按此类音读，其源则明。如："阴槃"即"悦般"，"圜阴"即"回纥"等。
又按，《说文》曰："雕，琢也。"又说："琢，雕也。"因此"雕"当读"琢"。显然，"雕阴"应读作"琢武"，亦即"昭武"。

[67]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页918。

曰："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庐碛。云仲云者，小月氏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

[68]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下》，页6243—6250。

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成分

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性，可与欧洲语言的多样性相比拟[1]。然而，“北方汉语”却又有着并不亚于“美洲英语”的统一性。后者产生于欧洲诸国大量移民的近三百年间；而“北方汉语”的出现，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这种“大一统”现象，使我们猜测：“北方汉语”必定是在一个漫长时期里，由许多不同部落的原始语言融合而成的。那时候，在黄河流域一定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融合活动。

现代语言学是将“汉语”归属于“汉—藏缅语系”的，这种极具说服力的理论，使人们开始积极地注意“藏缅语”与“汉语”间的关系；但同时又使人们忽视了其他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实，“中原居民”与“北方诸族”直接相邻，他们之间必然会有血缘上的联系；其次，基于对地缘和人口的考量，似乎不应是“藏民族”本身，而是其他“藏缅式语言”的载体部落参与了“中原汉语”的形成。然而，“北方诸族语言”与“藏缅式语言”，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语系分野。因此，辨明中原地区古代民族来去的方向，及其语言的“先后”、“主客”和“转换”关系，将是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

许多证据表明,“戎狄诸族”是在远古时期从中原地区出走的。“北狄”部落在草原地带,因改营游牧而获得了巨大迁徙能力;所谓“西戎”民族,也就是沿河套通道转徙陕甘宁青,而后再经河西走廊扩散至中亚、南亚、东欧地区的“北狄”部落[2]。正因此,“北狄”和“西戎”的许多部落名,乃至“西域”的族国名,都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历史中追溯到它们的始源;反之,“华夏民族”民族的许多语言信息,亦可以在欧亚草原上去寻觅它们的去踪。“北狄”、“西戎”与“中原部落”间的这种同源关系,正是现世所谓“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有着举足轻重分量的根本原因。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和湖南的“城头山遗址”等考古发现,震撼了世界各国学术界,这些七千至九千年前的古代农耕文明的出土,有力地表明:长江流域有着更早的人类社会活动。其次,以现代基因科学为基础的人类学的研究,也发现亚洲东部人类男性 Y - 染色体种类,自南向北渐趋单纯的瓶颈现象[3]。这些考古学、基因—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重现了古代人类迁徙活动,这也为“汉民族”和“汉语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线索。

一、历史人名、地名和族名比较研究之意义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例如,“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而“族名”又往往会转化为“姓氏”、“人名”和“地名”。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白令海峡两侧的地名或原住民的族名:“爱斯基摩”(Eskimo)、“楚克奇”(Chukchi)、“阿留”(Aleut)等,就很象“通古斯”族名“兀

者”、“沮渠”、“挹娄”。在“阿拉斯加”一侧的“尤比克语”(Yup'ik)中,还保留了为数不少的“通古斯语”的基本词汇;但是,尤比克语中的“基数词”却有着“五进位制”的特征[4]。这表明:可能是在“通古斯语”的“数词系统”产生之前,这些“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就带着他们的“族名”离开了“通古斯民族”部落群体。

不少人企图从“地名”去为“民族”寻根。例如,在满、蒙地区就可以找到许多个“鲜卑山”。事实上,上古人类是不可能先为山川河流,而后为自身血缘命名的;这些山水地名不过是“鲜卑部落”迁徙活动的遗迹。同样,人们寻找“族名”的语义,也往往是徒劳的。象“爱新”和“阿巴嘎”(通古斯语“金”和“天”),或“叱奴”(蒙古语“狼”),这样一些保有语义的族名,是为数不多的。“语种”的湮灭在历史上从未休止过;然而,人们却并不因为语言的更替,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族名”或“姓氏”。在古代部落及其语言的兴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丧失了它们曾经有过的含义;那些探索“突厥”、“蒙古”、“女真”,乃至“华夏”这样的族名的语义的努力,还不是统统都归于失败了吗?

由原始“族名”发展而来的“地名”和“姓氏”,无疑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由于它们大部分失去了语义内涵,因此也不再迁就语言的游移变幻,从而成为语言中较稳定的语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属、语属信息,是历史—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研究内容或方法。而中国历史又恰恰在这些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记载。

《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了两个似不显见于后世的北方族名:“空同”(khong-thong)和“姑他”(kha-tho)。其实,后史记载的“乌谭种”[5]、“渴单氏”[6],“纥突邻”[7]部,辽代“越里笃”[8],都是

它们的变音。“塞种”部落“捐毒”或“尉头”[9]，乃是它们远涉中亚的同源族类。“于阗”或“和田”，又是这些部落在西域形成的族国名[10]；《蒙古秘史》将其记作“兀丹”[11]，《元史》则作“斡端”或“忽炭”[12]。实际上，中原地名“邯郸”、“洪洞”、“滹沱”，都是它们最恰当的对音。从这两个族名的语音解析，我们或许可以瞥见源自中原的古代人类部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流动势态。

《史记》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13]的“三河”地区，是“华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时，那里的地名[14]与“北方族名”的关联，是相当普遍的，如：

北虢　　即“仆骨”；
东虢　　即“东胡”；
大卤　　即“同罗”；
曲沃　　即“昭武”；
令狐　　即“术和”；
羁马　　即“吉里迷”；
狐厨　　即“兀者”；
箎祈　　即“赤狄”。

所谓中原的“戎”名[15]也多是些北方民族的族名，如：

扬拒　　即“按出”；
伊雒　　即“挹娄”；
陆浑　　即“术和”；
鄋瞒　　即“悉万”；

皋落	即“斛律”。

这些关联现象不仅是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证据，也是中原古代居民族属的判据。

先秦人名也应为人们所重视。如：“舜”的生母之名“握登”[16]，就是蒙古语中的“夫人”——“合敦”一字；“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宋国”的末代诸侯“景公”名“头曼”[17]，竟同一个匈奴单于之号[18]。在与“北方诸族”打了数千年的交道后，我们或许还会联想若干古代人名，就是北方民族的族名，如：

东郭	即“屠各”或“东胡”；
扶苏、孟尝君	即“靺鞨”或“密须”；
胡亥	即“回纥”；
无忌、伍子胥	即“兀者”。

而《秦本纪》记载的：“大费”、“蜚廉”、“太几”、“大骆”、“奄息”、“到满”、“乌获”、“孟说”、“白起”、“恶来革”、“百里奚”、“摶里疾”等人名，则无一不是“胡名”、“胡姓”[19]。

当然，对“族名”、“地名”、“人名”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汉语古代语音问题。清代以来的中外文字语言学者们对先秦语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韵》系统上从事反推。一些学者客观地指出，作为规范汉语语音的一种努力，《切韵》等书也把许多“古音”抹煞掉了[20]。为重现各代“古音”，选取一些非汉语的对照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梵语和汉语的译音比较，曾对认识唐代语音起过有益的作用。又如，藏语和汉语间的比较，则划时代地推动了

汉—藏缅语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而近百年来，西方历史—语言学者对古代西域地名、族名、人名，怀有极大的学术兴趣。他们很精明地看到，从中可以发现上古汉语的一些语音线索。

事实上，对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地名的比较研究，不仅具有“语音学”的价值；我们还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地去解析“汉民族”及其语言的融含成分。

二、春秋时期齐鲁地区住民的族属分析

“春秋”是一个仕农工商全面发展，文化教育长足进步的时代。而春秋时代的“齐鲁”地区，又是农业文明的中心，孔子作为“专业”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现在鲁国地方，是齐鲁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必然结果。

西周的“宋”、“卫”、“鲁”三国，又是“商王朝”的故地，学界一般也认为“商族”与“东夷系”民族的渊缘较深。研究“商部落”族源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创制了“甲骨文字”，这于“汉民族”及其语言的形成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史记·仲尼弟子》所记载的孔子的七十七个平民学生，大多是出自“商奄”周边诸国，他们的姓氏则为我们检索的“商族”居民的族属，提供了一套标本。这些姓氏本该是古代中原的部落—氏族名；而它们与北方诸族族名的相似性，则揭示了中原古代居民与中国北方民族同源的事实。

本文的姓氏研究始于孔子学生中的含“公”诸姓。

公姓诸生

孔子弟子中有十一人的姓氏含有“公”字：“公冶长”、“公皙哀”、“公伯缭”、“公西赤”、“公孙龙”、“公祖句兹”、“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公西舆如”、“公西箴”。此外，《史记》还说：“黄帝者，……姓公孙”[21]。因此判定这些含“公”姓氏的族源，对于中原古族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有人说“公孙”是“公之孙”，“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这大概都是些无稽之谈。我们还得从语音上来寻找它们的族名之源。从字形上来看，“公”与“瓜”有相象之处；但是“公”和“瓜”究竟是否相关？从文字考据的角度来说，是颇难求证的。然而，“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我们也若将“公”作“乌”、“兀”、“斛”、“纥”读，所有含“公”姓氏[22]与北方诸大族族名的关联，倒是一目了然了：

兀者：　公祖、公肩、公车、公仇、公朱；
回纥：　公夏、公何、公户、公扈、公华；
乌孙：　公孙、公山、公申、公慎、公胜；
纥奚：　公西、公皙、公师、公施、公息；
曷萨：　公沙、公若、公帅、公索、公输；
斛律：　公良、公林、公刘、公留、公旅；
纥突：　公涛、公佗、公德、公都、公堵；
巫马：　公孟、公明、公罔、公文；
呼延：　公冶、公言、公羊；
阿巴嘎：　公伯、公宾。

因此，将“公”读为“乌”或“兀”，不失是个成功的归纳和猜想。而

“黄帝”亦姓“公孙氏”，也必是“乌孙氏”；而“乌孙氏”很可能就是“爱新氏”[23]。这无疑揭示了“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是有着深度渊缘的。

冉氏诸生

孔子弟子中有五人的姓氏含“冉”字：“冉耕”、“冉雍”、“冉求”、“冉孺”、“冉季”。

一般认为“冉”字即是“冉”字。其实，它是“内”或“南”的别写；这个说法可能较少质疑，因为“楠”字，亦是作“枏”写的。“冉”从“泥母 n”，读“纳”、“奴”、“粘”、“囊”大概皆可。“冉耕”、“冉雍”、“冉求”、“冉季”等，应与女真姓氏“粘葛”、“纳合”、“纳吉”相关。而“冉孺”则必是蒙古语的“太阳”*nar*，或 *naran*（纳兰）一字。

除此之外，仲尼诸弟子中还有：“南宫括字子容”和“壤驷赤字子徒”者；另如商王“南庚”者，和“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者。这些“南宫”、“南庚”、“壤驷”、“南子”，以及古代姓氏“淖盖”和“淖齿”，当然都是“冉耕”和“冉季”等的变音或异写。

颜、燕、原氏诸生

王力先生曾就“安”、“焉”、“恶”、“乌”四字的同源性，进行过论证[24]。“安”、“焉”（an），与“恶”、“乌”（a、ak、al）间的音转，本与 n 和 l 间的谐变有关；这种谐变出现在字首，就有“南”和“兰”之通；发生在字尾，则是“安”和“乌”之转。“焉”和“乌”相通，是我猜测“焉耆”即“兀者”的依据。

“颜”（ian）与“焉”音同，常作“安”（an）读；基于上述的音转

规律，它当然也可以转读作“乌”或“兀”。因此，孔子的五名“颜”姓弟子的姓氏：“颜回”、“颜无”、“颜高”、“颜哙”、“颜何”，可能就是族名“乌护”、“护骨”、“回纥”的转音。

孔子另外四名学生的姓氏：“颜幸”、“颜祖”、“颜之”、“燕伋”等，显然就是通古斯族名“爱新”、“按出”、“奄蔡”、“安息”。而另一名姓“原宪”者，当是“元宪”或“兀宪”[25]，或即“乌孙”之异写。

高柴、后处

仲尼弟子中有“高柴字子羔”者。“高”字可能不是读作 gao 或 kao，而应该是读作 ghao、khao、hao 或 ao 的；事实上，由“高”字衍生出来的“蒿”、“镐”、“毫”、“豪”等字，也都是读 hao 的。如是读来，“高柴”和另一名学生“后处字子里”之姓“后处”，都应当是“兀者氏”无疑了。

卜商、伯虔、步叔乘、邦巽

“卜商字子夏”，“伯虔字子析”，“步叔乘字子车”，“邦巽字子敛”四人的姓氏，可能与出现于不同时代的“白羊”、“拔野古”、“伯岳吾”、“巴牙兀惕”等北方部落名有关。

“伯岳吾”可能出自“伯颜”[26]，即满、蒙两语中的“富人”一字；这个氏族后来在欧亚草原上播散得很辽远。据 8—9 世纪的西方记载，南俄地区出现过一个凶悍部落名 Pechenegs（“伯虔”？），匈牙利人称其为 Bes(h)enyo（“卜商”、“步叔乘”、“邦巽”？），阿拉伯文献则记之为 Bajanak（“伯颜”？），它们可能就是后来的“钦察伯岳吾”部。从这些欧亚草原上的“流”，我们可以回溯它们出自黄河流域的“源”。

施之常、石作蜀

“厖狄”是个重要的氏族，北齐名人“厖狄干”是被称作“鲜卑老公”的[27]。唐代漠北“思结”部，元蒙时的“失吉”氏，入主近东的“塞尔柱人”，可能都是“厖狄”之裔。古代西域的“瑟底痕”[28]，现代中亚的 Sazagan、Shazhagay、Shizhaga 等地名，想必都是“厖狄”部落徙居之遗存。

孔子弟子“施之常”和“石作蜀”的姓氏“施之”和“石作”，大概就是“厖狄”。据公元 491 年安提俄克城“约翰”的记载，有一个名叫 Sigizan 的 Hun 人，曾服役于拜占庭的军队[29]，Sigizan 显然就是“施之常”。

司马耕

仲尼有弟子“司马耕字子牛”者。

一般以为“司马”是从官衔转化来的。司马迁在《自序》中，却从未说过因祖上当过“司马”官，而袭了这个“司马”姓。在他的先人中，还有名“蒯聩”、“昭豫”、“无泽”者，它们显然是从族名“护骨”、“昭武”、“兀者”转化来的，看来太史公的家系也有着“戎狄”的血统。

人名“司马耕”、“司马迁”，与古代族名“悉万斤”、“悉万丹”、“悉泯健”[30]、Sarmatae[31]（“萨尔马泰”），地名 Samarkand（“撒麻耳干”）等如此音似。我想，汉姓“司马”、“西门”，胡姓“泣伏”、“乞伏”、“石抹”，匈牙利姓氏 Szima 等，可能都是族名“悉万”之变译。

巫马施

与“巫马”同源的“胡名”、“胡姓”随处可见。《魏书》所记载的人名“务目尘”[32]，氏族名“侯莫陈”[33]；《新唐书》记载于阗王“姓尉迟氏，名屋密”[34]；宋代西夏民族则有“嵬名”、“讹命”等姓氏；《辽史·兵卫志》则记载了“属国军”名“乌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这些人名—氏族名，和中原地名“侯马”、“高密”，新疆地名“哈密”（维吾尔语读“库密”），西域古国名“胡蜜丹”等，可能都源自北方族名“库莫奚”一字。

澹台·灭明

“澹台”当是“拓特”，即“鞑靼”之源名。蒙古人通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部落为“水达达”，亦可见“拓特”是个通古斯系姓氏。

“灭明”，北方诸族中没有这个族名的显性记载；但西域却有“迷密国”，它是“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国”，《新唐书》说：“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35]。

“澹台·灭明”，或许应该是复合姓氏“拓特·弭秣”。

漆雕

孔子有三名姓“漆雕”的弟子：“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说文》说“雕，琢也”；又说“琢，雕也”。因此“漆雕”当是chi-tiu或chi-teok，即族名“赤狄”（chi-ti）之音。

秦冉

“秦冉字开”。“秦冉”当是后世鲜卑系民族部落名“叱奴”、

“丑奴”或“叱那”，即蒙古语之“狼”字。

春秋时代的“殷之遗民”，仍然保留了“夷”、“狄”民族的姓氏特征，这显示他们与“北方诸族”有着同源的关系。他们一定是经过了使用“藏缅式语言”的部落的长期影响，才转化成使用“汉语”的“中原汉族”的。

那时，中原地区的语言可能还相当复杂，各部落语言的“汉化”过程也并不是同步进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语言，《左传·鲁襄公十四年》记载了一则有趣的相关故事。吴国被楚国战败，而告于盟主晋国，各诸侯在一个叫“向”的地方聚会，主盟的晋大夫“范宣子”，逮捕了私通楚国的莒国公子“务娄”；他又怀疑“姜戎氏”泄密，而指责来会的戎子“驹支”；后者则作了一番颇长的辩解，其中言及：

>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这无疑说明，虽然那时“汉语”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诸戎”部落也积极参与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活动，但是它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中原诸国的主流语言仍然是不同的。

三、春秋前后“齐”、“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名

尽管，许多中原部落在远古时代就逐个地离析出走了，有些则融合消蚀了，但它们仍然在黄河流域留下了痕迹。在那些自“春

秋”保留至今的中原地名中，许多就是“华夏民族”的祖先部落名。

引言中对黄河中游“三河地区”的“地名”和“戎名”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那里的古代部落，与“北方诸族”有着亲缘关系。而《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黄河上游的“西戎”之地，即今天的甘肃庆阳、宁夏固原、陕北延安一带的汉代地名，亦与“北狄”族名有着鲜明的可比特征。例如：

乌氏、郁郅、月氏	即“兀者”；
木禾	即“靺鞨”；
安俾	即“阿巴嘎”；
龟兹	即“厥机”、“沮渠”；
复累	即“覆罗”；
直路	即“敕勒”、“叱勒”；
回获	即“回纥”；
朝那	即“叱奴”；
独乐	即“吐如纥”、“同罗”。

如果在“齐鲁地名”与“北方诸族族名”之间，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可比性，那将使整个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与“北方诸族”的同源关系，得以全面展现。而这种比较也并不是难以实现的。

我们不难发现自“春秋”始，中原地名的记载数量有一个“飞跃性”的增长。它们中的大部分无疑是承继于前代的，其中还有不少一直延用到现代。这显然表明：从“春秋”起，中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已趋稳定。下文用于比较的“齐鲁”及周边地名都摘自《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了弥补疏漏，我们添以若干战国和秦

汉时代地名，以及个别西域族国名，来强化这个对比。如：

春秋、战国、秦、汉时代齐、鲁及周边地名	北方诸族部落名
公丘、冤句、魏其、郁秩、夏丘、尉氏	兀者、兀惹、(焉耆)
东阿、东牟、东垣、东昏、单父、堂阜	东胡、屠何，达斡尔
祝其、赘其、垂葭、曲池、曲成、楚丘	沮渠、主儿扯、女直
丘舆、钟吾、龟阴、壮武、曲阜、曲沃	昭武、仲云
取虑、昌虑、訾娄、邹卢、陈留、巨鹿	敕勒、叱勒
牧丘、马泾、蔓葭、麦丘	靺鞨、靺羯、勿吉
咸丘、安丘	按出虎、安车骨
鲜虞、鲜牟、豕韦、司吾	室韦、失韦
外黄、五吾、高鱼、武垣、滑	乌护、回纥
无娄、袁娄、缘陵、胡陆	斛律、乌洛侯
廪丘、闾丘、梁丘、犁丘	如甲
蒲姑、平阴、符合	仆骨、婆莫
符离、浮来	钵利曷、步六孤、(蒲类)
高唐、狐骀、邯郸	乌谭、(和田)
菟裘、陶丘、桃丘	突厥、泰赤兀
石门、鄋瞒	悉万、乞伏、(悉万斤)
须句、石窌	厖狄、失吉
高密、姑幕	库莫奚、(哈密)
重馆、长葛	镇国
逼阳、平阳	白羊、伯岳吾
京兹、长勺	(精绝)、(金积)
即墨、葭密、羁马	吉里迷、(且末)

夫钟	覆钟
夫馀	扶馀
祝柯	术虎
胡阳	呼延
舞阳	兀颜
不其	白狄
夹谷	夹谷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若干现象，并得到一些结论：

其一，后世北方诸族部落名“兀者”、“东胡”、“沮渠”、“昭武”、“敕勒”、“靺鞨”、“室韦”、“回纥”、“斛律”等，对应着为数众多的中原古地名；这些北方大族，也必定曾是上古中原大族。

其二，被认为是“通古斯系”的部落名“兀者”、“沮渠”、“靺鞨”、“按出”，与“东胡—鲜卑系”的“东胡”、“室韦”、“昭武”、“敕勒”、“回纥”、“斛律”等部落名转化成的地名，呈交错分布。因此，它们的血缘和原始语言的异同，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其三，地名“桑丘”在多处出现，它们与“襄丘”或“商丘”一样，显然都曾是“商部落”的聚居地；鲁国的“曲阜”，晋国的多个“曲沃”，可能都是源于族名“昭武”的地名；山东半岛尽头有“即墨”，晋西南则有“羁马”，两地相隔千里。这些同源地名四处分布的现象，表明远古时代，黄河流域曾经有过大规模的部落迁徙活动。

其四，“中原地名”与“北方诸族族名”间的全面对应表明：后世北方诸族，都是“古代中原民族”出走北方的胞裔。而“中原汉语”与现世“北方诸族语言”间的截然不同，则又表明：使用“藏缅

式语言”的后来部落的不断注入，是这种“古代汉语”形成的根本原因。

四、语言比较的证据

上述“姓氏”和“地名”研究表明，演变成“汉族”的中原古代居民，与“北方诸族”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如果我们能从“中原汉语”中发现“北方诸族语言”的成分，也将是这种联系的重要证据。经过数千年的渗透和融合，北方诸族仍然使用着相当不同的语言，这些区别也必然是承继于上古时代中原语言的多元性。因此，将“中原古代汉语”与“北方诸族语言”逐一比较，不仅是对“汉语”的“语谱分析”，也是解析“汉民族”内涵成分的有效手段。

现代语言学并没有注意到上述的现象，西方语言学界是将“汉语”和“藏缅语”视为亲缘语言的。所谓“汉—藏缅语系”诸语言，大部具有单音节词根和每个音节都有固定音调的特征。尽管，这个理论几乎完全忽略了“汉语”与“北方诸族语言”的关系，但它仍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理论体系。“汉语”和“藏语”间的大量的基本语词的语音对应现象，构成了这个理论合理的内核，如：

汉语	变通字	吴音	藏语[36]
我	吾、俺	ng	nga
五		ng	nga
鱼		ng/nyu	nya
二	贰	nyi	nyii
太阳	日	nye	nyime

耳朵		nyidu	nyendjoo
一			dji
三			sum
四			shi
死		xi/shi	shi
有			yoo
不	莫、没		mee,
作	做		chee
候			huu
结束	卒		tsha
名			ming
谁			suu
氏族			ruu
鸟	雀		dja
鼠			dji
狐			woomo

尽管这个表列的容量有限，但已经足以洞察“汉语”和“藏语”间的亲缘关系。特别是汉语的“南方方言”与“藏语”，在“我、五、鱼”，“贰、日、耳”，“四、死”，“雀、鼠”这些无关语词间的语音“同构对应”现象，可以看出“藏语”与“南方汉语”的关系，要比与“北方汉语”的关系更为根本。然而，一重亲缘关系的存在，并不能排斥另一重亲缘关系。貌似截然不同的“汉语”和“北方诸族语言”间，或许有着不亚于“汉语”和“藏缅语”间的关联。

“汉字系统”是从“象形字”发展出来的。基本象形字既以“象

形”和“喻义”为本，也理当可为任何人理解和使用；日本、朝鲜、越南诸国将“汉字”使用了上千年，都是按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训读”的。因此，如果我们能确定一些基本“象形字”的原始音训，不仅可以追溯古代汉语的语源基因，还可以去判定汉字初造者们的族属和语属。

以“马”、“木”二字为例。它们不仅是两个基本的“象形字”，而且是两个重要的基本“声符”，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造字之初，“马”、“木”二字就是读作 ma、mu、mo 的。为了确证这两个具有声符意义的汉字的语源，下面谨作一个范围稍广的比较：

	藏语	满语	蒙语	突厥语
马	ta	morin	morin/at	at
木	shiin	mo	mod	agach

从这个比较不难看出：突厥语和藏语与这两个汉字是无关的；藏语的 *shiin*，可能是“薪”字的音源；而只有满语和蒙语中的对应字，才与汉语中的“马”、“木”二字有本质的关联。

中国古籍为“古代汉语”和“北方诸语”的关联现象，也作了若干相当有意思的隐性记载。例如，《尔雅·释草》说：

> 卉，草。
> 荂、蕫、华，荣。

象形字“卉”表现了茂盛的丛草。“草”字在藏语中是 tsa；在满语中是 or-ho（“斡儿和”）；而在匈牙利语中为 fu。不难看出，汉语的

“草”，与藏语的 tsa 有着渊缘；而“卉”字则与满语和匈牙利语相关。

而“荄”、“葟”、“华”，义“荣”，即是“花”。它们实际上都是“花”的不同的写法而已；而独树一帜的“荄”，则可能是满语的“花”——“依尔嘎（哈）”（ilga/ilha）的缩音。我不想再讨论“花”是否就是“哈”的转音，但必须指出上述诸字与藏语是绝对无缘的，藏语的“花”字是 metoo。

《尔雅·释天》还说：

>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是，它们是上古各代“年岁”一词的演变；“唐虞”则解作“唐尧虞舜的时代”。事实上，“夏”、“商”、“周”本是中原强部之名转化成的朝代之名，“唐虞”是“尧舜”所出的部落，它可能就是“东胡”，或元蒙时代“唐兀”[37]之异译。与其说这几个同义词是发生在各个时代，还不如说它们是古代诸部落语言在中原汉语中的沉淀。

“年”字，蒙古语作 *ziil*，即是“唐虞曰载”之“载”；而满语作 *anen*，又正是“周曰年”之“年”；满语的“岁”字 *ser*，恰似“商曰祀”之“祀”；“夏曰岁”之“岁”，则是“楚瓦什语”之 *sul*。看来，“夏”和“唐虞”似为“蒙古语族”，而“商”和“周”则似“通古斯语族”。

西方语言学者的丰富想象力予我们很多启发；但时而也有走得太远之嫌。例如，高本汉推定了汉字“卒”与藏字 *sdud-pa*（读 tsha，义为“收集，聚集，聚结起来”）同源后；又进而推论其“士卒”之义，是来自“受强制劳动的男人群体”的意思。对此，就连包拟

古也有“离题太远”的感慨[38]。

藏语的“士兵”是 *mermi*，它与汉字“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蒙古语的“士兵”作 *tsereg*，“健壮”作 *cheereg*；而匈牙利语的 *sereg* 一字，已意转为“军队”了。*tsereg*、*cheereg*、*sereg* 等当同鲜卑语“车鹿会”一字，“壮士”之谓也，在原始社会里“壮士”就是“战士”，它们大概就是汉语中“卒”字的意源。

一些“突厥语”的基本词汇，也遗存在“汉语”中。如：*hun*（“阳”）、*su*（“水”）、*toprak*（“土”）、*hoca*（“车”）等。当然，“藏语”的 *chuu* 与“水”字也很相近；“藏语”的“土”字 *saa*，则是“沙”字的影子。但是，如果我们过分执着地要从“藏语”中去寻找一切“汉字”源泉，或许也会有失公允。

根据“车”和它的衍生字“载”的现代读音，可以推测“车”的源音应该是在 *cha* 和 *chi* 之间，而“车”字在突厥语中为 *hoca*，在匈牙利语中则为 *kocsi*，它们的读音都恰似“高车”，亦几同欧洲语言中的 *coach*。有匈牙利学者认为，这是匈牙利语汇对西方语言不多的贡献之一。如果这种说法是可靠的话，或许我们已经寻得了 *coach* 一字远在东方的“中原古代语言”的根。

一个简明的表列，或许能弥足专门家和浏览者的共同要求：

汉语	变通字	藏语	满语	蒙语	突厥语	匈牙利语
万		chi	tuman			
花			metoo	ilga/ilha		
木	薪	shiin	mo			
草	卉	tsa	or-ho			fu
铁		dja		temer		

河		gukdju		gol		folyo
火		me		gal		
气		lung		hii		
水		chuu			su	
土	沙	saa			toprak	
车		kolo			hoca	kocsi
马		ta	morin			lo
驴		pung-gu				
牛	特	long	ihen			tehen
羊		luu		jamaa		
兔		rekoon		tuula		
头	元、兀[39]	go	uju	da、咄		
臂	胳膊	lang-aa	gala	gar	gol	
年	载	lo	anen	ziil		
天		nam		tengri		
山	岳	ri		uul		
山脉	岭	ribo	alin			
峰	丘	ridse	colhon			
云		drimpa		uul		
雨		cher	huur			
父	爹	papa		etseg		atya
母	娘	ama	anyen			anya
兄	昆	djudju	ahun			
弟	仲	oma	deote	duu		
兵	卒	mermi		tsereg		

我们还不妨注意一个地理—语言现象:南方“河流”多以“江”名;北方则多以“水”或“河”名。前者如“湘江”、“赣江”,后者如“泾水”、“渭水”,或“黄河”、“淮河”等。其实,“河”是蒙古语 *gol* 字之转,而“水”是突厥语 *su* 之音。甘肃临夏旧名“河州”,当地使用蒙古语的“东乡族”民众,则是以谐音称之为“各州”的。

五、关于若干问题的思考

经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应该会进一步思考一些基本问题。

首先,“声调”的确是弥补“单音节”词汇的表义困难的一种手段,但也很难设想一种能够表义的原始语言的基本词汇系统,与生而来就是具有“单音节—声调”特征的。事实上,不少藏语和古汉语的词汇,也是“多音节”的;由于“多音节词汇”的表义精度增加,自然也就可以免除对“声调”的管制。当然,也有些学者极有见地地认为,人类语言的词汇音节数量可能是由简到繁的;还有学者认为“辅音丛”或“复辅音”的分化,是“多音节”词汇形成的原因之一。

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特征,是不必否定的;然而,也不宜将其“扩大化”。例如,有学者认为宋景公之名“头曼”,就是一个“复辅音”字 t. rmog;但察明了“商部落”与“北方民族”有着同源的关系后,“头曼”是通古斯语的“万”字 *tuman*,也就不奇怪了。许多汉字是“北方诸族语言”多音节字的简缩,“万”来自 *tuman*,“马”出自 *morin*,即是两个例字。这种转化的原因:既可能是来自所谓“藏缅式语言”的影响;也可能是“象形文字”的反作用。总之,汉

语的“一字一义一音”的特征，不少是“后天获得性”的非自然现象。

其次，藏语作为一种较纯的“汉—藏缅式语言”，它与南方汉语方言有比较接近的关系；加上“壮”、“侗”、“苗”、“瑶”等同属语言，也都居于中国南方的地缘分布，使我们可以判断（猜测）：它们的共有语词和“单音节—声调”的特征，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地区发育成形的。而所谓“藏缅语”诸族，大概也是从那里朝西扩散出去的。中国南方古代居民向北方的迁徙活动，则是改变黄河流域古代语言的根本原因。

黄河流域古代居民及其语言，与“北方诸族”及其语言间的关联，显示“北方诸族”与“中原古族”是同源的。离开黄河流域的古代部落，保留了他们的祖先从中原地区带出去的，具有较纯粹形态的各种“原语”。这些迁徙活动，可能在现代人类的祖先到达东亚地区后，就没有间断停顿过。“爱斯基摩”人脱离“通古斯”部落群体，可能是发生在“数词系统”产生之前，即是一个例证。最近发现的“红山文化”早期遗址，可定在五千至七千年前，或许这也是“中原部落”进入“东北亚地区”的时代坐标之一。

“汉—藏缅”式中原语言，即“汉语”的形成和确立的时代，至少应该是发生在四千年以前的“史前期”，因为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就已经是用具有这种语言特征的文字写成的。包拟古说[40]：

> 这种先藏语（按：指“汉—藏缅式原语”）的影响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公元前1027年周灭商的时间比它要晚，因为许多跟藏语有关的上古汉语词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周族跟这个影响汉语的先藏语部族可能

属于同一支，或者是有某种亲属关系的另一支，不过入侵中原的时间要晚一些。……鉴于藏缅语中许多语言的差异很大，我们只得把共同语的时间定在非常遥远的年代。但是由于现在假设一大部分汉语和藏语的共同词汇是借用的结果，这就容许我们把年代（按：应指上古中原语言自“藏缅式原语”借词的年代）定得比较近一些，也许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前后几个世纪之间，对于解释这两种语言的相似和差异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时间深度。

他在这里说出了一些重要的道理。如“汉—藏缅式原语”，即所谓“先藏语”对于古代“中原语言”来说是外来的。而“汉语”，即“汉—藏缅式的中原语言”中与“藏语”共有的语词，大部是“借用”的，而不是“同源”的。

但是，作为“借方”的各中原部落的语言，在受到“贷方”语言——“先藏语”的冲击前，例如“商部落”的祖语，究竟又是一些什么样的语言呢？他是没有把握来回答的。在上述的引文中，他还曾猜测“周族”可能是一支“先藏语部族”。其实，种种迹象表明，远古时代的“夏”、“商”、“周”、“秦”等部落，非但不是什么“汉—藏缅式原语”的载体，而是与“北方诸族”同源的部落。

六、结论

古代汉语无疑是在“藏缅式”语言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它是来自什么方向的呢？包拟古在一条注解[41]中说，这种“先藏语”影响是来自西方的。这大概是从古今藏族一直居住在中国西部的现

象，而引发出来的一种地缘性结论。其实，“藏民族”只不过是使用“藏缅式原语”的诸族中，因为走得最远而保留了较纯净的语言形态的一支人群—部落而已。那种具有“单音节—音调”特征的古代语言，对“中原古代语言”的冲击，更可能是直接来自长江以南的“南蛮”诸族。这种语言的运动取向，与亚洲东部古代人类的由南朝北的迁徙态势也是一致的。

我们明知“汉语”的“多源性”，却又只说“汉语”和“藏缅语”有着共同的祖语，当然是不全面的；而将如此庞杂的“汉—藏缅语系”的共同祖语（如果存在的话），又仅仅说成是“先藏语”，则更是欠妥的；然而，使用“先藏语”这样一个名词，只是用现存表象去逼近历史真实的一种“无奈”。

中原地区古代部落的“夷”、“狄”、“戎”、“胡”属性，都表明他们与后世“通古斯”、“蒙古”、“突厥”诸族同源。这些出自黄河流域的“北方诸族”的语言，已被西方语言学者归属为“阿尔泰语系”。然而，经过数千年的兼并融合，这三种语言的基本数词竟都不一致，而且许多“共有词”也都是互借的结果；可见远古时代中原部落的语言状况，还要大大地复杂得多；因此也很难设想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祖语。这个理论的基础非常脆弱，但它的影响却十分巨大。

由于汉字系统非表音的特殊性征，我们今天最明白的也只能是包括各种方言在内的“现代汉语语音层”，其次才是那些“韵书”所记载的所谓“中古音”。人们对上古时代汉语语音的探索，只是基于中古汉语语音，参照某些对比系统的“反推”或“猜想”。“诗韵”和“藏语”是中外语言学者们用得较多的两种对照系。作者在欣赏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还想以本文的结论指出：“北方诸族语

言”是“汉语”的另一面重要的“镜子”。

如同“洁白透明”的“白光”可以分解成“红”、“橙”、“黄”、“绿”诸色一样；我们竟也在“纯洁无瑕”的“汉语”中，析出了“戎”、“狄”、“夷”、“蛮”语言的可比成分。如果能作一个定量的统计，或许可以发现“汉语”中的“北方诸族语言”的内涵，未必亚于“藏缅语”的分量。现代“汉—藏缅语系”理论的创导者们，有着不同凡响的洞察力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他们完全忽视了“中原古代居民”及其语言，与“中国北方诸族”及其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这种“色盲症”，也许限制了他们的某些结论的“准确性”或“正确性”。

注释

[1] S. C. Egerod,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Vol. 22, pp. 723.

[2] 本书《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

[3] Bing Su(宿兵), Junhua Xiao, Peter Underhill, Ranjan Deka, Weiling Zhang, Joshua Akey, Wei Huang, Di Shen, Daru Lu, Jingchun Luo, Jiayou Chu, Jiazhen Tan, Peidong Shen, Ron Davis, Luca Cavalli-Sforza, Ranajit Chakraborty, Momiao Xiong, Ruofu Du, Peter Oefner, Zhu Chen, and Li Jin(金力)(1999) *Y- 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 Northward Migration of Modern Humans into Eastern Asia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Am. J. Hum. Genet. 65: 1718—1724.

[4] *A Dictionary of the St. Lawrence Island/Siberian Yup'ik Eskimo Language*, Edited by Steven A. Jacobson, Fairbanks, University of Alaska, 1987.

	尤比克语	满语		尤比克语	满语
乳房	mamaq	mermer	耳朵	sigun	san
眼睛	iya	yashi	嘴巴	qaneq	anqa
鼻子	qengaq	song-giqa	手	iigga	gala
地方	na	na	水	muq	muke
一	ataasiq		六	aghvinlek	
二	maalghuk		七	maaghraghvinlek	
三	pingayut		八	pingayuneng	
四	estamat		九	estamaneng	
五	tallimat		十	qula	

[5] 《晋书》卷九十七,《北狄·匈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549—2550。

[6]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011。

[7] 《魏书》卷一百三,《蠕蠕传》,页2289。

[8] 《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下·五国部》,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92。

[9]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884。

[10]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二十二国》,台北,三民书局,1998,页627—647;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235。

[11] 《蒙古秘史》第263节,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中华书局,1957,页260。

[12]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568。

[13]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262。

[14]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7，页22—23。

[15]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页22—23。

[16]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页32。

注曰："索隐：皇甫谧云：'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

[17] 《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页1630。

[18]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页2887。

曰："当是之时，东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

[19] 按：这些人名皆可与北方诸族族名、人名对应：

"大费"：　"屠何"；

"蜚廉"：　"费连"、"覆罗"；

"太几"：　"突厥"、"泰赤兀"；

"大骆"：　"吐如"、"同罗"；

"奄息"：　"爱新"；

"到满"：　"头曼"、"土门"；

"乌获"：　"乌护"、"回纥"；

"孟说"：　"密须"、"靺鞨"；

"白起"：　"白狄"、"博尔济吉"；

"百里奚"：　"蔑里乞"；

"恶来革"、"摶里疾"："乌洛侯"。

[20] 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页168。

[21]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页1。

[22] 陈明远、汪宗虎《中国姓氏大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页99—107。

[23]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44;
本书《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

[24]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120、277。

[25]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页65。

[26]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80。

[27] 《北齐书》卷一、二,《帝纪·神武》,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4。

[28]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页6245。
曰:"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

[29]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420.

[30]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页6243。
《大唐西域记》卷一,《三十四国》,页32。

[31]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53、63、77、79。

[32] 《魏书》卷一百三,《徒河段就六眷传》,页2305。

[33]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页3012。

[34]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页6235。

[35]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页6247。

[36] *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 Compiled by M. C. Goldstein, Berkeley, The Regent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4.

[37]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页6214;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页912;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3981;
本书《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注[40]。

[38]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蒸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5，页 15。

[39]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

[40]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页 53。

[41]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页 222，注 8。

曰："中国的西北部在有史年代是操藏缅语的居民跟汉人发生接触的地域，在更早的时候也可能如此。张光直断定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是商族的早期领土，但是在征服夏族以后，他们的活动中心就向西移动了。……我们所假设的先藏语的影响也许就是来自河南西边和山西西边的夏族。"

东亚民族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

现代人类的祖先通过数十万年的跋涉，至少在一万年或数万年前就已经遍布全球。按照今天的人种划分，蒙古人种是形成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而印欧人种则源自它的西部。由于那些包括传说在内的历史记载，仅仅起步于四、五千年前；因此，在漫长的史前期内，人类的多元种属与语言的分裂和形成机制，始终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艰深课题。

在人类历史的后期，由于马、车、撬、舟等运载工具的使用，大大地加速了人类祖先的迁徙活动，它又导致了人类不同种群的血缘和语言的融合，同时也传播了造车、驯马、冶金等各种早期发明。对于产生人类主流文明的欧亚大陆来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是东方影响了西方；还是西方扰动了东方？要研判这种相互作用的方向，首先必须确认各个时期迁徙着的人类集团的族属。

西方历史记载，在公元前的一千年中，Cimmerian、Scythian、Sarmatae 等诸多亚洲民族，源源不断地从中亚进入欧洲和近东；汉代中国历史记载，“月氏”、“乌孙”等部落，亦先后从河西走廊进入了中亚地区。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些游牧部落都是属于“伊朗”或“印欧”人种的民族。这些“猜测”不仅作为“结论”载入了权威著作；而且几乎被包括许多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界接受了。

这些在早期学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猜测，是非常令人质疑的：

如此众多的印欧—伊朗人种的部落源源不断地出自于东方(或中亚);然而,此后两千年来西迁的亚洲游牧民族又统统都是蒙古人种,难道那里的印欧人种都走完了吗?事实上,除少数部落以外,古今东方民族并没有表现出西方人种的属性。要东方身兼蒙古和印欧两大人种的共同发源地,是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的。

在近代学术思想和方法不断发展和更新的情况下,作者基于对东北亚民族的研究和中西史料的比较,力图从语言、民俗和其他方面来求证:早期入侵西方世界的亚洲游牧部落的祖先,都是出自东北亚的蒙古人种民族。

一、息西安人(Scythian)

有"史学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前484—430/420),曾亲莅东欧草原,并对那里的 Scythian 人(Σκυθαι)做了详尽有致的记载。尽管,现在有人将它译作"斯基泰"人;但本文仍取旧译"息西安",因为 Σκ 是读 s 或 z 的。而且东西方史料对比表明,Scythian 可能就是东北亚古族名"息慎"或"肃慎"。

对于这个游牧民族,《大英百科全书》归纳说[1]:

> 息西安人,公元前8至7世纪从中亚迁徙到南俄地区的伊朗人种游牧民族。他们以克里米亚为中心建立的王国,富强兴盛了将近五个多世纪;公元前4至2世纪,才臣服"萨尔马泰"人(Sarmatian)。
>
> 息西安人在战争中的勇敢和骑术使人敬畏。作为最早掌握骑马术的民族之一,他们的快速的运动能力令人惊叹。这

些从亚洲来的息西安人，进入了高加索至黑海北岸平原地区的奇米利安人（Cimmerian）的领地。经过延续了三十年的战争，他们终于击败了后者，而成为了从波斯西部，经叙利亚和犹太地方，一直展伸到埃及边界的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后来，他们被原先统治波斯的美地亚人赶出了安那托利亚，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从波斯边界，经库班到南俄地区的控制。

息西安人不仅以善战著称，而且以创造文明传世。他们有贵族阶级，在贵族们的墓葬中，藏有制作精良的金器和珍物。他们在南俄和克里米亚建立过统治，也正是在那里出土了大量的息西安文明的遗物；他们的势力大到足以逐走公元前513年大流士王的入侵。

……息西安人的军队，是由收受薪资而非仅供衣食的自由民组成；持有敌人头颅的战士，有分享战利品的权利；许多战士穿戴希腊式的头盔和锁子甲护心；他们的主战武器是双弧弓，和有三叶草型箭头的箭；每个息西安人至少有一匹座骑，富有者则拥有很大的马群，内中大都是蒙古小种马；他们的葬俗很奢侈，还征召死者的家人，如妻妾，侍佣，乃至马匹，施行殉葬。

《大英百科全书》不仅将 Scythian，而且将 Sarmatian、Cimmerian 等东来民族名也统统归属在“伊朗人种”中。因此，我们就不得不从整体上考虑它们的族源。事实上，这些与 Scythian 人伴生的部落，都有着一些东北亚民族的族名，如：

Cimmerian　　吉里迷[2]

Neuri	女奚烈
Androphagi	安达尔奇[3]
Sauromatae	悉万丹[4]
Melanchlaeni	篾儿乞[5]

这些西史记载的族名与东方族名一一对应的现象，是这些民族都是来自东方的证明，当然也为 Scythian 即是通古斯族名“肃慎”提供了一个依据。

以 Neuri 为例，唐代靺鞨姓氏“倪属利”[6]，金代女真姓氏“女奚烈”，可能就是这个族名之源。希罗多德的记载说[7]：

> Neuri 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与息西安人是一样的。……他们好象是个玩弄巫术的民族，那里的息西安人和希腊人都说，每个 Neuri 人每年都要变一次狼，过几天后再恢复成人。

这段“人变狼”的不经之说，竟与中国正史不谋而合。《金史·金国语解》说：“女奚烈曰郎。”“郎”是“狼”同音雅字。近代蒙、满、突厥诸语的“狼”虽然都不是“女奚烈”；然而“女奚烈”的这个图腾意义，却在东西方历史中得以互证。

关于另一个部落 Androphagi，希罗多德说[8]：

> Androphagi 人是一个最不开化，无法无天的民族。他们是些居无定所的游牧民；衣服类息西安，而语言特异。

中国典籍中也有这个族名。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曾记载过“安呾

罗缚国"[9]，它可能就是被称为"高车之别种"的"嚈哒"之遗国[10]；清初满蒙地区也有个叫"安达尔奇"的部落。如将"安咀罗缚"(an-da-ro-wo)和"安达尔奇"(an-da-r-gi)，合成为"安咀罗缚奇"的话，它简直就是 Androphagi 的直译。

从语言上来看，息西安人的语言好象与蒙古语比较接近。在提到一个关于 Amazon 部落的传说时，希罗多德说[11]：

> 息西安人称 Amazon 人为 *Oeorpata*，其意思是"杀男人者"，*oeor* 是息西安语里的"男人"一字，而 *pata* 则是"杀"的意思。

蒙古语中"男人"一字，内蒙音是 *eir*("艾尔")，外蒙音是 *er*("额尔")，而匈牙利语中的"先生"或"男士"则是 *ùr*("兀尔")；*oeor* 显然就是它们的转写。现代蒙古语中 *but* 或 *buta*，有"粉碎"、"击溃"和"消灭"的意思[12]，它或许就是希罗多德听到的 *pata* 一字。

在言及一条 Hypanis 河和一支流入该河的"苦泉"时，希罗多德说[13]：

> 这泉水是如此的苦，以至它的水量虽然不大，但混合起来却使世上大河之一的 Hypanis 河的水，也变了味道。……这条泉水和它流出的地方，在息西安语里都叫 *Exampaeus*。

蒙古语的"苦"是"噶失文"[14](*gashuun*)，"水"是"乌苏"(*us*)。"苦泉"应为"噶失文乌苏"，它与 *Exampaeus* 很相近；而 exampae 中的主要音节 xam，与"噶失文"则更相似，这个泉名也象是出自古

蒙古语的。

关于某个息西安部落，希罗多德说："据说这些人不分男女生来都是秃头，他们是长着狮子鼻和大下巴的民族。……他们称一种果汁为 *aschu*。"[15] 尽管，这个"秃头"的传闻令人困惑；但宽鼻子和大下巴倒的确是蒙古人种的特征。而 *aschu* 与现代蒙古语的"果汁"一字 *shuus*，也是非常接近的。

希罗多德记载的几个息西安酋长人名：Lipoxais、Arpoxais、Colaxais、Scoloti、Madyas。除 Lipoxais 外，其他都可以在北方诸族的人名和族名中找到对应：

Arpoxais	即"阿巴嘎"
Colaxais	即"库褥官"[16]或"窟略寒"[17]
Scoloti	即"树洛于"[18]
Madyas	即"靺羯"衍生之人名"靺羯斯"

从习俗上看，息西安人亦与北亚古族一致。例如，息西安人酿造马乳的方法，就与蒙古人制作"忽迷思"的方法几乎完全相同。息西安人的办法是[19]：

> 马奶挤出来之后，便把它倒进一个很深的木桶里，并叫奴隶站在木桶边摇动桶里的马乳。浮到马乳表面的东西，被视为最珍贵的部分取出来；留在桶下面的，则被当作不大珍贵的东西。

13 世纪西方传教士鲁布鲁克描绘蒙古人的作法是[20]：

> 他们不断搅拌奶汁，直到所有浑浊的部分象药渣一样迳直沉底，清纯部分留在表面，好象奶清或新酿的白葡萄酒。渣滓很白，给奴隶吃，有利于睡眠。主人喝清的，它肯定极为可口，而且有益于健康。

再如，在馈赠礼物方面，息西安人亦表现出东北亚民族的习俗。大流士率军攻入息西安人的领地；他们诱敌深入，竟使波斯军进退维谷；这时，息西安人又送来了一分令人揣摩不透的礼物[21]：

> 这分礼物是一只鸟、一只鼠、一只蛙和五支箭。

先秦历史记载，肃慎族就是用箭杆进贡中原的。孔子说“昔武王克商，……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22]。清代，箭杆仍是满洲地方首长献给中央政府的例贡。那只“鸟”可能是珍贵的“鹰鹘”；那只“鼠”或许是鲜美的“地鼠”。若波斯人与息西安人同俗的话，这分厚礼是不会使大流士疑神疑鬼，进而使波斯军不战而溃的。

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息西安人的丧俗[23]，很类似于中国北方诸族的“剪面”俗：

> 在[国王的]尸体送到的时候，出迎的人们和息西安王族都同样地割掉一只耳朵，剃掉头发，绕着手臂切出一条环状的伤口，割破额头和鼻子，而且用箭刺穿左手。

中国史学界很重视这种古俗，并把它当作是辨认北方诸族的特征

民俗之一。

《史记》曾有“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记载[24];中原诸侯也做过一样的事:“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为饮器”[25]。而息西安人也是这样来处理敌人的首级的[26]:

> 沿着两个耳朵在头皮上割一个圈,然后揪着头皮把它从头盖上摇扯出来。再用牛肋骨把头肉刮干净,再用手将它揉软,当作手巾来保存,还要把它悬挂在马勒上以示炫耀;拥有这种头皮手巾最多的人,被认为是最勇武的人。……
>
> 把眉毛以下的头颅锯去,弄干净后,再裹上牛皮。若是穷人,就到此为止;如是富人,里面还要镀金。他们都将它作饮器使用。

最近中国考古学家在河北邯郸和河南武陟人类遗址,发现了若干四千年前的带环状割痕的头颅骨。因此,“剥头皮”和以人颅为“饮器”的习俗,最初可能是源自中原的,但它们在出走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存在了一段更长的时间。

中国北方诸族多崇拜柳树。例如,满族有“柳枝祭”,即“佛多妈妈祭”[27];满语“佛多活”是“柳树”,“柳叶”是“女阴”的隐喻;而“佛多活”在蒙古语中的转音“五毒户”,就明言是“阴户”了[28];因此,柳树崇拜实际上是女性生殖器崇拜。希罗多德则说息西安人是用柳枝来进行“占卜”的[29]:

> 息西安人中卜者很多;他们是用柳枝来占卜的,占卜是这样进行的:把柳枝摊开放在地上,然后卜者将它们一根一根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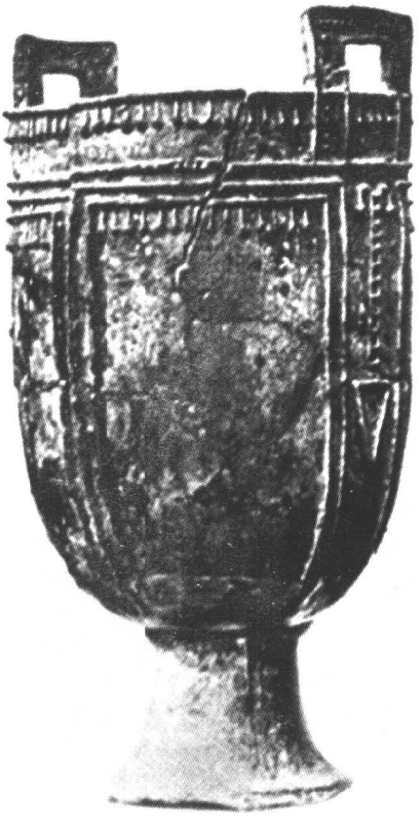
分开，同时诵说着卜词……

在库班、克里米亚和匈牙利的息西安贵族的墓葬中，有大量以野兽搏斗为题材的雕金陪葬物[30]出土。在西伯利亚广大地区，也多有这种“息西安艺术”遗存的发现。前苏联学者在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州，也发现过不少虎、鹿等动物形象的金属饰物[31]。学者们都注意到这种女真艺术与息西安艺术的联系，但没有人设想过息西安艺术源自东方的可能性。

在南俄草原上发现过许多息西安人时代的青铜釜。事实上，遍布整个欧亚草原出土的釜类，都与商、周时代的青铜釜，有着大致相同的造型[32]。日本学者指出：息西安人的一类青铜釜，与春秋晚期的某些青铜釜惊人地相似[33]。希罗多德提到置于“苦泉”地方的一个巨大的青铜釜，他说[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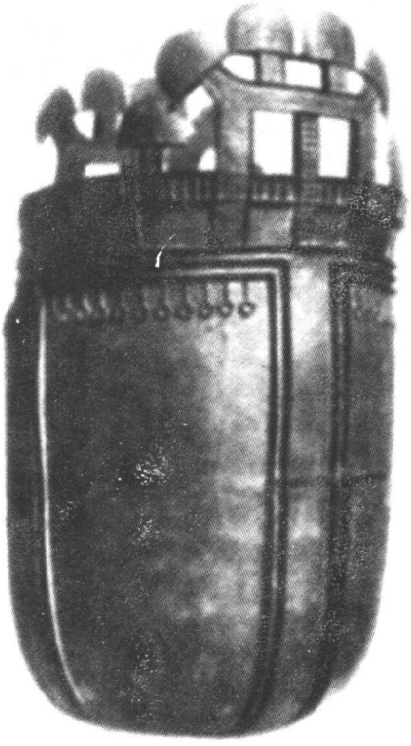
> 对于那些没有见过这件铜器的人，我只要告诉他：这个可以轻易容纳五千加仑（按：现代容量单位）液体的息西安人的大釜有六指厚，他就会明白了。据当地人说，这个大容器是用箭头冶铸成的。

这个青铜釜的尺寸可能是被夸大了；然而，息西安人掌握有青铜冶铸技术，却是有考古实据的。在讨论古代中原汉语中含有大量的北方诸族语言成分时[35]，我曾经指出：北方诸族是出自中原地区的。而“草原青铜文化”与“商周青铜文化”间的相似，则揭示了另一个事实：北方诸族可能是带着冶金术从中原出走的。



图九:伏尔加河中游,乌里扬诺夫斯克附近 Osoka 溪边沙滩中出土的青铜釜,高 53.2 厘米,直径 31.2 厘米,重 17.7 公斤。

取自:Otto J. Mae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3, pp. 316—317.



图十:匈牙利 Törtel 地方(Pest 县)出土的青铜釜,高 89 厘米,直径 50 厘米。

取自:Otto J. Mae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3, pp. 309.

二、美地亚人(Mede)

"美地亚"(Media)就是今天的阿萨拜疆地方。希罗多德的时代,一个叫 Mede,即"美地亚"的游牧部落盘据着这片牧场,地名 Media 即是出自这个族名。公元前 709 年,美地亚人领导的起义,导致了亚述王朝的衰落。其后,它又征服了波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西部地区,从而成为与希腊城邦对峙的近东强权。

尽管,没有关于美地亚人的由来的确凿记载;然而,根据与美地亚人同类的息西安人、奇米利安人都是穿越高加索山脉而来的史实,可推测美地亚人也是从南俄草原进入近东地区的。在记述了息西安人入侵美地亚时,希罗多德说[36]:

> 息西安王 Madyas 率一支大军,追赶被逐出欧罗巴的奇米利安人,而侵入了亚细亚,来到了美地亚人的领地。
>
> 从亚速海到 Phasis 河和 Colchi 人住的地方,轻装要走三十天。从 Colchi 人那里再走不远,便可进入美地亚,因为中间只隔着 Saspire 人的地方,过了那里就是美地亚了。

息西安人的领地是在顿河—亚速海以西,Colchi 和 Saspire 部落应在北高加索地区;那条 Phasis 河,可能就是库班河的支流 Psis 河。Colchi 人和 Saspire 人的背景,自然也是认识邻族美地亚人的相关信息。但是,希罗多德对它们没有作更多的描述,因此我们也只能将视距调到一千多年后的时代。

公元 7 世纪前后,被认为是 Huns 的后代的 Kurtrighur 和 Bul-

gar 部落,定居在亚速海周边地区[37],本书不止一次讨论前者是"高车",后者是"仆骨"的可能性。那时,另一支"高加索 Huns"——Sabir 人则活动在北高加索地区,阿拉伯文献记之为 Suwar,亚美尼亚文献为 Savirk[38],它们又象是"鲜卑"或"室韦"。看来,希罗多德时代北高加索地区的 Colchi 和 Saspire 人,就是一千多年后的 Kurtrighur 和 Sabir 人的祖先;如果把 Bulgar 和 Mede 算在内的话,它们是来自东方的"高车"、"鲜卑"、"仆骨"、"靺羯"部落群体。

继承美地亚人的霸业的,是居鲁士(Cyrus)领导兴起的波斯帝国。居鲁士是美地亚王 Astyages 和希腊城邦吕地亚公主的外孙,他们联姻的故事,起因于公元前 585 年 5 月 28 日发生的日蚀,正在搏战中的美地亚人和吕地亚人受到了惊吓,就地结束了持续了五年而两败俱伤的战争。记载说[39]:

> 吕地亚王 Alyattes 将他的女儿 Aryenis 嫁给了美地亚王 Cyaxares 的儿子 Astyages,因为他们意识到,没有保证的协议是难以持久的。两个民族按希腊人的方式发誓,还切臂互相吮吸了对方的鲜血。
>
> 后来,Cyaxares 死了,……他的儿子 Astyages 继承了王位。
>
> Astyages 有个女儿叫 Mandane。他做了个怪梦:她撒了一泡尿,这泡尿溢满全城,而且淹没了整个亚细亚。……Mandane 长大后,Astyages 害怕梦呓会应验,没有把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美地亚人,而是将她下嫁给了一个波斯良家子弟 Cambyes……

在 Mandane 和 Cambyes 结婚的头年里，Astyages 又做了一个怪梦：她的子宫里长出了葡萄蔓，这串葡萄蔓覆盖了整个亚细亚。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占梦的人，还软禁了怀孕的女儿，打算杀死即将出生的婴儿，因为占梦的巫师预言这个婴儿，将要篡夺他的王位。

居鲁士就是这个生世显赫，而命运多舛的无辜婴儿。他降生时，Astyages 命令家臣 Harpagus 将婴儿杀死。但 Harpagus 将婴儿托付给一个山间牧人，牧人的妻子 Cyno 把他扶养成人。居鲁士很小就表现出领袖才能；在处理一桩孩童纠纷时，Astyages 在居鲁士的身上察觉到自己的霸气。于是，他召来了牧人和 Harpagus，两人招出了实情。Astyages 把外孙还给了他的父母；但杀死了 Harpagus 的儿子，还骗他食用了亲子的骨肉。若干年后，怀恨在心的 Harpagus 帮助居鲁士推翻了他的外祖父，自己则成了居鲁士的头号谋臣，帮助他征服了吕地亚。当居鲁士回师波斯时，他和另一个美地亚人 Mazares，镇压了希腊城邦的叛乱。

回到父母身边的居鲁士，念念不忘 Cyno 的养育之恩：

他总是提到 Cyno，什么事情也离不开她。父母为了使波斯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出于天意，便把一个说法散播出去，说他在被遗弃后，曾受到一只母狼的抚养。

希罗多德曾不止一次提到息西安人谋杀孩童，并诱其亲人食用的泄恨手段；而美地亚人也恰恰有此恶俗；母狼育婴而终成伟人的故事，也是在中国北方各族中屡见不鲜的传说[40]。我们虽然无

从查考 *cyno*（“居奴”）是否就是希腊语的“母狼”一字；然而 *chino*（“叱奴”）是鲜卑—蒙古语中的“狼”字，倒是确凿有据的。这些习俗、传说和语言信息，无疑都是美地亚人具有东方背景的证据。

在美地亚人的环境中长大的居鲁士，最亲信的也多是些美地亚人；与其说他是个波斯人，还不如他是个美地亚人。居鲁士统治波斯近三十年，最后在与 Massagetae 人的一场恶战中战死，战前 Massagetae 女王的使者还称他为“美地亚王”[41]。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几个美地亚人，亦都有着是远东民族常用的名字。如：

英译	希腊原文	应译作
Astyage(s)	‘Αστυαγεσ	阿济格（满语“小”）
Cyaxare(s)	Κυαξαηζ	可萨、曷萨、贵霜
Cyno	Κυνο	叱奴（蒙语“狼”）
Harpagu(s)	‘Αρπαγοζ	阿巴嘎（满语“天”）
Mazare(s)	Μαζαρεα	靺羯、麻察、马扎儿

除“叱奴”是地道的蒙古字外；“阿济格”、“阿巴嘎”、“麻察”等，都是后世满、蒙两族中常见的男子名，它们本是源自通古斯语的。这些人名的鲜明东方语言特征更表明：Mede 就是通古斯族名“勿吉”或“靺羯”。

源自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曾多次入侵种族极为复杂的近东地区；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一样，也曾经长期被异族统治，而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地亚人。除去波斯民族外，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两河流域的亚述人以及亚美尼亚的祖先，可能都参与了与美地亚人的融合，居鲁士的多重血缘就反映了这一融合的过程。

三、Massagetae 人和阿兰尼人

关于居住在里海以东的 Massagetae 人的族类和习俗，后世的历史有不少记载；现代西方学者更有许多讨论。希罗多德说[42]：

> 据说 Massagetae 人口众多和勇武善战，他们住在 Araxes 河以东的与 Issedones 人相邻的地方。有人说他们与息西安人同族。
>
> Massagetae 人的衣着和生活与息西安人相同……他们在一切器物上都使用黄金和青铜，矛头、箭头、战斧等都是用青铜制成的，头盔、腰带、胸甲上的饰物则是用黄金制成的。他们在马的胸部配置青铜护甲；而马勒、马衔和颈甲则是用黄金做的。

Massagetae 人大量使用黄金和青铜器物的记载，表明他们是息西安文明的载体。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Massagetae 人可能是一支南下的“塞种”部落。

希罗多德说 Araxes 河的水量可与多瑙河相比，因此它必是现代中亚的“阿姆河”无疑。《地理志》的作者斯屈波说[43]：

> ……Massagetae 人，有些住在山区，有些住在平原，有些住在沼泽地带的岛屿上，他们说这片地区大多是被 Araxes 河浸没的，这条河分流成许多支流后，大多注入北方的另一个海（按：即咸海），只有一条流入 Hyrcanian 湾（按：即里海）。

这片地方,很象是同时代的《史记》所记载的"妫水"(阿姆河)流域的"安息国",和"大泽"(咸海)附近的"奄蔡国"[44]。《后汉书》的两则记载[45],或许是辨析"安息"和"奄蔡"部落族源的有用信息:

> 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
> 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

人名"满屈"可能就是通古斯人名"满住"[46];而"安息"、"奄蔡"和"阿兰聊"则分别与满语、女真语和匈牙利语的"金"字"爱新"、"按出"或 *arany* 对应。因此,"安息"和"奄蔡"可能就是自命"金族"的通古斯部落。

"奄蔡"又名"阿兰聊",因此有人猜测他们与4世纪在南俄草原抵抗 Hun 人的"阿兰尼"人(Alani,亦译"阿兰人")有关。而记载这段战事的 Ammianus Marcellius 恰恰又指称[47]:"阿兰尼"人就是 Massagetae 人。这反证了:当初在 Araxes 河畔与居鲁士恶战的 Massagetae 人,就是"奄蔡"或"安息"部落的祖先。Ammianus 还说:

> 几乎所有的阿兰尼男子都高大端庄,他们的头发略带黄色,眼神凶煞;轻便的盔甲使他们行动迅捷;在各个方面他们都与 Hun 人相似,只是在食物和生活方式上稍文明一些。他们劫猎于亚速海和奇米利安地峡一带,有时则入侵亚美尼亚和美地亚。

经过长期的融合,4 世纪时的阿兰尼人看来已经形似印欧种人了。在说到阿兰尼人无住屋、不农耕、食肉酪、以车为家的习俗时,Ammianus 还提到他们"将车子围成一个圆圈"而聚居的生活,这恰是蒙古人的用车扎营的"古列延";Ammianus 说阿兰尼人珍惜马匹,自幼接受骑马和严守纪律的战士训练;还说他们视死如归,战死者享有荣光,终老病榻或死于非命者则不齿人间。

阿兰尼人的归宿是,约在 370 年,它被 Hun 人征服,许多族人与汪达尔(Vandal)和斯维比(Suebi)人结伴西逃,406 年进入高卢地区。尽管部分阿兰尼人定居在奥尔良和瓦伦斯等地,但大多数与汪达尔人一起进入北非……据说,那些在 Hun 人统治下的阿兰尼人,是现代高加索地区沃塞梯(Ossete)人的祖先。[48]

4、5 世纪时的"阿兰尼"人,已是一个血缘非常混杂的民族,Massagetae 人可能是它的重要先世,Ossete 人是其一部馀孽;而"安息"、"奄蔡"或"阿兰聊",则是它铭刻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关族名。若人们能注意到高车也有个氏族名"阿崙"[49]的话;先后族名 Massagetae、Alani 和 Ossete,与"靺羯"、"阿崙"和"兀者"间的关联,强烈地暗示了这个屡经播迁的民族具有远东祖源的可能性。

四、日耳曼尼亚和东欧地区的游牧民族

"日耳曼尼亚"(Germania)是地中海文明诸国对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地方的概称。公元 1 世纪罗马史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记载了该地的诸多"蛮族"部落,其中主体的部分是血缘很纯的印欧人种土著,他说[50]:

> 我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因通婚而保持了纯净、特殊而且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血统的种族。因此，他们的人口虽然很多，而体格却完全一样：他们都长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和高大的身躯；……

记载表明，他们是定居、农耕、婚姻稳定和性俗严谨的民族。但是，现代日耳曼民族的重要祖先“哥特人”进入这片土地，还是几百年后的事情；因此，要将当时日耳曼尼亚的印欧人种部落，与尔后的日耳曼民族等同起来，也是不妥当的。

另一方面，由于日耳曼尼亚是欧亚草原的地域延伸，人们自然地会联想：在日耳曼尼亚诸族中，是否也渗透了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种部落？斯屈波比塔西佗更早记载过一个叫做“斯维比”（Suebi或Suevi）的部落[51]：

> 斯维比人是最大的一个民族，因为它分布在从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大片地区。……其他的一些部落都被驱逐到易北河的彼岸去了。这片地方的百姓（按：指斯维比人）的共同特征是都易于迁徙，他们物质极度匮乏，而且不知耕作积蓄；住着极为简陋的临时棚舍，今日不愁明天的事情；与游牧民族一样，他们食用的都是牲畜之所出，还效仿着游牧民族用车辆载着家私，驱赶牧群四方漫游，哪里好就到那里去。

这种游牧生活与亚洲民族很相似，而与日耳曼人的定居生活截然相反。据罗马文献记载，居住在今天奥匈和南德地区的古代“潘

诺尼亚人”，就食用一种叫做 *Kamos* 的饮料[52]；从语音上看，*Kamos* 必是“忽迷思”。蒙古民族的祖先部落看来很早就深入了中欧地区，而斯维比人可能是他们中间的一个重要部分。

斯屈波还提到几个斯维比人的从属部落：Lugii、Zumi、Butones、Mugilo-nes、Sibi-ni、Semno-nes。其中 Lugii、Buto、Mugilo、Sibi 与“如甲”、“泊咄”、“靺羯”、“锡伯”等远东族名都非常近似。

在塔西佗的著述中，“斯维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落。他说到斯维比人有一种类似于人们熟知的满族男子脑后辫发的发式[53]：

> 斯维比人所特有的一个标记是将头发抹在脑后，绾成一个结。这是他们不同于日耳曼人其他部落的标志，……

中国南北朝时，《南齐书》称鲜卑民族为“索头”[54]；《梁书》则说柔然部落是“辫发”的[55]。

出现在罗马帝国历史中的斯维比酋长 Sido 和他的兄弟 Vangio 之名[56]，是日耳曼尼亚的两个部落名 Sitones 和 Vangiones 的字根。可相比较的是，北魏鲜卑姓氏“尸突”[57]，女真姓氏“石敦”[58]，以及匈牙利姓氏 Suto，都与 Sido 对应；而女真族人名“凡察”或“樊察”[59]又与 Vangio 一致，它们应是女真部名“王甲”的变音。

后来，斯维比人参与了 Hun 人入侵所触发的欧洲民族大迁徙。公元后 406 年除夕之夜，一支斯维比人，伙同汪达尔人、阿兰尼人和勃艮第人（Burgundians）越过冰封的莱茵河，蹂躏了大片高卢的土地；409 年夏，一些斯维比人、汪达尔人、阿兰尼人翻越比里

牛斯山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并瓜分了这个罗马的“西班牙行省”，斯维比人所得的是半岛西北多山贫瘠的“加利奇亚”（Galicia），估计那时他们总计不过二万五千人；但是自411年开始，他们顽强地维持着一个孤寂的小朝廷，直到585年才被西哥特人兼并了去[60]。

从族名来看，Suebi 象是“鲜卑”，Suevi 更似“室韦”。在中国历史上“鲜卑”就是“室韦”；而“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尽管，我们没有“斯维比”的出源的直接记载；但是，这些间接的信息表明他们是东方民族之裔。“斯维比”人可能是比“息西安”人来得更早，却又走得更远的“鲜卑”民族。6世纪末，当他们的一支余脉，最终湮灭在欧亚大陆最西端的时候，他们至少已在欧洲生存了一千几百年；他们祖先的东方血缘，已经在西方民族的汪洋中稀释了几十代了。

《日耳曼尼亚志》记载的波罗的海东岸 Aestii 人的情况[61]，也是比较和追溯斯维比人种属的重要信息：

> 在斯维比海东岸住着 Aestii 人，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服装是属于斯维比人的，但他们的语言却非常象不列颠语。他们崇拜诸神之母，这种迷信的标帜为一只牝野猪的形象。

波罗的海东岸地区，正是现代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之地；而 Aestii 正是“爱沙尼亚”（Eesti）的别写。“爱沙尼亚”是一个语言特异的欧洲民族。旧俄时代，它被称为 Chudj[62]。与通古斯族名对比，Eesti 就是“兀者”之源音“斡拙”或“讹斥”；Chudj 就是“女直”的源音“厥机”或“沮渠”。Aestii 人迷信牝野猪的风俗，又

与通古斯民族将野猪作为神验的巫俗[63]相一致。

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匈牙利语，与若干西西伯利亚地区的纯蒙古人种的部落语言有着近缘联系，西方语言学界将它们归属为“乌拉尔语系”。其中，匈牙利语与通古斯语和蒙古语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许多学者认为“乌拉尔语系”与“阿尔泰语系”是同宗的。尽管，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比匈牙利语更早脱离了东方，而且东方语言本身无疑也曾发生过重要的变化；然而，在爱沙尼亚语和阿尔泰诸语间，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可比语素，如：

	爱沙尼亚语	通古斯—满语	蒙古语	突厥语
大	avar	amba（按巴）		
土、地	maa	na （那）		
手、臂	kasi	kala		
冰	jaa	juhe（朱合）		
箭	nool	niru（牛录）		
头	juht	wuju（兀术）		
水	vesi		us（乌苏）	
狗	koer		nohoi	
心	suda		zurh	
驾驭	juhtima			getmek（丘豆伐）

现代爱沙尼亚语的亚洲语言属性，古代 Aestii 人的通古斯式的习俗，是推定 Aestii 人是爱沙尼亚人的祖先的一个依据；而塔西佗关于斯维比人与 Aestii 人同俗的简略记载，则启示我们进一步确认：

“斯维比”就是东方族名“鲜卑”。

除 Suebi(鲜卑)和 Aestii(兀者)外,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载的日耳曼尼亚诸多族名,不少是与中国北方诸族可比的,如:Buri(颇里),Cheru-sci(叱勒),Daci(达稽),Hellusii(挹娄),Lugii(如甲),Nervii(纳尾、纳会鸡),Nemet-es(纳谋鲁),Osi(纥奚),Oxion-es(乌孙),Rugii(如甲),Siton-es(尸突、石敦),Suion-es(匈),Tungri(唐古),Ubii(纥便),Vangion-es(王甲)。其中,Nervii 不仅与辽代契丹部名“纳尾”、“纳会鸡”[64],而且与现代黑龙江下游族名 Nivkh[65]极为相似。

塔西佗述及的 Sarmatae(“萨尔马泰”)人,就是希罗多德笔下的 Sauromatae 人[66];由这个族名引申出来的地名 Sarmatia,是从东欧到中亚的广大草原地区的泛称;希罗多德则把它叫做 Scythia。西方学界是这样认识和概述“萨尔马泰”人的族属和始末的[67]:

> 公元前 6 至 4 世纪间,从中亚迁至乌拉尔山地区,最后定居在南俄和巴尔干东部地区的一种源自于伊朗人种的民族。
>
> 公元前 5 世纪,萨尔马泰人居留在乌拉尔山和顿河之间地区,公元前 4 世纪时他们渡过了顿河,进入息西安人的领地;前 2 世纪时,他们已经取代了息西安人,成为整个南俄地区的统治者。在尼罗统治的期间,他们曾经入侵罗马帝国的下梅西亚(Moesia,今保加利亚)行省;直至公元后 1 世纪,萨尔马泰人和日耳曼人的联盟,对罗马构成了长期可怕的威胁。在萨尔马泰人存在的最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入侵过达契亚(Dacia,今罗马尼亚)和多瑙河下游;3 世纪时他们曾被哥特人征服,因此许多人曾参与哥特人对西欧的入侵活动。公元

后370年，Hun人来到南俄地区以后，萨尔马泰人衰败了；幸存者们有些归顺同化，有些则逃亡到西方继续抵抗Hun人和哥特人。到6世纪时，他们的族名在史册中消失了。

从中国历史来看，Sarma-tae显然就是中国历史中的族名“悉万丹”和“深末怛”[68]。它的字根Sarma，与族名“乞伏”、“石抹”，中原姓氏“司马”、“西门”，匈牙利姓氏Szima等，都是相关的。西方学者断言Sarma-tae也是“伊朗人种”，那是因为他们对古代东方民族的了解太过陌生了。

塔西佗还记载了今俄罗斯中、北部地区的Peucini、Veneti和Fenni人，并将他们与“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泰人”进行了对照。这些古代分类描述对现代比较人类学的研究，依然具有的重要的学术价值。他说[69]：

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把Peucini人、Veneti人和Fenni人算作是日耳曼人呢？还是算作萨尔马泰人。

Peucini人有时也叫Bastarnae人，他们的语言、生活方式、定居习惯以及习俗都与日耳曼人很相似；他们人人都一样地肮脏，酋领们都很懒惰。互相通婚致使他们有着萨尔马泰人的那种令人不悦的长相。

Veneti人有许多萨尔马泰人的习俗，他们在Peucini和Fenni人之间的山林中出没，劫掠为生。但是，应该把他们算作是日耳曼人，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栖身之所，也有护身的盾，而且喜欢步行，矫捷善走；这些都和萨尔马泰人完全相反。萨尔马泰人则是以马背或车辆为家的。

> Fenni 人则极端地野蛮和出奇地贫穷，他们没有兵器、马匹和住宅；食野草、衣兽皮、寝土地；一切都仰给于弓箭，因为没有铁，他们在箭头上装的是骨镞。妇女与男子一道打猎，一样地分享猎物。他们只会用树枝编成一个罩子，来保护婴孩，使之免于野兽和风雨的侵害。

Fenni 人是“芬兰人”的祖先；Veneti 人是“斯拉夫人”的别称[70]；唯 Peucini 人血缘混杂，因而难断他们的先世或后裔。从行文来看，塔西佗是以“定居”或“游牧”，来区分“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泰人”的。亚洲游牧民族多用车辆，以“马背或车辆为家”的萨尔马泰人，应该是出自东北亚的蒙古人种；而所谓“萨尔马泰人的那种令人不悦的长相”，也恰恰正是欧洲人对蒙古人种形象的偏见。

Fenni 人是以射猎为生的民族。他们的利器是弓箭；“箭”字在芬兰语中为 *nuoli*，爱沙尼亚语为 *nool*，匈牙利语为 *nyil*；它们都与满语的 *niru*（“牛录”）一致。看来，在塔西佗的时代，东欧森林地带乃至极北地区，已经有东方民族盘踞在那里，他们是带着坚弓利箭离开远东地区的通古斯猎人部落。

最后，希罗多德还提到一种 Hellusii 人和一种 Oxiones 人，他说：

> 其后，是关于 Hellusii 人和 Oxiones 人的传言，听说他们长着人类的面孔和野兽的肢体。对于这些无稽之谈，我则无可奉告。

Hellu 和 Oxion 可能就是“挹娄”和“乌孙”。传言他们长着“野兽的肢体”,可能是因为在一些欧洲人的心目中,某些蒙古人种显得四肢短粗且上身颀长的原因。中国古籍对北方民族也有一些相当类似的无知描述。如《淮南子·坠形训》说:“北方,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其人蠢愚,禽兽而寿。”

希罗多德、斯屈波、塔西佗等西方经典作家,关于日耳曼尼亚、潘诺尼亚、达契亚、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俄罗斯草原—森林地带的诸多民族的记载,隐含了东方民族在欧洲地区活动的宝贵信息。根据这些历史—人类学早期记载,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以印欧人种为主体的西方人类的祖先,曾经不断地融入了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种的血缘。

事实上,现代德国姓氏就包容了数量可观的东北亚族名[71]。如:

Aiching(爱新)	Alten(阿勒坦)
Abich、Ebbeke(阿巴嘎)	Aubitz(阿保机)
Anderach(安达尔奇)	Atz(阿跌)
Barr(把)	Bugher、Bulger(仆骨)
Chur(乔)	Dagher、Dahler(达斡尔)
Lane(兰)	Mager(靺羯)
Mahnke(蒙古)	Nacke(纳葛)
Niedig(纳吉)	Nuessli(女奚烈)
Schmel(石抹)	Schone(匈)
Schub(须卜)	Sieb(锡伯)
Schwer(室韦)	Sieben(昔班)

Siegel(厖狄)	Todt(拓特)
Topfer(拓拔)	Uhlig、Urich(乌洛浑)
Wehe(回纥)	Utz(兀者)

尽管,我们无法逐个准确推定这些氏族融入西方民族的时代,也无法保证所有上述的对应都是准确无误的;然而,它们无疑为东西方人类在欧洲地区的互相融合提供了线索和证据。

五、结束语

关于祖先的由来的探索,是人类永恒的生动的课题。对本文涉及的欧亚大陆人类学课题的研究,西方学者有着可敬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却难免疏于对中国史料和东方民族的深入了解;相反,中国史学虽然拥有无与伦比的丰富史料,却又对外部世界和现代研究方法,缺乏应有的兴趣。因此长期以来,面对西方学者无数虽不尽正确,然勇于创新的"大胆假设",中国史学往往只有一些严守传统,而苍白无力的"小心求证"。

20 世纪的后半期,中国新疆地区出土了甚至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欧洲人种的大量干尸及其器物,这些考古成就已使中国学界开始关注史前期欧洲人种通过中亚进入东方的可能性。同时,西方学界也在不断反省前人的结论。例如,最近一位英国人类学家认为[72],公元 175 年被罗马帝国派去保卫不列颠行省的五千五百名"萨尔马泰"人,与 13 世纪成吉思汗的骑兵一样,是同属于蒙古民族的;而英国"亚瑟王"的传奇则是脱胎于他们的事迹。这些双向的反思的重要意义在于:唯有客观开放和摒弃偏见的学术

勇气，才是认知世间真理的出发点。

尽管，蒙古人种迟于印欧人种到达亚洲中部地区；但是他们的那种集生活、军事为一统的游牧生产方式，使得进入文明期的波斯、印度、罗马等欧亚帝国与中华帝国一样，都无法抵御他们长达数千年的入侵活动。他们在寒带的无与伦比的适存能力，又赋予他们在森林地带和极北地区的迁徙以坚韧不拔的力量。蒙古人种在整个欧亚大陆，乃至美洲大陆的渗透，都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本文论证，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间，出现在欧洲和近东地区的息西安、美地亚、萨尔马泰、斯维比、阿兰尼等游牧民族，都是沿欧亚草原骑马射箭而来的蒙古人种部落。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具有远东祖源的人类集团，全方位地融入到各个重要的西方和近东的“印欧人种”民族中去了。

注释

[1] "Scythian",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10, p. 576.

[2] 《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页549。

曰：“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

[3] 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页15。

按：清初有部落名“安达尔奇·爱满”，“爱满”(aimak)为蒙古语“部落”和“氏族”的意思。因此，这个部落可能是属于蒙古语族的。

[4] 《魏书》卷一百一，《契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223。

[5] 《蒙古秘史》102节，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中华书局，1957。

按:《南村辍耕录》有蒙古部落名“木里乞”、“末里乞”、“灭里吉”等。

[6]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黑水靺鞨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178。

[7]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306。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105.

[8] 同上,页307。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106.

[9]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二十二国》,台北,三民书局,1998,页598—599。

按:“安呾罗缚”,音 an-da-ro-wo,“嚈哒”应音同“安呾”。

[10] 本书《嚈哒与吐火罗斯坦诸族》。

[11] 同[7],页307—308。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110.

[12] 《蒙汉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76,页213;
《新蒙汉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213。

[13] 同[7],页286。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52.

[14] 贾敬颜、朱风《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页141;
J. G. Hangin, *A Concise English-Mongolian Dictionary*, Indiana Univ., 1992, p. 27.

[15] 同[7],页274。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23.

[16]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页3014。

[17] 《魏书》卷一百一,《吐谷浑传》,页2236。

[18]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页3011。

[19] 同[7],页265。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2.

[20]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等译,中华书局,1985,页214—215。

[21] 同[7],页316。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131.

[22] 《国语》卷五,《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214—215。

[23] 同[7],页292。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71.

[24]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157。

[25]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页2519。

[26] 同[7],页290。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65.

[27] 宋和平《满族萨满神歌译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页15。

[28] 贾敬颜、朱风《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页155,164。

[29] 同[7],页290—291。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67.

[30] "Scythian art",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10, p. 577.

[31] A. I. 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页405—406。

[32] M. Erdy, "Hun and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Throughout Eurasian", *Eurasian Studies Yearbook*, Indiana University, 1995;
郭物《青铜釜在欧亚大陆的初传》,《欧亚学刊》第一辑,1999,页122—150。

[33] 雪乌宏一《スキタィの釜》,《草原考古通信》第6号,1995,页2—

14。

[34] 同[7],页298。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 81.

[35] 本书《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成分》。

[36] 同[7],页54。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1, Sect. 104.

[37]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South Russian Steppes",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61—263;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p. 176—177.

[38] P. Golden, *Khazar Studies*,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80, p. 35;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South Russian Steppes", pp. 259—260.

[39] 同[7],页55—64。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1. Sects. 107—123.

[40] 《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863。

曰:"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啣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

[41] 同[7],页102。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1, Sect. 206.

[42] 同[7],页101—102。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1, Sects. 201—203.

[43]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XI, 8, 6, translated by H.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88, V, p. 265.

[44]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页3161—2162。

[45]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918、2923。

[46] 莫东寅《满族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79重印,页77—78。

[47]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 D.* 354—378), Penguin, 1986, pp. 412.

[48] "Alani",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1, p. 201.

[49] 《魏书》卷一百三,《高车传》,页2310。

曰:"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按:其中"右叔沛"疑为"右沛叔"之误,"右沛叔"乃"渥巴锡"。

[50]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57。

Tacitus, *Germani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sect. 4.

[51]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XII, 1, 3, translated by H.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88, III, p. 265.

[52]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1973, p. 424—425.

[53] 同[50],页74。

Tacitus, *Germania*, sect. 38.

[54]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983。

[55] 《梁书》卷五十四,《芮芮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817。

曰："芮芮（按：即柔然）国，盖匈奴别种。魏、晋世，匈奴分为数百千部，各有名号，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迁，因擅其故地。无城郭，随水草畜牧，以穹庐为居。辫发，衣锦……"

[56] 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371。

Herodotus, *The Annals*, Book 12, Sect. 29.

[57]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页3010。

曰："尸突氏，后改为屈氏。"

[58] 《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页1230。

曰："凡白号之姓，完颜、温迪罕、夹谷、陀满、……石敦、……"

按："白号之姓"或"黑号之姓"，其意不明。

[59] 莫东寅《满族史论丛》，页29，178。

文引《朝鲜世宗实录》卷八十二，二十年七月辛亥条："[吾都里部]凡察之母，佥尹甫哥之女，也吾巨，先嫁豆满挥厚，生猛哥帖木儿。挥厚死后，嫁挥厚异母弟容绍包奇，生子虚里、于沙哥、凡察。包奇本妻之子有吾沙可、加时波、要知。"又引《满洲实录》记载，清朝统治者始祖"布库哩雍顺"有后人"樊察"者。

[60] "Suebi",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10, p. 352; M. Todd,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pp. 184—188.

[61] 同[50]，页78。

Tacitus, *Germania*, sect. 45.

[62] R. Harms, "Uralic Languages",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22, p. 703.

[63] 王宏刚、富育光《满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1,页21;

莫东寅《满族史论丛》,页199。

[64] 《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80。

[65] J. Forsyth,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2, pp. 207—211.

[66] 同[7],页273,307—310。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4, Sects. 21,110—117.

[67] "Sarmatian",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10, p. 455.

[68] 《北史》卷九十四,《室韦传》,页3129。

曰:"室韦国……其后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并无君长。"

[69] 同[50],页79。

Tacitus, *Germania*, sect. 46.

[70] 同[50],页90。

Tacitus, *Germania*, Notes.

注84曰:"Veneti人就是Wends人,所谓Wends人就是古代日耳曼人对斯拉夫人的称呼。塔西佗说Wends人在Peucini人与Fenni人之间,考其地址,也正是斯拉夫人原来的居住地。"

[71] Luk Waii, *Hesperian Surnames and History*, U. S. A., Boxearth 68, 1998, pp. 374—456.

陆木叉威《西方姓氏简史》,美国,1998,页374—456。

[72] H. Reid, *Arthur, the Dragon King*, London, Headline, 2001.

关于若干问题的注记

在应该结束本书的时候，却仍有“言犹未尽”之感。但我意识到，最好由新一代的历史、语言学者来继续这些问题的讨论。因此，我谨将一些曾经思索过的问题，作几则注记如下。

一、“通古斯”和“桃花石”的意义

本书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通古斯”民族及其语言。

17 世纪，俄罗斯人发现西伯利亚地区使用突厥语的“雅库特人”，称“鄂温克”人为“通古斯”。因此，“通古斯”也就成了关于“肃慎”、“勿吉”、“靺鞨”、“女真”、“满”等先后或近缘民族及其语言的学名。至于“通古斯”一字的源意，却没有准确的解释。

我认为“通古斯”就是突厥语“九”字 *dokuz* 或 *tokuz*[1]，作族名则是“九姓部落”的意思。这个想法是受波斯著作《史集》的一段记载的启发[2]：

> 在古代，畏兀儿诸部的驻地这些河流（按：指色楞格河及其诸多支流）沿岸、山里和平原上。沿着十条河流居住的，称为 auun 畏兀儿，而住在九河［地区］的，称为 tughuz 畏兀儿。

其实,突厥语中 tughuz 和 auun 分别是数词"九"和"十"(*on*);因此"tughuz 畏兀儿"和"auun 畏兀儿",不是"九河回纥"和"十河回纥",而是"九姓回纥"和"十姓回纥",两者可能有祖属的区别,"九姓回纥"也许就是"通古斯系回纥"。

中西历史都有突厥语民族称中国或汉人为"桃花石"的记载。关于"桃花石"一字的意义有许多诠释,其中以法国人阿卜尔·勒缪塞的"东胡说",和伯希和的"拓拔说"影响较大,但反对者很多,因此至今也没有定说[3]。我以为"桃花石"就是"通古斯"。

据忒俄费拉克图斯的记载[4],公元 598 年西突厥使者递交给拜占庭的国书,曾述及柔然"馀众奔亡入 Taugas"的事情。1021 年,"长春真人"邱处机赴中亚见成吉思汗,途中遇到的中亚土著称汉人为"桃花石"[5]。15 世纪西班牙使者克拉维约出使帖木儿汗国,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6]:

> 中国皇帝名 Çayis 汗,其意为:"统有九邦之大帝"。鞑靼人则称之为 Tanguz,其意为:"嗜食豕肉之人"。

一个来去匆匆的西方人,要弄懂东方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从上下文来看,克拉维约之谓"鞑靼人",是突厥化了的中亚蒙古后裔;Tanguz 就是"九邦",而与"嗜食豕肉之人"没有关系。中亚突厥语谓"中国"为 Tanguz,即是"桃花石"或"通古斯"。伯希和等的猜测是没有道理的。

突厥语系民族将"汉人"和"女真"系民族混称为"九姓",必有深远的历史原因。这或许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那时"九姓"(通古斯系)部落在中原就已经占了强势地位,因此先行离开中原

图十一:20 世纪初,黑龙江下游的一个通古斯—那乃族家庭。它的一些成员穿的是鱼皮制作的外衣;前排两男子间放置的和中排右二者头带的斗笠,都是用桦树皮制成的;中排右一中年妇人手持旱烟筒。

取自:J. Forsyth,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13.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底片号 41614。

的突厥语民族，视中原为“九姓之地”；而女真—靺鞨系民族则是于“汉语”未形成前，从中原出走的“九姓”部落。中国自谓“九州”，或许也是源于这个意思。

二、突厥姓氏“阿史那”

关于突厥民族的始源有许多说法，它和它的核心氏族“阿史那”之名，在后魏、隋唐前的各代历史中都没有出现过。而象“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7]这样的记载，又过于笼统。秦汉时，“匈奴”是“北狄”和“西戎”的代名词；说它是“匈奴之别种”，无非指其为北方诸族的成员而已；而识别“阿史那”氏族的族源，或许才有一些具体的意义。

唐人对于姓名、地名译音，常以“那”字表示结尾的-n 音。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据，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第一卷中曾记载，在他去程中经过一个叫做“梵衍那”（又作“帆延”或“犯引”等）的族国，说在它的都城近侧有一尊“大佛像”。据此，该城必为著名的“巴米安”（Bamian）地方；而玄奘在第十二卷中，是将这个地名记为“护苾那”的。

以“那”字替代结尾-n 音的古文字现象，可能是受当时很时髦的梵语或梵文的影响而产生的；但也可能是人类发音的一种泛见现象，有人说 China（“支那”）是从 Chin（“秦”）字变来的，很能附会这种想法。

因此，“阿史那”，O-si-na 或 A-si-na，很可能是 O-sin 或 A-sin 的衍写，它就是族名“乌孙”或“爱新”。突厥民族的首领氏族源于通古斯系民族的背景，也不是很难理解的事情；不久前，“爱新”氏

还曾是中华帝国的皇族呢。

三、“吉里迷”与“日耳曼”

金、元时代东北亚族名“吉里迷”的先世、后裔及播迁，在本书各篇中散见有一些讨论。古今中原地名“即墨”；西域地名“且末”[8]、“忸密”[9]；魏姓“丘穆陵”[10]；隋代北狄之“九离伏”[11]，唐代突厥之“处蜜”[12]，五代奚族之“啜米”[13]，蒙古民族之“扎马儿歹”[14]等部落名；以及今内蒙政区“哲里木”，和哈萨克斯坦地名“奇姆肯特”(Chimkent)等。可能都是这个出自黄河流域，远徙于欧亚大陆的民族的裔族和遗迹。

关于“吉里迷”最明确的记载，出自《金史·地理志》的起句“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这无疑表明，当时还有一支“吉里迷”部落生活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蒙古语在读 r 或 l 时，常常将其转化为 ra/ri 或 la/li；而古代汉语又因行文限字的原因，往往把这些“尔”、“儿”、“耳”略去。这就是“吉儿迷”被蒙古人叫成“吉里迷”、“哲里木”，而汉籍称其“且末”的原因。若将这个族名的发音构作：dje-r-me 或 dji-r-mi，应该是可取的。

这个民族的信息远不止来自中国历史；希罗多德记载的 Cimmerian(通译“奇米里安”)民族至少于公元前 6、7 世纪便已经在黑海北岸游牧[15]，并在顿河—亚速海海口遗留了一个著名的古地名“奇米里安地峡”(Cimmerian Strait)。其实，我们将 Cimmer 比译作“且末”、“吉迷”或“哲木”都是非常恰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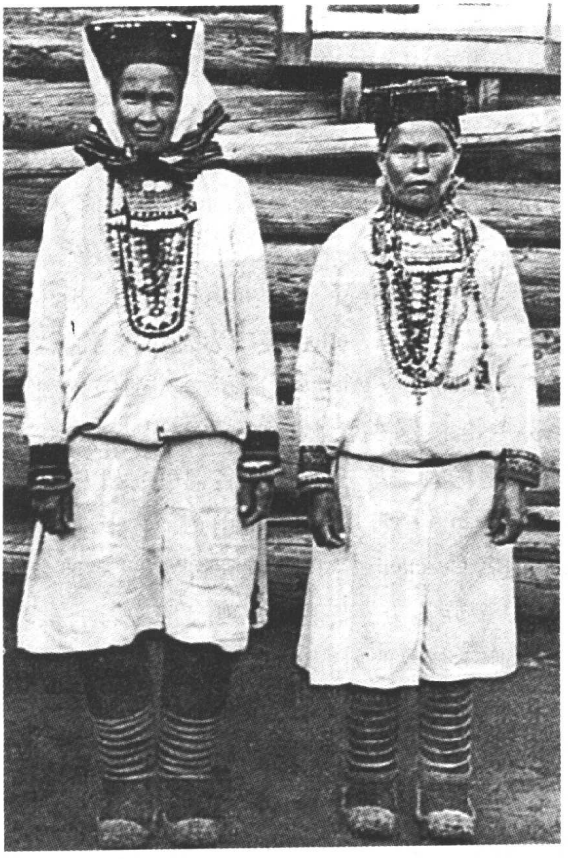
《罗斯编年史》则有在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尔汗国中有一个

Chalmata(音同“扎马儿歹”)部落的记载[16]。13 世纪蒙古军“渡亦扎勒河、扎牙黑河,直抵乞瓦绵、客儿绵等地”[17]。现代东北方言还称“客人”为“且”,《说文》则曰:“客,寄也”[18]。若依照这些读法,“客儿绵”当即是“且儿绵”或“寄儿绵”。今伏尔加河—卡玛河合流处的 Chermis 族[19],当是 Chalmata 或“客儿绵”的后裔。

德意志国名、族名或语名是很多样的,这反映它历史的流长和血缘的复杂。其中,“日耳曼”(German)、“德意志”(Dutch)、“普鲁士”(Prussia)、“哥特”(Goths)等广为人知;然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却叫它 Allemand 或 Alemán;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又称之为 Német(s);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则谓之 Saksa(n)(“撒克森”)。它们大都可以追溯到一些古代部落名,其中又以“哥特”(Goths)最著名;唯 German 一字,是出自纪元前后罗马、希腊历史—地理作家记载的地名 Germania(“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名之由来却无人知晓,只做“蛮族地方”来理解。现代历史、语言、考古学家对 German 一字,作了往复的研究,结果却都不得要领。[20]

这个地名问题,无疑必须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解决。东欧广大地区曾在希罗多德的时代称为 Scythia,后来又改称 Sarmatia,罗马尼亚地区又长期被称为 Dacia,这些地名统统与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的族名相关。因此,地名 Germania 很可能与早于 Scythian 人到达欧洲的 Cimmerian 民族有关,German 一字可能就是东方游牧民族族名“吉儿迷”或“寄儿绵”。

事实上,南部德国的若干地名,是否与东方民族的族名相关,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历史地理问题。如:Memmingen(“迷密”或“弭末”),München(“靺鞨”),Schwabisch(“室韦”),Wangen(“王甲”),Wurttemburg(“乌潭”或“和田”)等。



图十二：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两个 Cheremis 族妇女（T. Evsevev 摄于 1919 年，藏于芬兰国家博物馆）。

取自：T. Vuorela, *The Finno-Ugric Peoples*, Indiana University, 1964, p. 259.

按：这两位 Cheremis 族妇女表现出较明显的亚洲人种体征。

图十三: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一个 Cheremis 族家庭(T. Evsevev 摄于 1919 年,藏于芬兰国家博物馆)。

取自:T. Vuorela, *The Finno-Ugric Peoples*, Indiana University, 1964, p. 258.

按:这位 Cheremis 族男子及儿童表现出较明显的欧洲人种体征。

四、关于“十二生肖”的问题

中原民族以十二兽纪年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一般认为它是起于东汉。

《周书·宇文护传》就说：“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

清代赵翼《陔馀丛考》说：“汉时呼韩邪欵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

蒙古民族用“十二兽”为纪年，则分别多见于《蒙古秘史》和《史集》。俄罗斯东欧部分的楚瓦什等民族，亦有这种传统的动物纪年习俗。

与“十二兽”相对应的“十二地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其实在金文甲骨中就已经出现。如果，将“十二兽”名及相应的“十二地支”名，与蒙古语比较：

兔		tuula
龙		luu
马	午	morin
羊		jamaa
猴	申	samz
猪	亥	gahai

图十四:20 世纪初,发现于哈萨克斯坦 Akmolinsk 南 Kara-Agach 地方的有“龙”头装饰的金器。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南部的 Stavropol 地方也有雷同的器物出土。

取自:Otto J. Mae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3, p. 304.

按:有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是 4、5 世纪 Hun 人的遗物。实际上,它们更可能是 Scythian 人留下的,希罗多德对黑海北岸 Scythian 人的金制饰物有许多记载。中国十二动物纪年中的唯一图腾兽——“龙”,古代欧亚草原上的诸游牧民族或部落亦皆有之,这是它们出自黄河流域的证据。

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兔”、“龙”、“马”、“羊”四字与蒙古语是同源的,而“申”、“亥”两地支名,又恰恰是蒙古语中的“猴”*samz* 和“猪” *gahai* 的缩音。因此,这种“兽历”并非由北方传入中原,或由中原流去北方;“十二兽”与“十二地支”的对应也不象是后人的撮合,它是中原先民的创造,也是后世北方诸族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

五、“阿姆河”与“阿穆尔河”

现代中亚“阿姆河”(Amu Darya),《史记》和《汉书》作“妫水”[21],《魏书》作“乌许水”[22],《北史》、《隋书》和《唐书》作“乌浒水”[23],《大唐西域记》则记为“缚刍水”[24],它们均与该河之古代希腊名 Oxus 有关。译名“乌浒水”或“缚刍水”,较尊重其希腊语的源音;而“妫水”则显然是借自一条中原河名。后世,它又名“质浑河”或“细浑河”,克拉维约曾有下述记载[25]:

> 星期四,行至阿姆河(Abu Amu)或称之为细浑河(Ceyhun)的一条大河边。河面宽约十里,水流甚急。

“阿姆”和“细浑”之名出现在中亚地区,显然与东北亚民族的不断迁入有关,那里有许多与满蒙地名相关的地名。鄂温克族称黑龙江为“阿穆尔”河,而金代女真族把它叫作“石黑罕”河[26];不难看出,“阿穆尔”和“石黑罕”,分别就是“阿姆”和“细浑”的对音。《魏书》还说[27]:

> 叠伏罗国,去代三万一千里。国中有勿悉城。城北有盐

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织作布。土宜五谷。世宗时，其国王伏陀末多遣使献方物，自是每使朝贡。

我们也不难看出：部落名“叠伏罗”即东北亚族名“豆莫娄”，“勿悉”即“勿吉”之别音；其王名“伏陀末”，则是“忽多忽”或“胡土虎”之转音；周边“土宜五谷”的“西流”大河，必是流经巴里黑以北平川的“阿姆河”，其名“盐奇水”又极似“掩滗水”或“掩施水”[28]。显然，一条松嫩平原上的河名，又被套用在这条中亚大河的头上了。

可以想象，无数来自东北亚的移民部落，都各行其是地将自己祖居地的美好地名，转嫁到这片宜耕宜牧的乐土上；而“阿姆河”，就正是这样一个历尽淘汰而未湮灭的，具有鲜明远东特征的中亚河名。

六、满清皇室人名特征[29]

北方诸族之人名，很多是与族名、部落名有关的，本书以此为语言信息或历史线索，作了许多讨论，获得了许多结论。事实上，清代帝室人名也是尊从这个传统的。不过，初入关时这种现象一目了然；后来，汉化益深，用字愈僻，因此也就越难辨认了。

努尔哈赤有十六子：褚英、代善、阿拜、汤古代、莽古尔泰、阿巴泰、阿巴嘎（皇太极）、巴布泰、德格类、巴布海、阿济格、赖慕布、多尔衮、多铎、费扬果。皇太极有十一子：豪格、洛格、洛博会、叶布舒、硕塞、高塞、常舒、福临、韬塞、博穆博果尔等。这些名字基本都是直译音，因此很容易识别。其中：

阿拜、阿巴泰、叶布舒	即“阿巴嘎”或“阿保机”；
汤古代	即“唐兀惕”（“西夏”之别称）；
莽古尔泰	即“蒙兀儿惕”；
德格类	即“达斡尔”或“吐火罗”；
多尔衮	即“吐[谷]浑”；
多铎	即“拓特”；
豪格	即“乌护”或“乌古”；
洛格	即“术和”；
博果尔	即“仆骨”；
费扬果	即“费雅喀”；
福临	即“费连”或“贺楼”。

此外，“硕塞”可能就是“厖狄”；“高塞”就是“兀者”；“韬塞”即是“突厥”。而“阿济格”乃是通古斯语的“小”字。

自康熙后，清皇室从汉习，人名按辈分限定首字，但又要维护民族的传统。这样一来就造成名字虽多，但实质重复的现象。如康熙帝三十五子的名字，以“允”字为首者，即有二十七人，因此这些名字也就限制在有限的氏族名中了。如将“允”读如“兀”、“乌”等音，便一切释清。如：

“兀者”：	允禔、允祉、允祺、允祚、允禄、允禮、允祄、允禩、允祈、允禶、允禨；
“乌护”：	允祐、允禑、允禑、允禕、允祐、允禑、允禑；
“斛律”：	允禄、允禮；

“纥奚”： 允禩、允禧；
“乌孙”： 允礽、允祥；
“乌潭”： 允禟、允禑；
“阿巴嘎”： 允祕。

雍正十子(“弘”、“福”字辈)，乾隆十七子(“永”字辈)，嘉庆五子(“绵”字辈)，道光九子之名，都不难循此理析澄清。清末，同治之名“载淳”是“女真”的源音“朱里真”(读“朱儿真”)，光绪之名“载湉”是“契丹”，尚犹可辩。到了“溥仪”、“溥杰”辈，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汉字“允”、“弘”、“福”、“永”、“绵”、“载”、“溥”等的读音，是没有什么可推敲的；须要洞察的，则是它们所隐喻的“胡音”。

康熙第四子名“胤禛”(即“雍正”)，与秦始皇的名字“嬴政”，实际就是《金国语解》中的“金曰‘桉春’”一字。这是“秦”是由北狄转化来的西戎部落的一个证据。还该提一下咸丰帝的近臣“肃顺”及“端华”的名字，它们分别就是族名“肃慎”和“达斡尔”。

七、“奕”字应读“著”

“奕”和“弈”是两个同义的形声字，本义“下棋”。这个字在先秦古籍中多现，如：“视君不如弈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今夫弈之为数”(《孟子·告子上》)；“使弈秋海二人弈”(《孟子·告子上》)等。古今辞书都说它读“亦(yì)声”。如：《说文》曰：“围棋也，从廾，亦声。论语曰不有博弈者乎。”

事实上，人们说“下棋”是“著棋”，没有人说“亦棋”的；人们

也只说“妙著”，不说“妙亦”。但面对辞书造成既成局面，要辨证该字的正音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有证据说“弈”或“奕”，的确是读“著”的。如《魏书·吐谷浑传》记载：

> 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

人名“弈洛韩”其实就是“车鹿会”。前文中我曾经提及，这个鲜卑字可能就是现代蒙古语中的 *cheregh*，意即是“健壮”，古代则兼有“勇士”和“英雄”的意思。东胡—鲜卑系人名或称呼“丘力居”、“就六眷”、“日陆眷”、“成律归”、“曳落河”等，皆其谐音[30]。也惟将“弈”字或“奕”字读成“著”，方能顺理成章。许慎说它读“亦声”是不对的。

清咸丰帝“奕詝”，其八个兄弟名：“奕纬”、“奕纲”、“奕继”、“奕誴”、“奕訢”、“奕譞”、“奕诒”、“奕譓”。他的一些堂兄弟名如：“奕淳”、“奕謨”、“奕詳”、“奕勋”、“奕格”、“奕绘”、“奕劻”。这些“奕”字也惟读“著”或其近音，方能符合人名从部落名的习惯。如：

奕纬、奕譞、奕譓、奕绘	即“昭武”；
奕訢、奕淳、奕勋、奕詳	即“朱里真”；
奕继	即“女直”的源音“主儿扯”；
奕謨	即“吉里迷”之缩音“且末”或“拘弥”。

八、先秦中原人名的几个例子

先秦文献记载的人名一般都无姓氏，汉族姓氏如“张”、“王”、“李”、“赵”等的全面出现和使用，是从汉朝才开始的。其原因之一是，秦朝统一中国后，中原民众采用原诸侯国名作为姓氏，来表明自己的籍贯。《史记》记载的人名，与北方诸族的部落名相关的，不可胜计。这既是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重要例证，也是有关中华民族祖源的重要信息。为吁请人们的注意，我再举几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史记·孔子世家》说：

>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孔子的祖先是“商族”的后裔“宋人”（按，“宋”应即“商”之衍生字）；而后世的“孔”姓，可能是始于“孔丘”之名；说孔子的祖先就姓“孔”，恐怕是不实之词。其祖上三代人名，以“叔梁纥”最易辨认。古今蒙古语都是将“高丽”称为“肃良合”（Solongho）的[31]；而清代文献则又称“鄂温克”族为“索伦”部[32]。虽然构成上述事实的原因不很清楚，但“叔梁纥”或“肃良合”是个古代部落或族国名则是无疑的。

《孔子世家》还说到一个“鲁大夫孟厘子”；《秦本纪》记载过一个重要的人物“百里傒”（拟读“陌里傒”）。实际上，这两个人名就是后世屡见不鲜的北方族名“篾里乞”。

《赵世家》说到“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一事。人名“黑臀”是不可能用字义来解释的，它必定就是古代族名“乌潭”，古今中原地名“邯郸”，西域地名“和田”等，可能皆出自于此族名。

《魏世家》记载的名人“信陵君无忌”；《周本纪》记载的周部落之始祖“后稷”；以及《太史公自序》记载的司马迁的祖父名“无泽”等，就是后世通古斯系族名“兀者”。

《楚世家》记有楚部落的先人“吴回”者和“公子弃疾”者。“吴回”和“弃疾”，当是北方族名“回纥”和“赤狄”之音。

《蒙恬列传》说“恬大父蒙骜”和“骜子曰武，武子曰恬”。“蒙骜”和“蒙武”，其实就是后世族名“蒙兀”。尽管，“蒙古”或“蒙兀”作为族名很晚才出现，但作为人名它很早就存在了。这或许是历史的疏忽。

《苏秦列传》言及苏秦曾受业于一位“鬼谷先生”。将人名“鬼谷”拟为“魏古”，即“回古”或“回纥”是很合理的。事实上，商代甲骨记载的“鬼方”也就是“回纥”。《集解》和《索隐》说，在扶风、颍川都有叫“鬼谷”的地方；这也说明“回纥”的确是出自中原的北方部落。

后世有不少仿古的人名，如宋代有“辛弃疾”；现代有“柳无忌”。它们可能是分别取了“不患疾病”和“百无禁忌”的美意；而那些“无泽”和“黑臀”之类有寡恩或秽俗之嫌的，也就无人效法了。

先秦中原人名与后世北方诸族族名的对应，为中原汉语的“上古音”找到了一面镜子，这种比较的结果表明：“上古音”与汉代以后的“中古音”的差别可能不是很大的。或许，有人会以质疑这种人名—族名的对应，来否定这种方法及其结论。为此，我们不

妨再举几个族名—族名间的直接对应,进一步来肯定这一事实。

《赵世家》说:

……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

其中,"休溷"("溷"音"陌")显然就是后世的族名"悉万"或"石抹",而"黑姑"就是"护古"或"乌古"。

九、西夏民族的族源

西夏民族,中原皇朝叫它"党项"或"党项羌",突厥碑铭记之为"唐古特",西方文献称之 Tangut[33];吐蕃却又叫它"弥药"。他们在宋代建立了自号"大夏"[34]的政权,西夏帝国疆域的中心在今陕甘宁青地区。

学术界至今对它的起源争论不休,说它是藏系民族的依据,无非是因为"羌"字出现在它的族名中;说它是鲜卑系的根据,也只因其核心氏族是"拓拔氏"。很少有人设想他们是"西戎"之裔。从族名来看,"党项"就是"东胡";"弭药"就是"靺鞨"。《隋书·党项传》说它"自称猕猴种","猕猴"也是"靺鞨"之异音。看来,西夏民族的祖先是来自北方的通古斯、鲜卑系部落。

《唐书·党项传》说它的属部:"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其中"拓拔氏"出自鲜卑自不待说;"野辞氏"和"米擒氏"分别是"兀者"(或"讹者")和"靺羯"(或"篾里乞"),也一目了然。同传所谓"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等"六州部落",亦

皆北方诸族之族名，其如：

越诗	即“纥奚”；
龙儿	即“术和”；
厥律	即“敕勒”；
儿黄、野海	即“乌护”；
野窣	即“兀者”；
野利	即“乌洛浑”或“斛律”。

又谓“居夏州者号为平夏部落”，“平夏”当即族名“钵和”。

《唐书·党项传》记载的党项人名，如“拓拔赤辞”、“拓拔思恭”、“拓拔思谏”，“拓拔乞梅”、“折磨布落”、“野利秃罗”、“野利刚”等，也是北方诸族的族名和人名。如：

赤辞	即“赤狄”；
思谏	即“厙狄”；
思恭	即“拾归”或“什翼犍”；
乞梅、折磨	即“吉里迷”或“且末”；
野利刚	即“斛律金”；
野利秃罗	即“斛律·同罗”；
布落	即“步六”或“拨略”。

西夏仁宗朝有名臣“斡道冲”者，祖籍灵武，世代为国史编修官。儒学功底精深，夏汉两文兼通，曾译《论语注》，并撰有《周易卜筮断》、《论语小义》等书。我曾经指出[35]，魏姓“郁都甄”，契丹

人名“胡突堇”，女真人名“温迪罕”，西史记载的 Hun 人人名 Odolgan，或“突厥”碑铭中的山名 Otukan（汉籍作“于都斤”或“乌都鞬”）等，就是《金国语解》之“阿徒罕，采薪之子”一字。“斡道冲”，显然亦即是该字。

《宋史》说西夏称“可汗”为“兀卒”[36]，《史集》则说西夏语的“大”字为“绀孛”[37]，两字皆同通古斯—满语。今银川—青铜峡间，遗留至明代的西夏地名[38]也都是些鲜卑系或通古斯系族名：

瞿靖	即“沮渠”；
王铨、王澄	即“兀者”；
魏信	即“乌孙”；
唐铎	即“拓特”；
许旺	即“室韦”。

19 世纪流亡俄属中亚的陕甘宁青“东干族”，应该是西夏民族之后裔；“东干”应即“党项”或“唐古特”之谐音。

据说，中西学者对于西夏文字的识别颇有成绩，而对其语音的构拟却未能有所突破；有字有据的西夏语言的语属，竟无头绪。这种为难的局面，可能与学界未能先辨明西夏民族之祖源有关。我以为，若果能从通古斯语和蒙古语着手，解读西夏文字；西夏民族的族源和语属的确认，将指日可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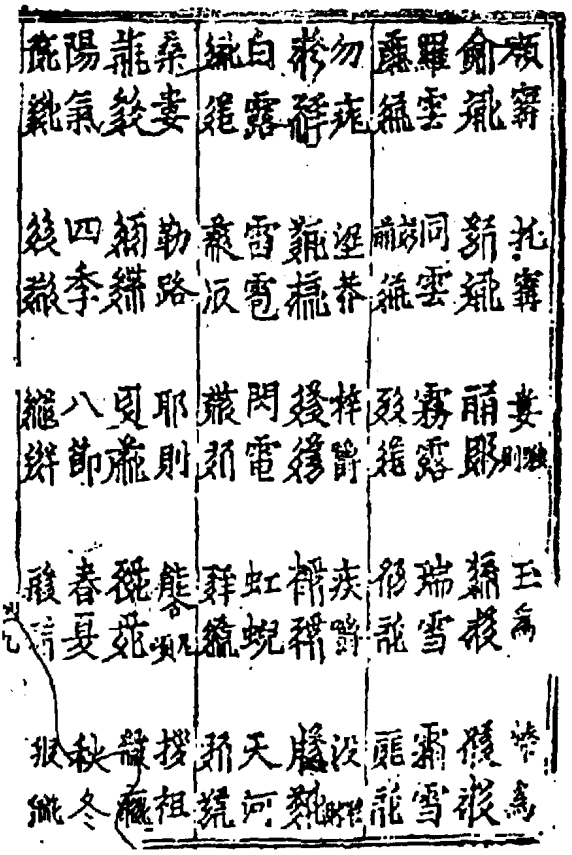
20 世纪初，俄人科兹洛夫于今内蒙额济纳旗（“黑水城”）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其中，有刊印于乾佑二十一年（1190）的，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纂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该书是一本西夏文—汉文音义对照的简易词典，它对于研究西夏语言、文字、

文法和释读西夏文献，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利用它进行西夏语言与北方诸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却至今尚未展开。

下面的列表将《掌中珠》中较易识别的一些基本词汇，与通古斯—女真—满语语词（主要采自各种版本的《女真译语》）和藏语语词，进行了并非严格的语音比较，一些两可的现象也予并列保留。但我们仍然会注意到：对于西夏语来说，通古斯语和藏语有不相上下的影响。如果将蒙古语、突厥语，以及与通古斯语近缘的匈牙利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也参与比较的话，西夏语言与北方诸族语言关联的结论也就更加明确。

	西夏语	女真语	藏语	其他语言
天	鱼骨	**阿瓜**	naam	**ég**（匈牙利语）
太阳	桑	**孙**	nyimer	
日子	能	**能吉**	nyimer	
土地	勒	**纳**	saa	
树木	西	莫、莫**西**	**shiin**	
河流	麻	必剌	gukdju	**moron**（蒙古语）
	说			**su**（突厥语）
霓虹	疾嚼	**拙**勒莫	**dja**	
马	领	木**棱**	taa	
	囉	苏**录**（白马）		**ló**（匈牙利语）
牛	悟	**委罕**	long	
羊	野	贺泥	luu	**jamaa**（蒙古语）
猪	讹	**兀尖**	paapa	
狗	屈	因答忽	**khi**	

兔	勒讹	姑麻洪	rekoon	
鱼	汝、乳	**泥木哈**	**nya**	
蜜蜂	谋率		pang	**mehilainen/mesilane**（芬兰/爱沙尼亚语）
人	尼卒	**捏麻**	mi	
头	吴	兀住	go	
手	臈	嘎拉	laqpa	
心	宁	**捏麻**	**ning**	
眼	昧、每	牙撒	mii	
牙	个	**畏可**	soo	**fog**（匈牙利语）
耳	尼六	尚	**nyendjoo**	
鼻	你	宋吉	**nerquu**	
生	削	半的孩	**tshe**	
死	悉	卜车黑	**shi**	
新	悉	伊彻	sa-apa	**shine**（蒙古语）
不	没、名	夸	**mee**	
一	阿、娄	**额木**	dji	**egy**（匈牙利语）
二	能	拙	**nyii**	
三	桑	以兰	**sum**	
五	鱼骨	顺扎	**nga**	
六	抽	宁**住**	**thuu**	
十	晻	庄	cu	**on**（突厥语）



图十五：西夏骨勒茂才著《番汉合时掌中珠》之一页。原件发现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故西夏黑水城），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经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教授整理，该书1989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夏语复杂的语源现象表明，陕甘宁青的西夏民族的内涵和祖源也是复杂的，他们的先祖必定是与北方诸族有关的“西戎”。这些问题的认识，对于厘清古代“周”、“秦”等部落的族属有重大的意义。而且，随着“西戎”即“北狄”的结论的到来，“月氏”、“乌孙”、“大宛”、“大夏”，乃至“昭武九姓”之谜，亦将迎刃而解。另一方面，西夏语言的藏缅语特征，不仅与藏缅系民族的融入有关，必然也与中原汉民族及汉语的影响有关。西夏语的某些藏缅语特征，是我们探讨北方汉语的形成过程的又一面可借鉴的镜子。

注释

[1] R. Akdikmen, *Standard Turkish Dictionary*, New York, Langenscheidt, 1986. S. Mamedov, *Azerbaijiani*,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95.

[2]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页240。

[3]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页58—75。

[4]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页220—221。

[5] 《长春真人西游记》，摘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页203。

[6]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97，页127。

[7] 《周书》卷五十，《异域·突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907。

[8]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897；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262。

[9]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页2270。

曰："忸密国，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按：同书《官氏志》有"勿忸氏，后改为于氏"的记载。"勿忸"应即"勿吉"，"忸密"应即"吉[里]迷"，故"忸"应读"丑"、"吉"等音。

[10]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页3006。

[11] 《隋书》卷八十四，《铁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880。

[12]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5179。

曰："西突厥……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

按：除"处密"即"吉[里]迷"外，"都陆"即"同罗"，"歌逻禄"即"斛律"，"处月"即"昭武"，"伊吾"就是"乌护"。"弩失毕"与"昭武九姓"国名"那色波"可比它们与《辽史》记载的契丹族名"芮奚"有关，也可能就是通古斯族名"女奚烈"。

[13]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中华书局，点校本，页909。

曰："奚，……分为五部，一曰阿萎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粤质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讫支部。"

按：上述部名，除"啜米"显然是"吉里迷"外，"阿萎"即"乌护"，"奴皆"即"纳割"或"纳吉"，而"粤质"和"黑讫支"同为"兀者"。

[14] 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97，页12—14。

[15]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8。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1, Sect. 15.

曰："……被游牧的 Scythian 人从家乡驱逐出来的 Cimmerian 人，进入了亚细亚……"

[16]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in Denis Si-

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41.

[17] 《蒙古秘史》262 节,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中华书局,1957,页 259。

[18] 许慎撰《说文解字》,香港,中华书局,1972,影印本,页 151 下。

[19] T. Vuorela, *The Finno-Ugric Peopl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237—264.

[20] M. Todd,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pp. 1—28.

[21]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3162;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页 3889—3890。

[22]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嚈哒传》,页 2279。

[23] 《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嚈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3230;
《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乌那曷传》,页 1856;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6244。

[24] 《大唐西域记》卷一,《三十四国》,台北,三民书局,1998,页 31。

[25]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页 127。

曰:"星期四,行至阿卜阿姆河(Abu Amu),或称之为细浑河(Ceyhun)的一条大河边。河面宽约十里,水流甚急。"(按:Abu 是阿拉伯语的"河"字。)

[26] 杨锡春《东北地名语源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页 199。

[27]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叠伏罗国》,页 2278。

[28] 同[1],页 160—161。

[29] 赵志忠《北京的王府与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30] 本书《鲜卑民族及其语言线索》。

[31] 贾敬颜、朱风《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页 135;

J. G. Hangin, *A Concise English-Mongolian Dictionary*, Indiana Univ., 1992, p. 123.

[32] 杨学琛《清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页137。

[33]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页253。

[34]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3996。

[35] 本书《Hun人的鲜卑—通古斯族源》。

[36] 同[34],页13998。

曰:"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

[37]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页214。

曰:"扎阿绀孛(jakambu)原名客列亦台(karaidai)。当唐兀惕人捉住他时,见他十分机灵,便称他为扎阿绀孛,即'国家的大异密';'扎阿'意为'国家','绀孛'(kambu)意为'大'"。

[38] 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页223。

参 考 文 献

古 代 典 籍

《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8。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魏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北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
《周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辽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金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元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

中 文 著 作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蒸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耿升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4。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

陈芳芝:《东北史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陈飞、凡平注释《大唐西域记》,台北,三民书局,1998。

陈明远、汪宗虎《中国姓氏大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陈庆英主编《中国藏族部落》,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达木丁苏隆编译《蒙古秘史》,谢再善译,北京,中华书局,1957。

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6。

冯继钦、孟广耀,黄凤岐《契丹族文化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傅海波等编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格列科夫等《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耿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译《保加利亚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胡振华《柯尔克孜语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李增祥《突厥语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
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莫东寅《满族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79 重印。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北京,中华书局,1999。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886。
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宋和平《满族萨满神歌译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苏天爵《滋溪文稿》,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
孙进已《东北民族源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 1987。
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王力《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 1998。
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 1995。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希罗多德《历史》(*The Histories*),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徐莉莉、詹鄞鑫《尔雅·文词的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杨锡春《东北地名语源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

西文著作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enguin, 1986.
Boyle J. edi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5: *The Seljuq and Mongol Periods*, Cambridge Univ., 1968.
Burns T. *A History of the Ostrogoths*, Indiana Univ. 1984.

Bury J. B. *Invasions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London, 1928.

Consta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rio*, Washinton D. C.: Dumbarton Oaks, 1967.

Debets G. trans.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Afghanistan: I-II*, 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1970.

Dunlop D.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rinceton Univ., 1954.

Evans S. *A Short History of Bulgaria*,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0.

Forsyth J.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Cambridge Univ., 1992.

Gibbon 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by J. B. Bu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5.

Golden P. *Khazar Studies*,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80.

Golden P. "The People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 1990.

Grousset R.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Rutgers Univ. ,1970.

Harms R. "Uralic Languages",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22.

Hazai G. "Altaic Languages",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22

Hosking 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Harvard Univ., 1997.

Ignotus P., *Hungary*, New York: Praeger, 1972.

Jones H. L. trans.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Harvard Univ., Reprint 1988.

Kaegi W. E. *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uests*, Cambridge Univ., 1992.

Kosary D. *A History of Hungary*, Cleveland: Benjamin Franklin, 1941.

Lengyel E. *1,000 Years of Hungary*. New York: John Day, 1958,

Macartney C. *Hungary, a Short History*, Chicago: Aldine 1962.

Maenchen-Helfen O.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Univ. of Cali., 1973.

Macartney C. and Barany G. "Hungary",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20.

Marsden W. trans. and ed.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New York: Doubleday, 1948.

McCullough D. W. ed. *Chronicles of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Times, 1998.

Nemeth Gy. *A honfoglalo magyarsag kialakulasa*, Budapest, 1930.

Redgate A. E. *The Armenians*, Oxford: Blackwell, 2000.

Sinor D. *History of Hunga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6.

Sinor 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 1990.

Shnirelman V. *Who Gets the Past?*, Washinton D. C.: Woodrow Wilson, 1996.

Tacitus *The Agricola and the Germania*. New York: Penguin, 1970.

Thompson E. A. *The Huns*, Oxford: Blackwell, 1996.

Todd M.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Blackwell, 1999.

Vuorela T. *The Finno-Ugric People*, Indiana Univ., 1964.

辞书类

Akdikmen R. *Standard Turkish Dictionary*. New York: Langenscheidt, 1986.

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

Goldstein M. C. *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 Berkeley: Univ. of Cali., 1984.

Hangin J. G. *A Concise English-Mongolian Dictionary*. Indiana Univ. 1992.

骨勒茂才(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贾敬颜、朱风编《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Jacobson, S. A. *A Dictionary of the St. Lawrence Island\Siberian Yup'ik Eskimo Language*, Univ. of Alaska, 1987.

Krueger J. R. *Chuvash Manual*, Indiana Univ. 1961.

Kyiv K., Benyuch O. *Estonia-English\English-Estonian Dictionary*, New York: Hippocrene, 1994.

Magay T., Kiss L. *English-Hungarian Dictionary*, New York: Hippocrene, 1995.

Mamedov S. *English-Azerbajiani\Azerbajiani-English Dictionary*. New York: Hippocrene, 1995.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Wuolle A. *Finnish-English\English-Finnish Dictionary*, New York:

Hippocrene, 1992.
许慎《说文解字》影印本,香港,中华书局,1972。

附录一：

《金史·金国语解》

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载本国之语，得诸重译，而可解者何可阙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贱，或以疾，犹有古人尚质之风，不可文也。国姓为某，汉姓为某，后魏孝文以来已有之矣。存诸篇终，以备考索。

官称

都勃极烈，总治官名，犹汉云冢宰。

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

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

胡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

移赉勃极烈，位第三曰“移赉”。

阿买勃极烈，治城邑者。

乙室勃极烈，迎邪之官。

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称。

昃勃极烈，阴阳之官。

迭勃极烈，倅贰之职。

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也。

诸纠“详稳”，边戍之官。

诸“移里堇”，部落墟砦之首领。

详稳、移里堇，本辽语，金人因之而稍异同焉。

秃里，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

乌鲁古，牧圉之官。

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

人事

孛论出，胚胎之名。

阿胡迭，长子。骨赧，季也。蒲阳温，曰幼子。

益都，次第之通称。第九曰“乌也”，十六曰“女鲁欢”。

按答海，客之通称。

山只昆，舍人也。

散亦孛，奇男子。

撒答，老人之称也。

什古乃，瘠人。

撒合辇，黧黑之名。

保活里，侏儒。

阿里孙，貌不扬也。

阿徒罕，采薪之子。

答不也，耘田者。

阿土古，善采捕者。阿里喜，围猎也。

拔里速，角牴戏者。

阿离合懑，臂鹰鹘者。

胡鲁剌，户长。阿合，人奴也。

兀术，曰头。粘罕，心也。畏可，牙，又曰吾亦可。

盘里合，将指。

三合，人之腭也。

牙吾塔，疡疮。

蒲剌都，目赤而盲也。

石哥里，溲疾。

谩都謌，痴騃之谓。

谋良虎，无赖之名。皆不美之称也。

与人同受福曰“忽都”。以力助人曰“阿息保”。

辞不失，酒醒也。

奴申，和睦之义。

讹出虎，宽容之名也。

赛里，安乐。

迪古乃，来也。

撒八，迅速之义。

乌古出，方言曰再休，犹言再不复也。

凡事之先者曰“石伦”。以物与人已然曰“阿里白”。

吾里补，畜积之名。

习失，犹人云常川也。

凡市物已得曰“兀带”，取以名子者，犹言货取如物然也。

物象

兀典，明星。

阿邻，山。太神，高也。山之上锐者曰“哈丹”，坡陀曰“阿懒”，大而峻曰“斜鲁”。

忒邻，海也。沙忽带，舟也。

生铁曰“斡论”，釜曰“阇母”，刃曰“斜烈”。

婆卢火者槌也。

金曰“桉春”。

银术可，珠也。

布囊曰“蒲卢浑”，盆曰“阿里虎”，罐曰“活女”。

乌烈，草廪也。

沙剌，衣襟也。

活腊胡，色之赤者也。

胡剌，灶突。

物类

桓端，松。阿虎里，松子。孰辇，莲也。活离罕，羔。合喜，犬子。讹古乃，犬之有文者。斜哥，貂鼠。蒲阿，山鸡。窝谋罕，鸟卵也。

姓氏

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剌曰刘。斡勒曰石。纳剌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

其后氏族或因人变易，难以遍举，姑载其可知者云。

金国语解终。

附录二：

《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摘要）

凡白号之姓，完颜、温迪罕、夹谷、陀满、仆散、术虎、移剌荅、斡勒、斡准、把、阿不罕、卓鲁、回特、黑罕、会兰、沈谷、塞蒲里、吾古孙、石敦、卓陀、阿斯准、匹独思、潘术古、谙石剌、石古苦、缀罕、光吉剌，皆封金源郡。斐满、徒单、温敦、兀林荅、阿典、纥石烈、纳阑、孛术鲁、阿勒根、纳合、石盏、蒲鲜、古里甲、阿迭、聂摸栾、抹撚、纳坦、兀撒惹、阿鲜、把古、温古孙、耨盌、撒合烈、吾塞、和速嘉、能偃、阿里班、兀里坦、聂散、蒲速烈，皆封广平郡。吾古论、兀颜、女奚烈、独吉、黄掴、颜盏、蒲古里，必兰、斡雷、独鼎、尼厖窟窟亦作古、拓特、盍散、撒荅牙、阿速、撒刿、准土谷、纳谋鲁、业速布、安煦烈、爱申、拿可、贵益昆、温撒、梭罕、霍域，皆封陇西郡。

黑号之姓，唐括旧书作同古、蒲察、术甲、蒙古、蒲速、粘割、奥屯、斜卯、准葛、谙蛮、独虎、术鲁、磨辇、益辇、帖暖、苏孛辇，皆封彭城郡。

附录三：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摘要）

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

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

次兄为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

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

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

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

次弟为侯氏，后改为亥氏。

七族之兴，自此起也。

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

又命疏属曰车焜氏，后改为车氏。

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高祖革之，各以职司从事。

神元皇帝时，馀部诸姓内入者。

丘穆陵氏，后改为穆氏。

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

贺赖氏，后改为贺氏。

独孤氏，后改为刘氏。

贺楼氏，后改为楼氏。

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
是连氏，后改为连氏。
仆阑氏，后改为仆氏。
若干氏，后改为苟氏。
拔列氏，后改为梁氏。
拨略氏，后改为略氏。
若口引氏，后改为寇氏。
叱罗氏，后改为罗氏。
普陋茹氏，后改为茹氏。
贺葛氏，后改为葛氏。
是賁氏，后改为封氏。
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
可地延氏，后改为延氏。
阿鹿桓氏，后改为鹿氏。
他骆拔氏，后改为骆氏。
薄奚氏，后改为薄氏。
乌丸氏，后改为桓氏。
素和氏，后改为和氏
吐谷浑氏，依旧吐谷浑氏。
胡古口引氏，后改为侯氏。
贺若氏，依旧贺若氏。
谷浑氏，后改为浑氏。
匹娄氏，后改为娄氏。
俟力伐氏，后改为鲍氏。
吐伏卢氏，后改为卢氏。

牒云氏，后改为云氏。
是云氏，后改为是氏。
叱利氏，后改为利氏。
副吕氏，后改为副氏。
那氏，依旧那氏。
如罗氏，后改为如氏。
乞扶氏，后改为扶氏。
阿单氏，后改为单氏。
俟几氏，后改为几氏。
贺儿氏，后改为儿氏。
吐奚氏，后改为古氏。
出连氏，后改为毕氏。
庾氏，依旧庾氏。
贺拔氏，后改为何氏。
叱吕氏，后改为吕氏。
莫那娄氏，后改为莫氏。
奚斗卢氏，后改为索卢氏。
莫芦氏，后改为芦氏。
步六汗氏，后改为韩氏。
没路真氏，后改为路氏。
扈地于氏，后改为扈氏。
莫舆氏，后改为舆氏。
纥干氏，后改为干氏。
俟伏斤氏，后改为伏氏。
是楼氏，后改为高氏。

尸突氏，后改为屈氏。

沓卢氏，后改为沓氏。

嗢石阑氏，后改为石氏。

解枇氏，后改为解氏。

奇斤氏，后改为奇氏。

须卜氏，后改为卜氏。

丘林氏，后改为林氏。

大莫干氏，后改为郃氏。

尒緜氏，后改为緜氏。

盖楼氏，后改为盖氏。

素黎氏，后改为黎氏。

渴单氏，后改为单氏。

壹斗眷氏，后改为明氏。

叱门氏，后改为门氏。

宿六斤氏，后改为宿氏。

秘邗氏，后改为邗氏。

土难氏，后改为山氏。

屋引氏，后改为房氏。

树洛于氏，后改为树氏。

乙弗氏，后改为乙氏。

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有传。

南方有茂眷氏，后改为茂氏。

宥连氏，后改为云氏。

次南有纥豆陵氏，后改为窦氏。

侯莫陈氏，后改为陈氏。

厙狄氏，后改为狄氏。

太洛稽氏，后改为稽氏。

柯拔氏，后改为柯氏。

西方尉迟氏，后改为尉氏。

步鹿根氏，后改为步氏。

破多罗氏，后改为潘氏。

叱干氏，后改为薛氏。

俟奴氏，后改为俟氏。

辗迟氏，后改为展氏。

费连氏，后改为费氏。

其连氏，后改为綦氏。

去斤氏，后改为艾氏。

渴侯氏，后改为缑氏。

叱卢氏，后改为祝氏。

和稽氏，后改为缓氏。

冤赖氏，后改为就氏。

嗢盆氏，后改为温氏。

达勃氏，后改为褒氏。

独孤浑氏，后改为杜氏。

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而尉迟已下不及贺兰诸部氏。

北方贺兰，后改为贺氏。

郁都甄氏，后改为甄氏。

纥奚氏，后改为嵇氏。

越勒氏，后改为越氏。

叱奴氏，后改为狼氏。

渴烛浑氏，后改为味氏。

库褥官氏，后改为库氏。

乌洛兰氏，后改为兰氏。

一那蒌氏，后改为蒌氏。

羽弗氏，后改为羽氏。

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附录四：

《隋书》卷八十四“北狄·铁勒”(摘要)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罐、纥骨、也咥、于尼罐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达契等，一万馀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截、拨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达(中华书局点校本讹作：“何嵯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中华书局点校本讹作：“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馀。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中华书局点校本讹作：“北褥九离、伏嗢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

按：上述族名中，拔也古(伯岳吾)、覆罗、斯结(厖狄)、浑、斛薛(曷萨)、契弊(契苾)、那曷(纳葛)、薛延陀、咥勒儿(敕勒)、达契(达稽)、恩屈(按出)、阿兰(阿崙)、都波(都播)等皆易辨认；馀者亦

不难解读：

乙咥、也咥、诃咥、曷截、何嵯	即“兀者”；
韦纥、乌讙、嗢昏、纥骨	即“回纥”或“护骨”；
苏婆、苏拔、十槃	即“鲜卑”或“须卜”；
蒙陈、蔑促	即“靺羯”；
薄落职、北褥	即“拨略”；
仆骨、拔忽	即“仆固”；
于尼讙	即“乌罗浑”；
吐如纥	即“同罗”；
隆忽	即“术和”；
曷比悉、也未	即“渥巴锡”或“阿巴噶”；
九离伏	即“且末”或“吉里迷”；
渴达	即“渴单”；
羯三	即“迟散”或“诸申”；
具海	即“昭武”。

此外，“比干”可能就是魏姓“豁邗”、“苏路”即魏姓“素黎”、“索咽”或许同魏姓“是引”。此三族名不常见。

附录五：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
“北狄列传·室韦、黑水靺鞨、渤海”

室韦，契丹别种，东胡之北边，盖丁零苗裔也。地据黄龙北，傍猛越河，直京师东北七千里，东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其国无君长，惟大酋，皆号“莫贺咄”，摄筦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不税敛。每弋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不相臣制，故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其气候多寒，夏雾雨，冬霜霰。其俗，富人以五色珠垂领，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土少金铁，率资于高丽。器有角弓、楛矢，人尤善射。每溽夏，西保貢勃、次对二山。山多草木鸟兽，然苦飞蚊，则巢居以避。酋帅死，以子弟继，无则推豪桀立之。率乘牛车，蘧蒢为室，度水则束薪为桴，或以皮为舟。马皆草鞯、绳羁靮。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蘧蒢覆，徙则载而行。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其语言，靺鞨也。

分部凡二十馀。曰岭西部、山北部、黄头部，强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莫部、讷北部、骆丹部：悉处柳城东北，近者三千，远六千里而赢。最西有乌素固部，与回纥接，当俱伦泊之西南。自

泊而东有移塞没部；稍东有塞曷支部，最强部也，居啜河之阴，亦曰燕支河；益东有和解部、乌罗护部、那礼部、岭西部，直北曰讷比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河出俱伦，迤而东；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东合那河、忽汗河，又东贯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东注于海。猛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其北有东室韦，盖乌丸东南鄙馀人也。

贞观五年，始来贡丰貂，后再入朝。长寿二年叛，将军李多祚击定之。景龙初，复朝献，请助讨突厥。开元、天宝间，凡十朝献，大历中十一。贞元四年，与奚共寇振武，节度使唐朝臣方郊劳天子使者，惊而走军，室韦执诏使，大杀掠而去。明年，使者来谢。大和中三朝献。大中中一来。咸通时，大酋怛烈与奚皆遣使至京师，然非显夷后，史官失传。

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于山西，北注它漏河；稍东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东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东曰白山部。部间远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

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寖微无闻焉，遗人迸入渤海。唯黑水完强，分十六落，以南北称，盖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劲健，善步战，常能患它部。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性忍悍，善射猎，无忧戚，贵壮贱老。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以溺盥面，于夷狄最浊秽。死者埋之，无棺椁，杀所乘马以祭。其酋曰大莫拂瞒咄，世相承为长。无书契。其矢

石镞，长二寸，盖楛砮遗法。畜多豕，无牛羊。有车马，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土多貂鼠、白兔、白鹰。有盐泉，气蒸薄，盐凝树颠。

武德五年，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

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献诚，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讫帝世，朝献者十五。大历世凡七，贞元一来，元和中再。

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亦号屈设，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西抵室韦，南北袤二千里，东西千里。拂涅、铁利、虞娄、越喜时时通中国，而郡利，屈设、莫曳皆不能自通。今存其朝京师者附左方。

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

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翔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馀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

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十馀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扶馀、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中宗时，使侍御史张行岌招慰，祚荣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

玄宗开元七年，祚荣死，其国私谥为高王。子武艺立，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赐典册袭王并所领。未几，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长史临总。武艺召其下谋曰："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门艺及舅任雅相发兵击黑水。门艺尝质京师，知利害，谓武艺曰："黑水请吏而我击之，是背唐也。唐，大国，兵万倍我，与之产怨，我且亡。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王将违之，不可。"武艺不从。兵至境，又以书固谏。武艺怒，遣从兄壹夏代将，召门艺，将杀之。门艺惧，儳路自归，诏拜左骁卫将军。武艺使使暴门艺罪恶，请诛之。有诏处之安西，好报曰："门艺穷来归我，谊不可杀，已投之恶地。"并留使者不遣，别诏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谕旨。武艺知之，上书斥言："陛下不当以妄示天下"，意必杀门艺。帝怒道邃、复漏言国事，皆左除，而阳斥门艺以报。

后十年，武艺遣大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帝驰遣门艺发幽州

兵击之。使太仆卿金思兰使新罗，督兵攻其南。会大寒，雪袤丈，士冻死过半，无功而还。武艺望其弟不已，募客入东都狙刺于道。门艺格之，得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杀之。

武艺死，其国私谥武王。子钦茂立，改年大兴，有诏嗣王及所领，钦茂因是赦境内。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讫帝世，朝献者二十九。宝应元年，诏以渤海为国，钦茂王之，进检校太尉。大历中，二十五来，以日本舞女十一献诸朝。贞元时，东南徙东京。钦茂死，私谥文王。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一岁，猜虐，国人杀之。推宏临子华玙为王，复还上京，改年中兴。死，谥曰成王。

钦茂少子嵩邻立，改年正历，有诏授右骁卫大将军，嗣王。建中、贞元间凡四来。死，谥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谥定王。弟言义立，改年硃雀，并袭王如故事。死，谥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岁死，谥简王。从父仁秀立，改年建兴，其四世祖野勃，祚荣弟也。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诏检校司空、袭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献，长庆四，宝历凡再。大和四年，仁秀死，谥宣王。子新德蚤死，孙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诏袭爵。终文宗世来朝十二，会昌凡四。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锡立。咸通时，三朝献。

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领庐、显、铁、汤、荣、兴六州。獩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领沃、睛、椒三州。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渌府，领神、桓、丰、正四州；曰长岭府，领瑕、河二州。扶

馀故地为扶馀府，常屯劲兵扞契丹，领扶、仙二州；鄚颉府领鄚、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领定、潘二州；安边府领安、琼二州。率宾故地为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领伊、蒙、沱、黑、比五州。铁利故地为铁利府，领广、汾、蒲、海、义、归六州。越喜故地为怀远府，领达、越、怀、纪、富、美、福、邪、芝九州；安远府领宁、郿、慕、常四州。又郢、铜、涑三州为独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渌，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扶馀，契丹道也。

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其命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贵妃”，长子曰“副王”，诸子曰“王子”。官有宣诏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谏议居之。中台省，右相、右平章事、内史、诏诰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内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仆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义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仓、膳部，部有郎中、员外；右六司，智、礼、信部，支司戎、计、水部，卿、郎准左：以比六官。中正台，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属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监。令、监皆有少。太常、司宾、大农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监有监长。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员有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各大将军一、将军一。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如此。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

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馀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庐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都之李，乐游之梨。馀俗与高丽、契

丹略等。幽州节度府与相聘问，自营、平距京师盖八千里而远。后朝贡至否，史家失传，故叛附无考焉。

附录六：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摘要）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乐平。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县九：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泽在县西。莽曰循虏。上禄，故道，莽曰善治。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汉，行五百二十里。莽曰乐平亭。平乐道，沮，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过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莽曰杨德。

陇西郡，秦置。莽曰厌戎。户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铁官、盐官。县十一：狄道，白石山在东。莽曰操虏。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莽曰亭道。首阳，《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谓水所出，东至船司空入河，过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予道，莽曰德道。大夏，莽曰顺夏。羌道，羌水出塞外，南至阴平入白水，过郡三，行六百里。襄武，莽曰相桓。临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东入河。《禹贡》西顷山在县西，南部都尉治也。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县十三：允吾，乌亭逆水出参街谷，东至枝阳入湟。莽曰修远。浩亹，浩亹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莽曰兴武。令居，涧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莽曰罕虏。枝阳，金城，莽曰金屏。榆中，枹罕，白石，离水出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莽曰顺砾。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过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

安夷，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修远。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莽曰盐羌。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户六万三百七十，口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开，绵诸道，阿阳，略阳道，冀，《禹贡》砆圄山在县南梧中聚。莽曰冀治。勇士，属国都尉治满福。莽曰纪德。成纪，清水，莽曰识睦。奉捷，陇，豲道，骑都尉治密艾亭。兰干。莽曰兰盾。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莽曰张掖。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县十：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张掖，武威，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野泽。休屠，莽曰晏然。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揟次，莽曰播德。鸾乌，扑剸，莽曰敷虏。媪围，苍松，南山，松陕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莽曰射楚。宣威。

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设屏。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县十：觻得，千金渠西至东涫入泽中。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官式。昭武，莽曰渠武。删丹，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莽曰贯虏。氐池，莽曰否武。屋兰，莽曰传武。日勒，都尉治泽索谷。莽曰勒治。骊靬，莽曰揭虏。番和，农都尉治。莽曰罗虏。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戎。显美。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辅平。户万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万六千七百二十六。县九：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莽曰显德。表是，莽曰载武。乐涫，莽曰乐亭。天陈，玉门，莽曰辅平亭。会水，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莽曰萧武。池头，绥弥，乾齐。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测虏。

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

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县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穀，渊泉，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高平，莽曰铺睦。复累，安俾，抚夷，莽曰抚宁。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泾阳，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过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临泾，莽曰监泾。卤，灌水出西。乌氏，乌水出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阴密，《诗》密人国。有嚣安亭。安定，参繇，主骑都尉治。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莽曰广延亭。阴槃，安武，莽曰安桓。祖厉，莽曰乡礼。爰得，眴卷，河水别出为河沟，东至富平北入河。彭阳，鹑阴，月氏道。莽曰月顺。

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户六万四千四百六十一，口二十一万六百八十八。县十九：马领，直路，沮水出西，东入洛。灵武，莽曰威成亭。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莽曰特武。灵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号非苑。莽曰令周。眴衍，方渠，除道，莽曰通道。五街，莽曰吾街。鹑孤，归德，洛水出北蛮夷中，入河。有堵苑、白马苑。回获，略畔道，莽曰延年道。泥阳，莽曰泥阴。郁郅，泥水出北蛮夷中。有牧师菟官。莽曰功著。义渠道，莽曰义沟。弋居，有盐官。大要，廉。卑移山在西北。莽曰西河亭。

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翟国，七月复故。匈归都尉治塞外匈归障。属并州。户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八。县二十三：肤施，有五龙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独乐，有盐民。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畴。木禾，平都，浅水，莽曰广信。京室，莽曰积粟。洛都，莽曰卑顺。白土，圜水出西，东入河。莽曰黄土。襄洛，莽曰上党亭。原都，漆垣，莽曰漆墙。奢延，莽曰奢节。雕阴，推邪，莽曰排邪。桢林，莽曰桢干。高望，

北部都尉治。莽曰坚甯。雕阴道，龟兹，属国都尉治。有盐官。定阳，高奴，有洧水，可糜。莽曰利平。望松，北部都尉治。宜都。莽曰坚宁小邑。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埤是。莽曰归新。属并州。户十三万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万八千八百三十六。县三十六：富昌，有盐官。莽曰富成。驺虞，鹄泽，平定，莽曰阴平亭。美稷，属国都尉治。中阳，乐街，莽曰截虏。徒经，莽曰廉耻。皋狼，大成，莽曰好成。广田，莽曰广翰。圜阴，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阴。益阑，莽曰香阑。平周，鸿门，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出也。蔺，宣武，莽曰讨貉。千章，增山，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圜阳，广衍，武车，莽曰桓车。虎猛，西部都尉治。离石，穀罗，武泽在西北。饶，莽曰饶衍。方利，莽曰广德。隰成，莽曰慈平亭。临水，莽曰监水。土军，西都，莽曰五原亭。平陆，阴山，莽曰山宁。鲵是，莽曰伏鲵。博陵，莽曰助桓。盐官。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开。西部都尉治窳浑。莽曰沟搜。属并州。户三万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万六千六百二十八。县十：三封，武帝元狩三年城。朔方，金连盐泽、青盐泽皆在南。莽曰武符。修都，临河，莽曰监河。呼遒，窳浑，有道西北出鸡鹿塞。屠申泽在东。莽曰极武。渠搜，中部都尉治。莽曰沟搜。沃野，武帝元狩三年城。有盐官。莽曰绥武。广牧，东部都尉治。莽曰盐官。临戎。武帝元朔五年城。莽曰推武。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东部都尉治稒阳。莽曰获降。属并州。户三万九千三百二十二，口二十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县十六：九原，莽曰成平。固陵，莽曰固调。五源，莽曰填河亭。临沃，莽曰振武。文国，莽曰繁聚。河阴，蒲泽，属国都尉治。南兴，莽曰南利。武都，莽曰桓都。宜梁，曼柏，莽曰延柏。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有盐官。莽曰艾虏。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莽曰固阴。莫魁，西安阳，莽曰鄣安。河目。

云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属并州。户三万八千三百三，口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县十一：云中，莽曰远服。咸阳，莽曰贲武。陶林，东部都尉治。桢陵，缘胡山在西北。西部都尉治。莽曰桢陆。犊和，沙陵，莽曰希恩。原阳，沙南，北舆，中部都尉治。武泉，莽曰顺泉。阳寿。莽曰常得。

定襄郡，高帝置。莽曰得降。属并州。户三万八千五百五十九，口十六万三千一百四十四。县一十二：成乐，桐过，莽曰椅桐。都武，莽曰通德。武进，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西部都尉治。莽曰伐蛮。襄阴，武皋，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中部都尉治。莽曰永武。骆，莽曰遮要。定陶，莽曰迎符。武城，莽曰桓就。武要，东部都尉治。莽曰厌胡。定襄，莽曰著武。复陆。莽曰闻武。

雁门郡，秦置。句注山在阴馆。莽曰填狄。属并州。户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县十四：善无，莽曰阴馆。沃阳，盐泽在东北，有长丞。西部都尉治。莽曰敬阳。繁畤，莽曰当要。中陵，莽曰遮害。阴馆，楼烦乡。景帝后三年置。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过郡六，行千一百里。莽曰富代。楼烦，有盐官。武州，莽曰桓州，滎陶，剧阳，莽曰善阳。崞，莽曰崞张。平城，东部都尉治。莽曰平顺。埒，莽曰填狄亭。马邑，莽曰章昭。强阴。诸闻泽在东北。莽曰伏阴。

代郡，秦置。莽曰厌狄。有五原关、常山关。属幽州。户五万六千七百七十一，口二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县十八：桑乾，莽曰安德。道人，莽曰道仁。当城，高柳，西部都尉治。马城，东部都尉治。班氏，秦地图书班氏。莽曰班副。延陵，狋氏，莽曰狋聚。且如，于延水出塞外，东至宁入沽。中部都尉治。平邑，莽曰平胡。阳原，东安阳，莽曰竟安。参合，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莽曰平葆。代，莽曰厌狄亭。灵丘，滱河东至文安入大河，过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广昌，涞水东南至容城入河，过郡三，行五百里，并州浸。莽曰广屏。卤城，虖池河东至参户入虖池别，过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从

河东至文安入海，过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莽曰鲁盾。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调。属幽州。户三万六千八，口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二。县十五：沮阳，莽曰沮阴。泉上，莽曰塞泉。潘，莽曰树武。军都，温馀水东至路，南入沽。居庸，有关。雎脊，夷舆，莽曰朔调亭。宁，西部都尉治。莽曰博康。昌平，莽曰长昌。广宁，莽曰广康。涿鹿，莽曰拓陆。且居，阳乐水出东，南入沽。莽曰久居。茹，莽曰穀武。女祁，东部都尉治。莽曰祁。下落。莽曰下忠。

渔阳郡，秦置。莽曰通路。属幽州。户六万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万四千一百一十六。县十二：渔阳，沽水出塞外。东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有铁官。莽曰得渔。狐奴，莽曰举符。路，莽曰通路亭。雍奴，泉州，有盐官。莽曰泉调。平谷，安乐，厖奚，莽曰敦德。犷平，莽曰平犷。要阳，都尉治。莽曰要术。白檀，洫水出北蛮夷。滑盐。莽曰匡德。

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顺。属幽州。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万七百八十。县十六：平刚，无终，故无终子国。浭水西至雍奴入海，过郡二，行六百五十里。石成，延陵，莽曰铺武。俊靡，灤水南至无终东入庚。莽曰俊麻。賛，都尉治。莽曰裒睦。徐无，莽曰北顺亭。字，榆水出东。土根，白狼，莽曰伏狄。夕阳，有铁官。莽曰夕阴。昌城，莽曰淑武。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莽曰揭石。广成，莽曰平虏。聚阳，莽曰笃睦。平明。莽曰平阳。

辽西郡，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属幽州。户七万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县十四：且虑，有高庙。莽曰鉏虑。海阳，龙鲜水东入封大水。封大水，缓虚水皆南入海。有盐官。新安平。夷水东入塞外。柳城，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肥如，玄水东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阳。又有卢水，南入玄。莽曰肥而。宾从，莽曰勉武。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东部都尉治。莽曰禽虏。阳乐，狐苏，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徒河，莽曰河福。文成，莽曰言虏。临

渝，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冯德。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宾水，皆南入官。莽曰选武。

辽东郡，秦置。属幽州。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襄平。有牧师官。莽曰昌平。新昌，无虑，西部都尉治。望平，大辽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莽曰长说。房，候城，中部都尉治。辽队，莽曰顺睦。辽阳，大梁水西南至辽阳入辽。莽曰辽阴。险渎，居就，室伪山，室伪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高显，安市，武次，东部都尉治。莽曰桓次。平郭，有铁官、盐官。西安平，莽曰北安平。文，莽曰文亭。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沓氏。

后　记

本书探讨了若干与中国北方诸族相关的重要问题:即寻找它们的“源”和辨析它们的“流”。北方诸族迁徙的能动力是无与伦比的;然而,许多它们的征伐活动都被移接到其他人种—民族的名下去了。纪元前出现在东欧和中近东地区的 Cimmerian、Scythian、Sarmatae 人,被说成是“伊朗人种的游牧部落”;甚至那些出自河西走廊的“月氏”和“乌孙”民族也被指认为“印欧人种”。我从语言线索出发,为这些甚至在史前期就远徙四方的人类集团找到了源头:他们是出自中原的北方诸族;不仅中华民族,世界上许多民族多融有他们血缘基因。

所谓“民族”,实有“血族”和“语族”之分。远古时,由于部落隔绝、人口稀少和近亲遗传,使人类的体征、语言,或种属发生分离。语言则是在血缘集团中内向地发育完备的,因此那个时代“血族”和“语族”可能是基本一致的。直到了人类生产、迁徙能力增强时,血缘才开始在较大范围内交叉。外向的远缘繁殖使人类体质和智力发生飞跃。而在某些“强势部落”和“强势语言”的影响下,一些大规模的“民族”——实为“语族”开始形成,而“血族”的概念则渐渐淡漠。如“汉族”就只是一个“语族”而已,其“血缘”则早已无法辨析。概言之,人类之初可能主要是处于“离析”的状态,而后世则处在“融合”的趋势中。

在基因科学如此进步的今天，人类生理、病理和遗传等艰深问题的解决，都是指日可待的了；而人类对自身由来的认识，却依然遥遥无期。近一万年人类的活动只是它的历史的最后几页，而我们对它的理解却是千头万绪。从生命科学的成果来看，不同人类种属间的基因区别极其微小，而且这种微弱差异又被人类融合的过程稀释到难以察觉的程度。因此，那些包括传说在内的历史记载，必然包含了解决上述课题的语言线索；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强势进展面前，仍然保有它的不可与缺的一席之地。

我一向对这些动人的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脑子里有的也只是一片混沌的概念，而且从来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打算。一次偶然的机会，将我引上了深入这项研究的不归之路。1996 年夏天，为识得一个蒙古字之读音，打电话给蒙古国驻美国大使馆求教，商务参赞纳兰胡（意为“太阳之子”）先生竟与我闲聊了两个多钟头。纳兰胡先生之父是长期驻节原苏联外交官，因此他自幼长在俄罗斯，受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外文系，英俄两语俱佳；其岳父又是蒙古著名的鲜卑史专家，耳濡目染，对于史学亦颇有见解。他告诉我匈牙利语与蒙古语很接近，还说匈牙利国内年轻的一代，正在与传统势力斗争，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蒙古的。

纳兰胡先生寄来载于 1995 年 2 月 6 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一篇题为 *Hungry of Their Roots* 的文章，说的就是匈牙利年轻一代“饥渴地寻根”的热潮。Hungary（匈牙利）与 Hungry（饥渴）仅一字之差，该标题实际是一个英文文字游戏。这篇《饥渴》文章说：

在共产主义的年代里，苏联学者支持匈牙利人和芬兰人

是源自于苏联境内的乌拉尔山地区，因为这个假设或多或少有利于将匈牙利套在苏联的轨道上。但是，新的研究已经开始质疑这个假设，匈牙利人正在朝更远的东方去寻找他们的文化之源。

这篇文章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公道地说，前苏联学者的纯学术态度是高尚的。匈牙利和芬兰民族的祖先发源于乌拉尔山的理论，是源于一些西欧学者的早期研究，后来才为芬兰学者所认同，而目前为一些匈牙利和西方学者所坚持。对于这个学术观点，前苏联学者也并没有表现出比西方学者更高的热情。美国传媒精于的“突出政治”、“无限上纲”的“冷战”型报道则是众所皆知的。

比如，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的，匈裔犹太人学者 Denis Sinor，很早便移居国外，但他是上述观点的“权威”支持者之一。匈牙利罗兰(Eotvos Lorand)大学的 Gy. Kara 教授，以及《大英百科全书》也都在鼓吹这种理论。如果说这都是在为前苏联的政治服务，显然是荒谬的。客观一点说，《邮报》是用“戴红帽子”的方法，为匈牙利的一代新人发泄他们对行将逝去的一代学术专制的怨忿，顺便也捞上一把政治油水。

《饥渴》一文描绘了一群匈牙利大学生学习“中亚学”的热潮，和罗兰大学里西藏语和蒙古语的课堂爆满的情景。这篇报道表现美国大报记者善于速成的聪明才智，它不失精确地介绍了公元896年左右，Magyar 人从东方闯进喀尔巴阡盆地的那段已知的历史，以及种种关于 Magyar 人未知的祖源的说法。它说：

在中断了七十九年后，最近的研究重新又开始于1986

年，中国政府允许匈牙利学者回到乌鲁木齐以东三十英里处的墓地进行研究，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省的墓地，是在1907年为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所发现的。匈牙利学者们在那里发掘了一千二百座墓葬，他们发现这些出土的文物与9至10世纪间的匈牙利墓葬物相似，墓中陪葬武器的排列，掩埋的方式，以及文字书写的形式均相一致。著名的匈牙利民族学者基斯利(Istvan Kiszely)说："这些地方竟埋藏了人们从未领略过的秘密"。

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按：实际是在甘肃省)，基斯利和其他学者们碰到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在中国被称为"裕固"的民族，它与新疆地区也使用突厥语的维吾尔族有所不同。科学家们发现，这个人数仅九千人的裕固族的七十三首民歌，都是五音阶的；那些被世界著名的作曲家B. 巴托克普及了的匈牙利民歌也都是用五音阶作成的。(按：这个结果是中国音乐学家杜亚雄教授首先发现的。)

基斯利说："我们找到了最后一个会唱这些民歌的妇女，她唱得就和我们匈牙利人一模一样"。基斯利还说，裕固族在若干个世纪以前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却依然保存了萨满教的巫医治病的传统。(按：裕固族不信伊斯兰教。)他们所用的念咒语的方式，在11世纪以前尚未接受基督教的匈牙利也很普遍。基斯利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寻到了自己的根，但是我们必须回来反复的确证它"。基斯利说，他认为古匈牙利人不迟于5世纪才离开新疆地区，以后则一路走走停停，经过了几个世纪，中途又融入了古芬兰人，演变了他们原先的语言，最后才到达他们今天欧洲的家。

文章还说：

> 一个名叫尤迪特·色楞格(Judit Szelenge)的专修蒙古语的女学生，曾在几年前去蒙古，因为她感到两种人民间有一种无形的联系。她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他们一起回到布达佩斯，都在该大学里做研究。她说："我知道匈牙利人不是欧洲人，我们有许多与亚洲人共同的东西，特别是与蒙古人。"

她的一段话，就成了这篇《饥渴》报道的"副标题"：

I know that Hungarians are not a European people.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Asian people,
especially with the Mongolians.

Magyar 人的先祖肯定是从东方迁移来的一个民族集团。如果他们还是一副亚洲人的样子，问题可能会变得索然无味。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那种"西方人"的外形，和"东方人"的内涵，及曾经游牧于欧亚草原的无可奉告的历史，使得假设可以更为大胆，而求证则必须甚为小心。然而，除去科学性以外，还往往牵涉人们的感情。蓝色的多瑙河畔的人们，是否会苦思这样一个难题：难道我们会是来自苦旱的蒙古高原的吗？难道我们的祖先是那些高颧塌鼻的蒙古人吗？

《饥渴》报道的是若干争论。基斯利教授说"裕固族"的祖先

可能是他们的根；而色楞格女士则更认同“蒙古人”。裕固族是“回纥”的后代，他们从蒙古高原中部迁徙到甘肃地区，是公元840年后的事；而蒙古民族是12、13世纪间，以成吉思汗的蒙古部为核心融合成的。匈牙利人在9世纪末进入中欧地区之前，还曾在欧亚草原上游荡了几百年。如果“回纥”是其祖先，他们则应出自“蒙古高原”；如果“蒙古”是其所宗，他们则应来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地方。

经此番启迪，我兴致大发。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比较完了半本“英匈字典”和“英蒙字典”，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数百个几乎完全相同的对应词汇，当时我几乎已经认定匈牙利人必是源自蒙古族，并准备要写一篇论文发表了。然而又一偶然事件改变了我的思路和结论。

1996年感恩节，我去洛杉矶省亲，在蒙特利公园市的一家中国书店中，掘得一部《金史》。说来也巧，老板唐一国先生是家姐朱学文女士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班同学，大家相见甚欢。《金史》的最后一编为《金国语解》，其中罗列了七十七个金代女真语词汇。回到家中，经过几个星期的揣摸和比较，发现女真语竟比蒙古语还要更接近匈牙利语。我开始意识到：匈牙利的族名和国号Magyar（读作“马扎尔”），或许就是女真—满族的祖名“靺鞨”（亦作“靺羯”），而Magyar人与满族是同源的。以后又进一步发现了支持这个结论的大量证据，终于于1997年夏，作就了平生第一篇史学论文《Magyar人的远东祖源》。

文章写成后，首先寄给了著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德刚先生道德文章闻名天下，年过八旬而又谐趣风生。据其夫人说，他在接到文章后的当天，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唐先生在电话里，用极重

的合肥话与我长谈，他说："你的文章是一篇绝好博士论文"，他说他也曾有过 Magyar 即"靺鞨"的想法，可惜没有深入下去。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未有与唐先生谋面。

受此鼓励，又把文章寄给国内杂志，然而却遭遇了重重的困难。非议如："不合体例"，"未曾听说"；或"某字拼法有误"，"匈牙利会有什么反映"，"洋人有如何看法"云云；怕见笑于世界，受讥于学界。总之，无自信乃我民族之劣质也。很荣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亚问题专家余太山教授，颇能接受我的观点、方法和结论，不仅予我许多鼓励，还竭力四方推荐。回想起他的热情和真挚，令人感佩。

自然科学家要敏锐些，老朋友赵忠贤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超导电体物理学家）得悉我的文章得不到发表，颇为叹惜地说了一件事：他有一位研究生，发现了一个经验公式，只需有某种物质的几个数据，便可大致确定其是否可能有高温超导性，在有所舍取后，再行实验，既省钱又省事。该生投稿《中国科学》，竟被以"理论不完善"为由而拒用。他不得已而转投著名的美国《应用物理》杂志，却立即被录用。现在这个公式已被寻找高温超导体的各国同行广泛使用。

学弟陈良尧博士小我七、八岁，我在做"博士后"时，他尚未结业。他极干练忠厚，对学问和世事又见地极深。回国后以诸多成就，荣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之一，后又担任该校信息工程学院院长。他为鼓励我继续探索，于万忙中将这篇数万字的文章输入电脑，还寄来中文软件，使我从此走上了电脑写作之路。后来见到漂亮的版面时，才想及德刚先生当初读我手抄本时的艰辛。

总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博士主编的

《世界民族》杂志，于1998年第二期刊登了这篇长文，可惜所有的附录都被略去了。后来《欧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满语研究》等杂志，也都刊出了我的若干后续文章。1999年，由芬兰、土耳其和韩国学者主编的，在汉城出版的《国际中亚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用相当大的篇幅，全文发表了它的英文稿。近年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黑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社科院、中山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进行了学术交流，我的方法和结论引起相关学界的注意。2001年，在布达佩斯讲演更引起了匈牙利学界的高度重视；是年底该国*TURAN*杂志又将它译成匈牙利语后全文刊出。我想任何学术成果的认识和传播，都是要消磨时间和耐心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主任柴剑虹教授，很早就与我约稿成书。但线索一旦展开，课题迅速发展到通古斯、鲜卑民族及语言、西域族国名和北方汉语的起源等问题，思潮如涌，很不容易收敛；有的文章杀青了，又言犹未尽。所以拖到今天才终于决心“打住”，给自己留了一条“出路”。

在毫无警觉中，人生已经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六十个年头；慈祥的母亲早早地逝去了；我少小离家，却陪侍了父亲生前最后的八年，享受了他对我的风烛之爱。世界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谈镐生(H. S. Tan)院士是我的导师，他对我有过真挚的期许；中学时代李锦珍女士和施嘉惠先生教授我数学和英文，他们的人格、学养和风度始终是我人生的楷模，他们也都期待过我有所建树。盼望本书能早日出版，我将亲手奉献给这些形同父母的师表们。

在整整的五年中，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v)的钢琴协奏曲，始终陪伴着我；感谢这些永恒人间的起伏旋律，竟在孤独平庸

的思绪中漾起了激情波澜。

2002 年 10 月 20 日补充订正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E HANXUE LUNCONG

ISBN 7-101-03336-9

9 787101 033366 >

定价：26.00元